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马茨·艾尔维森（Mats Alvesson）
卡伊·舍尔德贝里（Kaj Sköldberg） 著
陈仁仁 译



ZHIXING YANJIU DE LILUN SHIJIAO YIZHONG FANSHENXING DE FANGFALUN

■ 本书清晰地揭示了经验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与不同的研究传统之间的关联，为理论结构与经验研究之间更具思想开放性与创造性的互动指明了途径，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学生与研究者的基本读物。

■ 全书评述并批判性地讨论了一些主要学派，突出了它们在经验研究中的问题与可能性。作者对主要学派，如建构理论、解释学、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会话分析、系谱学与女权主义等，给出了同等的评述，尤其关注文化、语言、选择性理解、认知与意识形态的主观形式是如何渗入科学活动的。

■ 本书大部分内容讨论的是反身性方法论的发展与例证。反身性是研究过程的基本要素，它为实地研究的成功解释与深刻结论的进展提供了必要的视域。反省包括哲学反思与对研究者的假定的问题化、解释以及与经验材料的互动。

发表及参阅相关讨论，请登录：

万卷方法与学术规范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4889-1

9 787562 448891 >

定价：39.00元

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主编：陈向明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马茨·艾尔维森（Mats Alvesson）
卡伊·舍尔德贝里（Kaj Sköldberg） 著
陈仁仁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美)艾尔维森(Alvesson, M.),(美)舍尔德贝里(Sköldberg, K.)著;陈仁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7
(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书名原文: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24-4889-1

Ⅰ.质… Ⅱ.①艾…②舍…③陈… 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Ⅳ.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1454 号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马茨·艾尔维森(Mats Alvesson)
卡伊·舍尔德贝里(Kaj Sköldberg) 著
陈仁仁 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邬小梅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1.875 字数:351千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889-1 定价:39.00 元

万卷方法学术委员会

前言

本书的目的是尝试在社会科学中推进一种更具反思性的/反身性的(reflective/reflexive)研究方法。我们在后面将区分"反思性的"与"反身性的",而这里是把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的。关于"反思性的方法",我们的意思是给予经验研究的解释性、政治性以及修辞性以应有的关注。这就要求研究者们自觉地深入了解诸多领域:深入了解解释行为,深入了解社会科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伦理的问题,以及深入了解他们自己的"资料"结构或者他们所谈论和理解的经验材料。这还意味着将这些深入了解的知识引入到他们的经验研究工作中去。因而反思(反身)首先是这样一个问题:完全承认研究者的文本与其所研究的实在之间令人讨厌的含糊关系。反思意味着解释某人自己的解释,从其他视角来看待某人自己的观点,以及对某人自己作为解释者与作者的权威作自我批判。

我们的计划可以这样表述,要么通过综合科学哲学的观念与结论,来提高质性方法的水平,而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至关重要且具连续性的因素;要么努力将抽象的哲学(元)理论、概念与观念降低到一种在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语境中变得互相相关和易于处理的层面上。这一计划也可以说成是质性方法的理智化或者科学哲学的实用化。而且在这一说法中,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哲学专家或者研究方法论技术与规则的专家。我们的兴趣与能力在于抽象的哲学与狭隘的方法问题之间的领域。

想要通过写一本书来把属于科学哲学的主题与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质性方法问题连结起来,这个任务实在不易完成。希望读者不要这样来要求我们:要么像职业哲学家那样通晓科学哲学中整个古典与现代的趋势,要么像方法论专家那样对近年出现的关于质性方法的各种各样技术性专著有广泛的了解。我们尽量使自己熟悉大量文献,而且我们的计划跨越了学术学科范畴的传统边界。我们的目标对象并

不是某一特定的读者层,而是社会与行为科学中广泛的确有思想的研究者们。

写作此书的念头缘于我们对经验、质性的社会科学的相当广泛的经验,而且有一种巨大的兴趣培育着这一念头。自攻读研究生以来,我们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基础理论与哲学问题中一直都保持着这种兴趣。这一兴趣不断地丰富着我们各种各样的经验与理论的规划(而且这一兴趣也是它的一个部分)。下面的内容是两位职业研究者进行交锋的结果,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兴趣点有部分的不同,他们都想过一段时间再来反观他们当前在此领域中的立场,通过观点的互相辩驳来看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论。这也意味着本书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报告,只表明一种暂时性的观点与某些可能的未来走向,而不是任何最终的真理,因为研究之旅仍在继续。

马茨·艾尔维森
卡伊·舍尔德贝里

目录

第1章

导论:方法的理智化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Method

传统的研究被认为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创造正确的、客观的知识。通过现象或者通过资料、事实,以及有关“实在”的明确烙印,我们有可能获得基于经验的结论的合理而充分的基础。接下来是进行概括和理论建构。这就是长期以来被设想的研究方式,而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中许多面向经验的研究者也仍然是这样认为的,不管他们是考察“客观实在”(社会事实)还是探索人的主体或主体间的经验世界(意义)。

然而,这种看法已经遭到了大量的批评,这些批评大多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而且被引向反对“实证主义”。由于进一步的批评与各种形式的质性方法有关,所以质性方法研究者有时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反实证主义者”或至少是“非实证主义者”。我们暂时只提一下这样一种批评,它强调语言的模糊性、不稳定性与对上下文的依赖性特点,强调对建立在解释与理论之上的(免于解释的中立于理论的事实,原则上是不存在的)观察与资料的依赖,以及强调社会科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这里有一种论证线索是从认识不能脱离认识者这一观念入手的(Steedman,1991:53)。我们将要论证,资料与事实是解释的构造或解释的结果:如果要使我们的感官印象易于理解或有意义,我们就不得不对我们的感官印象做点什么。伴随着这种对客观主义者的科学的观点以及过于注重经验资料的一般性的批评,更具体的针对各种方法论概念与方法的批评就提出来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与方法已暴露在反对意见的密集攻击之下,以至于我们要期待着经验主义者们放弃他们的自信并且转换到另一种研究思路上

来。[1]但事实上,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职业研究者们仍然一如既往,要么完全压制批评,要么或多或少地依然对批评不加理睬。另一方面,许多批评家们趋向于走向相反的极端而完全不顾经验实在——尽管他们这样做正是取决于其特定的科学倾向。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在本书中大体将自己限制于此——1* 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区分:一是主流的以经验为导向的研究,一是各种各样流行的以不同哲学或理论为根据的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区分与下面的二分有重叠之处:一是坚定地采取客观主义者的本体论方法的学者,一是对本体论与认识论持有意识导向与经验导向的解释性观点的学者(Burrell and Morgan,1979)。当然其间亦有差异,因为第二种方法的某些代表人物被拉入了经验主义者的阵营。比如,某些现象主义者和其他鼓吹严格的质性方法的学者们假定了,方法的严格可以保证好的研究结果。经验主义的批评家——从科学史家、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心理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到意识形态批评家和哲学家——声称文化、语言、选择性的感知、认知的主观形式、社会习俗、政治、意识形态、权力与叙事,都以某种复杂的方式渗透到了科学活动之中。这些因素在经验实在与/或把实在的片断强行揉入研究文本这一企图之间的关系上留下了印记,以至于"实在"与"文本"(研究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往最好的方面看充其量也只是不确定,而往最坏的方面看则是任意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一论题有着各种形式,它可以是这样的:"给十个不同的研究者一个任务去考察一个完全一样的重要的研究问题,你将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说法)"(这些结果或说法,并不一定互相冲突,但是可以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模糊的)。[2]为了寻求对此一论题的支持,我们只需这样认为,尽管社会科学中大多数领域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理论,但是我们会发现经验结论一般是——至少部分是——与研究者本人的前提"相一致"的,而且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不会仅仅因为以另一理论为基础的某位研究者提出了与他们的观点相抵触的经验"资料"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

* 此处为英文版页码,全书同。

关于社会实在是如何被研究者建构——不仅仅是如何被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将在本书中得到考察。我们相信，同"反经验主义者"一样，经验社会科学比常识或传统的方法论教科书更不可靠、更有问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一点上，大量关于"质性方法"的著作并不与关于量化方法的文献有明确的区分。在对含糊的经验材料和复杂的解释充分开放的意义上，作为一条规则，以前的"质性自足(qualitative enough)"也是不可能的。对程序与技术的关注暗示着对量化方法教科书的模仿，并且把注意力从基本问题转移开去了，这些基本问题与某些因素相关联，如语言的功能，研究工作中的解释性与选择性，因而低估了对反思的需要。另一方面，过分地强调这种需要也会卷入一定的风险。通过问题化的研究，我们可能又高估了其难度，长此以往此难度将导致失败主义者的回应，或者我们甚至可能要自问经验社会科学究竟还有什么任何合理的功能。 2

但我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我们对经验材料(资料)具有对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能力满腹狐疑。我们不能确信与方法论教科书的看法——例如，在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方法论教科书声称完全可以忽略经验实在——相反的任何方式都是可取的。对于具有许多解释学与批判理论特点的经验问题的恐惧也是不可取的。我们的经验是，对充满混乱与矛盾而又常常令人惊讶、令人振奋的经验材料的研究有很多好处。正是这种来自科学哲学与经验兴趣的启发的结合提供了本书存在的理由，并且，我们相信这使得本书具有独特性。大多数相关领域——广义地界定为关于如何引导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领域——的文献要么是主要面向经验的，要么给予理论的和哲学的思考以毫不含糊的优先权。理论和哲学总是倾向于把经验研究看作零散的、无意义的、天真的乃至无效的思考。我们则试图在这两种传统的也是保险的立场之间作出策略上的调整。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立场更像某种方法论上的锡拉岩礁和卡律布迪斯(Scylla and Charybdis)*。

* Charybdis 是意大利 Messina 海峡中著名的大漩涡，它的对面就是巨岩 Scylla。Scylla and Charybdis，表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译者注

在对经验主义——这里宽泛地界定为所有以"纯资料"或不加解释的"事实"为研究的坚实基础的这种研究——的理解中,我们力图考虑到已由解释学家、批判理论家、后结构主义者、语言哲学家、话语分析家、女权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反思主义者以及其他麻烦制造者们所提出的异议。这些麻烦制造者们要么与量化方法的支持者过不去,要么又与主流的质性方法的支持者过不去。我们反对这些麻烦制造者们,他们或明或暗地使他们的读者对经验研究带着犹豫与绝望,我们则坚决认为,对于超越于研究共同体(范式、意识、文本、修辞操作)中的研究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之上的实在的存在的假定,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且,我们作为研究者对这个实在应该有点富于洞察力的见解。这种看法是与一个信念相一致的,即相信社会实在不是外在于人——包括研究者(当然也是某一社群的成员)在内的某一社群的成员——的意识和语言的。

质性与量化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质性方法。读者将会发现,我们是以一种有点非正统的方式来看待它的。"质性方法"该如何界定绝不是自明的。对公开的、模糊的经验材料及其宗旨的思考,是一个核心标准,尽管某些质性方法的确强调了分类的重要性。于是,如同量化与质性方法之间的分界线一样,标准化与非标准化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但这并不妨碍作出这种区分的有益性。3 质性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它们是从研究主体的视角与行为出发的,而量化研究则一般是从研究者对于那些应该构成了中心焦点的维度与范畴的观念出发的(Bryman,1989)。[3]我们并没有明确地拿出理由赞成质性方法而反对量化方法,尽管我们将明显对于在社会科学中,至少在它们最严格的编纂形式中,普遍采用后者表示了高度的怀疑。没有理由要特意为质性方法的存在作辩护,质性方法已经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建立起来了,甚至在某些学科中成了主导的方法(参看 Denzin and Lincoln, 1994;Silverman,1985)。

因此,我们将不会对任何关于量化与质性方法的优劣作进一步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大量的,且常常是无益的争论(Deetz,1996)。而这种争论看来也确实就要消亡了,这其中部分是因为其论据已经用尽,部分是因为两极化看来已不再像在过去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那样流行了(例如参看,Bryman,1989;Martin,1990a;Silverman,1985)。有一个通常的看法认为,量化与质性方法不能被抽象地选择,而必须与特殊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对象相关。有时——尽管据我们的观点并非总是看上去就像现在的情形——纯粹的量化方法也许是适当的,有时纯粹的质性方法是适当的,而有时需要两种方法的结合(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4]甚至在主要是质性研究的情形下,可能有时也要含有某种简单的量化才是明智的(Gherardi and Turner,1987;Silverman,1985)。尽管对社会现象的统计常常是含糊的,而且掩盖了分类所建基的社会准则(Prior,1997),但是,它们有时可能作为质性研究的背景材料有着某种价值。

在我们看来,不是方法而是本体论与认识论才是对好的社会科学起决定性作用的。这在质性研究中往往处理得更好,它考虑到了各种可能解释的含糊性,并使得研究者对所探索的对象的解释变得更加明确。不过也有例子表明量化方法的价值,在量化方法中,数字、技术以及对客观性的宣称不允许占上风,而是从属于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研究观点(其中有:Bourdieu,1984;Silverman,1985)。如果我们能避免将量化结果视作对某一"外在"实在的坚定而明确的反思这个陷阱,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激烈地"反量化"。

反思性/反身性研究

本书的意图与其说是为了论证对质性方法的赞同,不如说是为了有助于我们对所谓的"反思性或反身性的经验研究"(我们暂时把这两个概念用为同义词。研究者有时以类似的方式使用它们。我们将在后文对它们作出区分,把反身性研究视作一种特殊而详细的反思性研究,它包含着若干层面上或指向若干论题的反 4

思）。这是什么意思？根据布迪厄与沃昆特（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的观点，存在多种不同的反身性。包括作为文本的民族方法学的民族志，（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批判的现象学以及像古尔德纳和吉登斯（双重解释学）这样的学者的著作。布迪厄自己的那种反身性亦是如此。在他所谓的反身性中，研究者被认为是嵌入社群中的，他们在竞争与权力情形的特定关系中产生了特殊的"习惯"，即其成员的某种行为倾向的模式。

因而，在文献中存在着对反身性或反思性的不同运用。这通常把注意力引向了知识产生过程与此过程的不同语境及其所牵涉到的知识制造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关涉到研究工作中的至少两个层面上的操作，并且尤为关注人们如何对思考作出思考（thinks about thinking）（Maranhão，1991）。卡拉斯与斯默西奇（Calás and Smircich，1992b：240）谈到"对'知识'与'获取知识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作持续评定这种反身性"。简要地说，对我们而言，这一概念——我们将在下文探讨——意味着严肃地关注下面这种方式：不同语言的、社会的、政治的与理论的因素在知识发展的过程中被编织在一起，在此过程中，经验材料被构造、解释与书写。在反思性的模式中，经验研究是从一种怀疑方法出发的，即怀疑那表面看上去就是对"实在"的毫无疑问的摹本，而同时坚信，对这一实在作适当的（深思熟虑的）选择研究可以为知识的产生提供重要的基础，这种知识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建立"真理"而是为理解提供机会。

反思性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谨慎的解释与反思。[5]前者暗示着所有对经验资料的或详或略或细或巨的参考，都是解释的结果。因而原则上应该拒绝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度量、观察、访谈主体的陈述，以及对二级资料如统计学的或档案的资料的研究，与任何一种外在的经验材料都有一种明确的或毫无疑问的关系。考虑到解释的根本重要性意味着不得不放弃关于"实在"或"经验事实"与研究结果（文本）之间的简单的反映式设定。解释被带到了研究工作的最前线。这需要最大限度地意识到理论上的设定，语言与前理解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构成了主要的决定性的解释。这第二个特征，反思，把"向内的（inwards）"注意力转向

了研究者个体,相关的研究团体,作为整体的社群,知识与文化传统,研究语境中的语言与叙述(表象形式)的核心重要性与性质问题。若干不同层面上的系统的反思能够赋予解释以某种能理解经验研究之价值的特性。在经验研究的语境中,反思可以界定为对解释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interpretation),和对某人自己所作的对经验材料(包括其结构)的解释开展批评性的自我探察。反思可能意味着我们不断地思考解释工作里面与背后的各种基本维度,这种思考才叫反思。我们将在本书中指出一些反思的标准与原则,我们所把握的这些标准与原则能够统一并刺激到经验研究中。

因此,在反思性的经验研究中,重心从处理经验材料尽可能地转向了思考感知的、认知的、理论的、语言的、内在文本的、政治的与文化的环境,这些构成了解释的背景,也注入到解释之中。这些环境使解释得以可能,但在不同程度上,它们也意味着研究部分地变成了某种天真而不自觉的事业。例如,研究者要澄清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研究共同体和语言中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与盲点,这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而,我们的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努力刺激批判性的反思与自觉,这首先就是关涉质性研究的。[6]经验材料——关于"实在"的解释——依然重要,但是,在形成任何一种关于某种"实在"的观点之前,我们必须谨慎地在反思中前行,要更多地沉思经验材料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恰恰作出这些特殊的解释。研究的过程形成了对社会实在的(重新)构造。在社会实在中,研究者既与被研究的行为者互动,又通过积极的解释不断地为他们自己和别人塑造形象:这些形象有选择性地强调了条件与过程——经验、情形、关系——如何能被理解,然后抑制了可供选择的解释的某些可能性。本书的目标是要指出研究工作的资料结构(解释)与文本制造(作者身份)中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并且以如同刺激自觉意识那样来将这些主题概念化,以及在研究过程中,要提供关于计划、解释与写作中的谨慎与反思的观念。

当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读者要说我们幻想万能之前,我们也许应该再说一句:这本书自然不是从零开始。在基本方式上,本书是对(社会)科学哲学中的知识陈述的总结与批判

性评论，特别与社会研究、与质性方法相关。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去建立。然而，我们将努力超越简单的总结与一般化的讨论。我们也希望提供对不同立场的批判，以达到综合与发展应用的目的。而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反思因素的充分灵活与机动的指称结构的发展，提出一种做社会研究的新的方式。

许多哲学向度的讨论依然没与经验工作分离开来。许多研究者也许感觉就像梅利亚(Melia，1997：29)那样认为："以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与哲学立场之间的关联来表明其方法的合理性，这通常是有问题的。"我们承认这有着太过频繁的例子，它当然叫人颇不满意。谈及哲学的观念而不实际地运用它们是毫无意义的、令人困惑的。这意味着既浪费了研究者也浪费了他或她的读者的时间和精力。哲学观念与经验工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标志着高质量的社会研究。哲学的精密性当然不是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而没有哲学根据的反思的社会研究很容易渐渐变得没有反思性，以至于"研究"这一标签就显得有问题了。要避免如同被"理智化"的某种结果那样避免把方法论理解为研究实践中的无关紧要的部分，这当然是一个挑战。针对这种理解，即所谓的"由于方法的争论已变得更加哲学化，或至少是认识论上的，所以它们已变得越来越无益于研究了"(Media，1997：35)，我们希望贡献一种有益的讨论。由于哲学、理论上的思想与经验、实践上的灵感之源这两者之间更好的相互作用，研究就变得有效了，这种研究避免了某些缺陷，并且更加具有反思性与创造性。

反思性研究的四个要素

第2～5章讲到了方法论与科学哲学中的四种趋势：面向经验的趋势(尤其是扎根理论)、解释学、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我们将其视为重要的灵感之源。这四种倾向指明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从事的反思性领域，不管他或她更偏向于哪种特殊的方法。在这里，能对已经从不同的倾向上浮现出来的主要内容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并且对后面将要讨论的内容给出一些提示，我们就很满足了。

1 研究程序中的分类法与技术。质性研究在与经验材料的相互作用中应遵循在逻辑上有充分理由,并运用严格的技术来处理资料。这是大多数论述质性方法的著作所做的事。我们把扎根理论(Glaser and Strauss,1967)当作这种方法论观点的典型。我们也将简要地介绍民族方法学与归纳民族志(ethno-methodology and inductive ethnography)。

2 对解释的基本澄清。研究可以被视作一种基本的解释活动,与其他活动相比,或至少在更大程度上比其他活动更加意识到真正的事实。所有研究工作所包含的以及由解释者——进一步说,在社会科学中,此解释者经常思考其他解释者(被研究的人)并与他们互动——所推动的认识,在这里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观点的钥匙。因而,方法不能与前理解的理论以及其他基础相分离,因为假定与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对研究对象的解释与表征。因而,解释学是一种重要的反思形式。

7

3 对研究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的自觉。社会科学是一种植根于政治与伦理语境中的社会现象。其所探索者,以及如何探索,很难避免要么支撑(再现)要么挑战存在的社会条件。不同的社会利益,受惠与未受惠,有赖于所问(与未问)的问题以及实在如何被表征与解释。因此,其所植基的解释与理论设定,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的一部分,并有助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姑不论其他人,这些维度已经受到了批判理论家们的强调。

4 对表征与权威问题的反思。最近的解释学已指出,在许多决定性意义上,文本是与作者相分离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更进一步把文本与任何外在实在都分离开来。可以说,文本有它自己的生命,而对外在于其自身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指涉。文本只是彼此相互影响,而这种多样的无序的相互影响的结果使得文本变成了碎片,被分裂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论是作者(在我们的讨论中称为研究者)对权威的宣称,还是文本对再现(reproduce)[不是"镜照(mirror)"]某种外部实在的宣称,都同样被破坏了。于是,研究的主体与被研究的对象都受到了质疑。

读者也许会认为与这里所介绍的四种主题相关联的不同的

理论立场是不能比较的。的确如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然而，从一种或多种这样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解释重要的观念，并将它们放入新的语境中，这种研究策略却是可以设想的。诚然，我们这四种倾向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考虑赋予质性研究以更具反身性的特征，同时也强调经验材料的重要性，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把诸如扎根理论与后现代主义融入典型的研究，而是要努力从解释学、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来提炼原理与思想。经验材料在其他三种倾向中通常不受重视，却是扎根理论和民族方法学的核心，在这里关于研究程序的特定观念也许是有用处的。因而，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解释中从不同立场所收集来的特定洞见。这与其说是以关于这些思想学派的传统态度来展开的，不如说这可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价值。

关于反思性的这四个领域（这里，反思因素在第一个理论即扎根理论中是不受重视的），这里所给定的顺序有着确定的逻辑。对于阐述了（各种）质性方法如扎根理论之核心的（非标准化的）经验材料的兴趣，构成了研究工作的一种底线。然而，这一底线并不比一般的假定稳定。在大多数质性方法论的理论中，集中于“资料的收集与处理”是非反思性的，而且应该受到抨击。相反，基本的解释学因素应该渗透于研究过程的始终。于是，与其说是在所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实在的表征，不如说是解释成了核心因素。甚至可以强调：不存在无中介的资料或无中介的事实这样的事情，它们总是解释的结果。而解释不会发生在中性的、无关政治的、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地方。一个独立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者也是不可靠的。除了研究上的和其他政治上的利益，各种范式、观点和概念也都显示出特定类型的解释的可能性。同时，它们以中性、合理、正当和恰当为幌子压制他者。于是，作为政治一意识形态之表达的解释，为解释学一类的解释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补充。某种怀疑的因素随后就被引入了。甚至有意识形态与政治自觉的研究者也要冒着被他们自己的文本所左右的风险，这一洞见也被加强了。在这里，来自流行的不受约束的话语的影响可能占上风，而且它们与可能具有有意的政治自觉的文本玩起了它们割裂文本的游戏。于是，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要决定“事物如何”或“如何最佳地解释一种现象”的野心，也许就被视作虚幻

的并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观念激发了对研究者宣称权威的质疑。

在这些初步思考以及本书后面将要详细阐述的其他内容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好的质性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应该建立起一种一般性的自觉,并系统而清楚地对待上文提到的立场和问题,以及它们所暗示的可能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本书其他部分的主题。我们将在第 7 章提出反身性的方法论,建立起一种解释与反思的多层次的、灵活的结构,其中反思性领域之间的系统的交互作用是核心。

本书的规划

在第 2 ~5 章我们谈到了将要探讨的反身性方法论中的四种主要标准。首先,我们从具有相当严格的经验倾向的扎根理论,思考了典型的质性方法。我们看到了其中某些实证因素,但也暗示了它给出的是一个太过理性化的研究过程的图景,表达的是一种朴素的经验研究的观点。第 3 ~5 章讨论了这样一些因素: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以及文本的相对自主性。如果这些因素被严肃对待并运用于经验研究中,那么它们就能够克服面向经验的研究方法的缺陷,从而有可能超越这些研究方法而指向更加熟练的研究过程。 9

在第 6 章,我们提出了一些更加重要的有影响的当前热门论题。这些论题与重新定位的质性方法高度相关,尽管它们只是在反思性的工作中对于上述层面的补充,而非构成其基本要素。话语分析(对语言行为与表达的密切的经验研究)、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系谱权力理论(Foucault)就属于这样一些有影响的论题。这些论证线索进一步深化了在第 5 章中甚至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在第 3 章和第 4 章中的一些洞见,而且超出了这几章的讨论。

第 7 章是结论性的,主要是正视四种主要层面之间的彼此关系——即处理经验材料、解释、政治/意识形态与表征/权威,以便创造一种新的更广的而且有发展余地的质性方法。我们指出了在方法论问题上构造我们的思想的不同方式,并点出了一些反身

性研究的类型。其间反思性的领域,由于研究问题和知识兴趣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分量。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处理复杂研究过程的可能方式的一些具体建议,我们也讨论了与反身性因素相关联的目标的适当层面。

本书读者需要对一些社会科学学术有一般的认知,以及对质性方法与科学理论有一定的了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别的知识准备,应该也可以阅读本书。

我们没有解释那些可能被认为属于一般知识的术语,一般的百科全书应该可以帮助那些紧抠任何一个特殊语词的人。而由于其研究定位,以及对于读者对此领域的先行熟悉程度的依赖,本书的某些部分可能有一些进一步的要求。不过,这只是一个坚持的问题! 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要坚持努力学习方法论。但是,如果食用的是方法论的垃圾食品,最终则只会导致营养不良……

注 释

[1] 我们所谓的"经验主义者"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工作在科学领域中,对经验研究直接反映实在的能力以及对科学中的"资料"的重要作用给予很大的信任。研究被认为首先是收集问题,处理和分析资料,它可以是量化的也可以是质性的。理论与资料两者之间被毫无争议地认为是相分离的,前者的价值通过后者的检验或从后者脱胎出来而被确立。

[2] 甚至狭隘领域中的量化研究也常常能指向不同方向。例如,领导层领域中的许多研究尚未产生一致而明确的结论(Andriessen and Drenth,1984;Yukl,1989)。

[3] 对质性研究特征的描述在大量这类研究上都是有效的。而有些语言导向与实践导向的质性研究者对主体的意思或观点并不感兴趣(Silverman,1993)。于是质性研究"与其说是决定哪个文本或文本的摘引对思考主体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不如说是分析论说问题的起源、本质与结构的问题,文本正是凭借论说而产生的"(Prior,1997:66)。

10

[4] 有一个观点认为应该首先确定问题,然后才是方法。作为对由技术所驱动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例如问卷法或半结构式访谈,被视作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的平衡,这是合理的。而重要的是要注意,离开了认识论和理论的出发点,研究的问题是不能被确定的。什么东西构成了一个令人关注又可

处理的研究问题,有赖于研究者在广义的方法论问题上的基本的立场。问题与方法(以及对方法论问题的理论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比单方面占优势的关系更加合理。

[5] 可能有人会认为,所有研究——其实是一般人类活动——都具有解释与反思的特征。在大多数的关于方法(包括质性方法)的著作中,这些方面并不突出。解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有限的因素,它发生在资料已被收集和分类之后。反思则很少被提及,它一般被限制在技术问题以及与结论的关系中。

[6] 然而,我们所必须要说的,即使不是所有,也有很多内容是与量化研究相关的。实际上我们所作的大量批判甚至触及了更大范围的量化方法,比如我们采用了一种朴素的语言观。这两个方向的边界也并非总是明确的。而在本书中,我们没有讲到特别属于量化方法的问题,而是谈到了质性方法领域的文献并讲到了与这个领域特别相关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量化与质性研究之间的区分更令人关注的区分是,反思性研究与那种使认识主体能避免所有批判性考察的研究,既然这种研究"已经被作为方法论的根据确立起来了"(Kittang,1977:33)。

11

第2章 面向资料的方法：经验主义的方法与程序

Data-oriented Methods Empiricist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我们将在本章叙述一些与经验材料紧密相关的方法。这不是对资料作片面展示的问题，因为这些方法也承认理论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与我们将要研究的其他方向相比，理论在这些方法中与经验材料的关联更紧密。我们不允许离（所谓的）基础资料太远，而倾向于维持低水平的抽象。我们特别关注以一般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学派为背景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因为这在我们看来是面向经验的方法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典型。根据登津（Denzin，1994：508）的说法，它是社会科学中运用最广泛的质性解释框架，特别是从1990年斯特劳斯和科尔宾的畅销教科书《质性研究基础》上市以来。本章还讨论了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并简要叙述了归纳民族志（inductive ethnography）。此外我们还将布迪厄的思想与这里的各种思潮作了比较和对照。

扎根理论

根　据

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有两重根据，一是斯特劳斯的符号互动论，二是格拉泽的统计实证主义。关于符号互动论的一般性介绍，如普卢默（Plummer，1991）通常把扎根理论视为伴随这一思潮的一个特别向度。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

我们的确把符号互动论看作是扎根理论的灵感之源。[1]

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代表了一种质性方法论运动,这一运动出现于20世纪初的美国(Hammersley,1989)。"符号互动论"一词于1938年由芝加哥社会学家赫伯特·布卢默首次使用。但这一思想的一般线索却更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系兴起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运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米德与库利(布卢默是米德的学生,而斯特劳斯是布卢默的学生)。它的三个主要灵感来源,以重要性为序是:美国实用主义,据此,真理是一个实践效用的问题;德国新康德主义,它强调对特殊个案作具体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对海量资料作通则性研究;德国历史主义,它给予质性研究以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优先权。

12

在经过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第一个全盛期后,符号互动论紧接着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加固了它的阵地,但随即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衰落。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硬的"方法如统计学方法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现象学方法论影响下的民族方法论形态中的"软的"方面的竞争。另外,政治左派抨击这一运动成为了主流体制结构内部的谨慎的改革主义运动。1973年一篇文章甚至宣告了符号互动论的死亡(Mullins and Mullins,1973)。不过,报告其死亡是太夸张了,后来其思想观念又有了复兴(Strykey,1987)。这一胜利意味着其方法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一胜利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激进化过程,以及对其他方法如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方法的吸纳。同时,这一胜利也是以原初观念的全面稀释和破碎为代价换来的(Fine,1993)。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著作(Glaser and Strauss,1967)与1960年代以来的运动本身有大致相同的历史,它一开始就相对缺乏向得到热情拥抱让步的兴趣。[2]对于许多质性研究者而言,质性方法几乎与扎根理论是等同的。正如特纳(Turner,1988:112)所说,"质性研究者别无真正的选择来寻求对扎根理论的真正接触"。在1990年代,如上文所提及,斯特劳斯和科尔宾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此书并未免于批评,它被认为背叛了此方法的原初精神。因而在这里,一本书的命运亦类似于其母运动的命运。

知识商品是扎根理论从符号互动论保留下来的术语,它有如

下几个核心特征：实用主义（pragmatism）、个案研究（idiographic research）、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探察（exploration）、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认知符号（cognitive symbols）、经验取向（empirical orientation），以及对经验材料的持续归纳。对这些特征我们将在下文具体来理解。这一系列特征，以及我们在下文对其具体内容的表述，都不是要对符号互动论给出一个彻底的描述。我们只是希望对那些与理解扎根理论相关的思想观念给出一个（必要的）非常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并没有自动转换到扎根理论，但在其中已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展着。因而，毫无疑问，它要么是对母运动的复制，要么是对母运动在认知上的突破：扎根理论不能与符号互动论相等同，就像它在那一运动中的背景可以被忽略一样。

13

实用主义　作为一种研究结果的社会效用、社会控制，构成了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反理论的哲学，它意味着尽可能地与实际的、经验的事实紧密相连。

个案研究而非通则（nomothetic）研究　它要研究的是特殊案例而非一般案例。个案认识特别出现在人文科学中，它是与对独特现象的集中研究相关的。通则认识特别发生在自然科学中，为了发现一般法则，它需要对大量资料作广泛研究。

质性的而非量化的方法　如果终究要运用后者的话，那也是预备的和次级的。可以说这表示了一种与量化方法论相反方向上的规定。而在量化方法论那里，质性阶段（如果还是有所谓质性阶段的话）也只被认为是预备的和次要的。

探察　倘若要对质性方法作强调，那么其探察功能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比它在自然科学中具有更高的地位，自然科学强调的是出于测试目的的可操作性。收集资料的灵活方法是其结果，选择的原则借此在研究进程中被持续地修正。探察（exploration）应该与检查（inspection）相联结，在检查中已被揭示的初步概念得以持续地修正与补充，而与此同时，不同的概念所指涉的不同的经验被“转变与扭曲”了。

敏感性概念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寻求创造敏感性概念，而不是为了说明概念而去努力创造越来越精确的技术。敏感性概念会刺激他们去认识新的关系、视点和世界观。不像在物理学

中,时间与空间关系占支配地位,在社会科学中,重要的是移情(如米德所言"角色换位")与判断。

社会行为 这里的主要焦点是微观过程,而不是诸如功能或结构(与后来吉登斯在 1984 年专著中的"构造(structuration)"概念相比较)。它是互动式的,也就是说它反映了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它又是符号式的,符号在行为者之间传递。于是,按照行为主义的精神,互动并非被视作外部行为。因而,主体间性(而不是诸如行为、心理、结构或功能)才是核心。

认知符号 人在与他人的接触中创造着,并不断地再创造着他们自身。确实,这一"自身"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过程。这"自身"不是内在外在刺激和行为之间,受约束与不受约束的变量之间的被动的中介或场所,而是一种它自身就极富成效的现象,它自身就是整个社会过程的引擎。这"自身"也是一个意义世界,不是一个外部结构或一系列的变量。意义首先被解释为认知性的。有一个针对布卢默与其他符号互动论者的批评,正好就说他们低估了意义创造中的情绪因素,而高估了认知因素。 14

经验材料的接近与持续归纳 研究者应该从日常实在的符号互动出发来归纳,而不是使他们自身远离它们。然而,这里的归纳与古典培根学派的归纳不同,古典培根学派的归纳不是直接从资料中而是在两个阶段中进行:首先是对单个经验案例中的有限资料系列作集中研究,在这一阶段中移情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是伴随着经验基础的扩展在多个案例中进行比较。

统计实证主义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符号互动论不是扎根理论的唯一灵感之源。其影响主要植根于这两位创立者之间的一位,即斯特劳斯。另一位创立者格拉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手下做研究(拉扎斯菲尔德以发展了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分析而著名)。例如布迪厄在提到拉扎斯菲尔德时就总是把他当作现代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中心人物(例如参见,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格拉泽(Glaser,1992)明确地说,他把统计分析方法作为扎根理论中的质性方法的典范来运用。于是,量化分析的实证主义形式或模型被融入了新的质性内容。更一般来说,扎根理论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项目中采取了一种严格的方法,借用邦奇(Bunge,1967)的说法,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对研究中的"资料"概

念的看重:资料是科学过程的阿尔法和欧米加(alpha and omega)*。符号互动论对此没有任何抑制。相反,互动论中的归纳因素有助于加强这一立场。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转入理论自身的系统展开了。

理论的产生、归纳、质性资料

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专著的题目《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正暗示了他们的方法论的主要因素。其核心是理论的发现、扎根理论以及质性研究。在书的前言中,作者宣称该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宏大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缺口搭桥(比较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流行的批评)。布卢默指出了这个缺口,而另外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则试图通过借助量化的证实方法来搭桥。与此相对照,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把他们的重点放在理论的发现上,而不是理论的证实(以及质性研究)上。然而,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把"产生"放在任何一种与证实相反的立场上,而只是要指出太多的力量花在了证实(在拉扎斯菲尔德的统计分析传统中)上。[3]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产生理论,而证实则是服务于理论的产生的(Glaser and Strauss,1967:28)。在前言中,作者也指出了它们的来源和程序。理论产生的来源是经验资料,而从这些资料抽象出理论来的方法则主要构成了对特例的比较分析。作者把他们自己定位在早期质性研究(例如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学派)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早期质性研究不够严格与系统,并被证实的花言巧语俘获,而不是去强调那真正相关的东西,即理论的产生。于是,在他们自己的书中,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目的是,在从经验资料产生理论的过程中(并为了理论的产生)形成一套更加严密而连贯的方法论规则或标准。

* 阿尔法和欧米加分别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阿尔法的写法是,大写A,小写α;欧米加的写法是,大写Ω,小写ω。α表示事情的开端,ω表示事情的结束。"alpha and omega"表示贯穿事情之始终。"alpha and omega"作为一个成语出自《圣经·启示录》。——译者注

作者认为"理论"已经成了下面这些"伟大人物"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等人的理论的代名词。那些后来的理论,那些没那么出色的头脑,将不得不通过目光短浅的证实活动来加强这些理论罢了。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反对这样,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思想上足够解放的观点,即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理论,只要他们从实在出发。因而,不是只有天才或"理论的资本家"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创造。甚至普通人都可以像科学企业家那样产生创造性的投入,而不必像从事检验的无产阶级那样只是服务于知识的大买卖。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理论的建筑师。当然理论应该得到检验,但这只是导向对它的修订,而不是毁灭。因为一个理论只会被另一个理论取代(Glaser and Strauss, 1967:28),否则它就会以纯粹惯性的力量而存在。作者在这里用的是库恩在 1960 年代所发表的观点(见 Kuhn,1970)。[4] 更进一步来说,检验的目的是决定理论应用的经验范围(Glaser and Strauss, 1967:24),这一观点是由科学哲学家图尔明提出来的。[5] 因此,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甚至应该避免谈"证实(verification)"或"检验(testing)",而应该谈理论的应用,不管这个理论是对还是错,而只管它在应用时,是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的。

因为扎根理论来自于资料,所以它在归纳中发展。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强烈反对从脱离实在的理论出发的"逻辑演绎"的观点。在这里,布劳(Blau,1955)特别以其形式化的交换理论而暴露于重头高射炮的攻击之下(这种归纳与演绎之间的方法论争论并不新鲜,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可以远溯至培根与笛卡尔,甚至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提出的反对演绎论的讨论通常是恰当的,例如,因为其理论过早地暴露了推理的痕迹而失去了与经验基础的接触,所以检验常常不可行;或者,尽管它被接受,但经验资料是被迫进入理论范畴的。

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会为作者自己眼中的沙粒感到奇怪。经验材料能很容易地还原到常识范畴。诚然,作者指出研究者可能会带入个体的和理论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对作为产生范畴的材料起作用。他们还在一个脚注(Glaser and Strauss,1967:3,脚注 3)中捍卫自己的主张,这个脚注说:　16

当然,研究者不是进入像白板(tabula rasa)一样的实在。

他必须有一个观点以帮助他来理解相关的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审查抽象出一些重要的范畴来。

这个所谓的“观点”往往并不少见地转换成了一个颇为透明的小树叶,以作为无前提归纳的遮掩。例如,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76:37)写道:

为了确保产生的范畴不被更适用于相异领域的概念的污染,首要的有效策略是真正地忽略研究范围中的理论和事实文献。同这种文献的相似点与会合点可以在范畴的核心经过分析显现之后再确立下来。[6]

现代科学理论在汉森(Hanson,1958)及其他后实证主义者的激发下,大体上都承认所有事实都是有理论承载(theory-laden)的,因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问题,而是我们总是将一整套认知的和理论的指称结构嵌入了对实在的理解——此观点来自黑格尔(Hegal,1952)1807年所写的一个辩论。他的辩论是要反对当时的归纳论者和经验论者,这得到后来的哲学解释学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1962)等人的强调。“实在”总是已经被解释。因而,资料从来不是来自于原始纯洁之源的纯净的水滴,它们总是在源头上就已被淹没于理论之中了。倘若对此持保留意见,那么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观点——尽管是修正了的形式——可以认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实用的观点:“不要阅读太多关于技术领域的东西,以便能保持你新鲜的眼光。”科学史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证据。那些阅读适度的研究者有时比那些在此领域博览群书的人更具创造性。[7]读书太多的风险在于过度依赖以往的权威并纠缠于老问题中,因而很难看到新的可能性。据此,解释过程中的胆量能通过不过分阅读此前成果来增强。当然,研究者也应该能够把他们自身从归纳中解脱出来,并能不受影响地接受行为者自然生发的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转向演绎。并非只有归纳与演绎二者择一式的选择。还有其他选择,如溯因推理(abduction),简单地说是指理解形态与揭示深层结构的能力(Hanson,1958)。[8]因而,对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领域的大致轮廓作一概览,接着尽快地进入某人自己的经验材料,应该是一个可行的策略。不过,对研究领域了解太少也有其缺点,如可能导致

重复发明。

批判性阅读自然是防止被某一领域的传统智慧或单纯的正统侵蚀的一剂良方。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一概颠覆否定已确立的问题这种风险。于是,注意到已有的研究包括其缺点,是发现新的可能性的一个好的出发点。另一个与前期理论和研究相关的有效的线索是尽量作广泛的比较对照,例如从相邻领域来了解经验研究和熟读可供选择的理论著作。后者无需考虑特别的应用范围,应该更具基础性,它暗示着更一般的多种解释线索。一般性地阅读总是有益的,这比已过量阅读或根本没有阅读专业领域文献要好。因此,一个研究者的阅读应该有一定的广度,不仅仅是为了参考,也是因为找到与较远现象之间的关联是创造性研究的一个一般特征。[9]

在理论的产生与证实之相异的争论中,一般还伴随着另一个基础性的区分,即质性的与量化的资料之间的区分。质性资料被认为主要投入在初步的探索性阶段,其结果是试验性的假定,而量化资料适用于研究过程的重要阶段,即对假设的验证。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则认为这是错误的,原因如下:第一,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给了理论的产生以更重的相当的分量。第二,这两种区分并不一致,它们互相抵触。质性和量化资料都既能运用于理论的产生又能运用于理论的证实。当谈到质性或量化资料的重要性与运用时,作者采取了一个简单的立场来设定理论的产生与证实的重要性问题。他们当然并不愿意排斥使用量化资料,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质性资料上,因为它们更适合于复杂现象与过程的研究。因为在经验范围中,质性的结论通常是"研究的最终结果",所以,超出经验范围,研究者很少愿意转到量化的证实上来。第三,因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即最"充分"与"有效的"方式来获取所想要的信息(Glaser and Strauss,1967:18)。第一个理由是对此前符号互动论者的讨论的回应,看来已被很好地证明了。而另两个理由却并不特别有力。第二个理由毕竟只适用于最终的结果——扎根理论,而不适用于达到它的路线。第三个理由依然有待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量化与质性方法、理论产生与理论证实的重要性问题,格拉泽和斯特劳斯都只是把传统的实证主义者的

论题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实证主义认为质性方法是量化方法的不太重要的补充,而理论产生只是理论证实的不太重要的前奏。反过来,在扎根理论中,质性方法与理论产生是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出现的,量化方法与理论证实只是被看作对它们的补充。结果,那种由库恩(Kuhn,1970)描述和认可的令人厌烦的谜一样的研究被避免了。当然,其缺点是研究者要冒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发现同一个理论,也许只是给一个旧有的观念换一个新的名称罢了。[10](这自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障碍,这本是沉疴已深,而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方法论无关。例如,我们知道,组织理论中的许多新名称这些年已被加之于伯恩斯和斯托克(Burns and Stalker,1961)的机械与有机管理系统上,并作为新的理论出现了。)

理论的标准:实际效用

从符号互动论传统,特别是从这个传统中的实用主义的强大因素而来的另一个遗产,是对理论的实际效用的强调。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屡次回到这上面来。他们认为一个理论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应该"可施于实际应用中——预测与解释应该能够使实践者理解并能对环境有所控制"(Glaser and Strauss,1967:3);它"必须能使运用它的人对日常环境有足够的控制,使理论的应用值得尝试"(Glaser and Strauss,1967:245)。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符号互动论者对"社会控制"的强调,这是工具主义常识的一个表现。当然,接受这样一个标准的危险在于,它把研究降为了实践的婢女。对这个同样的观点,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3)还有另一个表达,他们声称"理论必须也能易于被持任何观点的社会学家、学生以及明显的外行所理解"。上述危险在此处得到了加强,因为它甚至要求语言降到行为者的层面。而这依然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要使行为者能运用一个理论,很明显这个理论就不得不使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简洁阐述出来。这一看法有个问题,即很难达到高水平的理论。理论的建构将羞于降至行为者的层面。而科学并不仅仅是将常识系统化。类似地便自然注意到了数学中关于常识的直觉主义思潮。克罗内克尔是19世纪这一思潮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坎托这个形式

主义异端分子，他想扩大数的范围。克罗内克尔庄严地宣告："自然数是由上帝创造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人的事。"尽管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在其辩论中没有引到这句名言，但我们依然得到了这个印象，即"实践"在他们的理论中起着类似的作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科学理论在实践上尚无直接的重要性，就先行产生了一段时间，有时是很长一段时间。因而，"用户手册"型的知识少有可取之处。

但是除此之外，难道知识就没有它自身的内在价值吗？比如，关于宇宙在何时以及如何形成这一宇宙科学目标的认识的实际用处是什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它根本没有任何这种实际用处。而人类天生地就渴望这类知识。这同样也适用于科学的其他分支。格拉泽—斯特劳斯方法看来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的有时可能是优势的实际效用，与科学理论必须直接应用并易于被有关外行人士理解这一条件搞混淆了。只要他们明确地说了研究应该对"咨询"有用，那么事情就没有被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98)改善。

资料与资料来源

因而扎根理论是通过(被看作为)经验资料来展开的。在此语境中的"资料"是什么意思？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书中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事件"(incidents)。不幸的是，作者没给出任何界定甚至也没有作适当的语义考察来指明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为整个扎根理论提供了基础。读者在这里陷入了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斯特劳斯后来同一主题的那本书《社会科学质性分析》，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线索："事态"(event)一词被用作"事件"的同义词。如果我们进一步回想一下我们在上文曾简要说过的符号互动论中基础性的米德—布卢默范式，看来就有理由将一个事件与"社会互动"等同起来。而且这种等同实际上常常是显然有效的，斯特劳斯的书中对一些例子的考察特别能表明这一点。

然而，整个问题还远未明确：有时资料是作为不可解释的事态，有时事态是作为不可解释的事件，有时事件是作为不可分类的社会互动。在不少的用法中，"资料"的意思似乎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任意选择赋予的。因而，大概说来，扎根理论中的资料可

以用完全经验式的含糊的术语来描述，时而指某种事态，时而是某一事件的形式，时而是某种社会互动的形式。在他们的方法论中，作者没有对其基础元素作出概念考察，就冒险把他们的扎根理论建立在沙滩上。特别是，他们也没有考虑所有事情都是有理论依据的。不得不承认，他们偷工减料地取用了许多其他方法论，不仅有“传统的”实证主义，而且有其他与某种实证主义类型的思想接近的质性方法。

当然，把一个理论建立在资料之上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某种资料确实存在。因而考虑什么地方可以“发现”资料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资料的来源。在那以传统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寻找资料的地方，资料有时可能是薄弱或难以获得的。关于资料的来源，除了传统的来源，如参与观察、访谈等，扎根理论的确提供了一整套非传统的信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花了整整一章（第七章：“质性资料的新来源”）来谈这个问题，讨论了社会科学中一个常被忽略的领域，即图书馆研究。在这个语境中，他们提到的原始资料有，如“信件、传记、自传、论文集、演说、小说”（日记可以放在这里）。随后他们提到了一类明显比较远的现象如“契据、笑话、照片以及城市规划”（Glaser and Strauss，1967：161）。他们指出，图书馆研究中的各种策略都是对现场工作的回忆。比如，要到右边的架子上寻找关于事件来源的资料，与之相应的是选择右边部分来查找或者选择右边的人来咨询；研究讨论会的会议记录，与其相应的是参加讨论会；通过文献资料的记载来校验当事人事后对事件的说辞，与其相应的是通过访谈来了解（Glaser and Strauss，1967：163）。

其他提取资料的策略有如下一些（Glaser and Strauss，1967：167）：

- 搜索资料库（data caches）（如信件集、访谈、演说、系列论文、杂志），这可以说是真正的金矿，[11]唯一的风险是研究者可能会过于投入其中，以至于想要占有它们。
- 把与研究领域相关联的虚构的文献资料当作观念的一种来源来使用。[12]
- 为了发现丰富的理论关联，而浏览与研究领域关系比较远的文字材料。

- 留心偶然的发现,或者甚至是随便的浏览,常常会引向有重大影响的观点。
- 寻找那些描述了偏离于或者完全在某人自己的扎根理论之外的相比较群体的文献资料。
- 文献中那些来自扎根理论的假定中的"极微小"的细节。

说到更一般的形式理论,图书馆研究明显有一种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的最大优势当然在于其易近性,与现场研究相比,它能减少大量费用。另一个好处是可利用的比较材料的范围相当广,包括时间性质的、空间性质的以及其他性质的材料。图书馆研究当然也有其不足,特别是,原始材料已有了隔阂,事实已被人(更不用说研究者了)筛选过滤了(Glaser and Strauss, 1967:176-183)。毕竟关于图书馆研究这一章仍是此书最令人兴奋的一章,因为它指出了资料的来源不仅仅是指出那些传统的寻找方法,它相当细致地讨论了它们的运用。在此书的其他部分,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67,252)还介绍了另外一种非传统的资料来源,即研究者自己的经历,或"轶事比较(anecdotal comparison)"。 21

编码:从资料到范畴

扎根理论从资料出发来创造范畴,这是一种被称作编码的程序。然后范畴拥有了自己的属性。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从未真正解释他们所理解的范畴是什么意思,而其他科学家所谓的概念显然也是一笔糊涂账(Glaser,1992:38)。而属性又只是概念的属性或判定。在编码中,资料被分派到某一特定的范畴;同样地,范畴来自于对资料的解析。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给了很少关于这一程序如何展开的信息。而另一方面,斯特劳斯(Strauss,1987)关于质性方法的书尽是关于此问题的信息,并有许多通过编码创造范畴的具体实例,这主要来自于作者关于扎根理论的研讨班。其中对大量经验材料作了逐字逐句至少是逐段的高度集中的分析。正如已指出过的,材料与经验资料越近越好,最好是从亲身观察而来的现场记录,此外访谈也是有效的。

范畴应该取自行为者,或至少应该易于为他们所理解(这也

就是说，它们应该是从行为者那里提取出来的）。它们在本质上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从材料中发现的，因为它们被行为者叙述[实境代码（in vivo codes）]；另一种是研究者自己从材料中建构起来的[即试管代码（in vitro coding）]（Strauss，1987：33）。范畴可以从单个事件产生，然后任何数量的进一步的事件都能在这一范畴下编码，为其发展作出贡献。研究者仅仅只是（却也是勤勉地）：

- 逐字逐句地或至少是逐段地阅读文本（现场记录、访谈或文件材料）。
- 不断地问文本中的资料应该放在哪个范畴下，特别是易于为行为者所理解的日常或常识范畴。
- 记下这些范畴以及归于它们之下的进一步的资料。

通过对资料和范畴的“仔细考察”，也就是在心中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摆布它们——时刻记住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我们思考出了范畴的可能属性以丰富它们。斯特劳斯（Strauss，1987：27；也见Strauss and Corbin，1990）更明确地介绍了一个具体的编码范式的运用：

为一个既定范畴所指涉的所有现象作如下的资料编码：

条件

行为者之间的互动

策略与手段

22 推论

第一个和第四个概念与因果关系有关：“条件”完全与原因相关，而“推论”则与结果相关。另外两个大体可以自我解释。“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所涉及的关系并不直接与策略手段的运用相联。

下面这个参与观察及其开始编码的例子展示了这个程序（Strauss，1987：59-61）：

> 下面抄录的是第一现场记录的文字，记录了在心脏护理病房所作的一些观察。病人在作完心脏手术后会被马上带入这个病房。他们受到高度的监护和护理，一个病人一个护士。不时会有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来看看，对护士作些嘱

咐。在手术后的第一个小时里,病人看来无意识或很少有感觉。每个人被几种装备捆绑着、吊着,这对他们的生存与身体监护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现场记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非常熟练的年轻护士:她在一个失去了知觉的病人旁边不停地工作着。观察者集中观察的是与护理病人相关的装备工作的细节,这个现场记录也就是专门描述这的。本书专门对这些现场观察资料作了编码来说明编码程序,这在一项研究之初就会存在。

"我今天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护士 T 如何护理一位手术后仅四个小时的病人。这种工作一般是几件事交错着的。她换了输血袋,把里面的血挤出来,直到挤出气泡,然后又换上一袋,用机械灌了半瓶。她又挤了一次尿管,量了一下体温。她把一种药注入管子里导入病人的脖子里,然后把钾溶液加到标有"手工Ⅳ"的瓶子里。同时她还一直在关注着(尽管没必要直接注视)仪器屏幕上的心电图和血压读数。她按了一下电脑按钮以调出关于心脏功能的十五分钟读出数,又挤了一下导向病人腹部的感染清洁管。她定时记下了读数和一些已经做过的事。一次病人动了一下,因为她碰了一下他的手,她非常温柔地说她要给他打针了,要放松。他暗示她听到了。另一次,她提醒他正在打针,并关掉了他头部上方的灯,对他说:'这更好些,是不是?'在某个时候,她估计输血的压力不大,血滴的速度不够,然后咨询住院医生该怎么办。"

分析者在浏览了这份现场记录后,集中于前五行,只看与输血设备有关的记录以及护士所做的与此有关的事。分析花了他几分钟时间。接着他写下了下面这几行文字,详细地阐述他的要点,给那些特别而又非专门引起他个人注意的字词划上线。分析的第一行是这样开始的:"她换了输血袋。"他放在括号里的解释性评论简要地分析说明了正在发生什么事。

"她换了……"这是一个任务(一个从日常经验抽象出来的范畴)。

"她换了……"她正在自己完成这个任务。这显然无需对劳动作任何直接的分割(从技术文献抽象出一个范畴)。

然而,在提供血液中涉及了劳动的分割(division of labor),这个问题我留在后文来考虑(对这个范畴提出一般的疑问)。

“……输血袋。”“输血”告诉我们,这种设备——袋子和持有者——要求供应(一个范畴)。又是一个有意思的论题,我可以立刻提出问题来。

让我们来看“换”,即作为一个任务,它的属性是什么,或者关于其属性我能问什么问题?它对于其他人是可见的(这里的维度是可见—不可见)。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而它可能不需要多少训练。这个任务是接着另一个任务而来(用一个袋子换下另一个袋子)。这看来是常规事务,不需要做很长时间。它令人厌烦或仅只是常规事务吗?它也不是一个紧张的任务。而且看来它当然不具有挑战性。在一天的工作中,这件事她必须做多少次?也就是说取血输给病人的频率有多大?或者说,在每袋血之间,在新血实际输入病人体内之前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或者这有赖于她对病人状况的估计?如果他们暂时用完了血将会发生什么?(暗示了病人的安全问题,后文再看)我可以假设,如果没有立即的危险,那么更换血袋的问题就不明显。但是,如果它对某类病人有潜在的危险,那就应该有防止甚至一刻缺乏血袋的组织机制。好,我本应继续关注这一任务,但已足够了!

现在回到劳动的分割这个问题。既然病人事实上是无知觉的,那么护士在换血袋时就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这是一种非工作的关系——她是在对他、为他而不是与他一起工作。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干预她的工作。他也不能对她或任何其他人抱怨他不喜欢她所做的事或者她做事的方式(隐蔽的(implicit)比较)。我知道有的病人反对输血,特别是现在,他们会因害怕血污染而着急(明显的(explicit)比较,条件与详细的推论;这也又一次明确地触及了“供应”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一开始,必须供应设备或者没有使用任何设备。让我们称其为设备供应(范畴)。但是那是与我在医院看到的设备供应很不相同的供应。比较思考那些供应,将很快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设备供应的特别属性,并对一般供

应提出问题。有的用品是用塑料管做的,如果这塑料管陈旧了,一定时候就必须更换。血是自然物供应,不是人造的——但是,两者在某处有共同的来源吗?这来源在哪里呢?(我在后面考虑来源问题)塑料管与血都是可更换的,而血更贵。汽车需要油的供应,但必须到加油站去,而血液是提供给使用者的。血库又如何?在病房或在医院贮藏了血液吗?存多久是安全的?等等。

我们把这份编码报告放在这里,尽管它占了本书两页多的篇幅。这段引文显示,编码是非常广泛的工作,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112)说了"几百页纸"也只说了一项。(根据作者的说法,再写"几千"页纸可以建构起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单个现场研究的资料……)在运用扎根理论时编码也不是被草率看待的。这种方法论可以因各种原因被修订,但编码与理论备忘录——我们将在后文回头来谈这一点——是"必须"用到的方法,如果我们终究要能谈论扎根理论的话(Glaser and Strauss,1967: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为了发展范畴的属性,一个范畴中的新的已被编码的资料与同一范畴中先前被编码的资料之间的持续比较是一个问题。编码会持续,直到达到理论饱和。"当进一步的分析对于揭示一个范畴的新东西没有任何帮助时"(Strauss,1987:21),理论就出现了饱和。 24

分析性归纳是与符号互动论相关的质性技术,其类似的程序被批评为没有效率(Hammersley,1989)。[14] 对于扎根理论的相应的批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看来应该是正当的:以数百页手写的编码记录作为研究的成果,听起来有点太泛了。另一方面,扎根理论的提倡者们大概会声称:虽然其他技术可能有更高的效率——在投入与成绩之间有令人满意的平衡——但它们仍然会缺乏效力,因为它们迷失了经验的目标。例如,量化方法通常太过粗略而无法捕捉到世故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正如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所解释的,使用这些单调乏味的程序意味着研究个体所必需的创造性与灵感的缺失,好的理论结论是它们自己呈现的,而在此前却相反,是用汗水换来的。

许多关于上文所描述的编码过程的问题又浮现于脑海(例如,"她换了……")。斯特劳斯用劳动的分割来讨论它,并特别看

到了自治—他治(autonomy-heteronomy)这一维度。这给证据带来了奇怪的盲目性。对我们来说,大概也可以说对其他许多人来说,一个很不相同的角度都可能会看起来在与加了着重号的字的相关性中更加相关。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他”? 好,因为这个护士是位妇女。但为什么这位护士是妇女? 为什么在此语境中性别没有价值? 好,再看其他内容,常规工作是一个问题(见斯特劳斯关于常规事务的讨论分析),甚至护理、服侍的任务也是一个问题。对于清空血袋这一行为的词语选择亦有进一步的强调:“挤出”(milked),而不是“清空”(emptied)或某个其他同义词。这暗示着,这个护士在这里被比做一名挤奶女工,一个在高技术护理环境中的农家服务女生。在对“任务”范畴甚至“劳动的分割”范畴的讨论中,斯特劳斯也未在这一点上提出任何问题。

而问到护士中妇女的相对人数和医师与管理人员中男性的相对人数,以及他们相对的薪水等问题,也似乎本应是最明显的事。关于血污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以及无知觉(!)的病人没能力抱怨,这种像猜谜一样不讲逻辑的评论在思维上是错误的。鉴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上某特定人群(犹太人、妇女)曾易于被控告散布瘟疫,这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于是,在现场研究中,护士的温顺、半转身的侧影就由于众所周知的扭曲而突然变成了一个女巫的形象。所有风险在这里立刻被揭示出来,即缺乏对研究者或行为者无意识的心智框架的质疑,并把自己降到了常识概念的层次。而科学并不只是系统化的常识。

另外一个意义上,这整个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没有性征的:可以说,它是哑的、阴的。(就像一个侧面剪影影像,见 Ingarden,1976)这位行为者显得不像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某种阴暗的柏拉图式的人。例如,所涉及的两类人都具有的情绪在哪里? 情绪在这种临界情形中必须是更加明显的。怎样去影响护士,使她在环境中找到她自身? 必须在这个环境中尽可能地唤醒她的麻木。从整个观察来看,她甚至看上去没有表情的变化,至少对此没有任何记录。她可能就相当于已变成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机器人(这里当然与缺乏性别角色分析有关:妇女成了“服务精灵”的代名词)。进一步来说,这种边界情形是如何影响研究者的? 他(斯特劳斯)难道没有情感吗? 死亡的临近是使这整个描述的

基调如此阴暗的原因吗？是有这种迹象，特别是在最近的解释学文献中，死亡主题的确给出了对存在的最激进的表达并使存在中性化(Heidegger,1962)。

很有趣的是，故事中的病人，尽管是无知觉的，却被赋予了情绪，尤为明显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艾滋病！)。[15]我们有了两类人：一边是研究者和护士，他们有意识但缺乏情绪；另一边是无意识的病人，却拥有强烈的情绪。把这解释成研究者把情绪注入到了病人身上，似乎是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说，情绪从那些能够拥有它们的人那里移动，并用逻辑的筋斗把它们调换到那些不能拥有它们的人身上。而且，后者并不害怕最直接的风险——心脏疾病引起的死亡——而是害怕艾滋病(其名字甚至都没有被提及，而只是暗示了)。

事实上，这个案例中的整个编码计划可以看成是表达一种外在"中性的"事情与关系的过程。由于它强调这样一种高度的技术("设备供应"等)，所以使分析琐碎化的机会更大了。通过把一切都简化为外在因果关系，技术的合理性特别容易导致意义的丧失(Heidegger,1977)。斯特劳斯的解释范式事实上暗示着在现实中外在因果关联、目的—手段关系和互动关系(上文引到的编码范式中的四点，Heidegger, 1977:22-23)的局限性，即暗示着对有效的与最终的因果关系作研究的局限性。结果也使得这种趋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的确，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自问，是否这种解释范式还没有作为一种理论表达机制而产生，就是由于斯特劳斯长期而密切的研究面对的是高技术环境中的病危者的缘故。"油/汽车"与"血液/人"之间的比喻在此语境中起着思想激发的作用。最后，值得指出的是，从扎根理论之母符号互动论而来的遗产可能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这一运动常因研究的单方面的认知方式以及对情绪因素的忽视而受到批评。 26

因而，不管其意图何在，编码操作并不能以一种不含糊的、客观明确的、可靠而合理的程序来表现实在。相反，在这里研究者们根据他们自己的非反思的指称结构，来解释他们对所见之事的思考，这是有问题的。扎根理论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料处理的非反思的观点得到了提倡，这就带来了来自常识思维的前科学范畴的偏见；另一方面，太多的精力花在编码操作的细节上。

理论取样

理论取样是扎根理论的一个中心原则,斯特劳斯(Strauss,1987:38-39;引号略)这样表述它:

> 它是一种手段,在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者借此决定下一步收集什么资料、到哪里去发现它们。理论取样的基本问题是:下一步转向收集什么样的人口、事件、行为群体或次群体(去发现不同的维度、策略,等等)的资料。理论的目的是什么?而这个资料收集的过程是由正在出现的理论控制的。它当然要涉及分析者的许多计算与想象。如果做得好,这种分析操作很有价值,因为它迅速而有效地推动了理论的进步。

在扎根理论中,任何群体最终在原则上都能比较,而在传统的比较方法中,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相异的群体是相排斥、"不可比较的"(Glaser and Strauss,1967:50)。这似乎是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方法论的一个优势,因为很明显,发现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因而原则上一切事物都是可比较的。是否作出比较自然必须取决于手头的目的,而不是取决于实体之间的某种抽象概念空间上的距离。差异很大的("将差异最大化")实体间的比较应该具有潜在的丰富性,如果我们相信各种创造理论的话。创造理论强调从差异很大的事物中发现意外的相似性(参考 Koestler,1964)。

理论取样有两个主要步骤。首先,把群体之间的差异最小化,然后最大化。处于产生之中的新兴理论控制着整个过程。第一步,差异最小化,目的是迅速发现基础范畴及其属性(如上文的医院研究)。例如,为了将差异最小化,很可能从个案研究入手。这种选择是如何做出来的?作者没有深入地谈这个问题,但暗示了它取决于研究的问题或目的。据说这目的一开始相当广泛而没有详细的规定。在研究的过程中,它可能完全直接地改变了——或不只是"可能"。这种发展被认为是事件的通常过程。第二步,即比较群体之间差异的最大化,使研究者在最大可能的范围中考察这些范畴的属性,并开始把它们编织成一个稳固的理

27

论。在第一步和第二步中都使用的技术方法是，比较那些资料以产生和发展范畴及其属性：一个事件与其他在同一个范畴中、同一个或不同群体中先行提到的事件的持续比较。这套程序可名之曰“持续的比较方法”。

这个过程的一个不足之处是，事件之间的真正有机的关系被打破，这样，事件就被系之于范畴。事态从它由以产生的关系情境中分离开来，改而与行为者或研究者的常识相关联。这使得难以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比如对组织关系的研究中。[16]这就像通过研究，人们如何谈论和感知单个音符（“事件”）来分析音乐一样，以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发现音乐的本质要素——旋律。

从范畴到理论

范畴的属性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示了范畴的分支与衍生，通过这些范畴它们被编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理论。但实际上，一个理论如何从一系列的范畴中创造出来？这要用到三种主要策略。

首要的最不可少的是不断地为理论观念写备忘录，这些观念总是在编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范畴属性的关联中产生。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编码与备忘录写作在扎根理论中是“必需”的。备忘录可以是论说式的，也可以用图解式来表示，如图表、矩阵、表格、曲线图以及其他更加随意的图片。理论就逐渐地从备忘录写作中呈现出来，一个具体例证是从矩阵而来的形象表征，两个范畴的属性在矩阵中互相关联（Strauss，1987：147）。

第二个策略是发现核心范畴，它是中心概念，其他的概念都围绕着它。这就是说，它给了我们一把通向理论的钥匙。核心范畴可以通过下面的标准来帮助鉴别（Strauss，1987：36）：　28

1　“它必须是中心，即它必须尽可能多地与其他范畴及其属性相关联，而且比任何其他待选范畴都更适合核心范畴这个位置。”
2　它“必须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
3　它必须“易于……且丰富地”与“其他范畴”相关联。
4　它必须与正式理论有明确的关连。
5　它必须发展这个理论。
6　它必须允许“建立在……分析的最大变异的基础上”。

第三个策略是画出范畴之间相联方式的图表,或许多社会科学家所说的“模型”。在斯特劳斯的举例中,这很简单地用框框和箭头来表示。很明显可以设想更高级的模型,而重要的是画出基础概念(范畴)团结在一起的解析草图来(Strauss,1987,第8~9章)。一个好的思想是从核心范畴开始,然后考察其他范畴是如何相关的。

在以论说的方式构建的理论中,不同的属性就详细指明了范畴在一个理论中是如何联结起来的,我们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一个概念密集的(即高度网状的)理论——这被认为是此方法论一个很大的优势之一。例如,在作者关于护理病危者的研究中,“社会价值”显然是一个范畴,而“护理”是另一个范畴。其结果是较低的社会价值(第一个范畴的属性)与更低的护理标准(第二个范畴的属性)相关联。两个范畴也都还有许多其他属性,同时研究本身产生着进一步的范畴。在扎根理论中不同的研究范畴及其属性结成了一个很好的网状,上文已经阐明如何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网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努力去发展一个抽象而可能贫血的理论以便更多地说明有着丰富色彩的案例材料,他将必然会承认这种或多或少乃是无偿获得的巨大优势,或至少把这种优势看作研究过程的一个自然部分。这种把范畴属性编织在一起的结果是,与更抽象的理论构成对比,理论的综合是以一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实现的(不过在我们看来,扎根理论的这一性质是与经验材料的分裂相一致的)。

然而,密集与综合是有很高代价的。如此紧密地接近行为者的层面,其结果可能不过是或隐或显地对那些已经在此层面上获得的认识来一个认识的重新表述(充其量不过是另外使用其他的词)。其风险就是扎根理论将创造无甚价值的知识。这可以从关于乳房切除是一种“看不见的缺陷”的讨论(Strauss,1987:308),以及斯特劳斯(Strauss,1987:159)在一个关于扎根理论的研讨班上对一位参与者所作的“你翻译她(访谈主体)的话”这一命令来得到阐明。乳房手术的结果是一种看不见的缺陷(人体修复术),这一事实固然不是令人惊讶的一个认识。而这里的另一个例子,科学活动竟然要由对访谈主体所说的话的翻译来构成则是更令人吃惊的。如果我们回头看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

这个问题在那里也很明显。例如,“低社会价值”与“低水平的护理”相关联这一发现——作者的主要例子——就并不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 29

在斯塔林等人(Starrin et al. ,1984)的那部专著中有另外一个例子,即从经验基础发展而来的“理论”并没有“脱离出来”。这部著作基于扎根理论报告了一个关于失业妇女的研究。通过广泛的经验工作以及大量的访谈和处理分析资料,结论是失业妇女要么关心寻找雇佣工作,要么已放弃任何这类雄心,对于可以选择的活动的态度,她们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这两个维度是联结在一起的,由此出现了有的积极的妇女倾向于找一份雇佣工作并一直在找(“心理矛盾者”),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其他的方式积极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专门靠工资为生的人(“脱离中心者”);她们中的有些人在可供选择的活动面前消极被动,她们想要并准备找一份雇佣工作(“依附者”);而另外一些人则就只是一味地消极,没有任何要去找一份工作的特殊意愿(“辞职者”)。一个类似的“理论”结果本来可能通过脑力劳动产生,最终却只不过是费神制造、编码和分析了一个 1 500 页的访谈抄本。

甚至更惊人的例子都可以从格拉泽(Glaser,1993)那里找到。比如,我们在这里知道了,送奶工人培养了他们的消费者,囚犯忍受着隐私的缺乏,独行于空旷地带的妇女运用多种策略避免与陌生男子接触,等等。于是对很简明的事物作冗长的讨论分析这一风险越来越逼近了。

实质的与形式的扎根理论

有两种扎根理论,实质的与形式的(Glaser and Strauss,1967:32-35)。据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实质的理论是“向着实质的或经验的领域发展”,而形式的理论是“向着形式的或概念的领域发展”。第一种扎根理论的例子如已引用过的“病人护理、种族关系、职业教育、行为不良、研究组织”等,第二种扎根理论的例子有“耻辱、非正常行为、形式组织、社会化、身份一致、权威与权力、报酬系统以及社会迁移”等。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33)特别强调这两种形式的理论都是在中程理论中发现的,中程理论处于“低层次的工作假说”与“包含一切的宏大理论”之

间,默顿也曾介绍它作为沟通那些低层次与高层次理论之间的鸿沟的桥梁。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90-92)似乎暗示了,直接从资料产生既为实质性又为形式化的理论是可能的,但更可取的是,从实质理论出发,然后从实质理论产生出形式化的理论。从先前的理论产生出形式理论也是可能的,只要这先前的理论是实质性的,或至少是以先前阶段中的实质理论为基础(甚至直接从资料产生出形式理论也是可能的,但这更难,这里有个风险是,其结果可能是一种"逻辑演绎"型的抽象模型,既与资料不符,又对实际无用)。

30

然而,实质的与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明晰。有时作者谈到其区分,好像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实体理论,另一方面是属性/关系(如上文谈到的例证)。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看来好像认为实体是经验的,而属性或关系是概念的,这在语义上实际是等价的。而实际上,有时是一个"可区分的概括层次问题,这些概括只有程度之别"(Glaser and Strauss,1967:33)。但是,首先,概括的不同层次与经验和概念之间的差异并非等同,因为不同的概括可以既关涉理论又关涉其经验对象。其次,概括的不同层次与实体和属性之间的差别并非等同,因为实体与属性都可以更多地或更少地具有概括性(因而"狗"比"西班牙长耳猎犬"更有概括性,"有毛发"比"毛发蓬松"更有概括性)。

某种语义上的混乱就产生了。作者的一个错误是,实际上是在相对的两个现象之间的差异上设置了一个绝对的区分,尽管其边界是可变的。整个问题等于更低或更高层次的概括性问题,而事实上并非仅只这两个层次,而是有任意多的层次。选择哪个层次取决于特殊的考察目的。例如,通过一种关于"社会损失"(即对社会的损失)的实质理论以及医院职员对待临死病人取决于他们如何评价其社会损失这种方式,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叙述了他们如何将研究扩展到非常独立于护理情形的"社会价值"形式理论。从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对实质与形式的区分只是表示了概括性程度上的两种可能程度。向着更低层次的概括性往下看,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职业或家庭损失的研究上。向着更高层次的概括性往上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研究扩展到对一般社会价值创造的思考上来。这表明,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在概括性程

度上任意选择了两个相当接近的点,并把它们指定为"实质的"或"形式的"理论。作者进一步声称对重症监护病房或者消防委员会的研究都是建构实质理论的例子,因为它们关涉的是以经验作区分的领域。但也没什么会阻止我们研究它们的一般特征,比如,作为危机管理的(公共)组织这样一种一般特征——这只会再次表明实质—形式的区分是人为的。而且,"形式"一词,在上下文中有误导,因为据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所言,被讨论的理论要么是形式化的要么是非形式化的。甚至"实质的"一词亦可疑,因为处于概括性的较高层次的理论也并不缺乏内容,只要它们不是纯理论的。 31

然而,对实质与形式的讨论作为一种介绍和路标,对质性研究者还是有用的。创造了一种具有某种程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理论,不应该就此停止,而应该提高眼光,考察作进一步概括的可能性。通常通过研究属性比研究实体更能作进一步的概括。最后,研究者也应该思考将理论形式化的可能性,只要这不是终结自身而是可以产生更大的理论力量(比较 Sköldberg,1992a,对这一研究策略的论述)。

结　论

在反对"宏大理论"时以及在某种表面上,扎根理论强调的是局部、暂存、多元,在同一层面上它又与后现代主义有共通点(见第 5 章)。不过,它们之间也有(更为)明显的不同,一是通常的无批判态度,二是强烈抵制来自早期理论的"文本间的(intertextual)"影响。此一运动认为经验资料(相对地)不受理论约束(theory-free),因而也与实证主义有相重叠之处。它们都有这样一个理念,即能将理论从经验资料中分离出来然后又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扎根理论认为证实是次要的。进一步,它们都有客观性、可概括性、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等理念(Strauss and Corbin,1990:27)。而扎根理论在以下方面又是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它强调植根于社会互动来理解符号的意义,强调理论的产生比证实更重要,并强调质性资料比量化资料更重要。[17]但是,大体上说,我们有理由注意到扎根理论与实证主义者的科学姿态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因为许多作者已经倾向于认为扎根理论是一

种可供选择的实证主义模式,然后才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同(例如参看,Ekerwald and Johansson,1989)。[18]

通过对文本作十分精细的阅读,可以分辨出它与解释学的相似之处,但是其不同点更突出,特别是在关涉对经验材料的理解时,如在解释学中,经验材料总是解释的结果,而不是解释的第一起点。扎根理论与现象学有强烈的相似之处,它强调作者的视角(尽管扎根理论在这一点上没有达到某些其他学派如民族方法学的地步),它看到了独立于理论(theory-independent)的资料的可能性。

根据作者自己的差异最大化精神,比较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关于扎根理论的著作与大约与它同时代出版的其他方法论著作是有好处的。其中,布迪厄等(Bourdieu,1991)是从法国巴舍拉等人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传统出发的。作者将这些元科学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大危险在于降为常识认识。必须承认,所有认识都不得不从这种认识开始,但不应该停留于这个层次。而且社会科学必须不但要渐渐地使自身摆脱"前科学"观念世界("前科学"观念世界源于行为者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束缚,而且要真正努力来解放自身,这只有通过与完全原初的语义学和术语学作一种根本上的认识论断裂[巴舍拉著名的中断(coupure)]才会实现。社会科学必须创造它自己的社会概念,这种社会概念是从与日常世界的指称结构和观念完全不同的视野中形成的(Bourdieu et al.,1991:37):[19]

32

> 假如经验主义足以提醒他们,用庞加莱的话说,即"事实不会说话",那么社会学家将会较少受到经验主义的诱惑。也许这是人类科学的诅咒:他们处理的是说话的对象(speaking object)。当社会学家依靠事实来提供能使他们建构和分析事实的那些存疑的和理论的概念时,总有一个危险,即这些是从被调查人之嘴提供的。为了解释他们的行为甚至解释他们所提供的理由,社会学家单纯听从主体,忠实地记录他们的陈述与理由是不够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很容易用他所研究的那些人的前概念,或者用伪装的科学目标来代替他自己的前概念,这一伪装的科学目标混合着"科学家"的自发的社会学与他的对象的自发的社会学。

布迪厄等人把他们的批评主要指向了拉札斯菲尔德传统中强调统计学分析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但它也非常适用于对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的批评。反对短视的经验方法的讨论看来是有根据的,因为这种方法根本不能深入到经验材料的深层结构,而只会发现自身被束缚于表层结构(见 Chomsky,1965)。其关注的焦点是经验上的易近性。就像邦奇(Bunge,19670)与怀特黑德(Whitehead,1929)这两位不一样的科学理论家所论证的:从资料抽象出深层结构的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

扎根理论与布迪厄等人的构造论(constructionism),被认为不是二分法中相互排斥的二择一,而是在可能的方法论系谱中——其潜在的维度形成了与研究对象的远离——接近终点的位置("接近"意味着它们与终点并不一致)。如此说来,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相对地处于接近行为者的层面,接近其所研究的对象,而布迪厄关于社会对象的构造论则被真正的裂口、认识论的鸿沟从经验层面分离开来。在我们看来,布迪厄的构造论标志着真正丰富的"宏大理论",若超出布迪厄的构造论,就会展开经验上的空洞贫瘠的理论,它完全停滞不前,它需要经验资料提供的表面冲突——只要它们是真正的理论而不是像牧师的信念系统那样的概念结构或"方法"。另一方面,若超出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扎根理论,"研究"就只是由对行为者自身所说的话的重新表述或由研究者自己的常识思考所构成。[20] 33

因而扎根理论与社会对象的建构是两种研究模式,凭借其所需要的条件,两者都能产生有价值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别出心裁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再来看格拉泽与斯特劳斯,为他们的方法论添加一个新的基本原理或黄金法则:在形式化的扎根理论(最新思潮)中,努力实现一种与行为者层面的认识论断裂。[21] 其基础是:形式理论将解释深层结构,实质理论将解释表层结构。这样一种黄金法则将抵消掉格拉泽与斯特劳斯观点中许多在我们看来的根本性弱点,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它的长处:所有研究者创造新理论的可能性与权力。它强调理论的产生甚于证实,强调对质性方法的冒犯式使用,对新型资料的开发。这些属性,使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方法论看来依然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其持久的贡献在于,使特定研究类型合法化,使若干个别方法论元素得

以发展。扎根理论由此发挥着重大的历史性作用:将方法论从对某种特定的已建立起来的机制如量化分析和对假设的检验的过分依赖中解放出来。话虽如此,它仍需进一步发展。在我们看来,这个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其个别部分有其弱点。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对资料的片面注重,与此相应的是,无视资料对理论的依赖,并过分相信技术机制——编码。尽管这些因素在符号互动论中并不缺乏,但是自拉札斯菲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在这里更明确。扎根理论至少部分是建立于统计学过程模式之上的(Glaser,1992),这最终与质性方法格格不入。这些弱点使得考察学习质性研究的其他前沿的必要性变得非常急切,我们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对此作出探索。

大体说来,扎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重新表述是必要的,其所建立的基础是:与资料更为松散地结合,对经验材料作更具反思性的关注,在基础与理论的研究过程中结合一种大胆的方法。[对扎根理论作这样一种重构,这一方向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已由海格实施了,Haig,1995]尽管我们在这里向扎根理论提出了直接的批评,但它的确可以提供许多价值。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一方法论中有些因素无论规模大小都是有用的。正如许多研究者实际所为,建立于扎根理论所提供的普遍灵感之上而不受缚于其个别规定(甚至不受约束于编码程序这一特别的理论标志)是可能的[22](当然,重要的是这种普遍的灵感不会导向某种无方法的合法化)。另一种途径也是非常可能的:无需对整体有太多注意,研究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应从廉价的丰富材料而来的个人的技巧与方法来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如果这些可以综合成一种整体上的解释自觉的话。本书的目标就是要提供这样一种自觉。

34

结　语

前面我们已描述了扎根理论的主要特征并对其内容作了批评考察,主要参考了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开创性专著。1990 年代,这两位作者分道扬镳了,扎根理论的创造者之间有了分歧。冲突围绕的是斯特劳斯与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的著作。格拉泽(Glaser,1992)对这本书提出了严厉而又十分痛苦的

攻击,他认为这本书背叛了扎根理论的原初理念(要更积极地了解斯特劳斯与科尔宾的这部著作及其与原初理论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历史原因,见 Annells,1997)。他进一步声称,这本书对他自己既是这种方法论的创造者,又在他自己后来的书(Glaser,1978)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贡献没有给予充分的承认。格拉泽的批评特别针对的是斯特劳斯与科尔宾对以下内容的过分强调:

- 前概念而非一种无偏见的公开的方法。
- 范畴产生于对单个事件的精密分析而非产生于对多个事件的持续比较。
- 证实而非产生。
- 研究过程的规则,而非从资料而来的理论的自我显露。

根据格拉泽的描述,他自己像一个"正统主义者",而斯特劳斯我们就该称之为"修正主义者"了:格拉泽想保留原初的纯正的方法论,而斯特劳斯则在某些方面向其他方法论靠近了。他们之间的断裂点看来大体上是分析者的前概念问题,对于前概念,格拉泽认为不太重要,是消极的,而斯特劳斯则认为更重要,更要肯定(参见 Strauss and Corbin,1994)。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语境中,我们要指出其分界线的划定位置是与我们对扎根理论的主要批评相一致的。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得承认下面这一说法是对的,正如格拉泽所指出,斯特劳斯与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介绍了一整套范畴和前概念,尤其是某种纯理论的解释"范式"特别使格拉泽不安。[23]这样一套前概念在格拉泽(Glaser,1992)那里没有。另一方面,他的确提出了一个与斯特劳斯和科尔宾所有前概念加在一起的同等分量的前概念。他声称,研究的问题应当总是与探索行为者的问题及其主要困扰相关。他还坚持认为,这种困扰总有一个最大的。这当然意味着,分析应该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根本的方式进行。斯特劳斯和科尔宾同格拉泽都没有为他们各自的前概念进行辩护,而只是颇为突然地提出来了。扎根理论为完全无偏见的方式而努力,这就意味着前概念根本就不是以走后门或非反思的方式出现的,它们要么以纯理论假设的形式出现,

35

要么以适应行为者环境的方式出现。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根据纯理论假设来做研究或研究行为者的问题总是错的,但是如果把质性研究限制在这两条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那就是错误的。唯理论当然并不是社会或科学语境中的最高主宰。至于行为者的问题,从它开始并非等于肯定任何此类普遍问题的存在(Sköldberg,1991a;1994):不同的行为者会有不同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无论如何几乎总是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再者,如布迪厄指出,考虑行为者们自发的范畴很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继续前进以避免陷入由无意识、意识形态以及前科学的指称结构所影响的幼稚这一风险之中(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

民族方法学

根据:现象学

民族方法学也依赖于对经验材料的密切关注,其根据在现象学——20世纪初出现的德国哲学运动。据称,现象学不满于现代自然科学使自身脱离其日常生活的基础太远,并创造了一个它自己的抽象世界,而没有对其所依靠的通常人类经验的基础作出充分的分析。"回到事物自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现象学运动这一战斗的呼喊宣告了回到具体感官的日常生活世界[24]。实证主义以其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已经吸干了这个世界的物质和色彩,留下的是一个纯抽象的形式结构,一个摆脱了其最初束缚的空中楼阁。然而,现象学家们所希望回到的那个前理性经验,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的经验不是一回事。它是"活生生的"经验,不是消极的感官的感觉,而是感知,它通常已经具备了目标、价值、意义等形式的解释,现代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将这种解释命名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Spiegelberg,1982)。

于是,经验本身成了出发点。同时这意味着对它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对应物问题的忽视(毕竟,存在着幻想、幻觉、错觉等),而应该把兴趣点集中在现象的世界。可以说,真实的世界是被阻隔

的(用胡塞尔的术语,是“括起来的”)。这被称作“现象学的还原”,这意味着我们是从真实存在的对象来进行抽象,而不是把我们自身限定在理念世界。这样,胡塞尔声称发现了主体客体二分问题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情形。这里的兴趣点“意向性对象”既不是主观性的,也不是客观性的,而是第三种情形——“活生生的”。我们或许要问这些意向性对象如何与纯粹的主观心智现象相区别,而如果我们不考虑个体“思考者”,承认这不是意向性对象自身的心理过程而是它们的“内容”问题,那么其论证就清楚多了。

第一步还原是“现象的”。下一步,即第二个还原是“本质的(eidetic)”[25]。其目标是丢掉个别的现象,达到所谓的“本质(essence)”。现象学家们用这个术语,看上去指的是与通常所说不同的另外一种“普遍性”,比如桌子而非桌子本身这一概念(Spiegelberg,1982:99-102;Merleau-Ponty,1973:78-79)。为了从个别现象上升到某种更一般的普遍性,需要某种形式的思考过程。胡塞尔自我远离了包含分析性的抽象或类似活动的方法。然后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本质的直觉(wesensschau)”。这有点神秘意味的术语是什么意思呢?它似乎只是一种对于我们思考过程诸要素的“比较分析”。作为某一现象的“想象变异(imaginary variation)”的结果,我们应该能够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全体现象中的“不变性”。这共同的东西,这“不变性”正是“本质”。例如,一个红点在我眼前,通过想象所有可能的细微的色彩,我心中呈现出不同的红色,然后达到一个总的“红色”概念,它指的是那种颜色的所有色调和类型中的共同要素。这个一般的红色就成了我们看到某个具体的红点时所说的那个意思。可以说,我们看到了(see)一般寓于个别,寓于多样的个别现象中——对一般“本质”的直觉(Haglund,1977:56;Husserl,1913:106-109;Merleau-Ponty,1973:78-79;Schutz,1967:113-116)。我们知道,在现象学中,在逐步达到一般的过程中,最好不要使自己太远离于感官具体。可以这样说,一般总是植根于具体,而不是脱离它。胡塞尔警示我们,在创造一般概念时,不要丢掉了与具体经验的所有关联。我们“看到”一般寓于个别(对于“本质”之作为揭示先在的非反思性意义的一种方式的考察,参看 Merleau-Ponty,1973:61)。

还有一个步骤,在现象的和本质的还原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

还原,即超验还原。它的意思是,从研究普遍性、不变性以及一般现象即本质,到继续考察这些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事物通过什么样的心智先验结构获得其属性?胡塞尔根据康德而把这些结构称为了“超验自我”。这个具有创造力的、充满活力的自我是其自身世界的最终创造者。胡塞尔在这里事实上进入了激进的唯我论——唯有自我存在;甚至外部实在的存在,实际上也只是超验自我的一个先验范畴,是它投射自身的方式之一,是由自我创造建筑起来的这个世界的成分或属性之一。这条推理线索对于同一传统中后来的研究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兴趣点由此被指向了个体之间根本上同一的意义,因为超验自我也建构了其他个体,也包括他们的超验自我,这些超验自我因而是同一的(Schutz,1967:126)。这一踪迹能在民族方法学之父加芬克尔那里发现(Garfinkel,1967)。

37

从一开始,胡塞尔就已经把“经验(erlebnis)”放在“经验之流(erlebnisstrom)”里面——即个体的经验被解释为一个过程中的要素(Husserl,1913:358)。这引导我们去接近经验的历史形态,胡塞尔开始渐渐地把兴趣放在这方面,直至终生。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经验都必须被视为牢牢嵌入并承受概念世界的刻写,而历史的维度及时隐退到背后并暗指着未来。一个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里不断地改变、转化其“视域”的世界,用胡塞尔的著名术语,即生活世界或 Lebenswelt(Spiegelberg,1982:144-147; Gadamer,1989a:247-251)。

生活世界是我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物,还有人以及其他的“自身”。这些自身与无灵的物不同,在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态度和自觉的立场,这就形成了移情(Gadamer,1989a:250)。以这种直觉获知的方式,唯一我们能够“谨慎进入”的事物,是其他的自身,其他的人。然而,不幸的是依然留下了唯我论,既然移情是自身的先验结构,那么正是它把其他人也建构成了自身(Spiegelberg,1982:140; Schutz,1967:126)。

民族方法学的研究

关于现象学研究模式的说明,见茅斯他嘉(Moustakas,1994)

的作品。现象学已被应用于许多社会科学语境中(例如:Giorgi,1985; Karlsson,1993; Sandberg,1994; Silverman,1970)。我们在最后一章讨论了它的一个相关的发展,即社会结构主义(Berger and Luckmann,1966; Gergen,1985)。在现象学与社会结构主义的启发下,祖波夫(Zuboff,1988)把读者纳入了他对信息技术以及职业生活的研究中,以便作出更杰出的研究。本章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应用,即民族方法学(Cicourel,1964; Garfinkel,1967; 亦见 Heritage,1984, 以及关于更新的概述见 Holstein and Gubrium,1994)。民族方法学是对受第二代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影响的第三代人的现象学的直接继承(Gurwitsch,1964; Schutz,1967)。其关注的焦点是,探索生活世界是如何出现的,这个生活世界是社会互动形式微观过程的一个结果,而社会互动又产生了其成员的常识知识。它强烈地批评了传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指向社会行为者的日常世界的道德说教:"我们社会科学家更明白事理。"于是这就假定了抽象范畴优先于行为者自己的认识。民族方法学家认为这并非实情。相反,他们正是要研究这日常的认识它如何产生和成形。我们在生活世界或日常世界中的行为是受控于(非反思的,未质疑的)潜在预期与隐性规则的。而民族方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探明这些东西。 38

> 在霍尔特(Holte)与哥本哈根(Copenhagen)之间的市郊火车上,我曾亲见一个小情景,这个小情景可能是加芬克尔自己导演的。一个年轻人还有几站就要下火车了,他努力而徒劳地要把一个车币送出去。"我自己不需要这个了",他说,"你可以拿它继续用。"他一个挨一个地去送,但没有一个人想要他的车币。甚至没有一个人想看他。至少有十五个人拒绝了他的赠予,而没有说"不,谢谢",而是动都没动一下。这个年轻人长得体面而又严肃。他大概本应马上停止这件事,如果有人接受了他的车币的话,可是没人接受。当他一直走到我这里的时候,我小心地不去看他,就好像是因为他过来时裤裆前面的拉链没拉好而羞于看他。火车在下一站停了,几个新的乘客上车了,我们想:"啊哈! 他们还不知道将要受赠一个车币。"在斯瓦莫伦(Svanemollen)站这个年轻人下车了。依然揣着他那枚车币。而火车上的乘客们,

转眼间目光相接,互致笑意(Asplund,1987:129-130)。

我们将由读者去思考是什么样的隐性规则控制着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情景,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回头来讨论。这里我们要继续来讨论民族方法学中的几个核心概念。其核心概念包括"索引性(indexicality)"与"反身性(reflexivity)"。索引性——胡塞尔曾以其他名称谈过这一现象——意味着一个意义指向(meaning-bearing)单元(一个词、一个行为、一个事件)具有不止一个意思。借用现代解释学的一种表达可以更好地说明,它是多义性的,具有多重意义。这是因为所有意义指向单元中的义项都总是有语境依赖与场景范围的。相反,同样一个意义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因而,符号(sign)与表达(expression)之间是多对多而非一对一的关系。在民族方法学家看来,早期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精确理念的影响,已陷入了一个陷阱,就是试图把所有语言都压入到科学的模子里。在科学的模子里,定义与结论最应注意。在这里,语言就像一个经典的法兰西风景公园,而不是一个更自然和野生的英国园林。真实的日常世界中的语言,比自然科学中的语言更加丰富而含糊得多。而尽量简化语言以使之符合后者的标准的那种研究,事实上是在残害肢解语言以致无法弥补。

另外一个重要属性是反身性。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并非是单向度的,在研究过程中,两者是持续地互相影响着。根据实证主义的观点,对象不受研究者的影响,研究者亦不受对象的干扰。关于研究的这种实证主义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者与对象都被包含在一个共同的语境当中,根据前面一段的讨论即都是有语境依赖的。[26]波尔纳(Pollner,1991)坚定地指出,早期民族方法学所主张的"根本的反身性"有真正革命性的潜质,可是,不幸的是后来者妥协了,采取了更主流的立场。

39

民族方法学的其他核心概念包括如下这些:[27]

- 成员资格(membership)——掌握了某一特定的自然语言游戏的能力。
- 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行为者以常识术语反思性地叙述其行为的方法。
- 局部实践与社会秩序(local practices and social order)——

在具体实在中,行为者创造性地形成社会规则结构的方式。

- 方法的独特适当性与进入角色(unique adequacy of the methods, and becoming the phenomenon)。前者意味着研究者在他们所研究的生活世界中是有资格的。"进入角色"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强化。例如,卡斯塔尼达在备受争议的书中(首先是在 Castaneda,1963 中),他自已成为了墨西哥的印第安巫士的学徒,并滑入了萨满巫师的魔法世界(卡斯塔尼达是一个民族方法学家并曾从学于加芬克尔)。
- 场景式展示(scenic display)。这是戈夫曼(Goffman,1959)微观社会学的遗产,指的是在"局部实践、隐性规则以及知识、可说明性"等的实践中,行为者创造性的富有戏剧性的行为表现。它可以通过使用视听的手段(录像电影、录音磁带),以及民族方法学所擅长的"不协调实验"来获得研究。"不协调实验"的意思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行为者的常识观念进行扰乱。

这使我们回到那个车币和市郊火车的场景。

那个试图放弃车币的年轻人做了个简单而完美的民族方法学实验。他所违反的行为模式、规则以及潜在预期有下列这些:

①你不要送给陌生人礼物,尤其是不要送给城郊的市郊火车上的陌生人。

②你不要送出实际上没有用处的礼物,这礼物会由此获得一种不确定性的和矛盾的价值。

③你不要送出礼物,如果它们被接受并被使用,会表明那个接受者要么是极度地贫穷要么是特别地小气。

④一个没有特殊的社会显著特征的年轻人不要送礼物给那些明显是中年高收入的人。

⑤一个没有特殊的社会显著特征的年轻人也许应该向高收入的中年人索要车币,而相反的情形是不被接受的。　40

⑥还有其他一些。但总的来说,这个年轻人打破了集体

> 无意识行为的氛围……搭乘从霍尔特到哥本哈根的市郊火车是不想让人看见。或者这是要使自己隐蔽,而这需要大量的付出。这个拥有一枚车币的年轻人暴露了这些乘客。“现在这就是你了!”他一旦离开火车,回归无意识与隐蔽状态又通过微妙的瞬间相视与笑意的稍纵即逝得到确证(Asplund,1987:134-135)。

有人可能会反对,如果这一解释是有效的,那么每一个不正常的人——例如,一个公共交通上或公共场所中的痴迷者——都是(不自觉的)民族方法学家,因为这个人通过破坏隐性规则而揭示了它们。民族方法学家应该要同意这一点。于是问题就在于意义何在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行为是受控于习俗(隐性规则、潜在预期),这一看法丝毫不新鲜,说破坏这些规则会导致反感也不新鲜,因为这些规则被最初建立起来的理由之一就是协调社会交往。像民族方法学家那样用描述性的术语来研究这些事物,总显得怪怪的且无意义。自然的回答似乎是,“那又如何?”就在它开始要被感兴趣的时候,民族方法学停步了。任由我们去疑惑:是什么导致了习俗。用布迪厄的术语,我们可以这样问,例如,被不协调实验弄得可见的习惯是如何与行为者嵌入其中的社会场域密切联系起来的?(Bourdieu,1979;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在此语境中,布迪厄思想的中心,即支配因素,很明显就在火车上的富人旅行者与那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中。富人属于社会中的主导阶层,而那个年轻人属于边缘的不稳定阶层。而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民族方法学家们被密封住了,因为他们对生活世界的行为者层面作了现象学的限制与掺杂。

民族方法学已被应用于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尤其是医学、法学、会话、办公室与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宗教、艺术以及科学工作等。近年来的出版物中,有的研究主题多种多样且有趣,如饮食失调与祖父母照料(Beach,1996)、匿名戒酒会(Arminen,1996,1998)、演说角(McIllvenny,1996)、会话中的打断(Bilmes,1997)以及古典音乐排练(Weeks,1996)。

民族方法学没有保留任何一种带有用法说明的“官方指南”来指导研究程序,却通过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手段发展出了不同的“局部研究文化”。他们的目的一般是要动摇生活世界中的

当然之理,例如质疑社会习俗,并以此来突显潜在预期与隐性规则。下面看几个例子:

- 匝托写码(Zatocoding)。当有思想以及要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出现的时候,民族方法学家就把它们记在卡片上。当储备到了一百张卡片的时候,研究者以一些"描述符"为它们制作索引,然后继续下一个项目的一百张卡片,然后再下一个。几百张卡片被制作了索引之后,研究者开始与这些卡片进行"交谈",比如,互相比较某一个特定的描述符或不同的描述符下的所有情况。尽管这个过程听起来有点单调乏味,但是,就像运用某种群体动力学方法一样,它看来从未通过对研究者的反身性的影响而成功地放宽对实在的限制(Wood and Mehan,1975)。 41
- 倒置镜头被用来颠倒可见场域,然后,在大脑调整出"正确的"方式之前,恢复由视神经接收到的原始影像。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者可以真正以新鲜的眼光来看待实在。人工手脚的实验在肌肉运动的意义上也有同样的结果。
- 不协调实验。在关涉社会语境中的某些规则或预期时,实验者以某种异常的方式来行为,以便以疏远感来揭示隐性规则的结构。例如,实验者开始把顾客当作店员,或把饭店里的客人当作侍者,或要求他的朋友澄清他们大多数的日常陈述,或把新规则引入到熟悉的游戏中。
- 方法的独特适当性。民族方法学家借此在某领域中获得了资格,这个领域是他通过成为其中的成员来加以研究的。
- 展示现象(场景式展示)。通过运用未经加工的资料,特别是以具体的声像形式,对某理论作澄清或反对,以此来展示现象。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Atkinsom and Heritage,1984; Boden and Zimmerman,1991; Sacks,1992; Sacks et al. ,1974)值得特别提及。它已被认为是一种"新民族方法学"的方法,甚至对某些民族方法学家

来说,它就是现在流行的民族方法学的方法(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参考赫里蒂奇(Heritage,1984),霍尔斯坦与盖布莱恩(Holstein and Gubrium,1994:226)认为会话分析有三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1 通常会话存在着重复出现的结构特征,而不管参与者的心理特征。
2 会话是有语境范围的,以致它"既产生了又反映了其由以发生的环境"。
3 这两点规定了所有互动的特征,以至于没有任何细节会被认为是处于正在进行的互动秩序之外或对于正在进行的互动是偶然的或不相干的因素而被忽略。

会话通过被分解为片段来分析(与语言学类比)。于是我们会发现,不管会话内容是什么,某些特定类型的片断或"时隙"出现了。已获得研究的电话会话就通常由接到电话拿起听筒并回话的那个人提出供讨论;电话中的问候也是一般性地发出,而不管接下来会话的主体是谁(Mehan and Wood,1975)。这种分析的结果应该不会太耸人听闻。

42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Heath and Luff,1993),一名医生要为一个疝气病人写诊断书。在对所发生的会话所作的复杂而细致的编码的帮助下,他对情况作了考察。医生摸了一下病人的脚,病人喊了声"啊"。医生没有说什么表示同情的话,而只是继续写诊断书。在一个社会互动中(不仅仅是私下情形)病人喊"啊"这一事实,以及医生继续作检查这一事实,都被作为研究发现提出来。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不禁要疑惑,如果没有复杂的编码工具,也没有宣称是做"研究",做这些并非特别具有革命性的观察难道不是本来就可以做得到的吗?

评 论

我们将对其方法作几点批判性的评论以总结这一阐述。民族方法学在我们看来似乎先行假设了一个透明的、理性的、常识的过程,行为者的生活世界借此被持续地创造,就有点像一个精密的蚂蚁群,与蚂蚁群不同之处在于其信息不是以信息素而是以

语言和手势为中介形成的。这个世界是由许多语义上平等的超验自我构成的,它们之间没有冲突、没有情感、没有中断地互相交流。与列维纳斯(Levinas,1989)一道,我们可以宣称,参与者之间的相异实际上比这更加重要得多。因而,并不仅仅是具有煽动性的民族方法学家才容忍了摩擦与冲突。我们在上文说到了"偏离行为",但它很难被限定在一个清晰的社会边缘阶层即"偏离常规者"身上。相反,习俗、礼仪、隐性规则,比民族方法学家所可能掌握的更加易变、不确定和灵活。在人类关系中,习俗在不断地接触、重叠并被误解。情感以及情绪冲突,明显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大都被民族方法学家压制住了(Douglas and Johnson,1977)。如果社会话语的意义是有语境依赖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像吉登斯(Giddens,1976)那样问,例如,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他自己的理论,其实际情况如何。难道不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易变、不确定并且有语境依赖吗?而这实际上说明了什么呢?最后,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民族方法学从未问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形成了行为者行为性格的超个体结构有哪些?如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体结构。

通过在行为者层面上目光短浅地专注于一个充斥着细节的焦点,分析家冒险纠缠于琐事之中,如会话分析所表明的。这一过程结合其远非令人惊异的结论,其严谨与贺瑞斯(Horace)的山上产生了老鼠相比,也许并非巧合,会话分析甚至被说成是"强化的实证主义"(Lynch and Bogen,1994,转引自 Holstein and Gubrium,1994)。类似地,阿特金森(Atkinson,1988)批评了会话分析狭隘的"行为主义与经验主义"方法。他认为,当代的民族方法学(特别是但并非唯独会话分析),多有经验主义与归纳法优越论的原则特征,因而压抑了更具解释学与辩证立场的根芽。关于解释学与辩证的立场,他认为已在加芬克尔的早期著作中辨明(关于民族方法学中的这两个潮流,亦可参见 Mehan and Wood,1975)。其与扎根理论的比较,亦应注意。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会话分析并非完全流行。最近二十年,有些作者合并了各种各样的更加制度化的、语境的以及宏观关系的因素(Silverman,1985,1987;Drew and Heritage,1993)。

43

相反,加芬克尔(Garfinkel,1988)提倡了一种比会话分析更少

结构性更多局部焦点的民族方法学取向。这甚至使得梅纳德与克莱曼(Maynard and Clayman,1991)将其称为“最恰当的民族方法学”:

> 正面详述研究者如何可能地处理社会学的最令人敬畏的现象——社会事实的客观的、永恒的实在……社会学家能够严格地把这种现象解释为:行为者互相合作以实现社会事实在其日常生活中可观察并可互相说明。
>
> 简单地说,这是民族方法学事业的中心。

然而,阿特金森(Atkinson,1988)对此以及另外两位更近且更有影响的民族方法学家的文本作了如下批判:

> 因此,有一种自我强加的局限,具有非常根本性的后果。在强调对于“自内”工作以及没有任何社会学偏见的描述时,分析家似乎仅仅局限在扼要重述顺次观察到的活动、极少或没有选择的结构、或任何其他会话中的那些活动的表征结构……对可观察细节的过分强调有变成一种无意义的无原则的重述这种危险。这一由加芬克尔、林奇与利文斯顿提倡的立场,使人想起法国新小说作家如阿兰、罗布-格里耶:极小的细节描写聚集着丰富的超写实主义,直到读者丧失了对任何意义的领悟力。

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民族方法学采取一种比上面更积极的评价应该是可能的。对正统社会科学中的“宏大理论”的批评,对微观过程与局部生活的强调都在这个方向上得以加强,而尝试把现象解释为一个自我指涉的(“反身性的”)处于持续创造的形成过程中的文本(类似的评论,参见 Holstein and Gubrium,1994)。44 另一方面,不管其过程如何,民族方法学都缺乏局部历史的锚地,而这是具有后现代主义或至少是人文学科特征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中,它依然代表着一种显著的经验主义领域的研究,而后现代主义则以多种方式突显了对某些主题(如研究者的主体)、语言以及权威等的哲学化。此外,一位著名的具有民族方法学背景的作家如布鲁诺·拉图尔——例如,见其所著《阿拉米》(Latour,1996)——是对后现代主义与民族方法学作了幸运的融合的一个佳例,或许这暗示着社会构造论(social construction-

ism)可能成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桥梁。

归纳民族志

扎根理论与民族方法学自然不是面向资料的质性方法的仅有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已确立的方法论思潮,它们较少地受系统程序的紧密束缚,并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方法的自由。

这种思潮之一如民族志。费特曼(Fetterman,1989:11)把民族志广义地界定为"描述一个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这典型地暗示着现场工作"包含了大量的现场观察"(Prasad,1997:102)。但是,更准确地说,该术语是有多重意义而非不同意义上的运用。它一般与人类学研究的分支相关联。人类学的研究是以相当长时期地沉浸于局部社团为基础的。其思想是要显示,某个世界中的社会行为是如何从另外一种文化的视角获得理解的(Agar,1986:12)。但是较短时期地接触经验材料,有时也一般地被称为民族志(Atkinson and Hammersley,1994)。西尔弗曼(Silverman,1985)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他把民族志描述为任何包含了观察自然语境中的事件与行为的研究,并承认了对理论与资料的共同依赖。因此,他尽量使自己与这样一种观点(即把观察或参与者的观察视为一种纯粹的技术这一观点)保持距离。

不过,与其他许多作者一样,我们愿意保留这一术语来指称人类学方向上的一种方法。此方法的基础是:相当长时期地与被研究的社会或群体的日常生活直接接触,选择诸如共享意义与符号这样的文化主题(Prasad,1997; Wolcott,1955)。以一年的时间沉浸于要研究的社会,这往往暗示着典型的民族志程序(Sanday,1979)。然而,如果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异地的局部社团,而是研究者自己所在社会的某一部分(一个村庄、一个组织、一个亚文化群),那么研究所需的时间一般较少,因为研究者已经对研究对象所处一般语境有了相当的了解。跟扎根理论不一样,民族志不是一种连贯的,有明确规定的方法论,而是暗示了一种一般的研究方向,它可以呈现多种形式。某些民族志学家积极地参考了扎根理论与/或现象学,这表明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 45

然而,民族志研究一般暗指了局部社会或群体非常广泛的部门图。它常常强调的是文化或观念现象,诸如思想、思维方式、符号或意义。有时尤为关注行为形态及(其他)物质条件。

我们在此书中所讨论的主题,有可能区分出几种不同的民族志(Baszanger and Dodier,1997)。归纳民族志特别强调资料,如数量、质量,等等,而解释性的民族志、批判的民族志以及后现代民族志强调的是明显的(或尤为明显的)解释、批判性的反思和表征与叙述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来讨论它们。这里我们集中来讨论归纳民族志,它强烈地把中心集中在方法上,把方法当作好研究的关键。

民族志认为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某种理论或指称结构自然要指向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研究提供某种指导或系统,而不是妨碍重要的观察与分析。成功的研究也要以有足够的途径获得不同种类的广泛而丰富的资料,以及处理这些资料的能力为先决条件。进一步来说,还需要有个人的参与、灵活性以及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密切接触:

> 开放的心态还要允许民族志学家去探索未曾在研究计划中列出的丰富的、未被开发的资料来源。民族志研究允许对实在作多重解释,对研究过程中的资料作选择性的解释。民族志学家感兴趣的是,从当局者或局内人的观点来理解与描述一种社会的或文化的场景。民族志学家既是故事讲述者又是科学家。民族志的读者对故事所发生的当地的观点理解越切近,这个故事也就越好,这种科学也就越好(Fetterman,1989:12)。

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常常有力地应用了一大套方法:自然语境中的观察,对人工制品的研究(物质表示了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及不同种类的访谈——例如,对关键的信息提供者的访谈,以及/或者关于个人生活历史事件的访谈。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如投射测验、民意调查或问卷调查。因为以民族志为特征的方法有这么一大套,所以有些学者,如费特曼(Fetterman,1989),指出了三角互证的可能性。然而,民族志与三角互证之间的联结并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像其他类型的研究那样,有可能离开民

族志观念而依赖三角互证观念(如,Martin,1990a)。三角互证的观念是,在不同种类的方法的帮助下,有可能更好地限定某种特殊的现象。比如,我们可以把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结合起来。其目的是要回到(home in)被研究的现象。批评家声称,事实上应该是"走出(homing out)",即结论指向不同的方向(Potter and Wetherell,1987)。不同的方法获取不同的方面,这使得以它们的联合为基础来达到一个连贯的结论很难。而其他持宽泛民族志方法观点的人则视之为优势,它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材料,而不是要获得一种已被很好地证明了的材料。 46

民族志比扎根理论更少编码化,它给研究者个人留下了更大的余地,并允许对资料持一种更灵活的立场。在大多数民族志中,解释学的因素更加突出一些。而归纳民族志的支持者们首先采用的是扎根理论的假定,即资料研究是获得结论的关键,与资料相比,理论与解释是次要的。例如,根据费特曼(Fetterman,1989)的观点,理论应该以其运用中的适当性、简单性以及它的解释力为基础来选择。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隐蔽,而不是指引研究者处理和走出本领域的大量复杂的资料。当一个理论不再指引研究者时,它就不再有用了。如果资料不认同某理论,那就是该寻找新的理论的时候了(Fetterman,1989:18)。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认为研究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某种理论,资料可以简单地决定某理论的有用与否,这样一种观点是天真的。理论不是被简单而明确地界定为哪个可以自由选择,而是在范式上决定的。没有假设、概念和理论,根本就不会产生意义、"资料"。适当性、解释力以及引导研究者的能力,不能从非理论上或非范式上通过对资料的指称来决定。即使民族志学家相信,某一理论引导着他们,或者理论对他们的资料拥有解释力,但是这根本不能保证研究顺利进行。因为资料,特别是民族志研究中的资料,几乎总是模糊并向多重解释开放的,若干不同的理论可能看上去都是合适的,而那被研究者发现有用或已被证实的理论,可能仍然不是对经验材料最公正或者能促进最有创造性的思考以及有价值的洞见的那个理论。

民族志方法既需要时间又需要资源,而且往往包含了大量的个人挫折。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除了人类学之外,它不常被运用于

任何其他社会科学之中的原因。例如,在组织理论中,这种方法多被讨论而非运用(Rosen,1991),尽管有了更多的组织民族志理论(Schwartzman,1993)。它转而控制观察特别是访谈,这更为容易与方便。但是,近年来,对民族志的兴趣似乎在逐渐增长。对于可能的经验材料的丰富度与深度而言,它具有相当的优势。特别是根据与访谈相关联的所有问题与局限——它反映除了访谈情形中的行为规范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的能力已受到质疑(Potter and Wetherell,1987; Silverman,1985;1993)——民族志方法确实看来未被充分利用[28](我们将在第5和第6章回到与访谈相关联的问题)。

47

然而,我们将看到,归纳民族志苦于对资料有太多的固着。近年来,人类学家特别对各种各样的民族志以可靠的方法获取"客观实在"的能力表示怀疑(Clifford and Marcus,1986; Hammersley,1990; 亦可参见下文第5章)。而更加重视解释学、政治学以及表征问题、任意性问题的民族志研究,并未同样苦于对资料的固着、或对反映实在的宣称。我们将在以下的章节来谈这些问题,尤其在第3章中,有一部分是谈格尔茨的解释性的文化分析的。

本章小结

我们在本章讨论了三种质性方法论,它们都与资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或许会称他们为经验主义甚至"超写实主义"(布迪厄与沃昆特1992所描述的民族方法学)。扎根理论与民族方法学特别代表了"微观社会学革命"(Collins,1985)。这一革命反对的是超个体(或宏观)层面上各种形式的先在地占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以及统计学意义上的"资料运算(data-crunching)"型社会研究。根据帕森斯及其他人的精神,这三种思潮的共同点是,它们为自己勾勒的形象是反对崇高的——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经验空洞的或至少是难以运用、不切实际的——"宏大理论"(参见Mills,1959)。同时,他们强调质性方法的优势,而反对量化方法。但是却努力模仿量化方法论的技术性方法作严

格编码,尤其是扎根理论与民族方法学更是如此。聚焦于微观层面,如反理论主义以及对方法论的随时校订,其结果自然导向了一个面向资料的或者如果有人愿意的话是(超)经验主义的立场。

这些运动的历史收获之一是,面对量化的实证研究的主导地位及其被假定的优越性(往往不受质疑),他们非常强调质性方法的重要性。他们参与辩论,猛烈冲击反对对于实证与权威的强调,因为这使得理论仅仅成了对由来已久的古典的学院式应用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创造。这种个体的创造不太关注那些值得尊重的,然而不幸往往是尘封的老学究。应该打倒猜谜式的(puzzle-solving)常规研究,给每个人以思考自身的权利。

另一方面,这些思潮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下面的批评较少适用于归纳民族志而更适用于另外两个)。其所描述的焦点有相当大的最终仍然是井蛙之见的风险,而对作者自己观点的限制则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庸俗化(trivialization)。这些思潮忽视了解释问题的主要部分,以至于资料显得多少是无中介的、纯粹的,而且其研究过程被赋予了一种天然的特征,用一个农业上的比喻来说,它只是对经验材料进行收集然后脱粒。[29] 承认前理解具有某种重要性,并没有弥补这一决定性的缺陷。再者,没有顾及知识社会学的整个问题意识——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科学工作的影响。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权威从未受到质疑。话语对于"实在"与研究这两者(相对)的依赖性,也没得到实际上的讨论:语言与文本中的歧义与困境,依然是一片未经探索的雷区。我们现在来转向研究这些广泛而危险的领域,继续我们踏上方法论风景区的旅程。

48

注　释

[1] 这并不意味着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贡献与符号互动论是相等的。格拉泽与斯特劳斯以其创造性的元素对这一母思潮作了补充,当然——不时有些类似的例子——所有这些甚至都不在符号互动论的精神之中。但是,在对于扎根理论的接受中,它的影响被低估了。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它在作者自己的文本中也被忽视了。安奈斯(Annells,1996)在把符号互动论称为扎根理论的"传统的……理论上的支撑"的同时,也讨论了它的后实证主义的哲学语境,甚至与某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联系。

[2] 对格拉泽与斯特劳斯专著的接受，一开始有些冷淡，但在 1980 年代，引起了更多的兴趣和赏识（Ekerwald and Johansson，1989）。

[3] 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在这里预期了对发现而非辩护或者后来的后实证主义科学理论家（夏佩尔等人）语境的特别强调。这同样适用于对于研究过程的相关看法。例如，参看苏佩（Suppe，1977）。

[4]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是库恩的严格的对立面，因为他们要求多样的不同的理论；这与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5）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更相近。另一方面，库恩的"常规研究"意味着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理论，在任何特殊的时刻，在整个研究的分支中，都拥有或应该拥有（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边界被库恩的阐述弄模糊了）垄断的地位。其例外是当一个垄断被另一个垄断取代时所发生的"科学革命"。格拉泽与斯特劳斯把观念从宏观层面（整个研究领域）转向了微观层面（个别的研究过程）。

[5] 然而，作者们绝对与图尔明不同，他们不会把资料或者（由此而来）它们的应用范畴以及主体领域视为有理论依赖性。

[6] 他们的时代有个典型的表达方式，作者们几乎总是把研究者称为"他"。很明显，女性研究者在格拉泽与斯特劳斯及其所处时代的知识界是缺席的。

[7] 两个对照可以说明这一点。洛伦茨是他所处时代的理论物理学上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他被门外汉爱因斯坦超过了，这部分是因为爱因斯坦能够更自由地思考并较少地受权威的限制。洛伦茨本来已经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方程式。但是，在对它们的解释中，他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他从未试图使自己自由地建立以太（ether）概念。遗传密码的发现者，克里克与沃森，都是门外汉，受到了洛里亚的公然鄙视。洛里亚是其领域的伟大的博学之士，但他自己从未接近这一发现。尽管其他因素很明显也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一现象在科学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博尔（Bohr）就称自己是一个半吊子；达尔文是自学的；马克思从受到的教育来讲，是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弗洛伊德是一个医生，而不是一个心理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一个哲学家。

49

[8] 汉森用的是较少通用的"逆推法"而非"溯因法"。

[9] 或许应该补充说，创造性不是好研究的唯一标准。

[10] 比较哈默斯利（Hammersley，1989：176-177）批评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的非累积性：每一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头开始。

[11] 马克思（Marx，1967）就成功地使用了工厂检查员的公开报告，作为其理论的经验材料的来源。

[12] 在这一点以及下面的几点中，一个接受了"理论应该建立在经验资料的基础

上"这一事实的读者,开始感到有点糊涂了。而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6)作了如下辩论:

产生一个理论需要一个研究过程。相比较而言,特定观念甚至"模型"的来源,可能有其他来源而非资料。科学家传记里充满着这样的故事:洞见或重大思想是偶然闪现的,而非来自对资料的收集。但是,从这种洞见所产生的理论必须被引到与资料的关系中,否则就会有很大的危险,理论与经验世界将错位。

在这段引文中,除了这一明显的矛盾(理论产生于资料还是其他?),此辩论的实质是清晰的:外部资料的理论来源,应该被启发式地使用,并且要特别小心;与经验材料的关联是阿尔法与欧米加,否则,在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可能很不容易相配。

[13] 这一方法论技术来自布卢默,见哈默斯利(Hammersley,1989)。

[14] 见曼宁(Manning,1982)那篇有影响的论文,该文主张在民族志中运用分析性归纳。

[15] 关于被污染的血液,还没见到有对其他新的疾病的讨论。在旧有的疾病中,乙型肝炎是一种可能,但还是根本不像艾滋病那样在医学与公众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16] 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关系的探索,在符号互动论中,读者被归入了另外一种方法论,即"形态模型(pattern models)"(Williams,1976)。

[17] 而这最后一点在当前的语境中不是决定性的。例如,在"科学哲学"的立场与资料类型之间没有既定的关系。

[18] 例如,比较居巴与林肯(Guba and Lincoln,1994:110)的看法,他们认为扎根理论是一种修正的实证主义。

[19] 泰勒(Taylor,1985b:118)那里也有同样的思想:"解释性的社会科学需要我们把握行为者的自我描述,以便识别出我们的待解释者,但它绝不需要我们以同样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待解释状态。相反,它一般要求我们超越它。"第 123 页:"我在这里为之辩护的观点,可以称之为解释性的观点……必须与另外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一个是它最初的敌人,自然科学模型,我一直在辩驳它。另一个是错误联盟(false ally),这个观点把解释误解为采纳行为者的观点……我想要争辩的是,解释性观点要避免两个同样相反的误解:一方面,完全不顾自我描述,并试图以某种中性的'科学的'语言来操作;另一方面,极端严肃地看待这些描述。"

50

[20] 至少它超出了作者把例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或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视为扎根理论的例子这一范围。在格拉泽与斯特劳斯看来,离资料的远近有一定

的自由度。

[21] 所谓“形式理论”,我们的意思只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中,超出经验基础而被概括出来的理论。

[22] 例如,参看约恩松与伦丁(Jönsson and Lundin,1977)这篇讨论神话波(myth-waves)的文章,或者舍尔德贝里(Sköldberg,1992a;2000a)在一种扎根式的与更为构造式的方法之间的张力领域产生的规划文化理论,或瓦耶(Voyer et al.,1996)论系统层面的组织焦虑。

[23] 这是对上文讨论过的斯特劳斯(Strauss,1987)“编码范式”的进一步发展。

[24] 即现象学家所说的著名的 Lebenswelt(生活世界)。这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本特森(Bengtsson,1989)想要区分生活世界与日常世界,但他承认这不是现象学家他们自己的通常做法。

[25] 正如哈德兰(Hardland,1977)所指出的,关于这些还原,在术语学上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这术语学如何,最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分是还原中的层面或阶段之间的区分。在这里,它表现为现象学的、本质的与超验的。

[26] 事实上,同样的观点也为现代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有影响的派别所持有,即粒子物理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玻尔,海森伯格)。实验环境中的研究对象总是受研究者的影响,这是这一方法的基石。

[27] 除非另作说明,下文的中心概念、领域与方法,我们都是根据弗林(Flynn,1991)的社会语义学的分析。

[28] 关于此问题的某些结论我们在第 3 章谈来源批判部分讨论了。相反,参与观察能反映除参与观察环境中的行为规范之外的一切,这种能力当然也是值得怀疑的。

[29] 事实上,这一观点在格拉泽(Glaser,1992:24)那里有非常详尽的表述:“所有的不管何种类型的资料,都是提供给不断比较以发展范畴及其属性这样一个加工厂的谷物。”

51

第3章 解释学:解释与洞见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and Insight

我们已经知道,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介于思想的经验向度与解释线索之间。本章所坚持的正是经验主义方法(第2章)[1]与对意识形态作理论批判(第4章)之间的立场。本章的跨度把本书中的这些讨论导向为一个整体,尽管两端之间的距离不太远,而且有其特殊的论题。尤其是适用于此领域中的这两种主要方法,即客观主义(objectivist)与真势解释学(alethic hermeneutics)。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接下来更是一条面对面的争辩线索,而且常常采用了直接相反的立场(关于这一区别的论述,例如,参看Bauman,1978; Madison,1988; Schwandt,1994,尽管它们用了不同的术语)。

当然,本章所讨论的这些方法之间不仅仅只有不同,它们还有一些共同的显著特点。简言之,其中它们都有对直觉的重要性的强调。知识不是通过通常的、推理的和理性的("论说的")方式获得。实际上,对获取关于世界的真正知识存在着某种享有特权的皇家大道。这不是通过艰苦的思索才达到的,而是一蹴而就的,复杂整体中的诸形态由此被一种心智之光照亮,给出了一种直接而彻底的概观。知识常以经验为自明。直觉意味着某种内部的"凝视",而与更形式化的与非感知的认识不同。下面,我们将讨论两种类型的直觉。

第一种是传统理解的(verstehen)哲学,它强调意义的再现(einfühlung),文本与行为的始作者——作者与行为者——结合了这些意义。以上都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客观主义解释学之中,它导

致了对基础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

第二种是真势解释学,其核心是,真理乃是一种揭示行为。其中主体与客体两极,以及上文提到的理解与解释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根据更为原始的统一体(original unity)而解体了(Heidegger,1962:44;关于海德格尔思想在社会科学中应用于以组织理论为中心的讨论,见 Sköldberg,1998)。

52

根　据[2]

解释学的根据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两条并行且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影响的思潮——对圣经的新教分析与对古典的人文主义研究。对文本的解释、注释于是成了出发点。从一开始解释学的主旨就是:部分的意义只能放在与整体的关联中才能获得理解。因而,一段《圣经》文本只能放在与《圣经》整体的关联中才能被理解。反之,因为整体由部分构成,所以,整体也只能以部分为基础才能获得理解。于是,我们就面临了一个圆环,即所谓的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de):部分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而整体只能在部分中被理解。(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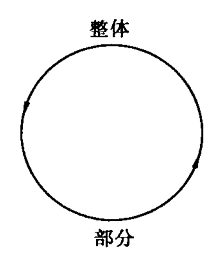


图 3.1　解释学循环:原始版本

解释学通过将循环改为螺旋式从而解决了这一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Radnitzky,1970:23)。例如,你从某一部分开始,试图将它与整体相关联,并对它作出新的阐释,你又从这里回到这一研究部分,等等。换言之,你从某一点开始,然后通过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理解来一步一步深入地钻研其主旨,这导致了对两者理解的渐渐深入。

这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循环。我们将看到,真势解释学主张的是另一种循环,即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的循环。里克尔(Ricoeur,1981)介绍了一种解释与理解之间的“解释学的弧”,它摇摆于社会科学程序中科学与人文主义方法之间,前者在性质上主要是结构主义的,后者主要是解释学的(尤其是真势解释学的)。这样,科学的理论的因素被另外嵌入了人文主义的解释。否则的话,以其传统的理解,解释学宁愿远离面向解释的科学的理论化。比如,海德格尔(Heidegger,1982)曾主张,通过对文本的质疑,他所从事的是揭示而非理论化的工作。解释学循环(不止设想两种循环)的通常特征是:它们对矛盾中的两极提供了一种过程上的、辩证的解决和相互转换,这一矛盾乍看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并被视作静止的。或者从另一角度说,它们在进退维谷的处境中作特技式跳跃,解决了研究状况中的“第 22 条军规(the “catch 22”)”*。

53

随着解释学的发展,何为“部分”,何为“整体”,得到了更大的延伸。“部分”最初是指《圣经》或某些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家著作的一个章节。后来,解释学方法的应用领域扩展到了一般写作文本,再后来在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解释学”那里甚至扩展到了口语词汇。最后,在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派[兰克,德罗伊森]那里,解释又从语言表达扩展到一般(历史)行为。

“整体”也得到了一系列的概括。兴趣点日益从《圣经》或古代的某些作品,转移到作品背后的作者:如果有必要将文本置于其语境中,为了理解它,那么语境自然也应该包括作品背后的作者。然而,作者也不能隔绝地来看,他们需要被置于其社会语境中,这就进一步扩展到了其整个历史背景。分析到最后,为了理解某一单个部分,甚至有必要考虑全部世界历史了。

于是,从寻求对《圣经》整体中的单个文本部分的理解(反之亦然),解释学的领域已不断地扩大到了包括对那些以世界历史整体为最终语境的行为的理解。

对理解的解释也渐渐与移情相关联:“理解”要求某人自身进入行为(书写、言说)者的情境中来生活(思考、感觉)。为了更清

* 第 22 条军规(the “catch 22”),指互相抵触的令人左右为难的规定。——译者注

晰地理解行为(书写或说话)者的意义,就要在想象的帮助下,尽力将自身放在行为者(作者、言说者)的位置上。从最终意义上说,这个观念是,一个个体的心灵(mind)——特别是其更具创造性的、不受规则限制的方面——是不容易被另一个个体的理性所接近的,如果只是尽量从外部来分析这个心灵的话;只有直觉能完全同化另一个人的心智世界(mental universe)。只要这种移情得到了解释者更广或至少是不同知识储备的补充,那么甚至有可能解释者能比行为者更好地理解行为者自身,这构成了解释学的主要信条之一。

通过在"道德(moral)"与"自然(natural)"领域之间作出针锋相对的区分,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即文科与社会科学是一类,自然科学是一类,18 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影响了这一问题的发展。康德还分析了直觉的功能,并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建构了我们的"真实"世界,形成了未加工的感知的材料。主体心智过程的直觉,被认同为自我意识。甚至早期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就已经提出了历史与自然过程之间根本不同这一看法。维科认为,只有人构成的世界如社会才真有可能被"理解"。自然事件必然永远留在人从内部(from the inside)而来的理解能力的可能性之外,因为它们不是人造物,不过,它们可以是"数学"形式的确定的对象(Caponigri,1963:459,1971:27;Gadamer,1989a:19-23;Hughes,1961:198,428)。

维科特别强调人的创造力——"诗的精神"。这一点也受到了 19 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德国浪漫主义通过诉诸人的精神(spirit)而非理性的创造力来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这些思想线索又被本世纪的德国"生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尼采(Nietzsche)更加强化了。这里的"生命"处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它是神秘的"意志之下的创造力量",它是不可解释的,只能通过内部直觉来理解。生命,而非思想,成了某些哲学家的中心论题。这些哲学家渴望通过他们那满是尘埃的蛛网般细小的抽象概念的象牙塔,来凝视外部正迅速发展的肥沃的风景地。同样地,新自然科学也被视为离生命太抽象太遥远(Caponigri,1971:11;Gadamer,1989a:231)。

“经验”(Erlebnis)这一概念在1870年代开始使用,最终获得了作为整整一代大陆哲学家的(不可化约的)基本要素的地位:经验是基本的,总是已经给定的,任何对实在或心智过程的探索都要从这里出发。“经验”在两个方面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的“感知”相区别:一是,它并不构成对某种外在于主体的事物的消极接受,相反,它是积极的、创造的并提供意向和意义的。二是,经验比单个的感知更是“整体的(global)”,它涵盖了所有的主体情境,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碎片,它也与个体的整个生命相关联,构成了生命的有机部分(Gadamer,1989a:60-70)。

在转向19世纪甚至进入20世纪的时候,所有这些思想线索——康德式的包含自我意识的直觉、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离、生命哲学以及解释学——趋向于三种连续出现的具有明确的反实证主义立场的方法:客观主义解释学、现象学以及真势解释学。[3]这三者在时下仍备受关注。

客观主义解释学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新观念论[4]的浪潮下,产生了一群杰出的现在仍然十分著名的学者,如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西梅尔、韦伯,他们活跃在诸如哲学、史学、法理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Hughes,1961)。狄尔泰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他与其他人相比属于早期一代,但活跃到了20世纪。也许他是上文所界定的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家”的最佳代表。其他人因提出了“回到康德”的口号,因而常常被划分为“新康德主义”(见 Spiegelberg,1982:109)。 55

所有新观念论者都转向反对他们时代的实证主义及其方法(Hughes,1961)。[5]实证主义应被限制在自然科学上。一般在自然与文化科学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线。“理解”成了后者的口头禅:通过“先天直觉(congenially intuitive)”对过去某一经验的移情再现(Einfühlung),研究者可以达到对以往个体以及影响他们的行为的意义的理解。

自然科学应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化科学（文科与社会科学）应该理解意义。这依然是有着强大影响的两分法（例如参看，Hollis，1994；[6] Radnitzky，1970；Roth，1991；von Wright，1971）。除此之外，狄尔泰（Gadamer，1989a：233-234）与韦伯（Weber，1967：97）都特别强调以比较的方法作为获取“更大的一般性真理”的手段，而不是单独只用直觉来理解。这些作者的抱负是要通过发展解释学，使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但是，若以这种方式作为对立的一极来接受自然科学，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主—客关系问题。根据客观主义解释学，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有严格的分界线（我们将看到，真势解释学对此有强烈的论争）。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主张研究中存在某种客观性——至少在相对意义上是如此（见下文讨论贝提的解释学原则部分的“原则3”）。

真势解释学

前面讨论的解释学最终是基于主体与客体两极对立来分析的。这与“符合”这一观念相联，即在理想意义上，解释主体——研究者——的概念，应该与对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观对象的解释相符。这“符合”是客观主义解释学的“理解”的最终推力，于是，它成了自然科学中的“解释”的一种对应物。我们将在本部分中讨论的解释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主客问题以及理解/解释这一对概念。从一开始，在这各种各样的解释学中，理解毫无例外地是科学要努力达到的顶点。也可以说，理解是每个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不断地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向以生存下来。正是这种基础理解，才是我们有必要开始去探索的，文化与自然科学中的理解/解释至多只是其次级派生。

56

比如，富克斯与温根（Fuchs and Wingens，1986）特别强调这样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论题，即通过把库恩的范式视为自然科学内部的解释学的“生命形式”，从而把它与当代自然哲学问题关联起来（关于解释学与库恩主义之间的相似性，亦见 Bernstein，1983；Caputo，1987）。于是，自然科学与其说是某一研究者/主体对客观

实在的研究,不如说变成了某个研究者共同体的一系列的理解方式。研究者,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文化科学家,总是某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的、永恒变化着的“生活世界”中的一员,他们的实践活动也总是已经承载着理论和暂存性(Heelan,1997)。

这也消解了自然与文化科学的边界,因为理解作为生命的形式成了他们两者共同的基础,而不是某些更表面的说法,比如说,前者与实在相符合,后者是移情。罗蒂(Rorty,1991)也支持消解这一边界,这是与他对于科学的激进实用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泰勒(Taylor,1991)在赞同实用主义图景的同时,还想保留二元论,因为他主张,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它是指向自我理解的。而罗蒂的观点是,甚至自我理解也是无需语境与理论依赖的(关于罗蒂与泰勒之间的争论,见 Guignon,1991)。于是,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有的真势解释学家强调其相似性,而有的则强调其不同。有可能主张两者之差异的看法是夸张了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无论如何,所有参与者看来都同意,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都必然是既以总是指向资料层面的解释为特点,又以理论产生中的前概念为特点(关于这一点可特别参考 Heelan,1997)。于是,我们得到了第二个解释学循环: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的循环(见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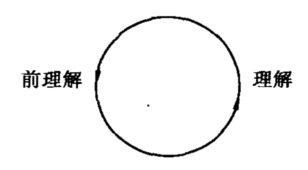


图 3.2 真势解释学循环

真势解释学消解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并使之成为了一种更原初和原始情境中的理解,其特征反而在于一种揭示型的结构。即,其基本观点与显露某种隐藏的东西相关,而不是说主体思考与客观实在之间的相符合。我们将在本章下文中更细致地解释这一观点。这里给一个暂时性的观察就足够了。我们选择了一个新词来为这种解释学命名,即“真势的(alethic)”。这个词源自希腊词“解蔽(aletheia)”或揭示,即显露某种隐藏的东西(Heidegger,1959:102)。真势解释学这一概念包含三个次级领 57

域,它们之间有不同的中心和偏重,但没有严格的界线:存在主义解释学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其学生加达默尔为代表;诗学解释学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兴趣所在,并被其后学者里克尔等人发展了;而存疑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7]所有这些都超出了主客问题,并且都在某种意义上专注于揭示某种隐藏的东西。对于存在主义解释学而言,这种隐藏的东西构成了埋藏在我们存在之根据里的属性的原始结构,但也正是这样而被遗忘了。对于诗学解释学而言,它形成了隐喻或叙述这一根本形态。最后,对于存疑解释学而言,它是某种可耻的东西,如经济利益、性或者权力等形式,因而它总是被压抑着。

解释学的解释——重构

在这部分,我们将指出解释学过程中的“重构”,它结合了两种看似冲突的主流研究途径。因为事实上两者有一种总体上的特征,所以它们之间并不像从它们的相互辩难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非常不相容。两派的支持者所采用的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都倾向于证明这一点。例如,客观主义派的支持者赫希(Hirsch,1967)区分了关于文本的作者的原始“意义”(meaning)与此文本(对于我们)的“意谓”(significance)。前者是重构的、客观的,后者是与目前这里相关的、真势的。赫希尤其关注前者,但一点也不排斥后者。类似地,斯金纳(Skinner,1986d)也主张有必要把焦点放在对作者意向的解释上,但并不排斥对意谓作进一步的寻求。根据真势方法的拥护者帕尔默(Palmer,1969)的观点,这两种解释学的方法,即我们在这里所谓的客观主义的和真势的,应该被视为互补的而非绝对对立的。帕尔默更关注真势解释学,但并不拒绝客观主义的方法,即使他看上去认为后者更单调乏味。因而结合这两种看法应该是可能的。这也适用于两种解释学循环“部分—整体”与“前理解—理解”之间的关系,我们把两者视为互补而非互相对立。

客观主义派与真势派双方都拒绝解释的规则。建立一般规则的努力总是有点迟疑不定,因为当它开始应用于特别的领域和情形时,例外的东西总是更为显著。在客观主义派中,赫希(Hirsch,1967)参考概率论,已为解释的验证(validation)建立了事先的标准,尽管他们仍有保留意见,即只把作为作者之意向的文本的原始意义,而非把对于读者的意谓当作真实的。因为意义是稳定的,与意谓相对。意谓是随着诸如文化的或历史的语境变化的。于是,根据赫希的观点,对于一个文本的作者原有意义的解释,乃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得以确证的:①把它与同一作者的其他文本相校验;②把它与来自同一文化或时代的其他文本相校验,以此来了解支持这一文本的频率是否增强了手头解释的有效性;③在文本的各种性质方面,重视与作者更近而非更远的(与作者更近的文本甚至可以推翻大量来自更远文本的支持证据)文本(最好是作者自己的文本)。为了判定对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多种解释,赫希建议从总体的类的层面(此文本属于哪一类)和微观的层面获得更多的信息。在微观的层面上,被谈论文本的更多(孤立的)部分,可以得到更新的考察,以确定应该是哪一种解释对它们解释得最好。在类的层面与微观层面发生冲突时,微观层面被给予了优先权。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诸种解释具有相类似的影响力这种情形,而解释者就应该公开报告和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将在后面再回到赫希的建议,并将作出某种实质上的修订。

58

另一方面,如帕尔默(Palmer,1969)所代表的真势派,拒绝在意义与意谓之间作出区分,并拒绝上述类型的标准。而且,对于存在主义解释学而言,验证(validation)问题是与科学主义的主客问题相关联的,这一方法使这个问题让位于一个中心问题即"理解的实际情形是如何进行的"。[8]只有当这一中心问题使得理解的过程比其结果更重要时,那才是当然的。或者甚至在更强烈的意义上讲,过程成为了其自身的结果。再次,(对每一个体而言,具有时代限制的)前理解将总是在任何标准之前就进入到图景当中来,例如问题指向或选择的形式,并且在它们身上留下它的印记:因而任何这种一般的客观标准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暗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我们可以说:试图画一条分界线,就总有使人非

法闯入的危险。

然而，构想出关于解释学方法的一些不那么严格的特征，同时又不放弃某种系统化的形式，这是可能的。例如，麦迪逊（Madison，1988）支持一种观点，即认为解释学方法是决疑法（casuistry），判断、实践（而非理论）理性以及论证是其中心要素。讨论并不能导向理论与实在相符合这一意义上的某种绝对真理，但能导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尽管是临时的"任意的（discretional）"，从来不是决定性的或强制性的。或者，用麦迪逊（Madison，1988：71）的话说："理性除了以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的沟通作为基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基础，人们凭借这一沟通成功地制订出了相互的协议。"

59

从这一点出发，麦迪逊（Madison，1988：29-30）提出了以下的"方法论原则"：

（a）连贯性——解释应该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b）全面性——重视作品的整体。

（c）穿透性——基础的、核心的问题应该暴露出来。[9]

（d）彻底性——文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应该要回答。

（e）恰当性——问题应该由文本提出，而不是由解释者提出。

（f）语境——文本应该被置于其历史的文化的语境中。

（g）同意（1）——解释应该同意作者实际所说，而不曲解。

（h）同意（2）——解释应该同意已经建立起来的对文本的解释。

（i）启发性——解释应该是"生发性的（fertile）"，并刺激想象。

（j）潜势——对解释的应用能够作进一步的扩展。

从外部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可能会指谪上列中的每一条（其中包括或特别是（a）这一点，我们在下文来讨论它。）这里，我们将自我限制在内部解释学的（intra-hermeneutic）观察上。（b）、（c）与（d）三点实际上是同一条原则，与重视作品整体相关。（e）点显得与主流的真势解释学相冲突，因为它将使解释者脱离文本与理解的情境。类似地，（g）点也显得与真势解释学（麦迪逊所坚持的）的基础观念相冲突。麦迪逊还承认放松这条原则有时可能会更

富成效。(h)点似乎过分保守,而且与(i)和(j)是对立的。后两者可以融合为一条,即研究中的生发性(fertility),它们并不仅仅限于解释学。进一步,在麦迪逊所猛烈批评的赫希的客观主义解释学"标准",与麦迪逊自己的真势解释学"标准"之间,我们并未看到任何绝对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只是除了其基本立场,我们同意麦迪逊(以及早期图尔明)的关于论证的逻辑,而不是理性指示的逻辑的看法。

以此为线索,一个解释学的解释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之间作转换,每一方面都包含着支持或反对此解释的证据。解释学的核心特征,一方面是部分与整体解释之间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解释者的特殊见解(既非宰制的亦非屈服的)以及被解释对象的特征。这些方面由整体上的解释以某种不同的次序构成,解释什么,一个人如何与解释以及解释中的微观过程相关。接下来,我们将指出四个方面的要素:解释形态、文本、对话以及次级解释。 60
这些方面之间当然不是密不透风地相互隔离的,它们之间相互的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是模糊的。差异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与理论和经验资料之间的传统差异是一样的),因而这些方面指出了解释学过程中的不同重点,而不是一些相互独立的间隔区间。

1 解释形态。这涉及对特定文本作解释的总体设置,即部分解释的连贯整体。解释形态与各种各样的外部解释学话语"理论"之间的相符是宽松的。解释形态应该内部一致,因为逻辑矛盾就是强烈的抗辩。解释形态也应该是外部一致的,意思是说,要么同意同一领域中的其他现存的解释形态(麦迪逊的"同意(2)"),要么有不同意它们的理由。解释形态在从文本的个别细节发展而来的同时,应该使它们可理解。解释形态也应该包含来自被解释材料的"事实",并且首先它们应该是不相矛盾的[10][奥德曼(Ödman)的"外部控制",麦迪逊的"同意(1)"]。在与文本的对话中,从解释者的前概念——前概念在此过程中将有改变——出发,此形态会获得详细的说明。此形态应该带来对文本的更深理解,超越阅读的直接所得(参见麦迪逊的"穿透性")。因为解释者批判地反映了他们的前概念,同时又想改变它们,所以解释形态被提高到了常识层面

之上（与第2章所讨论的更加面向经验的方法相比较）。

2 文本。得到解释的不是“事实”或“资料”，而是文本。文本可以是文字上的，可以是书面语或者口语，也可以是比喻意义上的。在此意义上，社会行为被视为有意义的符号，文本被视作模型（例如参看 Ricoeur，1981）。“事实”通过一个解释过程而从文本中出现。它们是结果，而非出发点。因而，我们把构成文本的部分视作某些或更准确地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有意义的符号，不管我们是在阅读用文字写成的文本，还是用社会行为写成的文本。根据解释的总体形态，其具体细节被赋予了更深刻而丰富的意义。它们回过头来又影响了解释的形态，在解释学的过程中丰富它和修订它。所谓的事实，以及事实的选择，都受到整个研究—社会学情形的影响。解释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如下过程中准备着改变他或她的指称结构：新的“事实”随即出现而旧有的“事实”消失。

根据麦迪逊（Madison，1988：30）的“语境”原则：“不能超出语境之外来阅读作者的作品，即应当适度关注其历史的与文化的语境”，上面这种情形发生的一种重要途径是，置文本本身于它自身的语境中，和对其关联所作的外在社会历史编纂中（Skinner，1986b；Phillips and Brown，1993）。这也适用于社会行为之迁移意义上的“作者的作品”。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可以把文本的单个部分与作为整体的文本联系起来一样，我们也可以转变视角视文本本身为一个部分，把它看作与其总体语境相关联。我们所研究的“文本”可以是足球比赛中的流氓行为，从这个文本来看，单个的暴力行为是部分。但流氓行为反过来应该与流行的社会经济情形相关联，比如社会隔离、贫乏的文化背景、喝酒习惯等。然而，语境并非绝对和不可改变的。相反，研究的独创性常常是通过把事物置于全新的语境中而达到的，这可以参考罗蒂（Rorty，1991）论“重置语境”的核心规则。关于重置语境的观念可以来自对知识的完全不同领域的认识与联结，并且/或者是对早期语境的有意地“遗忘”的结果。

61

3 对话。对于文本，解释学家既不像实证主义那样采取独白式

的立场,也不像机根理论那样消极地接受,而是以对话的形式向文本提问并倾听文本(Caputo,1987)。问题最初来自前理解,然后将会经过一个发展与转换的过程。于是得到提倡的是一种谦卑同时又积极的态度。在我们"进入"文本的同时,被解释的主题的自主性必须得到尊重。这时处于远离(distance)与亲近(familiarity)之间的辩证态度是最好的态度。换言之,我们在新的理解与前理解中强加给文本的"旧的"理解之间徘徊。最后,这一界线决不如爱丽丝的镜中世界或维特根斯坦的画谜那样明显,不同的方面开始互相渗入。面向整体的问题也与面向部分的问题交替出现,而且这两种问题可以"杂交"。这样,研究的问题将在此过程中转变,而且同时这种转变将会对"事实"以及解释形态造成影响。

但是,对话的方法也存在另一面。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进入了一种与读到我们的解释的人之间想象对话。也就是说,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独立的研究主体与被研究客体/事实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真理乃是通过逻辑必然性与经验"检验(testing)"(证实/证伪)确立起来的,关于这一问题,见泰勒(Taylor,1991)。相反,重要的是从通常认识(通常有历史环境与条件)出发,通过讨论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以达到最可信的结论。在这通常认识中,理论、方法与事实诸方面有互动。正如麦迪逊(Madison,1988)所指出的,我们要的是论证逻辑(logic of argumentation)而不是验证逻辑(logic of validation)。 62

被某种特殊的风格引导,也是对话的一个核心。根据肯特(Kent,1991)的观点,风格——并非如词汇或意义——在沟通中是首要的基本因素。在这一点上,肯特发展了巴赫京的理论。风格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读者作者群体所拥有的一套阅读预期,而且这些预期很明显随着时间而改变"(Kent,1991:300)。风格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沟通问题,永远不会有风格的"分类学"。风格的形成是持续的开放的创造。因而,我们应该自我反省地意识到我们写作的风格,或者当我们试图超越某一风格时我们所面对的风格或潜在风格。不同的科学发展了或继续创造了它们的表述风格,离开了这些没人能够采取

任何立场。超越某一风格的唯一方法是掌握它。关于风格的好例子可以在科学杂志中发现。科学杂志通常接受的是那些"符合"杂志所创造的风格的论文，结果一些很好的论文因为不符合杂志的风格而遭拒绝。我们在上文提到，这并非某种不合理的发明，而是可以视为一种与读者作沟通的机制。风格有着与大学里评判学位论文相类似的功能，或者与评估研究项目资金的使用或学术职位的申请有着类似的功能。对风格的态度既不应该是假装激进地乌托邦式地反对其专横，也不应该是不加考虑地吸收它们，而是应该在批判的反思与保持距离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与超越它们。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风格并不构成任何库恩（Kuhn，1970）意义上的"范式"。与范式相比，风格与实际上的文本产生密切相关。它们也可以被描述为共同接受的表象模式（modes of presentation）（参Skinner，1986c）。

4 次级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形成次级解释。我们以某种背景观念来判别它们。赫希（Hirsch，1967：179）已经很好地说到了这一点，尽管他把应用范围限制在作者赋予文本的意向意义上。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他的思考取决于验证的"客观的"标准，可是这一标准的存在无论如何是非常可疑的。而如果我们满足于更低调的深思熟虑的可能合理的解释，从可能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而不是从任何终极真理的宣称出发，那么除了可能把这一思想线索转换到对实践的分析，也即转换到以文本为模型（model）的一套社会行为上来之外，仍然有可能把这一思想线索转换到甚至文本的意义（meaning）上，而不管作者的意向（用赫希的术语，即"意谓（significance）"）是什么。

63

比如，假设我们正在确认某人 X 在某地 A 是否在特定场合有性骚扰行为。这是一个空对空的案例，在这个被谈论的特定场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相关信息。我们的解释进入了僵局。要获得进展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调查 X 以前的行为，看他在类似情境下有没有过性骚扰迹象？有没有类似的行为迹象（比如其他恶习）？此类迹象的

频率有多高?第二种方式是转向 X 在某方面应该从属于哪种个体类型或群体。性骚扰在 X 所处的国家的关联中,在某种意义上的可接受性,这个国家的"性观念"如何?教育层次和教育类别如何?工作职业如何?……在这种个体类型或群体中,性骚扰的频率有多高?

我们对相关群体的研究收得越窄,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 X 就越贴近,我们的探索和解释的价值就越高。另一方面,属于这个群体的个体越多,他们都有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解释的价值也就越高。首先要缩小群体范围:如果我们对 X 先前的性骚扰行为建立了坚实的档案基础,那么在目前的案例中类似的解释也就有了倾向性,即使在 X 所处的特定文化中性骚扰并不非常普遍。在两种情形中——群体的大与小,实例越多,解释的合理性也就越大。我们在上文提到,所谓缺乏进一步的信息,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或确定的结论。在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X 也许是无辜的,但可用的信息却表示相反的可能性更大。

于是,我们获得了评价解释的合理性的如下三种标准(Hirsch,1967:179):

1 小范围群体比大群体更重要。
2 解释的合理性随着相关实例的增多而提高。
3 解释的合理性随着群体中的成员数量的增多而提高(但这是从属于第一条的)。

注意:这里的目标不是要作出一个法律裁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在法律上,为了减少无辜者受罚的风险,被告的罪行必须超出所有的合理质疑才能建立起来。而这里的问题是通过已知的信息获得一种最可能为真的解释。如果涉及在世的人,很明显应该注意匿其名。

我们还要记住,所谓的"性"与"骚扰"就像其他事物一样,是受时间和文化限制的。所以,所谓的性骚扰是会根据社会文化语境而改变的,这也适用于被假定的受害者以及研究者/解释者。而且它依赖于受害者的主观经验。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反复的、粗鲁的性接近,从那些由实际上所有潜在的或

64

真正的受害者判断为同类案例的核心，到超越此类的那片评价因人而异的灰色领域，这样一种经验当然也会甚至在特定的文化或时期之内发生改变。而且，也有可能个体随着时间而改变他们的看法，甚至可能是慢性地自相矛盾。然而，这各种众所周知的性骚扰案例，很难说是我们所讨论的那类问题，而是并不敏感的那种问题，例如，所谓的为恶者是否真的以某种方式——在流行的环境中被一致认为是性骚扰的言论或行为——说过或做过什么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这样的事可能很难裁定甚至无法裁定，因为它在个体与文化之间及其内部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改变。

含有确定解释的合理性的三种标准的这同一方法，当然不仅仅适用于外部事物，也适用于个人的态度、意图、动机等。为什么 Y 在 S 情形下作出某种行为？Y 在某一特定场合没有显露他或她的动机，但在先前有预兆吗？有类似的场合吗？如何相似？有多少实例？Y 的家人、朋友圈及其文化群体如何？其同事、同党、同学……如何？其中被提到的动机有多频繁？我们可能仍然没意识到动机的层次，在我们的次级解释中努力去发现行为的形态，要么与单个的个人有关，要么与他们的同单个案例相符的社会联系有关，即使其基础在现在确实更加不稳固了。早期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研究在这里当然有价值。

在整个过程中，这些次级解释必定与解释的总体形态相关，次级解释改变了它和我们对文本提出的问题，反过来次级解释也被它和我们对文本提出的问题改变了。如果次级解释变了，解释的形态必将改变。新的事实被次级解释创造出来，而旧的事实消失。这对于新老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

两个甚至更基本的解释学循环应该渗入了产生解释形态、文本分析、对话以及次级解释的整个过程。这两个更为基本的解释学循环即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以及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的循环。[11]我们说过，这是两个主要的解释学思潮的特征，不过它们只是不同而非矛盾，因而它们可以很好地加入到同一研究过程中

65

来。这样,对整个文本的解释被对其部分的解释继续发展了,反过来,对部分的看法可以由对整体的看法而得以阐明。另一方面,对前理解与理解之间类似的选择也发生在整个解释过程中。对某一新文本的理解需要前理解,而同时,前理解如果要发展的话,就需要对新文本作出理解。理解必须不断地回头参照前理解,而前理解必须从新的理解获得养分。总之,出现了一个如图3.3 所示的解释学的"基本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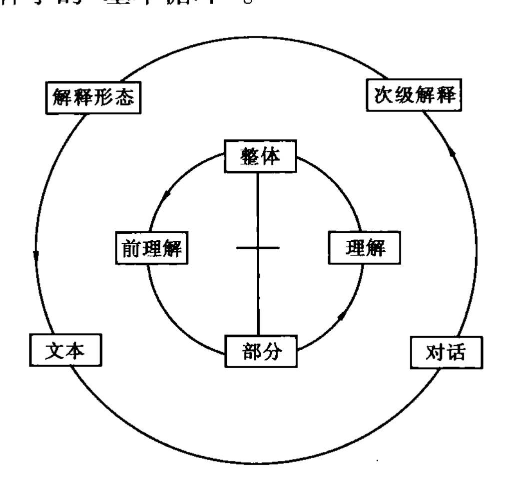


图 3.3 解释学的基本循环

关于解释的合理性问题,我们已在前面考虑了几种观点。它们对支持或反对某一解释提供了支持或批评的证据,这些证据不论是解释者还是外部评论员/批评家都是可以参考的(解释者当然可以先于批评家行动)。这显然暗示了向多重解释的开放。例如,即使支持某种解释的尺度倾向它了,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新的证据在第二天出现,进而引发事态的根本改变。而且,详述多种不同的解释,或至少是诸种解释的可能性,是对读者的负责。研究者/解释者并未向读者摆出任何终极权威的错误姿态,而是邀请他们进入对话来作一系列的选择,他或她在规定的基础上来选择某一种解释(或若干相当的解释)。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以上并不构成一套总体的或全面的先在标准,而是构成了对某种现有的正反两方面证据的有条件的系统化。证据的清单依然是开放的,进一步的证据(类型)可能而且当然会在未来出现,因为所有研究

66

都是一个再创造其自身方法的延续的过程（Feyerabend，1987）。这里的思考所能做的只是暂时为研究解释学及其将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某些更具体的发展了的不同解释类型。在我们刚刚提示的一般意义上的"基本循环"的影响下，解释学的研究过程运用了一些解释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非常自由地结合，比如通过轮流运用它们或者使它们互相充实。

贝提的解释学原则

贝提（Betti，1967；1980）是当代最著名的客观主义方法的倡导者[12]，他提出了可以引导解释学的四种主要标准或"原则"。前两者涉及研究的对象，而后两者则涉及主体。

原则 1：解释学的对象自主

如果要理解一个对象，就应该根据它自身，根据它自己内在的基准或标准，特别是根据它背后的原初意向来理解。这意思是说，例如，实证主义的研究就应该用实证主义的标准来判断，札根理论的研究就应该用札根理论自己的内在标准来判断。即使这只是一个呼吁性的观点，当然也可能有人反对，认为这造成了总体性标准的缺乏，而最终会走向相对主义：每种方法都是自身推进的单元，不受批评和外部刺激的影响。然而，我们将看到，下面的原则 3 与原则 4 沟通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并进一步沟通了潜在的颇为相异的研究传统。

原则 2：意义的连贯性（整体原则）

这是关于和谐整体的原则。在每一个被观察的事件中，都预设着一个普遍的整体意义，它反映在每一单个部分中。因而，原则 2 表达了上文所说的部分整体这一解释学循环。什么叫整体，什么叫部分，都取决于个体研究者，都要从他们的具体问题出发。例如，"部分"可以是一个文本、一个从句、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一个章节中的一个单词。"整体"可以是一个文本，或者作品背后

广义的作者,或者历史背景,等等。“文本”构成了解释学的解释范式,甚至为行为解释提供了模型。在解释中,行为可以像文本一样来阅读,也就是说它是有意义承载的符号集合,被放置在它们宽泛的语境中。 67

对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这一领域,这意味着解释学可作双重应用。首先,它对于解释文本的词汇字义这一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如访谈、文献、亲身观察笔记,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理论、概念化,等等,简言之,有效的话语领域的研究是有益的。其次,它在有意义的行为(meaningful action)领域是有益的,有意义的行为有着复杂多样的层次,从单个个体的行为到群体行为,以及组织、机构、文化团体、社区、国家,等等,简言之,有效的实践领域。这些复杂的有意义的行为同作为模型的文本一样得到了研究。因而我们把社会行为当作文本来读。那么,对话语和实践作解释学研究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以“双重解释学”(Giddens,1976)结合这两种解释的方式,其最根本的图景也就八九不离十地展现出来了。在这里,实践表示(更)直接的,而话语则是间接的。然而,不管话语或实践是否成问题,在解释过程中我们都在部分与整体之间交替。

原则 3:理解的真实性

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再产生的行为,研究者在理解中移用了对象的意义,而不是只机械地反映对象。研究者带着他们自己的指称结构,并且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解释与这些指称结构相符合。这也是为什么解释总是只具有相对的自主,而不可能有绝对自主的原因。例如,贝提反对旧历史学派天真的观念,根据旧历史学派,历史的编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直接相似的。贝提认为,在解释中,在重塑中,在研究者先在的指称结构一开始就具有的主观创造性中,总有一种不可化约的因素。研究者从来就不是白板一块。因此,前理解是重要的。

另一方面,根据贝提的观点,太过深远地强调前理解并给定指称结构,意味着对象的消失,从而不能受到主体的关注。这与上文讲到的建立了对象自主性的原则 1 相反。根据原则 3,真势解释学家主张用前理解—理解循环替代解释学的部分—整体循

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转变成了主体自己的独白。对此,真势解释学家可能会回应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同是人为的(两极化),真正的理解是一种更原始的现象而非任何一极。在这些批评家看来,根据主体—客体之分的问题意识,理解建立在太过理论化和理性化的观念之上,而非建立在实践的或情绪的基础之上。下文再详论这一点。

68

原则4:解释学的意义的符合(理解中意义的适当性)

如果前概念的核心作用就这样被拒绝,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原始融合的观念也被拒绝,那么研究者不得不建立一种与研究对象的"共鸣",一种不可见的(意义)联系通过"同性质(congeniality)"而被锻造熔合起来。解释者自我沉浸在心智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思想,甚至包括那些后来被客观化的思想,都在这心智过程中开始形成。在论述主体的文献中,主体的再现已被指定由另外通常的术语来表示,如领会或"移情"。通过形成理想类型并作比较研究,这种"同性质"也能达到超个体的层次,这与社会制度和结构有关,社会制度与结构是具有相对客观性与自主性的社会形式。

应用:历史编纂法(来源批判)

贝提的原则可以适用于许多方面。历史编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案例研究中一种极有用的技能,但不幸的是往往被忽视(Tsoukas,1989)。历史编纂与社会科学案例研究之间的主要不同是,后者的理论旨趣更强。在对质性材料的解释中,如果有相矛盾的陈述,如果陈述因这个或那个原因(例如,被访谈者有偏见,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被报告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等等)而表现不确定,一个通常的问题就由此产生了。日本电影《罗生门》是一个有名的例子,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事件可以有如此根本不同的版本,以至于到最后一般人必然会怀疑它背后到底是否有基本的真相或意义。[13]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历史编纂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术语表达,我们认同的表达是,来源批判。这是一种解释

学的(Betti,1967;Ricoeur,1988,也触及了来源批判)而又严密的方法,它设置了许多标准来评估和解释资料。[14]不仅仅是书写文本适用于此,在历史编纂的内部,来源批判的大本营,口头历史已经出现了,这使得这一方法也与访谈方法相关了(Thompson,1978;Vansina,1961)。[15]

正如奥德曼(Ödman,1979)所指出的,"历史解释学"与我们将在后文要讨论的真势解释学之间的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固定的。然而,历史解释学的来源批判因素大体上可以从属于当前主要部分所讨论的客观主义解释学。赫勒纽斯(Helenius,1990)认为:"来源批判的历史编纂规则与解释学的解释规则几乎一样。"这是对的,大意是说,客观主义解释学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将看到,来源批判与客观主义解释学原则是密切相关的。

这种方法有些什么更具体的内容?所有来源批判都关涉信息曲解的问题。姑且承认研究者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某种中介来观察实在,这里有一种三角关系:实在—来源—研究者。显然, 69
来源发生在实在与研究者之间的路线上。而正是这条至关重要的途径构成了来源批判领域的旨趣。当然,首先要澄清一下概念:关于"来源",我们的意思是指能为研究者提供关于过去事件之知识的任何实体。事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来源——媒介——上留下了线索或者有所反映,为了获得对过去问题的答案,研究者们就要让自己去熟悉和了解这一"线索"或者这种反映。[16]来源批评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实在论者,他相信存在基本实在,基本实在在来源上就有表达,哪怕是以一种不彻底的晦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17]这实在不必是简单的、明确的或不矛盾的,它可能正是复杂的、含糊的或相冲突的。这对于牢记下文的例子很重要。为了简化表述并保存文本范围,这些例子一般都是取自第一范畴。

遗存与叙述性来源

根据贝提的原则 1,从背后意向来判断研究对象,现在可以对来源作一个初步的分类了。据此,我们可以作出第一个区分,即提供无意向信息的来源与那些提供有意向信息的来源之间的区

分(例如参看 Le Goff,1992)。我们将把这两种类型的来源称为遗存与叙述性来源。因此,“遗存”的意思是不会面临主观曲解的那种来源。另一方面,在叙述性来源中,信息通过主观的中介,因而总是有面临曲解的危险。遗存被(研究者)视为某事已经发生的符号,而叙述性来源被认为是已经发生的某事。遗存受到关注的是一个事件的结果这一面;叙述性来源则关注的是事件的表达这一面。因此,在对来源批判的评价中,遗存比叙述性来源更有价值(当然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8]

围绕瓦伦贝格之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瓦伦贝格是一个著名的瑞典人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纳粹那里营救了许多匈牙利犹太人。在1945年战争的最后混乱的日子里,瓦伦贝格被苏联军队劫持了,此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瑞典政府不断地找寻与回忆,直到1956年才有结果,这时苏联官方宣布他于1947年死在鲁比扬卡监狱。由某个叫斯莫利佐夫的监狱军医签署的死亡证也被出示了,其死亡的原因说是心肌梗塞。可是,根据若干目击者的证明,瓦伦贝格于1947年之后还出现在各种营地上,于是瑞典官方并不太相信斯莫利佐夫的证明。瑞典研究小组汉斯与埃尔莎·维利乌斯于1966年以来源批判的眼光详细审查了这个死亡证,并且主要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真实的遗存。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专家基于对书法、墨水以及纸张类型的考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问题是这两个考察都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这个报告的内容——瓦伦贝格真的是死于心脏病(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还是被杀害的?[20]这两个考察确实指出的是瓦伦贝格的确死于1947年。就来源批判而言,遗存是比叙述性来源更有力的证据,死亡证书(即使其更为具体的内容即心肌梗塞而死的说法是虚假的)比后来的目击证明更重要。

70

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同样一个来源可以既是遗存又是叙述性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选择。再看一例,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埃及金字塔就是法老建筑活动的无声的证明,它也是遗存。对于一个金字塔学者而言,金字塔结构表达了一种尚未被完全解码的神秘信息,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是叙述性来源。或者来看近在身边的一个例子,(可靠的)会议记录是一场会议的遗

存,但也是这场会议的叙述性来源。作为遗存,它们证明的是一场会议举行过了这一事实;而作为叙述性来源,它们告诉我们的是这场会议是如何举行的。

真实性

从叙述性来源清整出遗存之后,来源批判评估的下一步就是控制其真实性,即这来源是否是真正的来源。我们一直遵循着贝提的第一条原则,理解的是始作者的意向;现在它被应用到他或她所面对的来源的目的中,而无论涉及的个人是否真诚。伪造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普遍。比如,一份把日期提前的文献,其所提供的资料是不真实的来源。更加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希特勒日记",这部日记是在东德伪造的,并在多年前成功地欺骗了一名世界级的历史学家。古人类学中的"皮尔当人(Piltdown Man)"研究,伯特的双胞胎(Broad and Wade,1982)心理研究,以及 1990 年代初曝光的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上伪造安置遗迹,所有这些都是著名的研究者的例子,他们欺骗了或被欺骗了。最荒诞的例子当然是,18 世纪一位德国学者不断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可思议的化石,甚至一些小人物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这些化石上,这也没有使他怀疑这是恶作剧,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一颗化石上刻着他自己的名字他才意识到。在他的同事与他开了这个恶意的玩笑之后,他把余生都放在回购那些他卖给了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化石这件事上。如果我们来看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根据概率原则已经表明不管是伽利略的实验还是孟德尔的实验都不会是完全如其所介绍的那样进行的。可能它们部分是思想实验,部分是人为控制的。多年前媒体一条重大新闻,即"冷聚变"的伟大发现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复制轰动性的发现物的企图,造成了模糊视线的效果。整个都是恶作剧,或者其中还是有些事实(如果不是聚合,那么也许是其他什么)? 这个案例并未完全结束,研究仍在进行。

71

偏 见

接着,我们来应用贝提的第二条原则,意义的连贯性(整体原则)。它在这里表现为偏见批判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中偏见涉及的是对信息报告者曲解信息的关注(自觉或不自觉)。事实上,这

些都并不微妙，而仅仅是对所有成年个体，当他们面对比如政客的公告或声明时都会运用的同样一种判断力的更系统化的应用罢了。我们通过理解其整个背景来判断报告者的偏见。可疑的偏见愈强，那来源所包含的信息的价值就愈低。某一不被怀疑有偏见的来源，也许可以慎重地用于某一叙事的要点。某一来源即使仅仅被怀疑存有偏见，也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从文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偏见，那么更容易作出这种评估。注意最后指涉的是来源所表示的意向何在。另一方面，某个具体的建立起来的偏见，例如意识形态偏见，如果从意识形态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的，即可据以了解其要旨所在。

对偏见作批判的关键是要不断地问谁在说，目的何在。因而，一个人不应该接受某条有可能存在偏见的信息，但总是试图以具有相反偏见的信息或来自（相对）中性的来源信息作为补充。从来源批判的观点来看，比如，如果对管理者关于他们自己公司的声明有甚至最轻微的怀疑，即这些声明可能是出于美化形象的目的而做出来的，但还是频繁使用管理文献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声明，这是很不应该的。具有相反偏见或（相对）中性的那些来源必定会对这类信息作补充。具有相反偏见的来源可以是在办公室或商场工作的基层人员。另一个策略是寻找组织里的"黑羊"，以作为管理者所提供的浮华图景的平衡力。这些相反形象当然也常常像那些管理者所做的那样在相反的方向上夸大。不过，它们还是可以作为这样的线索而起作用，这样的线索表明这里有些问题需要考察（例如，通过与管理者的重新接触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这"黑羊"同意管理者所提供的积极图景中的某些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就更值得信赖。相对中性的来源可以从下面这些方面去找，例如，从其他业务线索去找，这些业务对身边的公司有某种洞悉，但又并不与这些公司处在高度竞争或互相依赖的关系中；或者从公司内部处于管理者与其相对者之间的组织群体中去找，他们对美化或丑化其形象没有多大兴趣；或者从其他外部研究者团体去找。

72

到这里，我们已经说过了偏见批判的旨趣。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意识形态联系这样的事情都通常被归入了偏见批判之下。这还只是进入或思考偏见批判，即对某个来源中的视角

(perspectives)作更一般的评估,所跨出的一小步。因而问题就是要把不同部分的视角加在一起以获得一个整体图景。先前所说到的偏见与相反偏见现在看来似乎是某种特例,它所涉及的是两个相对的、部分的视角,支持或反对。换言之,部分的观点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圈子,研究者们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以达到一个完整的图景。于是,中性的来源是与某类报告者相一致的,这类报告者的视角使得她或他能更好地传达整体。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那个著名寓言中的大象与五个盲人。他们每个人都触及了这个动物不同的某一部分如鼻子、尾巴,等等,然后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这个动物的本质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故事常被讲述以"证明"一个相对主义的立场:"实在"是复杂的难以捉摸的,任何解释都是纯粹主观的。然而,这个故事的这种相对主义精神忽视或限制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讲述者这一角色。故事的讲述者如何知道这个动物是头大象?与讲述者一样,研究者应该把他所遇到的每一部分的视角综合起来,以达到这个结论,隐含的这一结论即这个动物是一头大象。或者,这个研究者可以与一个从其视角来看可以(更好地)传达这个整体的看得见的人接触。

根据法国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莱戈夫(Le Goff,1992)的观点,传统的来源批判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包含从总体权力结构而来的施加在来源上的影响。尽管刚才已说过,这种关联可以通过检查偏见来作出。总体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批判理论感兴趣的目标(见第 4 章)。在最后一章,我们将思考在不同层面的解释之间作出选择的重要性:对它的有趣的应用恰好能由批判理论和来源批判来提供。

远离与依赖

第 3 条原则,理解的真实性,对来源批判的另外两个方面即远离与依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两种情形中,研究者都声称能比报告者更好地解释事件。"远离"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来源在时空上离事件越遥远,其价值越低。"依赖"指的是信息已经从所谈的来源过了几道手。众所周知,信息经过的中介越多就越失真。中国的耳语游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游戏是这样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耳语,讲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人又传给另一个人

73

形成一个圈,到最后回到起点时故事就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而,中介越多,来源的价值就越低。因此,两种来源,一种是原初的,另一种显然依赖于它,这两种来源并不会比一种来源(第一种)更有价值(根据原则3,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进入这一图景之中来。历史的书写不应该仅仅是资料驱动的报告,也应该在研究者的前概念与指称结构中把握其出发点从而创造理论)。

*

以上所述一般原理需要几条来源批判的规则,下面我们可以给一个样本。注意:在所有情形下都需要保留其他条件不变。

- 遗存总是比叙述性来源更有价值。
- 如果来源的真实性可疑,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 因为没有任何来源是与事件完全同时的(其间总有一个时间间隔,即使这个时间间隔很小),所以不要接受对事实作具体陈述的单一的来源,而是要至少取两种相互独立的来源。
- 单一的来源如果没有受到偏见或依赖的影响,那就可能被接受为解说的主要结构(这"主要结构"如何构成,对于研究者的良知与"客观判断"就成了一个问题)。
- 如果两个来源A和B是相互依赖的,以至于B从A那里获取信息,那么它们联合的价值并不比单独的A更高。
- 最原初的来源比次级来源有更高的价值(或者进一步强调:只接受最原初的来源)。
- 某一来源与其所谈论的事件过程所在的时间越近,它就比那些时间隔得远的来源具有更高的价值。
- 某一来源与它为我们讲述的事件过程在时间上离得越远,其信息价值就越低。
- 怀疑一种来源存在偏见的理由越多,就越有理由拒绝它(或者进一步强调:拒绝所有甚至只是被怀疑有偏见的那些来源)。
- 两个在同样的方面都存在偏见的来源并不比一种来源更有价值。

诸如此类。记录了实际过程的会议记录就比对这同一过程

所作的访谈的信息更有价值;对很久以前的会议所作的评价比对不久前的会议所作的评价的价值更低;二手信息对于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作为线索而非作为证据,等等。 74

以上所提到的规则,由于表述与篇幅的原因比较粗略,它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它们不是方法论的脱粒机,不要以为通过它们就可以使资料运转起来。而且,我们已经指出,只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们才是有效的。例如,刚才所说的会议记录,只是在考虑到时间距离时才有效。也就是说,会议记录一般比访谈在时间上更贴近其所报告的事件,因而比后者较少受到记忆的曲解,后者可以是报告数月甚至数年前的事件。另一方面,关于偏见,会议记录与访谈当然都有可能面临曲解。此外,有必要考察会议记录在整理认可的过程中被改变的程度,因而它与事件的距离比第一眼所见更远。而且很显然会议记录与访谈都可以被伪造。当然,在数量上,会议记录通常比访谈更贫弱,尽管这可以改变。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其他条件不变"这一点,那么这一方法就变得更加精细而微妙。概言之,来源批判的规则应该像写作的文风那样来运用,像艺术那样举着敏感的直觉来运用,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机械的文本作一级一级的解释。

移 情

第四条原则是意义的符合,它暗示着研究者可以用移情来补充来源批判(考察其真实性、偏见、远离与依赖)。这意味着从研究对象的"内部"作直觉的理解,不管这对象是单个个体还是总体的社会构成(前面曾提到,在这种情形中研究者试图再现其原初创制背后的意图)。这意味着移情变得更加重要,而手头所占有的来源的价值就降低了。移情也通过使内部意义充满由来源批判所产生的纯粹外部"事实",而发挥重要作用。科林伍德(Collingwood,1992)说过,行为有外部与内部之分,即动作及其意义,他坚持认为后者只要通过"过去经验的再现"或者移情就能很容易达到。通过移情,我们使内部意义充满了作为先前解释之结果的外部行为的脆弱外壳。因此,在这里对行为主体的意义就成了核心。

一个例子:大屠杀

我们现在来举一个来源批判的实例。受到各种新纳粹组织的支持,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声称,二战期间的大屠杀并未发生过。据他们说,这是一个编造的神话,是污蔑纳粹主义这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至于比如与集中营相关的技术上的问题,修正主义者们试图运用来源批判来强调其实情。两方面的文献都很多,在这里没有任何空间进入真相。我们将从某种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75

首先从偏见批判开始,我们可以观察到纳粹及其右翼激进分子自然总有理由淡化或否认希特勒政权的邪恶暴行。与此相反,有证据表明它的对立面即胜利者也有同样巨大的兴趣来黑化这个政权的名声。战争中的胜利者也写它的历史,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是修正主义者援引的主要证据。因而,争议不能从对偏见的批判来作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双方完全是平衡的。如果我们转而研究遗存,就会发现受害者留下了数量极多的建筑物、[21]所有物等形式的遗存。类似地,有大量的目击者,他们就在事件现场并参与其事,既有受害者也有行刑者想方设法逃走。目击者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另外,还有各个层次的纳粹分子的陈述,既关涉高层意图又关涉此后的执行。希特勒自己在其政治生涯之初即宣布了他灭绝犹太人的意图,此后屡次重复了他的这一意图。例如,他在1919年9月16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 然而,最终的目标必须毫不动摇:赶走所有的犹太人。(Deuerlein,1959:204)

在1938年2月24日对"党的老战士"的讲演中,他说道:

> 欧洲人,你们天生的敌人就是犹太人!……消灭这种人,甚至基督都宣称他们是魔鬼之源……
>
>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我们必须继续毫不留情地在德国反对这些犹太人的后代……我希望彻底消灭你们。因此现在,智慧应该帮助我把你们驱赶到天涯海角,在那里你们成不了气候;然后再刺向你们的心脏。(Wucher,1961:

25)

在二战期间这一目的实现之后,1945 年 2 月 13 日,希特勒在第二政府驻地(Reichskanzlei)的地堡里与鲍曼交谈时宣称:

> 我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绝对是公正的。战争前夕我就给了他们最后的警告。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突然发动另一场战争,他们将不会被饶恕,我将把这些歹徒从欧洲铲除,这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
> 好,我们已经切除了犹太人这个脓块,未来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Genoud,1961:57)

76

从其他纳粹领导人那里还有许多类似的文献上的证据。[22]甚至在这大杀戮的时代,也有文献上的证据表明,那些并未直接卷入的人们——设法逃离了的犹太人以及良心不安的行刑者——通过外交渠道敲响了警钟,并力图使西方政权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但都不被注意,与其他事情一样这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断言看上去只是相关团体的夸张的宣传,直到证据开始不断增多。但为时已晚了。[23]

要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屠杀如此细致地被证实,以至于只有那些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人——特别是新纳粹分子——才会否认它。因而,一般的来源批判足以得出一个结论,而在这里我们也将表明移情原理如何进入这一图景的。例如,布洛克(Bullock,1991)试图使自己进入希特勒思想的妄想狂世界。布洛克指出,从其政治生涯的开始一直到结束,这位纳粹领导人都视犹太人为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根源,尤其是德国的致命威胁。他的目的就是必须要消除这一威胁。在其他语境下,从他所使用的手段来看,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绝对无情的人,他甚至对付他最亲密的共事最长的同事(如罗姆)。据此,大屠杀是某种行为逻辑——从现实的被歪曲的图景视角来看待问题,以及与无同情能力的精神变态相关联——的结果。于是,对其他相关行为者的移情也可以用来补充这一结论。

移情、意义与真理

科林伍德赋予移情以比上文所述的应用更大的作用,他坚持

认为它应该是所有作历史编纂的必要而充分的方法,这在我们看来走得太远了。他的这一立场拒绝把来源视作(或多或少)与实在相符合的主张。实际上他仅仅是把来源看作意义的传达者才愿意接受它们的。于是,我们不应该问“在这一来源中,陈述 A 与实在有多大程度的符合?”,而只能问“陈述 A 是什么意思?”这自然使得来源更加确定,因为真实性、偏见、远离与依赖的问题都不复存在了。再看前面在讨论偏见批判时的那个例子,没人会怀疑一份意识形态的文件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意义”),即使它很有可能导致对真实情况的误解(“符合”)。[24]

然而,科林伍德的观点太激进了,这会排除太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在宣传中,也许都有通向事实信息的线索,不过它们必须与自足的信息相核对。这可能也是相反偏见的问题,也就是说,某一条事实信息可能反驳对某一来源的一般偏见。如果一名公司主管与其他管理者一样也有美化公司形象的意思,他突然开始谈论全体员工里的冲突,那就有充分理由竖起耳朵来听,严肃对待这一信息,而且更仔细地考察它。一个相反偏见通常被看作一个陈述有效性的强大暗示。因而,甚至公开的宣传材料都可以用于符合价值,而不仅仅是用于意义价值。至于得到考查后的来源,如果相信它们对于手头的问题没有偏见,而且达到了其他来源批判标准(真实性、远离、依赖),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把它们作为符合的材料来运用。

77

同时,当然重要的是,如果经过来源批判的“回火”之后,其符合价值表现很弱,我们也不要去拒绝这一来源;相反,它可以证明对所研究的问题具有丰富的意义价值。假如我们研究的文本是考察犯罪的。在这个文本中,X 宣称看到了 Y 是一个犯罪者。然而,看上去以 X 的身体条件不可能作出观察,这是考察者所忽视的。由此,因为“远离”原则使得此陈述的符合价值无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们没有意义。因为此陈述可以由于其意义价值而有意义,我们可以问“它意味着什么?”于是,在这个案例中,想想“X 为什么这样说?”其结果可能是 X 归罪于 Y 是想保护另外某个人。通过更细致的考察(发现了 Z 写给 X 的信),这某人就是 Z,他长期以来敲诈勒索 X,因而对他有控制。为什么 Z 想要 Y 受罚呢?进一步的研究暗示 Z 可能是真正的罪犯。

我们的结论是,来源的符合价值与意义价值都应该考虑,这也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做的。重要的是要注意,在使用"符合"一词时我们并不是指终极真理,而仅仅是指对所发生事件的最合理的解释,如果此信息在任何特定时间都适用的话。这解释总是暂时的,可以随时改变,如果继续,相关的信息就出现了。

来源批判:结语

来源批判的原理应该值得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当下的应用。它们看上去尤其适用于案例研究,因为案例研究与历史编纂有共同点。进一步来说,被访谈者对特定事实环境的描述通常被无批判地接受,即使它们是特殊语境中的唯一来源。但是,我们知道合理化常常同记忆开玩笑。比如,美化某人自己在事件过程中的作用,把他说成处在比实际情形更为核心的位置,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形。对访谈材料作初步的来源批判上的检查将在这方面排除许多误解,这更加重要,因为这种材料在质性考察中通常提供了资料库的主体内容。一般而言,所有书写形式的报告都可能受制于这种解释学方法。甚至参与者 78 的观察也能很容易受到来源批判的检查,而不管这种观察是否尽力实现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远离与依赖。但是,在第 2 章谈到它也使用了书面报告。于是有了如下批判:

1 真实性的批判。观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在自然科学中,结论很容易被检查,伪造也并非不普遍,甚至非常著名的研究者也积极干这种事(Broad and Wade,1982)。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情形在社会科学中就应该非常不同。
2 偏见的批判。何为研究者的(可能的)偏见,以及这是如何曲解她的解释的?
3 远离的批判。作出观察之后多长时间把它记录下来,以及在什么位置记录下来?
4 依赖的批判。报告者听到的其他的事情可能影响此报告(以及接下来的分析)的结构或内容吗?这一现象可以称作叙述传染,比如古典的圣徒传问题。

这四点可以用研究者和其他"参与者"的移情来补充。

来源批判在历史研究中很早就已证明其价值了,要公正对待而不应低估。问题是先前它往往被历史学家抬高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并有替代理论的趋势。于是它发挥着使经验主义者反理论立场(就如 19 世纪的德国与法国)合法化的作用。这当然有把研究降低为编辑事实的风险,至多得到归纳的低层次理论的补充。然后我们以(质性的)实证主义告终。幸运的是,在现代历史学家中有一股采取更理论化的立场的强大思潮。正如里克尔已经表明的,来源批判甚至能与现代诗学解释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关于诗学解释学我们将在本章下文讨论。就叙述和情节来说,是解释而非干枯的"事实"编辑致使历史编纂方法比它有时所暗示的外在形象更加灵活和相对化。[25]

另外,科林伍德(Colling Wood,1992)等强调,一面是由来源批判产生的"事实",另一面是从这些事实作为某种形态出现的理论,研究者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比较是很重要的。应该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形中,我们所讨论的理论与经验材料都是经过解释的,被谈到的事实绝不是某种直接的存在,它们是某种解释过程的产物。因此,没有纯粹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文为事实一词打了一个引号的原因。根据科林伍德,研究者在这些被解释过的事实(它们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点或者某种"临时的网络节点")之间作"篡改",以此来编织一种整体网络。例如,研究者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企业家 A 访问了墨西哥城(Mexico City),然后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访问了休斯敦(Houston)、得克萨斯州(Texas)。于是看上去可以合理地假设 A 以某种方式在这些地方之间迁移。于是,临时的网络节点之间的这些线就被编织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网络、理论。仍然根据科林伍德,这个全球之网必须是"连贯的",这是所有解释学方法论的典型特征(以及解构主义批评的首要目标)。但是过程并未因某个理论或总体形态的产生而结束。甚至"事实"这些相对稳定的点现在又要根据这种理论来解释……因此我们是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解释学循环里迁移。

79

把这种进程方式与扎根理论作比较是有好处的。首先,事实从来不是直接的给定,它们总是已被解释过的。这意味着理论不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因为理论与事实两者都是在以文本为

出发点的解释的交互过程中出现的。其次,科林伍德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把资料从它们的语境中拿走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这导致了人工抽象实在的产生,并通过撕破历史形态而使得客观实在不能被发现(或如谚云:从鱼缸取鱼做汤易,从鱼汤取鱼返鱼缸难)。

事实上,科林伍德还进一步断言任何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解释都是主观的和历史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关涉着研究者自己的具有时限性的指称结构和价值观,等等。因此,再没有任何绝对而纯粹的理性主体反映客观实在这个意义上的独立于时空的大写的真理了。关于这种史实性、时限性,我们将在下面谈真势解释学时再论及。

存在主义解释学:回到基础

在　世

进入 1930 年代这个阶段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家们反对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作区分,然后把兴趣转向了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所谓的"在世(in-der-Welt-sein)"。[26] 我们被不可逆地混合在我们的世界里,先于任何自觉的反思,因而思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两极化是可疑的次级结构。因此,客观主义解释学中的理解概念有了问题,因为它建立在移情主体与(人的)移情客体这两极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Heidegger,1962:第一卷, 第二章,n. i; 参见加达默尔,1989a:254)创造了一个表述叫"事实性的解释学";即真正重要的是去"理解"具体的事实。真正重要和要关心的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它先于所有抽象、理性化以及理论结构[现象主义之父胡塞尔后来创造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即著名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这一表述很明显比海德格尔那不易记住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更加流行。比这两个表达更好的可能是加达默尔(Gadamer,1989a)的那个更简单的概念"隶属(belonging)"]。 80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要研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可以说,我们是总是在未征得我们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抛入这个世界

里的一种存在,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寻找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胡塞尔是海德格尔的早期哲学导师,他坚持认为人类(超越的)自我先于一切,这个世界是自我本身建构的。对于存在主义解释学而言,这是一个抽象,可是我们"总是已经"处在这个世界里。因而,应该强调的是"存在"这一术语指明了某种具体的个体的存在。存在主义解释学家们自身强烈地脱离于任何超个体、类定律的规律性或任何整体主义方法的观念之外。这些观念对于他们只是一些关于误导性抽象的例子,实际上只有个体或至多个体间的关系在原则上才是有效的。因此,作为核心的既非单一抽象的自我,亦非超个体的整体,而是研究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个体。这些思想在应用研究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了支持。例如,博斯(Boss,1988)的存在分析,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道格拉斯与约翰逊(Douglas and Johnson,1977)对存在主义解释学的社会科学的拥护;以及吉耶·德·蒙托(Guillet de Monthoux,1978)与索托(Sotto,1990)的组织与公司研究。

关怀的结构

海德格尔所谓的关怀的结构在具体生活情境——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中起着中心的作用。作为存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在这种存在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循环的时间视域。我们以伴随我们从过去走来的资料为基础计划着未来,我们着眼于未来与过去作出当下的决定。未来、现在与过去由此在关怀的循环中被连续地互相反思。这有着不同的结果。我们作为实在的可能性的要素被放置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有内在的可能性,因而是自由的,而正是这种情形带来了困境。如果个体是自由的,那么他们也自由地选择,他们有这种责任。这种选择建立在什么标准之上?问题是甚至这些标准最终也是我们自己作出的,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价值。尽管这样,选择仍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如萨特(Sartre,1973)所言,我们"命中注定是自由的"。对于萨持而言,自由存在于唯意志论者的(政治)实践;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它存在于对原初状态的光复中,却遗忘了统一性(unity)与同一性(oneness)(Fell,1979:418)。

在这些条件下重要的是去"毅然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勇敢

地面对我们的命运,并以一种无畏的英雄主义的态度作出决定。糟糕的是我们只是使自己屈从于环境,并否定我们作自由选择的 潜能,而这都可能是作茧自缚或者毫无根据的。这形成了一种"不可靠的"行为模式,与此相对的是"可靠的"模式,作为自主的个体,我们借此来实现我们自己的自由程度。顺便说一句,不去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不可靠的那种选择。我们"掉入"琐碎的日常世界。"良心的呐喊",即"良心的声音"的扩展,呼唤我们回到真实的生活。良心的呐喊不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而是击入我们最深本质的突然的呐喊,它以一种爆发的力量敲击唤起我们:你真正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Heidegger,1962)

这种情形常在艺术、电影或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在视觉上,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呐喊》(*The Scream*)卓越地描绘出了这种存在主义的焦虑。[27]我真正在做什么?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自己的生命,我最深刻的可能性浪费在琐事上吗?在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中,这样的问题能够激起个体的冰雪聪明,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不可思议"[28]的聪明,它将改变她的整个生命。当我们关注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与整体性以及它的无意义和空虚,产生了一种"焦虑",通过这种"焦虑",我们的心绪变化了,这种心绪使我们有可能作出非凡的决定,并且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恢复作为个体的我们(Heidegger,1962:74;参见 Sartre,1973:passim)。这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和我们潜能的一种现实主义的(realistic view)观点,即既不低估也不高估它们。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牵涉到这两种情况:因为它被淹没在琐事之中,于是由此降低了我们的自由度;因为它忽视了死亡,这当然就使得每一个存在都是"有限的"(Heidegger,1962:278)。

让我们用社会科学的例子来阐明这最后一点以使之具体化。死亡在组织研究中是某种禁忌(Sievers,1990)。对死亡思考的压抑可能正好导致了组织生活的平凡与狭隘。正如贝克尔(Becker,1973)所指出的,现代制度可以看作是逃避认识死亡的结构。摩根(Morgan,1986)在讨论他的八个关于组织的比喻之一——心灵牢狱(psychic prison)——时发挥了这种观点。当代一名作家个人见证了一个病例,一个晚期病人经过数年的死亡之旅,这不但没

有给身体组织意识造成令人沮丧的影响，事实上还帮助组织意识提高到了一个更高、更真诚和更热情的层面。这个人的办公室成了某种被崇拜的场所，它给人的一般感觉是松弛与开放。通过长期的接近死亡，生命的存在显露出来，轻微地改变着组织，不过组织的限制还是意味着退职甚至有时间限制的工作的终结，以及下岗的可能威胁。所有这些对于组织及其构件的影响都值得注意。例如，它们是否导致了逃避和平凡或者一种真诚的自觉意识？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82

理 解

存在主义解释学特别从胡塞尔和现象学那里继承了三个观念。第一，认识应该是一种直觉。海德格尔（Heidegger，1962）典型地认为真理概念经历了一个从柏拉图以来的长期的堕落过程：从对总是先已存在的知识的“揭示”（尽管目前是隐蔽的），到观点与实在之间相符合的原理。真理意味着从错觉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非必须从一个与实在相对照的观点中表达出来，这种对照只是一种衍生或次级的方面。[29] 因此，真理是一种洞见，一种直觉。然而，这直觉与胡塞尔的直觉有很重要的不同。直觉的胡塞尔式的变种是所谓的“Wesensschau”（字面意义是“凝视本质”），我们用“想象的变种”——粗略地说是一种现象学边缘的思想游戏——来探索它的基本结构。通过致力于现象本身，把它与其他现象隔绝来看待，这一直觉的变种显然既清除了历史的语境也清除了空间的语境。而根据海德格尔，重要的是在其语境中来看待该事物［环视（Umsicht）］，并以解释学的立场看穿［审查（Durchsicht）］来自历史的曲解。传统的直觉太过远离被直觉对象的时空语境来作直觉（即凝视）。［不过，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73：104-107），是站在胡塞尔这边的。］因而关联之网、历史语境都是重要的。鲁因（Ruin，1994）认为，史实性是一个关键概念，它把海德格尔思想的各个不同阶段，与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这些阶段之间的关联所在（即存在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了。

第二个从胡塞尔那里输入的观念是：原初的“生活的”状态、经验，是所有知识的根源。我们在上文注意到，胡塞尔把这扩展

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存在主义解释学家把我们视作“总是已经”被嵌入在这个世界(Heidegger,1962:12,13)。可以说,我们是被束缚于时空范围之中的。然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或有意向的世界。个人是一个意义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个网络就是她的世界。意向性就是从胡塞尔那里输入的第三个重要观念。上文提到的时间与空间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意向性的(Fell,1979:51)。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总是被设置在一个语境中,这个语境也是一种实践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理解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以把握实际情形为目标的,由此实现我们存在的潜能。并非只有海德格尔有此洞见,这也是 20 世纪除海德格尔之外另外一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即(后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原则。泰勒(Taylor,1991:308)指出:

> 过去两百年的许多哲学思潮已经努力走出了独白意识的死胡同。20 世纪的杰出代表是 M. 海德格尔,M. 梅洛-庞蒂,L. 维特根斯坦。其共同看法是,他们不是把行为者首先看作表征的场所,而是看作在这个世界里从事实践的有行为活动的存在。

83

例如,理解既含有激动的情绪也含有所谓的“静默的认识”(Polanyi,1967)。于是意向性就成了一种先于理性的前理解,再也不是某一主体被动地、理性地、理论地审视某一客体的问题了,而首先是主体与客体由以产生的一种认识行为。所以,正是理解的行为才是首要的,主体与客体是次要的(而且是误导的)范畴。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个体去理解他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正是这个原因,解释学渗透到了整个存在。每一个理解哪怕是对最简单的日常事物的理解,都同样有益于更好地自我理解。[30]

视域的融合

这同样适用于对其他人的理解。因为有另外的世界需要冒险进入,有其他个体的意义领域需要寻找。每个世界都是一个意义的“视域”,这意味着它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下(此时此地)都取决于它自己的看法、观点的最终限制及其中间领域。“视域”一词也

意味着某种灵活性，它能从此时到彼时发生变化（Gadamer，1989a：245-247，302-307；这个观念源自胡塞尔）。一个个体可以把她自身放入另一个个体的视域中，首先运用我们在上文所称的"移情"进入其意义领域，但这还不够。对于存在主义解释学而言，先于其他一切（"总是已经"），每个个体都陷入了自己的意义领域、时空中的意向性。换言之，她从来就不能摆脱来自过去的前概念、预设的意义。没有人其发展是从白板一块开始的，它包含着对理解的寻求。这是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的新版本：去理解预设的前理解，但同时前理解又是理解的一种障碍。为了防止发展成一个恶性循环，存在主义解释学家们主张在进入其他世界与回到我们自己的指称结构之间作不断的选择。依靠这种来回运动，我们可以不断达到对不熟悉的指称结构的理解。这个不熟悉的指称结构也会使得我们自己的指称结构得到逐渐修订与丰富，这就是"视域的融合"（Gadamer，1989a：306-307）。[31]

此外，还应该强调的是，所有理解从一开始就有由情绪基调（emotional moods）所带来的"总是已经"式的色彩，因而没有纯粹认知的或理性的理解（Heidegger，1962：Division One）。

84

最早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家（《存在与时间》中的早期海德格尔）把核心放在理解——作为基本现象出现——的基础地位上。后来，晚期海德格尔[32]、加达默尔（下文将讨论）甚至里克尔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都转向了文本。他们认为语言是生活世界揭示其自身的中介，激烈地辩驳反对关于语言的工具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语词及其意义不是我们建构的某种东西，它们是传统的仲裁者。像早期解释学那样，对假定的作者所具有的意向作或多或少的精神心理的再现，这再也不重要了，这些意向不管怎样必然是不可理解的。现在不同了，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行李装备进入了文本世界，可以说目标就是熟悉与不熟悉者之间的"视域的融合"。[33]

通过与传统的调解，我们曾提到的历史编纂也成为了中心。任何解释都是历史的、相对的。第一种意义是说它总是历史地预设了传播着的前概念，第二种意义是说为了表示相关性，它通过解释者而适用于当前。要补充说明的是，解释者以计划、预期等形式把解释指向未来。于是，任何解释都包含着时间上的三个方

面: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三个时刻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调解恰好通过语言发生。然而,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避免了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这两个陷阱,因为我们的前理解当然使得所有的认识都是视角性的,但正是由于这个特征,前理解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关于实在的条件,尽管必然总是受视角的限制(Wachterhouser,1986)。我们总是属于一个世界,只有在从理论上或抽象地使我们的心智活动与这个世界相分离时,我们才会产生相对主义—客观主义两极。鲁因(Ruin,1994)也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征既非相对主义又非客观主义。解释总是有历史条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相对的(相对于特定的时代或文化)。相反,实在的不同方面通过不同的时代或文化显露出来[参见德赖富斯(Dreyfus,1991)论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多元实在论]。

博曼(Bohman,1991)再次从另外两个方面攻击了相对主义—客观主义问题。一方面,他批判了视角、背景概念等观念,认为它们包含的只是消极的、限制性的条件。一个观念导致相对主义,是因为我们不能超越我们自己的视角。然而,视角等类似的观念应该从积极的角度视之为能动的条件,如此它们就总是开放的并能导向我们在尾章中所谓的有条件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回火"通过主体间的交流而发生,在主体间的交流中共同的能动条件得到调解。另一方面,博曼断言我们也有能力通过对视角的自觉反思——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基本论题——而超越我们的视角。这破坏了相对主义立场的基础。而客观主义却未得到疗治。因为开放的视角总是必然地导致认识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正因为我们总是能超越新的认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在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其认识是摇摆不定的、多回避的但同时至少是暂时有效的。　85

敞开文本

我们通过语言获得解释学的经验。最早的解释学家所探索的关于理解的基本关系,只能通过与文本展开对话才能实现。我们接近文本,既不是作为它的主人,也不是消极地使我们自己屈从于它,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首先,关键是学会倾听文本(而不要像札根理论那样把它弄得支离破碎)。其次,学会提问是很重

要的,对此科林伍德(Collingwood,1992)在半个世纪以前就作了强调:我们不能只是消极地坐等材料提出问题,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来并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要完全地自由和开放,有点像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方法。在存在主义解释学中,这种方法有深远的发挥。比如,解释者逐行地使用提问方法,有时甚至不断地提着同一个问题,就像小心地轻拍一个物体直到它发出声响来,或者一直敲着一道门直到它最后开了。我们提出问题,认真考察答案,扭曲和转变它,记录它的缺点,然后在已经出现的认识的新层次上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既要从有积极贡献的答案,也要从它的缺点来提出问题。

敏感度、敏感的耳朵,是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认真地倾听文本,就像为了听到它说出的答案而把你的耳朵靠近它。这个过程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由此再三地提出同一个问题,不断地倾听文本,直到它不再回答,或者它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如此含糊和微弱以至于再也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了。这个观念不是要达到任何最终的答案,反而是这个过程才是对它自己的回答。航程结束,问题已被解决,但一个新的问题又开始显露出来,于是这个过程又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就是报酬,而不是在路的尽头有某种最终认识上的香格里拉。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新法国质性社会学,其兴趣在于象征和想象,并与我们上文所描述的倾听的策略密切结合着。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才有可能辨明根本的象征形式的展开,这些象征形式处在那第一眼看上去所显示的主旨的背后(Lalli,1989)。下文在讨论诗学解释学的部分时再来详谈。

86

文本隐藏的基本问题

当对话的方法被用来探索某一特定文本背后的基础的未言明的问题并由此产生这一特定文本时,这一方法被推向了极致。这与麦迪逊(Madison,1988:29)的解释学原则"穿透性"相符:

> 一个好的解释应该具有"穿透力",它能导出作品中具有导向性的根本意向,这样使得作者的各种作品或陈述变得可理解,只要把它们看作是努力解决核心问题的所在(在我们只拥有文本的部分片断时,这一规则显得尤为必要)。

换言之,我们研究的问题现在成了:文本是回答什么未明言的问题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海德格尔亦曾提到过的对文本施行暴力,因为它暗示着我们说了文本既没说也不能说的东西。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种限制中:什么是对话和倾听? 在边缘地带,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可能被描述为霸道或固执,但最好的情形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功地找出文本的根本和隐藏着的问题。

这当然能由每一个文本中都存在着大量只能被静默地理解的问题而得到辩护,而这未言明的而非公开言明的主旨实际上就是被传达的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核心意旨就在字里行间。而其过程又是更多地由对原理的思考而获得辩护的。因为解释必须有史实性,作为解释者我们又总是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来就不能走出这个传统(现代主义的错误看法),而只是无批判地接受它,屈从于常识或至少是历史—文化的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的错误看法)。根据海德格尔,解决这种史实性困境的办法是与相关的传统作批判性的对话,逐渐地显露其隐藏的根据。而真正的历史根据总是回避着的,因而关键是要揭示它们,比如从解释者的时代和目的来反思它们:"又一个开端"(Ruin,1994)。[34]

这种方法当然有风险,因为我们预设了文本背后有一个或者也许有若干个基本问题。所有的解释学都从意义的连贯性概念出发,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这种方法就没底气。我们不是说没有一个最高的意义的连贯,而只是先在地认为其存在在我们看来是太过乐观或者纯理论的一种假定。而且这种假定会导致严重错误的见解,这在我们自己的经验研究中已经遇到过。[舍尔德贝里(Sköldberg,1991a)描述了从意义的连贯性出发的一个研究过程,但最终对经验材料的分析还是被迫与它作了一个根本的决裂。]

87

诗学解释学

解释学通常与文学关系密切,这是客观主义和真势解释学共同的情形。我们上文提到过,解释学最早是从对书写文本的研究

中出现的。19 世纪的施莱尔马赫重塑了解释学,使得文学文本也成了解释学适用的领域。对于(晚期)海德格尔来说,诗化的文学语言(荷尔德林)渐渐变得更加重要。[35]加达默尔(Gadamer,1989a)认为语言是解释学的前理解的核心。对于他来说,语言也包括理解与思想,其最深层的本质是隐喻—诗性的,而不是逻辑—形式的。[36]修辞上的形象不是表面肤浅的装饰而正是在本原处塑造思想。

里克尔(Ricoeur,1978a;1978b;1984;1985;1988)对隐喻和叙事的解释学问题作了几个重大的考察。里克尔(Ricoeur,1984:XI)的观点是,隐喻和叙事与一种综合的"诗性领域"密切相关。[37]它们与这种领域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变化无常的。隐喻所带来的不同方面的整合是与叙事的"情节"相符合的,这把各种因素连接起来了。隐喻与情节都是一种"丰富的想象"行为,一种"语义学的革新",通过一种"纲要式的处理",在语言王国中产生了一个整体上的新的统一体。隐喻式的表达"谈论着这个世界,尽管它们可能不是以描述的方式",但是却有更深的层次。根据里克尔(Ricoeur,1984:78-82),这同样适用于类似的文学文本,包括叙事性的文本,因为情节不是对实在的复制,而是超经验的(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情节,因为它总是被内在置换了的)。这一推论线索也可以延伸到非虚构文本。

可以看到,里克尔由此回到了最初的解释学——文本解释,以间接的方式继承了移情与存在环境分析。这是非常慎重的。诚然,里克尔公开表示自己是存在主义解释学的拥护者,其目标却是走回头路,从对早期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深层演练,直至他们实际上表层的出发点:人文科学问题。[38]不论是文本的字面义还是文本的比喻义,在这里都成了核心,后来则成了解释社会行为的模型。这样,对符号和语义的解释就被"移植"(Ricoeur,1981;Phillips and Brown,1993)到了解释学上。

前面关于加达默尔的一些说法可以在现在的语境中作进一步的说明了。我们应该在心中记住,这与旧有的诗学学者的方式不一样,文学方法使用了叙事和隐喻分析,但并不关心隐喻的结构和修辞格,以为这只是语言修饰、肤浅的语言修饰,而实际上这正是文本的心脏,它构成了基本的思想方式(White,1985a;1985b;

Sköldberg,2000b)。因此,逻辑是诗学的一个附带现象,而不是相反。所谓叙事的兴趣、历时性,是受人文主义的启发而产生的对一般所谓"科学"的反应,结构主义揭示了"科学"的首要特征是共时性、永存的、非时间的结构。于是,叙事比抽象的模型更为根本。对隐喻或广义的修辞格的兴趣,也是受人文主义的启发而产生的对太过深远的理性主义的反应,理性主义认为语言是次于逻辑的,其实相反语言渗入了思想的本质。叙事与隐喻分析构成了社会科学的诗学应用中的两个重要分支,但是它们当然并非独有的选择,其他还有值得思考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将只触及那些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内容。 88

隐　喻

解释学对诗学的兴趣,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隐喻。正如里克尔(Ricoeur,1978b)所指出的,对这种修辞格的分析有许多方式。一种方式是,认为隐喻是阐明差异之中的相似性(Gadamer,1989a)。里克尔跟着赫斯特(Hester,1967)讨论了这一点。隐喻暗示着两个不同现象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例如,"我的爱是一束玫瑰花",这暗示着温情的意象与这种植物现象之间有某种相似性(White,1985a)。其相似性可以是甜蜜、美丽、芳香,等等。当然,同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像菌群(flora)与动物群(fauna)之间的差异一样显著。隐喻以这种方式来引出是不同的现象之间的某种可能的一致性。一个隐喻做得越好,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就越显著和令人吃惊。

想象　隐喻通常被认为是纯粹言辞(verbal)上的。作为一种平衡,赫斯特(Hester,1967)指出了感官直觉的"形象"因素,并认为它应该先于言辞形式。因而,我们是首先把我们的爱看作是一束玫瑰,然后才把这种相似性放在言词里。因而语言首先是"形象",而非纯粹的言辞。总有一些表示诗性"氛围"的形象的词语,我们选择这样一些词语来作隐喻。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形象依赖于我们的观点和视角,因而是有主观条件的。这选择的可能性自然不是无限制的,其自由的"客观"程度又依赖于这两种相比较的现象的特点,如果它们的边界是交叉的,这就会导致所谓的坏的隐喻。

形象的这种重要性也得到了前面所提到的法国“想象社会学”(Fourastié and Joron,1993)的特别强调。“想象社会学”致力于日常生活的解释学：“的确，每个人的社会经历都是无止境地产生隐喻、想象的过程”(Lalli,1989:111;亦见 Tacussel,1993)。里克尔的研究表明，这个方法强调的是隐喻的多义性，但是在如下方面它比大多数解释学家都走得更远，即强调解释的矛盾和公开的品质：“个体的‘社会性’于是就在互相矛盾的表现与表征之间摇摆，它们缠结在个人的生活历史和多重伪装面貌的制造者，即社会认同之中。”(Lalli,1989:114)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这里是很明显的，这种方法的目标也是要描述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生活，更具想象而非理性，但同时也比一般意义或典型的解释学更加自相矛盾、破碎和形象冲突(Maffesoli,1993a;1993b)。另一方面，马费索利(Maffesoli,1993b)声称，形象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文化氛围”，这又创造了某种连贯的并赋予了色彩的特殊社会环境。因而，解释学典型的和谐还在，尽管是淡淡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想象社会学存在于所谓的隐喻的边缘，因为形象渐渐地再也不代表某种其他事物，而只是构成了基本的混沌“母体(matrix)”本身，这种混沌母体“驱动了社会生活”(Maffesoli,1993a)。这也避免了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完全重叠，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只有表层没有深层。另一方面，深层统一的观念是解释学的特征，即要抽象出统一意义。

89

根本隐喻 对隐喻概念的最重要的应用是对所谓的根本隐喻的分析，即构成整篇之基础的隐喻。这也为海德格尔(Heidegger,1982)所主张的作为更基本的现象学与解释学要素的不同分支科学的基础分析提供了实例。这是一个在存在主义解释学中对前理解的研究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例子。根本隐喻，就像叙事结构，是前理解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且由此看来也是解释研究的一个本质领域。布朗(Brown,1976;1977)已经作了这种研究，他研究那看上去显得自相矛盾的“认知美学”，即关于社会现象的一种美学观点，这一说法首先暗示的是，它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也要带来认识。这是与“符号实在论”结合在一起的，根据“符号实在论”：

> 充分的社会理论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它

除了产生对超出了个人直接控制的社会权力的解释之外,还必须对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作出理解。(Brown,1977:27)

具有因果关系的、法则式的说明本身就是一种解释程序,而解释本身就是一种严密的认识方式。(Brown,1977:33)

审美感知或审美视点这一概念,使我们走出量度与因果说明的"客观性"与理解的"主观性"之间令人生厌的争论。美学感知既非纯粹的反思亦非一般的意识,实际上是结合了前者与后者的直觉直接性的分离,但是两者又都被强调是中心。(Brown,1977:49)

90

上文最后引用的一段话表明,美学感知把基于直接的非反思的感觉经验的意识与更结构化的思想结合起来,达到一种融合,直觉在这里进入了一种与更为反思性的范畴不可分的统一体中。于是,我们所拥有的就处在相对虚空的具有理性形式的思想与实质的却又相对无形式的纯粹的感知之间的领域。

布朗识别了社会学中的五种根本隐喻:有机体、机制、语言、戏剧和游戏。有机的与机械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经典之别,回溯到 17 世纪,那时新的自然科学突破了以有机体隐喻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思想。根据布朗所言,语言是诸如符号互动论与民族方法学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及其他思想方法的根本隐喻。戏剧通常被不加反思地用作社会现象的隐喻,但也被戈夫曼等审慎地运用。游戏作为社会学的根本隐喻有两个: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的数学游戏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布朗的诗学分析中有许多其他脱离了根本隐喻之讨论的有趣的因素,但我们在这里不涉及。

1980 与 1990 年代,隐喻已经作为理解组织分析的核心以及作为新理论观念的启发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创造了"组织"的概念是通过把它看作某事物,即通过使用隐喻,而这被使用的隐喻对于我们理解主旨以及一般的思考和理论化都是绝对重要的。摩根(Morgan,1980;1986)的著作是这方面的核心著作。(对它的讨论,见 Tsoukas,1991;1993)摩根谈到隐喻被用来使整体或至少与某一特定学派或理论相关的组织的所有要素概念化(隐喻也可以用来阐明其他更为有限的现象,例如,在

我们谈论等级制度中的"更高的"或"更低的"地位时,或在谈论作为交流要素的"发出"与"接收"时。后者回到了"通过气动导管发送"这样一种关于交流的观点)。摩根(Morgan,1980:607)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科学中的思想派别,那些赞同相对连贯的观点的思想家团体,都以接受和使用作为研究之基础的不同的隐喻为基础"。

根据摩根,下面的隐喻引导了或适合于组织分析:机器、有机体、人口生态、控制论、宽松的夫妻制、政治体系、剧院、文化、文本、语言游戏、落实的意义建构、完成、心灵牢狱、控制工具、分裂与灾难(处理这些隐喻文本的某些部分,在受了这里所讨论的隐喻的影响的任何组织理论中,几乎都没有包含任何组织理论的研究实例)。其他总结了隐喻发展的现有线索的意见与讨论组织理论的著作,已由伯格(Berg,1982)和曼厄姆与奥韦林顿(Mangham and Overington, 1987)等人作出。扎尼亚斯卡—尤格斯(Czarniawska-Joerges,1994)认为"超个体"是关于组织的主要隐喻,它们这样被描述就好像它们能行为、作决定、有需要,等等。

91

叙 事

对于新解释学中意向性的解释,时间是理解存在的核心,不是任何时间,而是确有意义的时间,世界中的人的时间(Ruin,1994)。根据真势解释学家的观点,这种具体的有意义的时间渐渐地受到西方思想家的抑制,要么是否认它(只有在无时间性的科学模型或无时间性的哲学概念的形式下,才有可能构成发生在时间背后的真正的实在),要么通过各种方式使之变形、被吸干,使它失去血肉。因而时间是真势解释学的核心。然而,又要指出的是这并不适用于任何时间(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无想象、无意义的时间),而只是适用于总是已经有意义和结构化的时间,世界中的人的行为时间。[39]转到社会科学,有意义的时间的必然性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将意味着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任何在不同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无时间性的抽象模型的运作,都将产生不可靠的认识。这种例子在社会科学中有很多,包括各种各样的结构主义,系统理论模型以及合理选择的理论,在这里时间要么被降为非实体,要么被挖空成一个没有意义的空洞的外壳。

到这里,我们已经提供了否定性的评论。那么,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积极的、建设性的相反主张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把丢失的对时间的自觉还给认识。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做是否必须把社会科学扎根于它常常与之相对立的其他人文科学,因为后者是最卓越的时间科学。我们正在思考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解释学的社会科学,这种摆脱困难的方法当然是极有可能的。佩蒂格鲁(Pettigrew,1985)沿着这些思路提出了一种研究方法,被运用于公司策略研究上。不过这种求助没有必要。里克尔(Ricoeur,1981)指出,人文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历史编纂、文学和社会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在其主题的有意义的时间本质之中。常常被忽视的是叙事,而它却在它们那里都发挥着作用。因而一个解决办法就在叙事时间里(Ricoeur,1988)。[40]所以有意义的时间说白了就是叙事时间。正如里克尔所指出的,由于这个原因,分析工具可用于单个行为的两个主要层次(例如:Greimas,1983)并且把行为编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情节(Frye,1973;Propp,1968)。

92

因此,把中心放在叙事——此外我们记得它构成了诗歌中的解释学基本旨趣的其他方面——也还要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叙事通过根本的时间中介而迁移。里克尔(Ricoeur,1981:278-279)坚持认为叙事的关键方面"不只是添加一些片断,它也从分散的事件里建构出意义整体"。这暗示着一般而言叙事可以被限定为两个维度的结合,一个是时间性的,一个是非时间性的。后者为前者提供意义,使之成为有意义的时间:一系列片断,与对这些表面看可能是互相分离的片断的意义构造。没有承载意义的时间的认识是抽象和片面的。麦迪逊(Madison,1988:99-100)有如下评论:"经验是有意义的,正是由于它能被讲述,而它能被讲述又正是因为它具有时间结构。"在讨论交往研究中的叙事范式时,费希尔(Fisher,1985:34)有类似的主张:"任何包含技术交往的风格类型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片断是存在于生活故事("会话"的一个部分)之中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如德里达,里克尔从前的学生)受到了真势解释学中的时间讨论的重大影响,而且把它植入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中。[41]

隐喻与叙事

有人可能会问隐喻与叙事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除了两者都

属于诗学方面,以及都表达了丰富的、综合的语言学的想象。首先,应该把隐喻植入其更大的语境中,而不是像修辞学那样仅仅原子式地关联着其他的语词,或者像语义学那样关联着语词的分子式链条,形成一个部分且具有(语法)意义。隐喻应该放在整个文本主体的语境中,它构成了文本的一个部分,文本为它提供了基本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修辞学和语义学,从而进入解释学的领域(Ricoeur,1978a)。所有话语都是某种方式的叙事,或者是完全彻底的,或者是部分的(例如抒情诗),还可能以一种压抑的方式(实证主义的文本)。隐喻被看作是以叙事文本为背景的,它是文本的一个部分。反过来,叙事又受到隐喻的影响。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部分—整体的解释学循环。例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成功类型(理性—合理化通过对工作程序的执著的管理击败了自发性)的悲剧叙事,在这个故事中,组织作为机器这一根本隐喻起着核心的作用(Sköldberg,2000b)。

其次,在“看作(seeing as)”这一表达中有一种关联。隐喻意味着把某物看作另外一物。例如把心脏看作乞丐(莎士比亚 *Timon of Athens*, Act1,Scene2),或者把社会看作有基础有上层建筑的房子(马克思)。同样,叙事意味着我们把一系列独立的事件看作某种其他的东西,即一个被编织起来的整体,一个情节。这表示视相(aspect-seeing)是隐喻和叙事共同的基础,不论是从话语的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来看都是如此。因而,经过更密切的考察,我们前面说到的丰富的想象就在视相、“看作”之中(参见 Wittgenstein,1953)。也有一些作者想在科学研究中也给予它重要的角色。顺藤而下,阿斯普伦德(Asplund,1970)想要强调的是研究新的意义的重要性,罗蒂(Rorty,1991)坚持认为“重置语境”是科学研究的核心特征,即把正在研究的对象放入一个新的语境。

93

再次,隐喻与叙事互相支持(McCloskey,1990)。例如,在经济学中,隐喻凭借着模型实际上是占支配地位的诗学形式(就跟它们在物理学中一样,毕竟经济学曾自命为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或至少是19世纪的力学)。然而,当隐喻(模型)需要解释时,经济学家们就转向经济学的历史,即叙事。反过来,为了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历史如此发生,经济学家们又转向了他们的隐喻(模型)。因此,隐喻和叙事一起构成了自我支持的经济科学的诗学。

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一个自利(self-interest)的寓言。

存疑解释学[42]

因为代替受自然科学启发的模型,面向叙事和叙事形态的文本解释成了中心。所以叙事这一视角也提供了一种变异的精神分析学观点。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概念工具中的地形学与动力学范畴常被批评为天真的经验主义实在论。弗洛伊德所区分的心灵的不同"实体"——意识、前意识、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实际上根据现代解释学(Ricoeur,1974)根本就不是实体,而是一些解释。于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实际上并不存在了,而只是一种天生的意义。这将特别适用于分析工作本身,尤其是作为解释,它将在解释学上为理解精神分析方法提供钥匙。

把精神分析理解为一种要求严格证据的"客观的"科学者不乏其人。从解释学来看,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误,是向科学至上主义及其关于世界的形象的完全"屈服"(Ricoeur,1974;参见Lesche,1986)。精神分析学从来就不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其目标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很不相同。这两个认识领域甚至是以根本相异的材料运转起来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运转材料是可观察的行为。精神分析则根本不以事实为材料,它的材料是接受精神分析者的生活史,这是一种文本,分析者的任务是把它解释为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故事(亦见 Roth,1991)。在它那里,书写话语——文本——是解释口头话语的模型,个人生活史被视作符号,只有根据它们的语境才能赋予它们以意义。[43]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相比较,精神分析学家的目标并不是调整病人使之适应于一个常常是虚假的社会,而是通过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史努力使他们自我洞见。这种自我理解的结果可能正好是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反面。因而,主体就成了由话语和解释构成的了,而不是先于这些。解释的有效性问题应该通过内在的品质要求来解决,补以严格的论证(法理学就是榜样),目的是在几种可能冲突的解释中显示出某种最合理的解释(参见 Madison,1988,论作为论证过程的解释学方法)。

94

精神分析学可以被看作属于存疑解释学,除了弗洛伊德之外,马克思、尼采也是其代表人物。他们三人都从他们所认为的

虚幻的自我意识背后探索到更深层的、更令人不悦甚至"可耻的"本质。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是性欲(libido),在马克思那里是经济利益,在尼采那里是权力意志。解释学的概念由此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其发展史来看,解释学的一个特点却是缺乏这种质疑,相反它以一种虔敬的态度对待作为中介的传统——传统应该回到它的真实意义,通过解释者从令人尴尬的裸露的秘密上撕裂它虚幻的面纱,从而剥去它虚假的神圣的外衣。存疑解释学可以被视为处在本章所讨论的主题的边缘,所以我们对此未作更详细的讨论。它在一方面与海德格尔的揭示真理的观点有相同处,另一方面又与法兰克福学派(见第 4 章)的意识形态批判有相同的地方。它还与福柯的文本(第 6 章)有相通之处。福柯的文本受了尼采的系谱学方法的启发——寻找社会现象背后可耻的、碎片式的起源,社会现象的起源已经成了为过去编造神话,因为我们有高贵的理性和毫不含糊的清晰。

格尔茨的解释学的民族志

格尔茨(Geertz,1973)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44]研究文化的方法引出了前面部分所讨论的几种思潮。在我们看来,它可以看作真势解释学里论述某些重要问题时的一套优雅的即席创作。深描这个概念是与行为主义的只考虑外部行为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相对的,深描还包括内部意义方面(Geertz,1973:7)。关注意义与象征的丰富层次是很重要的。意义与象征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特征。对格尔茨来说,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符号的连贯的整体,个体的表达或它的部分是由符号构成的。格尔茨受到了里克尔强烈的影响,把文化当作文本来读:[45]

95

> 文化是可构造的记号(signs)(与保守的用法不同,我称之为符号(symbols))的互相作用的系统,而不是一种权力,一种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都归因于它的权力。它是一种语境,在它里面的事物能获得更容易理解的描述,即深度描述。(Geertz,1973:14)

此外,整体是和谐的:

> 文化系统必须有最低限度的连贯性,否则我们不能称之为系统。通过观察,它们通常有很多。(Geertz,1973:17-18)

这类似于贝多芬的四重奏构成了"一个模仿音的连贯系列"(Geertz,1973:11-12)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整体,这种连贯性是如何达到的呢?

> 我们首先对我们的报告者在做什么或想象他们在做什么作出我们自己的解释,然后把这些解释系统化。(Geertz,1973:15)

深描是文化解释的第一步。第二步理论的创造是一种"对具体情形作概括"的"形态-发现"(pattern-finding)过程。它与实证主义的过程相反。实证主义的过程是以某种控制法则对一套观察作演绎涵摄。格尔茨的推论使人想起其诊断研究:它"从一套(推定的)指示符(indicators)开始,然后试图把它们放在一种易于理解的框架中"(Geertz,1973:26)。格尔茨(Geertz,1973:25-28)的观点是,理论解释的观念必须总是取自其他早期文献,在这方面他的立场当然是直接地反对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然而,如果这两种立场被视为相对而非绝对的,看来就没有理由先验地排除任何这些产生理论的手段——既不能排除对已有观念的重新组合,也不能排除研究者创造性的灵光。除了在前者的情形中,总有一种取决于新综合之独特性的在程度上或高或低的独创性;反过来,在后者的情形中,也总有一种依赖性(最终是依赖于字母表),因为如果没有智力的社会化,我们甚至没有读写的能力。因而事实上,强调差异比绝对差异更是一个问题。

格尔茨举了几个例子如印度尼西亚人的文化(巴厘)来论证此方法的适用性。然而,正是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的熟练技能和对整体的把握,反而可能使读者看不到与分析背后的基本和谐观点相关联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本章开始时谈到的原则 2 意义的连贯性(整体原则)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此原则的一个批评是,它预设了实际上保留并表现在个体中的东西,即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系统的连贯性。[46]对整体连贯性的假定当然是有问题的,例如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这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除了其他方面,后

96

现代主义还明确反对在理性上同性质的总体或整体概念。

与叙事解释学相一致,格尔茨(Geertz,1973:452)通过参考里克尔(p.448 注)写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文本的合奏,文本自己的合奏,人类学家尽力反复地阅读那些它们真正属靠的作者。"他还明确地参考了(Geertz,1973:452)我们涉及过的三种主要的存疑解释学。有一个这样的文本讲的是巴厘的斗鸡(Balinese cockfight):这是一个血性壮观的场景,周围全是被吸引过来的围观者,格斗者武装着锋利的钢铁马刺,马刺极为锋利,不小心很容易会削掉粗心看客的手指头,围观者默默地而又兴奋地模仿着这些羽毛战士的每一个动作。格尔茨相信,我们当然可以把像斗鸡这样的文化现象视如一种仪典或消遣。功能主义或精神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可以考虑。而他的选择角度却不一样,根据他的视角,"文化形式可以当作文本,当作从社会材料建构出来的富有想象力的著作来对待"(Geertz,1973:449)。[47]

使得斗鸡有趣的是它所包含的激情及其广泛传播。深夜,每一个成年巴厘(男子)都以巨大的热情来从事这项"运动",尽管这是印度尼西亚官方所禁止的,尽管它看上去与巴厘的其他非常克制的文化世界相冲突。这项运动仅限于男子,没有女子参加斗鸡,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公鸡事实上被视为男子阳具的象征,而且在斗鸡与社会生活其他部分之间的内涵中有一系列的隐喻。

此外,在对错综复杂的赌博体系作出细致分析之后,格尔茨得出结论:钱在这里面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最强的情绪并未在赌注最高时出现,毋宁说它们与游戏者之间相类似的社会地位以及相互之间或对其中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敌视相关(Geertz,1973:441)。同时,这为巴厘人斗鸡谜团的解答提供了钥匙。巴厘人斗鸡既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也不是任何其他理性的(或功能上的)原因,根据格尔茨(Geertz,1973:443)它是一种"艺术形式",与其他任何高级艺术形式一样,它向游戏的参与者和旁观者道出了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的某种东西。斗鸡是地位之战,它展现于强烈的血性形式中,但它常常又被巴厘文化征服,赞成优雅的节制、程式化的舞蹈设计,这些行为者们以此来引导他们的社会交流。然而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这种在历史上被压抑的残酷的野蛮行为,有时已经爆发出如可怕的大屠杀这样的行为。

斗鸡实际上是无关紧要(鸡除外)之处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样一个白热化的激烈时刻,参与者可以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中某种核心却又被压抑的主题,如“死亡、男子气、愤怒、骄傲、损失、仁慈、机会”(Geertz,1973:443)。斗鸡就把这些存在的主题“整理为一种包容性的结构并以这种方式来展示它们。使得对其特殊的本质天性的思考得以释放”:

97

> 斗鸡通过在行为与目标方面的展示,使得日常普通的经验变得可理解。这些行为与目标已使得它们的实际结果被迁移,并且被降至(或升至,如果您更愿意这样说的话)纯粹表象的层面,在这里它们的意义能获得更有力的结合和更准确的理解。(Geertz,1973:443)

因此,斗鸡构成了一种“审美量子”(aesthetic quanta)(Geertz,1973:445),是生死关系的缩影,而这一关系被优雅的形式、仪礼和礼节的迷雾伪装在社会生活之中。斗鸡告诉我们存在暴力,它就在表层之下,它与等级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它借此也描绘了如果社会失去控制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Lek——巴厘语表示一个人失去其彬彬有礼的社会面具后的恐怖——获得了更深层的更不吉祥的意义。如果虚假的外表破裂,破坏性的暴力就会有如岩浆爆发般的威胁,危及行为者并最终危及社会自身。[48]斗鸡是仍在继续的高度戏剧化的故事和叙事,它向其参与者传达了其社会最深层的秘密。

综　合

我们已在上文提供了九种不同主旨的解释学,我们的出发点是解释学的“基本循环”,在本章一开始我们就对它作了重构:

1　历史编纂的来源批判
2　移情 Ⅰ(内部行为)
3　移情 Ⅱ[事件之间的插补(interpolation)]
4　对环境的存在主义理解

5 诗学(隐喻与/或叙事分析)
6 敞开文本
7 视域的融合
8 文本隐藏的基本问题的重构
9 存疑解释学

客观主义者与真势学派的两极分化很强烈。然而,这两种对立立场的代表人物,如赫希(Hirsch,1967)与帕尔默(Palmer,1969)在强调各自思想线索的重要性的同时,似乎暗示着两者应该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这意味着实际的解释学过程应该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以达到其全面性。让我们对这个思想观念作进一步的追索,我们发现客观主义与真势解释学都包含有各种各样的潜方向。通过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围绕研究问题,可以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涵盖了它。同样的方法也被运用于如现代诗[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之中,以使作品充满难以捉摸的想象的"实在"。这里运用的这一具体原理部分是受里克尔(Ricoeur,1984)不同层面的"模态(mimesis)"——创造性的重构——的启发。在讨论诗学的地位时,它与我们前面的表达在次序上有些不同。我们一开始关注的中心是作者/始作者(来源批判)。然后我们进而关注的是文本的行为者(移情Ⅰ与Ⅱ,以及存在主义的理解),再到文本自身及其结构(诗学)。然后,我们关注的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敞开文本、视域的融合、文本隐藏的基本问题、存疑解释学)。以存疑解释学结束这个循环,因为它又把注意力指向文本了的始作者。在上述结论的充实下,于是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解释圆环。见图3.4,此系列的次序是由刚提到的模态层次提供的。

博曼(Bohman,1991)指出,解释学方法有很多,不能将它们简化为某种单一的方法(例如,博曼提到视域的融合),它们都依赖于学术学科、研究问题、理论语境等。因此,某一特殊的解释学过程可以运用这所有九种方法,或者只用一种或结合数种。初等组合学告诉我们,这就产生了可供选择的512种不同的解释学类型。结合可以建立在互相协调互相支持的几种方法的基础上,或者相反可以建立在互相竞争的几种方法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形中各种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刺激了解释。本章图3.4提供了一个解释学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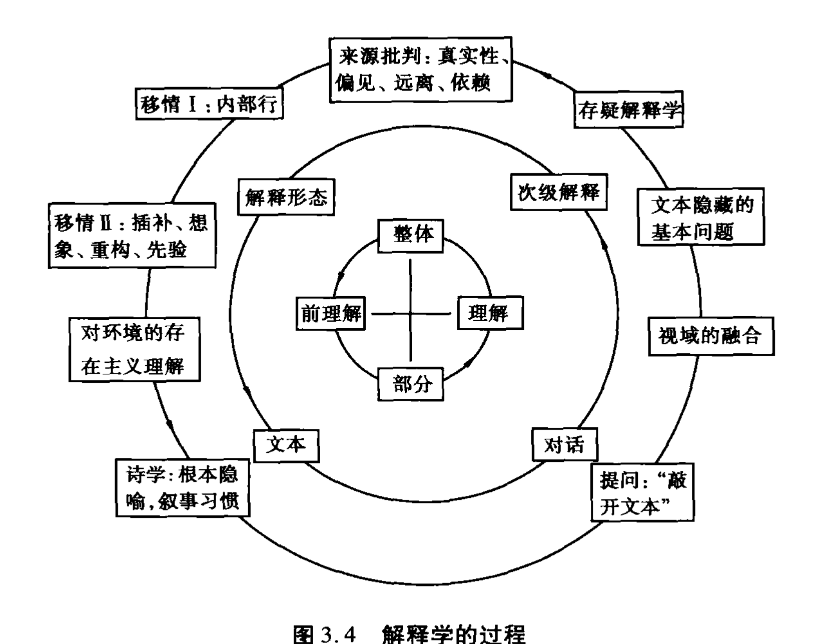


图 3.4　解释学的过程



过程的整体图景。最里面的那个循环是最基本的循环，其内在核心是在部分—整体与前理解—理解之间轮换。接下来一个重要的循环是中间那个，它是解释形态、文本、对话与次级解释之间的轮换。最后是最外层的循环，其领域是开放的，可以选择某一种方法，或者在两种乃至更多种方法之间作出丰富的（新的）组合。

评　论

最新的真势解释学常被看作是对基础思维批判的充分回应，实在论、客观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科学观念都受到这种批判。我们再也不拥有资料和理论的坚实基础，一切都被解释，于是解释学很自然就成了必经之路（Shusterman，1991）。然而问题是，是否真势解释学也不会被基础思维渗入，哪怕是在极轻微的——但也许又是更不可靠的——形式上。如果我们开始寻找这样一个基础，要找到也并不难。于是，加达默尔——这位海德格尔的学生、解释者和继承者，又一次回到了他的看法：解释学的绝对的前设，

使得对整体意义的清楚理解成为可能,而且有这样的整体(Olsson,1987)。至于这两个循环,"部分—整体"与"前理解—理解",尽管他谈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但加达默尔(Gadamer,1989a:293)似乎把后一个循环视为对前者的发展或彻底化,在前者那里,前理解将关涉被研究的整体。这种发展的胚芽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部分—整体循环,这一循环可以从主观的角度视为"对整体的直觉预期,以及随后在部分中的清晰化"。因此,研究者的前理解将指向整体,而整体又通过理解部分而获得更细致的发展。然而,我们可以批判地注意到这些循环并不一致:首先是因为理解不必是部分的问题,却能同样地关涉整体;其次,因为前理解也能适用于部分以及整体。不管怎样,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使得100 加达默尔得出结论,即解释的过程必须总是从下面这个概念开始来展开:

> "完整性前概念"。这也很明显是所有理解的形式条件。可以说只有真正构成一个意义的统一体时才是容易懂得的。因而当我们读一个文本时,我们总是假定它是完整的,只有当这个假定错了的时候——即这个文本是不易理解的——我们才开始质疑文本并努力去揭示如何补救它。

加达默尔(Gadamer,1989a:294)还是主张最重要的是"意义的内在统一性(an immanent unity of meaning)"、"统一的意义(unified meaning)",这构成了其解释学的基石。

但这不是回避问题实质吗? 加达默尔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同样的思路又再次出现在真势学派的其他拥护者那里。在对尼采的漂亮解释中,为了给每一个解释过程提供一个解释形态,海德格尔假定了这样一种统一的基础。他是在尼采未完成的著作《权力意志》(1901)中发现这一点的。关于这部著作,他声称其已经出版的著作——一般是片断的、非统一性的、相矛盾的——只提供了"前景"。问题只是在于《权力意志》有些部分是他的妹妹编辑的,何种程度的编辑不清楚。他妹妹是他死后的遗嘱执行者。也就是说,为了强调系统化的、总体统一的解释学主题,海德格尔被迫把重点放在来源可疑的未发表著作,并把已出版著作当作第二手材料。不过与此相反的做法才应该是更通常

意义上的做法。

让我们回到麦迪逊(Madison,1988:29),这位真势解释学的一名最近支持者。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他的十条解释学方法论原则中有两条是"全面性"与"穿透性"。这两条原则预设了文本是"一个'系统',即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从一个"核心问题"发散开来的。

客观主义学派那里也有同样的态度,我们只要想到贝提的第二条原则意义的连贯性(整体原则)就可以了。诚然,斯金纳(Skinner,1986a)批判在历史学家的政治理念那里发现了"连贯性的神话",但他还是没能避免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支持这同一个神话(Skinner,1986d)。问题是是否面向意义的统一性就排除了不协调的充满歧义等诸如此类的解释。斯金纳(Skinner,1986d)建议解释者从行为中的理性预设来进行解释,这就避免了从一开始就相互矛盾的可能性。赫希(Hirsch,1967:230)是另一个客观主义方法的支持者,他有如下回应:

> 我坚持认为言辞的意义总是显示了重要的确定的结构,但我并不是暗示着……文本必须没有歧义……就此而论,歧义、含糊与不确定性并不等同。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说言辞的意义是确定的不等于排除意义的复杂性,而只是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许多其他情形。若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那么一个含糊的或有歧义的文本正如一个逻辑命题一样具有确定性:它意味着它所意味的而非任何其他意味。

101

因此,含糊或歧义性能够渗入文本,以这种模式来考察,得出解释学从整体上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依然还有一种整体的意义,即一种模糊的意义。[49]与一种解释学立场相结合更困难之处在于解释本身中的转换点与间断处。例如,如果不能发现某种把不同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意义的话,就很难断定一个文本何时是含糊的和有歧义的,或者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片断。断定若干解释的有效性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据赫希(Hirsch,1967:230),这样一种视角和立场将犯两个错误:

一方面,它只是把互不包容的意义(视角)重点折中地并列在

一起。然而,如果视角是不相容的,这意味着必须作出选择,它们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 可以作为一个一般性法则断言的是,不管何时当一名读者遇到对类似的意义成分有各自强加了不同重点的两种解释时,至少其中之一必然是错误的。它们不可能达成一致。

与此相反,有人可能会以相互补充为理由,认为这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向性类似。另一方面,它可能受到反对,这只是非理性地把必须要揭示的矛盾装成好心去揭示,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不是试图去解决或穿透到矛盾背后的问题(Lerner,1991)。赫希自己触及了视相(aspect-seeing),还补充了并不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意见(在与上文关于歧义性与含糊性的引文同一段落之后):

> 这是对的,尽管有人认为一个文本可以展示变化着的重点,就像那些幻方图,初看好像是伸出来的然后又像是伸进去的。
>
> 对这样特征的文本(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只需要说它的重点是变化着的,因而不能作静止的解释。任何静止的解释都只会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变化的重点构成了视角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可能不止如此,还构成了视角主义立场的核心,那该如何?那就不可能只是去打扫背后的静止—流动的两极现象,相反,它是整个问题的一个综合的部分。赫希把这种变化的、流动的解释描述为明确的静止的解释之外的某种不重要的解释,上面引文中的“如果存在的话”就暗示了这一信息。另一方面,从解构的角度来看,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解释中意义之间的摇摆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再进一步视此文本自身为在矛盾意义中摆动,这取决于作者以及解释者(参见 Bohman,1991:第 3 章,论解释的不确定性之不可避免)。

102

与意义明确的预设相关联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许多论题中都存在。例如,一个就某一特定管理者而言的关于“领导”的陈述,可与从环境中产生的陈述相比较。如果这是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问题,那么关于这些行为的陈述更容易控制和比较;如果某人对问题更复杂的更广泛的形态(如类型、特征、价值、影响等)感

兴趣,那么其陈述就更难于控制和比较一些。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一套关于这种现象的陈述将显示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它有相重的以及相矛盾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仅在被谈论的管理者与其环境之间,也在不同个人的言说中。至少研究者不应该从一个先验的和谐的假定出发,而应该严肃对待矛盾及其变化的形式,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把它们强行放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去。(详见第 6 章关于话语分析的讨论。)然而,最终造成对可决定性、简单性和合理性的怀恋这一风险是很高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研究者规定被认为有效的关于概念的标准。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其风险就是这概念将成为民族中心主义式的。例如在特定的文化中,某些概念如"个体"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不能无视不可决定的情形的可能性。[50]顺便说一句,这仍然可能是"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

赫希的推理看来更有说服力,在同样一个文本中他认为视角主义无法使诸多相异的解释相关联起来,而可以说只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意义语境。[但是据艾尔维森(Alvesson,1996),会看到一个视角主义外衣下的全面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不同的解释被看作是互补的。]

另一方面,如果重点可以连在一起结合起来,于是根据赫希(Hirsch,1967:229),它们的综合才是正确的解释,而非单个的部分的视角,因为它们作为部分是非常错误的。视角的综合本身是正确的解释。于是问题产生了,即关于部分视角与它们的综合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解释学的精神来看,这种关系应该需要在(次级意义的)部分的视角与(占主要地位的)综合之间循环。于是我们回到了解释学的循环。

然而,这样从整体上狭隘地关注真理及其正确性似乎在这个语境中产生了奇怪的误导,如果我们还记得它恰恰也是一个解释问题的话。让我们用类比来强调这是方向上的偏离:没人会坚持认为莫扎特对某一小提琴奏鸣曲的具体解释是错误的(除非演奏者有可能走调)。这同样适用于演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或者与我们的方法论更贴近一点,也适用于艺术批评家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解释,或者文学评论家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释。另一方面,可能有人会认为某一个解释在特定方面比另一个解释要好。那 103

被证明是最好的解释将在解释的过程(顺便提一句,这个过程也在解释者自身那里展开)中出现。用麦迪逊(Madison,1988)的专门术语来讲,这是论证逻辑,而不是验证逻辑。运用这一类比,经验"事实"被作为支持社会科学中的某种解释的证据(之一)提出来,而不是作为与理论—实在之某一方相符被提出来的。

事实上,解释学把循环看成了它的基本隐喻绝非巧合(我们对解释学循环已很熟悉)。因为解释学从根本上存在一种循环性。这里的两种解释学循环是相一致的:客观主义解释学的部分—整体循环与真势解释学的前理解—理解循环。解释学预设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前理解,即在作品的各个部分里面有个基本的协调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每一单个的部分中表达自身:假定在意义统一的形式中有一个绝对的基础。于是,这个隐藏的基本的前提条件将在解释中来表达自身,或者在我们完成的某种分析中表达自身,这一分析是通过我们已经预设的循环路线……即协调的基本的整体来进行的。这样,这个作为解释学背后的根本隐喻的循环就出现了(在此情形中,谈论一种统一的基础看来是合理的)。[51]循环作为一个符号也总是被传统地视为对诸如完整性、统一性、协调性、整体性等性质的表达(Cooper,1978)。于是这个循环就以不同的方式处于客观主义和真势解释学的两个二级隐喻(部分—整体与前理解—理解)之间了。当然也可以像希克拉(Shklar,1986)那样问,循环的中心是什么?难道不是研究者、解释学家自身吗?然后,它对后者对真实性的宣称有什么看法?……

为什么不停止在循环中转圈,而以后现代的方式走出来(Ihde,1997)?这听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需要一些认真的思考。我们在第5章中将看到,那种非指涉性的文本间的符号的"自由互动(free play)"也不是没有异议的。如果解释学适合于对基本协调的文本的解释,那么后现代主义也会适合于将它处理为相矛盾的整体。

然而两者都错在把他们的视角整体化(totalizating),一个是普遍的协调,另一个是普遍的分裂。更加合理的则是考察手头的情形——协调或分裂——然后选择适应此情形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该向两种解释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更复杂的解释上的可能性

开放(Alvesson,1993a;Sköldberg,1994)。在解释学(两种方法都包括)和后现代主义里头有一个丰富的观念和灵感群供采用,一旦我们努力突破要么协调要么相异的僵局的话。前面提到的法国的“想象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有趣的选择,它结合了两个世界的因素。它把解释学通过解释进入某种基础这一旨趣与后现代主义对矛盾和分裂——这被认为以冲突概念的混沌“母体(matrix)”的形式处于社会现象的背后——的高度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偏好结合起来(Maffesoli,1993b)。从很不相同的出发点出发,卡普托(Caputo,1987:278-279)也力求达到一种解构的超越任何对协调的系恋和避免矛盾的更加“激进的解释学”: 104

>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引入一种激进的解释学,一种激进的解释姿态,它并不存在于对意义的发现中,而是存在于对意义的破坏、粉碎和建立中。那最终一劳永逸地固定了意义和真理的不是解释学,意义和真理的分散和对它们的焦虑所激发的才是解释学。可能只有在整体焦虑时,它才是刺激的令人震撼的(ébranler)解释学。那令人舒适的不是解释学,那作了最坏打算的、备受冷落的才是解释学(Caputo, 1987:278-279)。

注 释

[1] 我们在这里包括现象学(及其分支),它通常与解释学一道被当作一般的“解释”方法。这两者在思想史上也纠缠在一起,现象学的根据特别出现在早期海德格尔那里,这在下文会明确化。

[2] 下面对解释学的发展的阐述主要基于加达默尔(Gadamer,1989b)。这一部分以及下一部分文本进一步以蒙松与舍尔德贝里(Månsson and Sköldberg,1983)为基础。

[3] 批判理论有时也可以包含在“解释学”名下。而在本书中,我们专为它留了一章,讨论其与客观主义以及真势解释学都不相同的根本特征。

[4] 德国古典观念论(没有“新”这一前缀)统治了 18 世纪末期和 19 世纪前半叶,康德与黑格尔是其杰出人物。黑格尔死后,观念论随即迅速崩溃,继之而起的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受自然科学鼓舞的物质主义方法。“新观念论”这一术语指的是在新的基础上对观念论立场的回归。

[5] 实证主义在 19 世纪早期就已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来,并

直到这一世纪的末期发展得十分强大。其基本观点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已被证明非常成功,可以到处适用。逻辑实证主义(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达到鼎盛。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发展了形式逻辑方法。而且,它与(英国)经验论的联系比在早期实证主义那里更显著。

[6] 霍利斯(Hollis)又结合了另一个两分,即整体论与个体论的两分,于是产生了两两成对的比较表,对此他在书中作了分析:系统、行为者、游戏、演员。

[7] 这最后一种与下一章的目标相关,即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有时被称为批判解释学,这并非是巧合(参上注3)。海德格尔注入解释学的新方向通常被称为是"本体论的"。然而,这并非如同我们有时所想的那样,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从"本体论的"挑出"存在主义的"来那样容易(见下注26)。"真势的"是比任何这些术语具有更广泛意义的术语。

105

[8] 关于解释研究中的验证问题的讨论(例如参看克沃勒 Kvale,1989)。

[9] 对隐喻的选择尤其有意思:我们把它提供给后现代的女权主义,作为解构解释学的一条线索。

[10] 赫希(Hirsch,1967)认为,与自然科学中所谓的关键性的伪造实验相比较,推翻解释形态的反例在解释学过程中并未出现。我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倾向于质疑这一论断:反例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即支持或推翻令人兴奋的理论!然而,反例显然常常激起对形态的修订与进一步的苦心经营,而不是导致废弃它。如库恩(Kuhn,1970)与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5)所指出的,这也适用于自然科学中的异常现象等。

[11] 前理解—理解循环被视为整体—部分循环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不少见(例如参看 Gadamer,1989b)。前理解就被认为是对于某一特殊问题作新的部分理解的总体上的意义语境。这对于真势循环的产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若将历史问题放置一旁,这两个循环看上去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稍加反思即表明我们应该同样对最抽象的、总体的经验拥有部分的前理解。

[12] 也见赫希(Hirsch,1967),他受了贝提的启发。

[13] 同样的问题也在话语分析中谈到了(见第6章)。

[14] "文献批判"一语(例如参看 Le Goff,1992)与我们所谓的"来源批判"相比,似乎太狭隘。历史编纂研究运用的不仅仅是文献,还有从过去留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非文献资料(这在下文详述)。

[15] 应该强调我们下面所讨论的一个具体而基本的历史编纂方法:来源批判及其补充,移情。我们没有进入历史编纂方法的其他残留,比如年鉴学派或者心智史。为此,我们参考了一些研究这一主题的相关论文与专著(其中有 Carrard,1992;Tuchman,1994)。

[16]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会提出异议,认为线索并非任何"实在"的线索,而仅仅是其他线索的一条线索,而这其他线索自身又仅仅是另外一些其他线索的一条线索……,以至无穷。如果要提出反驳,来源批判者可以参考如黑格尔对那些敬畏"坏无限(bad infinity)"或无限倒退者的讽刺性的评论("好无限"构成了无限系列的综合准则。在这一情形中,它应该与作为自发线索之累积的实在相符合)。

[17] 这已经使得历史写作有了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所喜爱的目标,后现代主义者把任何形式的实在论都斥为错误,反映了虚妄的主体—客体问题。这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关,据此,任何历史学家都只是根据他(她)的文化偏见来写作的。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偏见的批判主义必然有某些目的,我们就必须注意后现代主义者们总体进入"只有(nothing but)"宣称,有引火烧身的危险。因为如果任何事情都只是当前文化、社会结构的产物,那么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是这样的,而且没有把实在论标为错误、而把后现代主义标为唯一真理这样的偏见。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很久,历史学家就已经意识到对解释者(历史学家自身包含其中)的文化偏见的影响。

[18] 如果以叙述性来源(有时)包含比遗存更多的信息来反驳这一点将是可笑的。这就像以宣称美国制造了比日本更多(或更大)的汽车,来反对日本制造的汽车比美国好这个看法一样。

106

[19] 据瑞典电视探索节目《脱衣舞娘》,1994 年 10 月 5 日。

[20] 前苏联秘密警察已有报告称心肌梗塞是依法处决的一个通常的委婉语,有些人为了避免日后在新的权力关系下的报复,就沿用了这一说法。

[21] 我们说过我们不会在这里进入技术性问题的。但有一事可以是个例外。修正主义者声称毒气室实际上是受害者的游泳池,这个看法是荒谬而应予以排除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太令人厌恶的话。修正主义者并不否定集中营存在的事实,而只是反对说它们是歼灭营。很难获知集中营允许囚犯从事任何娱乐活动。相反,饥饿、刑讯和杀戮是这图景中恒定的主题。

[22] 大卫·欧文是历史"修正主义者"的一名领军人物,他号称精通来源批判,并以此为武器来反对其论敌。最起码我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例如,他在 1983 年国际修正主义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希特勒在一次反对犹太人的讲演中用到的德语 Ausrottung(灭绝)一词,其意思是与现在的使用不同的某种其他意思。为什么?因为希特勒也曾用这个词来表示,如果俄罗斯人或捷克人没有向德国投降,而德国人被他们征服,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德国人身上。这是非常荒谬的,为什么他在两种情况下的用词不能是同一个意思?

因此,我们开始获得一种不同的图景。希特勒是在什么时候谈论"灭绝"犹太人的?对此我进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因为这是历史学家们反对我攻击他们的看法的唯一证据。他们认为希特勒所谈论的是他将要实行的事。答案是他根本没有那样说,他的说法很不相同:他说的是犹太人的影响即将结束了。(Irving,1984)

于是,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灭绝"的意思只是含糊的"结束其影响"。这一点不用争辩,有纯粹的证据留给我们作判断。当然,完全的十足的大屠杀行动是它没有准备证明文件的理由,而如欧文所提到的安乐死计划其情形就不同。大家都知道,安乐死计划曾激起德国人强烈的情绪。纳粹从这里受到启发。他们在施行计划无比巨大的新行动时,不得不保密并把地点放在国外。

最后,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敢于不征得他的同意,甚至在欧文所允许的程度上就开展暴行(欧文所提供的暴行大概是传统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四分之一),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23] 同样强大的证据来自相关事态的发展,比如纳粹为大屠杀所作的初步"演习":杀戮精神病人;在俄罗斯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大肆谋杀犹太人;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的毒气攻击。

[24] 为了阐明科林伍德的观点,首先我们在这里假定意识形态研究的目的是要引出文本作者的思想观念。当然也有可能在来源批判的语境中,来研究这类文本中的思想观念,而不管原作者的意图何在。于是,来源批判可以与下面第4~7章所讨论的其他方法相结合。其次,其所出现的意义也许正是含糊矛盾的而非清晰明确的。

[25] 因此,有影响的法国新史学实际上已经逐步转向了叙事而远离了量化模式。在这里它否认了自己最初的原理,因为它是从年鉴学派脱胎而来,在年鉴学派的理念中有对叙事传统——19世纪面向事件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强烈拒绝。

[26] 海德格尔与萨特是两个最著名的存在主义解释学家,萨特接受了"存在主义者"一名,而海德格尔则明确地反对此名。在本书中我们称他们都是"存在主义解释学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里克尔(Ricoeur,1981)认为萨特及其他存在主义者误解了海德格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卡普托(Caputo,1987)认为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受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的启发并与之接近,而并非如海德格尔主义者(包括海德格尔本人)通常所承认的那样。详见卡普托对此问题的论述。

107

[27] 与艺术批评相比较,另一种解释是从精神心理方面作出的,它总是想要把蒙

克的艺术还原为神经官能症的一种症状。

[28] "Unheimlich"是特异的不可翻译的语源上的双关语——我们感觉不在家。

[29] 举一个海德格尔自己用过的例子:当俄狄浦斯王(King Oedipus)认识到关于他自己的真相时——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并与自己的母亲乱伦——这不是语言学上的命题与实在的相符问题,而首先是一种揭示,一种与错觉的决裂。当然,假如俄狄浦斯愿意的话,他本来应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已经做了 A 和 B"),并且作一个实证主义的验证来检查这命题是否与实在相符。然而我们知道他选择的是挖掉自己的双眼。

[30] 把人类实践和自我理解当作解释学的核心,也在盎格鲁撒克逊解释学家如泰勒(1985a;1985b;1991)那里获得了特别的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泰勒把自己称为"后海德格尔主义者"。

[31] 关于加达默尔思想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参见阿加(Agar,1986)。

[32] 晚期海德格尔没有用"解释学"一词表达他的思想。然而,根据卡普托(Caputo,1987)的看法,他可以被视为一个激进的解释学家(与《存在与时间》时期相比)。

[33] 这一思路可能作进一步的发挥,最终变成危险的封闭的自恋。在里克尔那里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解释的要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身。这忽视了对于未知者自身理由的关注。解释当然导致了视域的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好的自我理解必然是解释学的要点。

[34] 根据卡普托(Caputo,1987),这暗示着加达默尔与晚期海德格尔之间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前者以其"视域的融合"而成为更加谨慎而传统的激进主义,而后者的解释学则是更加激进的。

[35] 例如,通过对诗的分析,海德格尔在所有居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中发现了四种基本的实体,就像是一个坐标:地、天、神与人(关于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讨论,见 Sköldberg,1998)。这可以看作是他构造存在的最后的努力,也是他晚期的一种非常基本的思想[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 White(1978),遗憾的是他只是重复和释义而不是解释海德格尔这一饱含情感而又神秘的思想]。

[36] 这里加达默尔(Gadamer,1989b)与海德格尔有不同的出发点,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晚期走错了方向。

[37] 意思是指"文学领域"。"诗性"意味着对文学的研究,而不能与"诗歌"混淆了,"诗歌"是诗学的研究对象。

[38] 我们在上文知道,晚期海德格尔与加达默尔已经通过对文本解释的兴趣走上了这条路。

[39] 海德格尔关于世界是屏障,"存在"在这道屏障上在理解的原初情形中反思

自身这一观点，并非必定不会受到挑战。直接的反对——确非柏拉图式的——观点，见克里希纳穆提（Krishnamurti，1954），根据他的看法，对存在的理解与对自由的理解一样，不可能在"时间之网"中，而只能在永恒的现在对前理解作一个根本的分解，前理解总是被经验时间（即记忆）和预期创造的。

[40] 如果我们相信普里果金和斯滕格（Prigogine and Stengers，1993），叙事时间的适用范围并不仅仅限于人文科学。从思考自然科学自身（普里果金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的坚实基础出发，他们对上文提出了同一层面上的类似的批评，以反对这一思路。因为这误导了对时间概念的抽象。根据他们的观点，具体的时间，对他们而言正是"叙事"时间，有意义的加在一起的事件的情节时间，必须放在显著位置，甚至在现代物理学中也应如此。叙事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着的过程。他们认为，物理学中时间概念的可逆转性使得这个概念不真实（因为它处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质之中）和抽象化。带着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伴随着表面的成功，科学已经为此纠缠奋斗很久了。因而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在这个方向上改造其时间观念才能获得解决。

108

[41] 麦迪逊（Madison，1988：99-100）指出，关于时间性，后结构主义者们如德里达的观点与解释学家们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时间性是一种"自由互动"而不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同意麦迪逊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忽视了叙事的时间功能。尽管"宏大叙事"被拒绝，但局部故事在后结构主义那里还是有其地位的。我们也不同意讲述故事是解释学的必然目的。解释学的解释并无必要对故事预设一个要达到的目标。

[42] 这部分内容我们根据的是里克尔（Ricoeur，1974）。

[43] 作为文本解释的精神分析也暗示了把无意识语言置于中心地位：这正如布思比（Boothby，1993）以其精神分析的观点综合海德格尔与拉康。在这里，语言学上的隐喻代替叙事成了中心。例如幻觉可以被看作含糊的语言表达的图证。因此，在晚上一个无法入眠者在梦里看到一个"升起来的"太阳，表示集中于自身许多"升起"的意义，在这时候对于病人有紧迫的决定性意义。布思比认为这与晚期海德格尔面向语言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受到布思比批评的博斯的存在分析从早期海德格尔的视角提供了精神分析。博斯主要把太阳幻象解释为一种存在经验。

[44] 这一概念借自牛津哲学家吉伯特·赖尔。

[45] 关于文化作为文本，亦见菲利普斯与布朗（Phillips and Brown，1993）。

[46] 更广泛的讨论，见本章最后一个部分。

[47] 除了已经谈到的里克尔的著作外，也可以参考帕尔默（Palmer，1969：24）：

"解释学的经验应该由文本来引导。"

[48] 格尔茨暗示,类似的解释可以用在日本文化上,日本文化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与赤裸裸的暴力倾向——著名的菊花与刀——之间有着奇怪的分裂。

[49] 贝提(Betti,1980:79-80)比加达默尔更同情这种不协调,他批评了加达默尔的"完美的前概念",根据这个"完美的前概念","只有构成了完美的意义统一体才是可能被理解的"。

[50] 非常有趣的是,甚至真势学派也有关于"不可决定性"的困难。例如麦迪逊(Madison,1988:115)想以"不可穷尽性"来代替这个概念,他发现这个概念是解构性的、否定性的,并且见证了对一切事务的自大。

[51] 在此语境中,注意到下面这一点并非无意义,即海德格尔屡次重复其思想的一个特性是继承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而来的他的核心概念——存在,严格说来这就是它的循环(从它自我封闭、自我指涉的意义上看)形式。 109

第4章 批判理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维度

Critical Theory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mension

关于"批判理论"我们指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传统，它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相关联的方向与作者。[1]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是那些直接或间接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德国（或生于德国）社会科学家，如哈贝马斯、马库斯、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弗罗姆、阿佩尔、奥佛。其他受法兰克福学派启发的学者有笛茨（Deetz, 1992）、费伊（Fay, 1987）、福里斯特（Forester, 1993）、拉希（Lasch, 1978）、莱斯（Leiss, 1978）以及关联不太强的森尼特（Sennett, 1977; 1980）、齐厄和施图本劳赫（Ziehe and Stubenrauch, 1982）。（要大体了解这些不同程度地受哈贝马斯和批判理论影响的杰出作者，亦见 Bernstein, 1985，以及 Thompson and Held, 1982）

批判理论的特点即它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它还对批判讨论实际的社会实在有着明显的兴趣。它有时更像是批判的解释学。其指导原则是知识中的解放的兴趣（emancipatory interest）。社会科学的目标就是服务于这一解放规划，而不是提供任何程式化的结论，不是从严格的指称结构来作批判的解释。批判理论的工作是"开放的、可误的（fallibilistic），它与充满着西方思想的知识墓地的整体化理论的'系统'很不相同"（Morrow, 1994: 267）。批判理论不断地坚持主张关于社会的辩证观点，宣称社会现象必须总是从它们的历史语境来看。实现了的形态必须从否定方面来理解，以它们自己的对立面以及可能存在的性质不同的社会条件为基础。

实际社会条件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假设是以许多经验式的研究甚至解释学为基础的，其提出是为了反对下面这个观

念:社会条件是历史创造的并受到了权力和特殊利益不对称的深深影响,并且可以使它作为根本变化的主题。首先提到的假设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是合理的。批判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区分什么是社会的心理上的不变量,什么是社会上可变的或可以使之变化的,并把精力集中在后者。因此,对规律性或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

110

批判理论导向的是一种非常杰出的理论或元理论方法,而且它的抽象层次通常在于对问题、概念以及代表着经验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包括了由其自身的经验材料——即含有第一手经验或运用了人们对特殊现象的叙述——构成的研究工作)的解释的某种排除上。甚至可以说批判理论的洞见并没有使它们自己在经验研究中易于运用。读者因此可能质疑它与我们这样一本面向质性经验研究的书的相关性。跟解释学一样,从对批判理论核心原则的阅读,很难拾捡到任何关于如何引导有意义的经验工作的线索。[2]

有的作家雄心勃勃地要在这最后一点上作些有益的贡献,跟他们一样,我们也自愿承担了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希望把对批判理论的元理解与更具体领域的经验研究联系起来,并表示出前者的要素是如何在质性方法上留下印记的。这是一个缩小产生知识的两种模式之间的距离的问题。批判理论可以抵消经验研究的天生倾向,并提供关于存在者的看似中性的描述,并再现被视为当然的制度化的主宰关系。回溯到 1930 年代初,这种方法代表了实证主义批判的很长一段历史,并对社会以及意识形态、意识结构的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连串的理论考察。批判理论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我们对社会现象的政治本质的自觉,并发展批判地反思那些被视为当然之实在的研究能力,他们考察这些实在,同时作为社会成员也是它的一个必然的部分。

我们将在本章描述批判理论及其发展以及它的某些特殊论题,我们也将讨论批判方法的隐含意义并提出以某些方法来引导有意义的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坚持对现存的社会形式采取一种批判和独立的态度并抵消它们的僵化。批判理论为如何在经验研究和文本产生中使社会研究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维度得到反思和认识,提供了指导方针。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起源与早期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1920年代末期,是一个专门的独立研究机构,从属于法兰克福大学。1930年代的关键人物是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库斯、本杰明和弗罗姆。来自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经济学和美学等领域的知识在这里结合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科学研究环境。他们反对传统的关于科学的观点,批判实证主义,目的是发展有哲学根据和实际政治意义的社会理论,而不与任何特殊的政党或其他名流结盟。霍克海默尔及其同事把独立的、批判的和忠于社会、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带到了中性的、不带偏见的研究者面前,这些研究者通过遵循既定的方法论规则来获得有条件的和可测因果关系的知识。

111

这个学派的成员不是去发展那些社会关系和过程中普遍的不变规律和固定形态的观念,而是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要澄清这样一个关系,即既定的经验的社会条件与它们在其中发展、再造并随时变化的历史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其观念是:社会现象应该被理解为辩证的社会发展中的可变因素。研究者要在这方面作出贡献,或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这样做。关于社会的陈述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他们更加倾向于巩固或挑战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并建立思想模式。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科学应该努力发展出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立场来面对这些制度和思想模式,而且应该注意妨碍社会功能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其内在固有的限制和不合理而应该作为研究的重要主题。

最早在作研究计划时,规划的是一种以社会哲学和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纲要。其基础观念是"超越个体的目的性、自发性、合理性与社会由以建立的那些工作过程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消除它们之间的对立"(Horkheimer,1976:220)。

其灵感的重要来源是马克思、韦伯、康德、黑格尔和弗洛伊德。显然这个学派也受到了当时的德国政治环境和苏联专制的

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强大影响。它开创了许多关于家庭的或个人的专制主义的研究。其基础观念是经济和其他"客观"条件,如资本主义危机、阶级冲突等,为理解提供了参照系,不过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对于如此多的人都在准备着采取的明显非理性的观念和行为形态的理解,要求有相当的心理学深度。这种方法的重要成果有阿多诺等人(Adorno et al.,1950)的专制人格研究和弗罗姆(Fromm,1941)的专著《逃离自由》。此外,关于前者有人声称对专制的偏好——倾向于根据不同地位对个人进行分类,颂扬上等人而贬低那些被看作低等人的人(如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必须从专制主义的培养来理解。一般来说,专制主义的培养回过头来又与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其他普遍的专制主义倾向相关联。这些又反过来受到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专制主义关系的支持与再造。弗罗姆强调人们使自己从属于专制主义关系和意识形态中的欲望是避免产生自由与独立之渴望的机制。 112

文化悲观主义与对合理性的批评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早成员移居美国。从那以后这个学派就不太是一种特别的知识环境,而更多的是一种通常的知识取向。在现在盛行起来的不太有利的工作条件下,由于对具有批判导向的知识应该发挥进步作用这一理念的悲观,最早的研究计划也至少被部分地抛弃了,尤其是引导经验研究这一雄心。在这个学派存在十年之后,这种经验研究不再是批判理论的明显组成部分。

与高度商业化的美国文化相遇,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的《启蒙辩证法》(1979)和马库斯的《单向度的人》(1964)这样的经典著作中留下了印记。这里分析的焦点集中在,由大众传媒和效果营销所支持的大众社会达到需求、欲望、希望的标准化以及获得对反应的控制能力上。深远的社会控制造就了一种社会,它使个体变成了适应性很强的可预知的消费者,使他们依赖于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不断增长的大量商品和服务。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马库斯认为这种社会控制是对思想自由和独立见解的威胁,其影响与早已成为他们开火攻击的目标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样巨大,尽管不是同样野蛮。基于科技知识控制自然的能力和不受个人情

感影响的客观的计算推理的发展，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批判了启蒙的理想性。他们宣称，这种理念使得理性形式把工具思维推进得更远，以致产生了它自己的对立面（非理性），也把社会转变成了理性的对象，手段取向的行为，允许工业化的大屠杀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对象化与流线型化（streamlining）。因此技术理性的占支配地位最终意味着任何事物都要受到计算和预知，人类、自然与生产都变成了操纵的对象，都对无限制的控制和调整很敏感。

> 如影片A与B之间的显著区别，或者不同价位的杂志里的故事之间的显著区别，与其说是取决于主题，不如说是取决于对消费者的分类、组织与标签。有的是提供给所有人的以至于无人能逃。区分被强调和扩展。公众被提供了分等级的不同质量的大量产品，于是完全量化的规则发展出来了。每一个人都必须根据他先前被限定的和编入索引的层次来行为（仿佛是自发地），并选择为他这类型的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中的那一类（Adorno and Horkheimer，1979：123）。

113

这些著作充满了文化悲观主义。根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的观点，社会发展及其启蒙理想被如纳粹主义等专制主义和无心智的（mindless）社会形式，或者营销、集团领导、教育、大众传媒中的社会技术的胜利建基于其上的那种理性控制毁坏了。后者使个体变成了无批判的消极的对象，很好地适应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的逻辑，从审美到政治，这种逻辑遍及社会一切领域。政治学变成了营销与管理的场所，而不是一种促使反思性的政治—伦理争论不断形成的环境。

批判理论的批判建设性变种

尽管文化悲观主义遍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思想中，但还是有一些保留了基本批判风格的变种的确包含着明确的建设性和“积极的”因素。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或其他领域中）有一种简单的批判性—建设性的二分。以从压抑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为目标的批判研究也可以作出建设性的贡献。除了哈贝马斯（见下一个节）之外，马库斯和弗罗姆的某些著作也进

入了带有某种乐观主义倾向的批判著作的范畴。

1968 年学生运动期间和此后的马库斯著作中有一种新的希望,即社会力量可以被鼓动起来质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逻辑,而且人们可以做他们自己的设计师而不是这种逻辑的牺牲者(参见 Marcuse,1969)。在经过几乎没有对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年发展后,引人注目的不满、质疑和新鲜思考的现象出现了。尽管标准化、想象力的缺乏以及消费主义至上的趋向依然占支配地位,但边缘群体并未遭受这些跟以前程度相同的恶性影响,他们抵抗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反对力量。替代运动(alternative movements)的学生与成员曾被视为真正的"反抗",其成员仍然还被视为这样一种"反抗"力量。与工人阶级和贸易联盟相比,他们较少被划入较高薪水与消费最大化的逻辑中。今天的主要反抗力量是女权主义者与环保主义者。

弗罗姆走上了一条与阿多诺、霍克海默尔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马库斯不同的道路。跟马库斯相似,他决定待在美国,甚至在纳粹失败之后还待在美国。1940 年代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决裂,部分是由于其他成员有深层的文化悲观主义,而且他们尤其是马库斯更强调精神分析中的人类本能。弗罗姆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德国批判理论与人文主义的美国自我心理学的综合。像其他人一样,他抨击了社会与现代人的受社会条件制约的病理学,他的这类著作如《健全的社会》(1955)和《占有还是生存?》(1976)。而马库斯从弗洛伊德的文化批判著作出发得出结论,人的性本能是文明的对立面,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不是经常的)。弗罗姆相信人有对付和驱使他的冲动的能力。此外,他宣称人自身内部有不同的潜能和向度,例如面对存在的吸引力或者强调拥有的意志——占有和控制。社会的发展加强了后者,弗罗姆认为这反映在现代语言习惯中,常常暗指的是人占有什么而不是他们是什么。因此所有权观念透露了我们的意识和我们的行为。这不是简单地对某一特定社会的无处不在的力量的反思,它同样是对不同基础向度之间的存在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充满了人的整个存在。但是我们所讨论的这种选择是受刻画了个体之特征的社会经济语境的巨大影响的。弗罗姆的社会批评更易于寻求妥协,更加人文主义以及更加向希望

114

开放。更正统的批判理论家,如马库斯,宣称批判已变得无力,弗罗姆已经阉割了精神分析对文明的批判,精神分析提出了关于建筑社会的整个过程的远令人惊恐的问题,并强调了文明与人的本性之间根本上的辩证矛盾。

哈贝马斯

第三种更加乐观的批判理论变种是由哈贝马斯提出来的。哈贝马斯是 1950 年代期间阿多诺的助手,他一般被认为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思潮。今天他是批判理论的主要人物,因此我们将给予他比此传统中的其他人更多的篇幅。

技术统治论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与他的前辈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妥协的——或用其对手的话说是"不分好歹的"——批判相比较,哈贝马斯采取了更为平衡的立场。他与其他人一样认为理性的狭隘的工具主义方法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遍布现代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的是手段的最优化和有效的目标向度行为系统的优化,其目标是解决狭义的问题并产生资源,而不管更广的政治或"意义"语境。哈贝马斯宣称,由关于科学的狭隘实证主义观点支持的专门知识和社会工程学,已经被交付用来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而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争论与反思却不太受人关注。人们采取独立的政治或伦理立场的能力已经被逐渐削弱了。技术、科学和管理已日渐占主导地位,而政治学也变得更加是管理社会机构的问题。这样,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政治条件与决断于是被隐藏在技术统治意识形态之下,因此问题的构想与解决的建议是与狭隘的手段—目的(means-end)逻辑最相适应的(Habermas,1971a)。

115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一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是他所谓的系统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系统"指的是已从人的直接文化语境中分离出来的那些社会因素,而它遵循一种更客观化的逻辑。这里的关键控制手段是金钱与权力(Habermas,1984)。后者是指法

律确认的那种权力。[其他对于更世故也更是包含一切的权力的看法现在很普遍。例如参看克莱格(Clegg,1989),对此的讨论见第6章论福柯]此系统在经济、管理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中都占支配地位。生活世界是从现象学(见第2章)借用来的一个概念,代表那些意义语境,人们通过文化视域来寻求对他们的形势和环境作出解释和理解。生活世界暗示了具体经验的范围(总是被解释了的),即都是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控制与协调的重要媒介是价值、规范和语言。

谈到系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Habermas,1984)认为这个"系统"已有巨大的扩展。金钱作为一种媒介控制着人的成长。系统不断的合理化有着使我们的意义语境以及社会化贫乏的危险。人的成长的特征在于它的那些含有分裂因素的客观力量和影响,就像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面对专家,从如何消费到如何养育孩子乃至如何达到性高潮——所有这一切对社会化和人格的形成都有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参见 Lasch,1978;1985)。哈贝马斯声称,大多数承载着现代社会之幸福与富足的心理和社会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它的一种结果。

在全面批判现代社会的同时,哈贝马斯强调社会更加发展进步的可能性也还是能够辨明的。在许多观点中,他支持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启蒙理念不太有积极意义的变种的批判,但他相信这些都不必必然地占主导地位。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一个事实,即在社会发展中那些最进步的社会,也已经越过了专制主义社会关系、宗教教义以及其他障碍,这些障碍阻止了讨论和事实的、理性的证明。大体上防止了所有生存斗争的政治民主、更多的教育和 116 信息以及这类经济发展,已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所谓的现代意识。这又反过来使人们更加善于接受由语言和交往所提供的这样的机会:考验已经建立起来的观念并且理解或摧毁对文化上已经建立起来的观念和理解造成阻碍的那些障碍物。我们有可能质疑以传统和专制制度为中介的观念和规范。这里有关于我们的存在的更广泛的"合理化"的可能。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只是简单地使自己被传统观念和价值控制,我们也可以审查和质疑它们,从而走出来以达到更合理的看法。于是哈贝马斯设想了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经济,另一个是政治—伦

理,他把两者都看作是向"合理化"开放的。

系统的合理化以及经济、管理、法律和社会工程控制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的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都能被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平衡。这意味着从基础而来的意义语境、解释形态、创造规范以及社会互动等,其特点越来越是反思和批判式质疑。哈贝马斯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交往行为和能力(Habermas,1984;1990)。

哈贝马斯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他简单地折中了两种不相容的方法:系统的方法与生活世界的方法。他对这个批评作的主要辩护(Habermas,1986)是进一步界定他的概念,然后替换论敌的反对意见而不与它们作正面冲突。对其批评的实质他依然大体上没有作答。另一个反对意见是针对他的"系统"这一理论提出来的,从现在的社会科学视角来看,这一理论有点古怪,至少从哈贝马斯的运用来看是这样的。他很难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怀恋干净无污点的合理性,这种怀恋在他的系统分析和交往概念中都有表达,对此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在哈贝马斯的术语用法中是某种相互的意思。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或消息的传递都包含在其中。交往行为包含有达到互相理解和同意的对话能力。哈贝马斯是从语言所提供的机会开始的。这里他受到了加达默尔解释学的很大影响。加达默尔强调个体之间在会面中达成理解的可能性,这要通过融合他们最初的但也是灵活的"视域",向上达到一种更高的一般性,不但要克服某人自己的特性也要克服其他人的特性(Gadamer,1989a)。然而,哈贝马斯反对加达默尔关于促成这种融合有文化传统关联上的共识的观点。相反,他假定了一种(深度)批判的解释学来反对调和的解释学。他的批判解释学考虑了传统和解释中的强迫与曲解。为了处理这种曲解,获得对话环境,解释有必要有一个基本原理,例如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关于对话环境,加达默尔认为是的确存在的,而哈贝马斯却认为它只是一种潜在状态,一种被实现的可能性(Habermas,1971b)。在他看来,所有陈述和意义原则上都有带着意识形态的烙印的嫌疑,即表达权力的意志并暗示社会理解上的禁区这样的痕迹。

117

哈贝马斯假定,在正常环境下,内在要求每一个陈述中的预期和宣称都要是可理解的、可信的(真实的)、合情合理的(与流行的价值系统相符)和真诚的。如果这些条件的存在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正常情形下的交往将是无意义的。(也有例外,比如幽默语言、文学和诗歌,但这些通常不是交往行为所关注的,所以这里没有考虑它们)除非对于真理、真诚、社会可接受的规范以及可理解性的努力能够控制谎言、曲解、对社会不可接受的规范的表达以及不可理解的陈述,否则任何讨论都没意义。语言的使用正是以前面这套成分能占支配地位的本质可能性为基础的。如果后面这套因素被质疑,那么会话的参与者将倾向于终止会话或至少质疑这种情形下的任何陈述。

可理解的、真实的、合情合理的以及真诚的陈述将支配一场对话,这不是必然自动实现的,当然有可能这样一些因素全部被忽略。然而在对话中,批判地检验言说行为(speech acts)并达到关于何为可理解、真实、道德善以及诚实的共识有着根本的可能性。这里存在另一种比工具理性更广泛和更基本的理性之基础。工具理性通常占支配地位,它与实证科学、社会工程以及把政治学简化为技术和管理是相符的。

这里的关键点是未被曲解的交往的可能性,它是"最高"(或者最好说是最广泛的、最具反思性的)形式的理性——交往理性的基础。这里不是权力、地位、声威、意识形态、操纵、专家规则、恐惧、不安全感、误解或任何其他令人不快的构成了显在观念和理解之基础的那些实践。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这样的:对善对有事实根据的论证的强调。在交往理性的语境中,我们不再听从神父,因为他已经垄断了解释上帝的话的权力;我们也不再听从公爵,因为他已经继承了他的头衔和其他特权。我们也不会不先思考其有效性而屈从于专家的意见,或者为了得到政治或伦理的立场而盲目地遵循科学与技术。我们研究各种各样的必要的真实性,并要求作所谓的合理性论证(或者依赖被认为基于理性的习以为常的约定)。宣称以理性为基础的论证,原则上是可以被研究和讨论的,只要对某一特定的观点之为正确的(或至少是可接受的)观点达成共识,根据某种深思熟虑的要求和偏好,它们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适当的。

118

交往理性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内涵最终是基于在辩谈中以不受限制的、统一的、能带来共识的力量为中心的经验，在这样的谈话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他们纯粹的主观看法，并由于双方在理性上相互有根据的信任而确保双方在客观世界和他们主体间的生活世界的统一（Habermas，1984：10）。

于是交往理性指出了对各种陈述之有效性宣称的回应方式（会话中的质疑、试探与可能的接受）。因此高层次的交往理性意味着认识是基于可理解的陈述的，这些陈述反映了诚实与真诚，是真实的或正确的（如果是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它们与通常规则是相符的。在以语言为基础的互动中，根本的假定是陈述者应该能够激发并遵守内在有效性的宣称，或者能够修正已表达的观点。重要的是上述四个因素在自由对话中是可以面对审查的。这意味着要结束或继续一场互动，比如实践—工具式的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互动，有着根本的和同样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接受各种陈述、对它们作批判审查，就可以达到共同的理解。非常重要的还有个体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他们的反思能力。交往行为于是构成了社会中以及社会制度中、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的潜在的重要方面。会话促进了交往理性又充满着交往理性，如果要出现会话的理想情形的话，“就必须对所有可能的参与者而言，在机会选择和言说行为上有对称性的分配”（Habermas，引自Thompson，1982：123）。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每位参加讨论的人所表达的观点将同等重要。因为许多因素如知识、经验、智慧以及所提出的论证的分量（因而是有条件的）等的作用，参加谈话的人产生影响的机会将会不同。然而，具体的有效宣称的基础应该总是向质疑开放的。某种知识、经验宣称的地位或者另一种权威的基础是必须要有交往的根据的。这样，专家陈述的范围、相关性与可靠性可以被确定，而且可以描述它们合理性的分量。因而，对合乎情理的不对称性的澄清是好的交往的一个目标（潜在目标）。

119

未被曲解的交往的对立面是被系统曲解的交往。这里的各种条件将阻碍自由创造的共识的实现。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控制等渗入了交往过程之中，从而使得我们很难或不可能对陈述进行

质疑或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可理解的、真诚的、正确的与合情合理的交往。相反,这些占支配地位的因素是不对称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不真诚、操纵、浮夸、失真的描述以及虚假讯息。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宣称合情合理的社会规范是被那些主观自觉地遵循它们的人真诚地接受的吗?或者它们仅仅是为了稳定权力关系?"(Lukes,1982:137)[3]如果是后者,那么不合情理的非对称权力关系,决定了哪些观点要发展,哪些观点要阻止。或者社会行为者可能不太重要,而且允许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文化阻力(被视为当然的假设)来影响讨论自身及其结果。

哈贝马斯区分了通过规范和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前者表示"统一"来自于通常认识的无批判的接受,要么是精英操纵的结果,要么是因为文化传统传承了规范和被视为当然的信念。[4]相反,批判的研究支持了通过交往获得共识。正是通过对话的方式批判地研究陈述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发展,才是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中心。随着这种合理化的进展,意义和价值的创造极少是无批判地接受和复制传统社会化过程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以传统为中介并探究传统,改变传统。

哈贝马斯的论证停留在非常抽象和理论的层面,他对于他的观念在经验上或实践上的应用没有多大兴趣。在后者的语境中,当然就很难确认什么是基于规范的共识,什么是基于交往的共识,或者很难发现未被曲解的交往的例子。在对此作更详细的考察之前,让我们现在来简要看看某些已经作出的对哈贝马斯观点的批评。

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批评

交往过程中的曲解自然不可避免地有不少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交往能力并不比其他任何社会特性或理念更能最优化。这已经甚至被表示同情的批评家指出来。有一种典型的看法,认为哈贝马斯的观点是理智化的,社会结构的矛盾的和非理性的根本特征应该与社会行为而不是与无止境的争辩和讨论相符(Bubner,1982)。也有人争辩说,基于理性的共识常常是无意义的,既然真正的兴趣上的偏好和冲突通常并不产生优势论证的力量。优势

论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解决互相冲突的观点和兴趣产生充分的影响(例如参看 Giddens,1982;Lukes,1982)。布朗(Brown,1994:22)评论道,因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的)真理概念是与意志、政治或同情相分离的,所以它与实践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哈贝马斯的观念对人灵活批判能力的要求太多。欲望、规范和思想并非如人们所可能设想的那样是对良好论证或会话之扭曲转折的回应。甚至哈贝马斯也承认这个问题。他主张,往往是考虑到妥协而非理想情形以及真诚共识才可能更富成效和更加现实。于是基于交往的妥协与关于单方面地基于特殊利益和力量的谈判妥协的多元观念是不同的。哈贝马斯区分了合法与不合法的妥协,根据是看产生妥协的根本原则是否是基于理性,即是否是从交往上来判断的(White,1988)。修正立场和信仰的意志(能力)问题依然存在,不过基于交往的妥协观念确实弱化了其方法的"实在论"问题。

另外,一种批评不仅仅强调实践的必然性也强调歧见的价值。缺乏共识是健康的,因为它提供了以不同的方式来感知和联系世界以及超越障碍的可能性。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特别提出的论证(例如,Lyotard,1984;见第 5 章)。笛茨(Deetz,1992)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哈贝马斯关于对话的重要性与价值的观点,但主要是在它顾及了揭示其过程中的意义的多样性以及避免对自身和世界的非反思的态度,才看到对话的价值。因而在他看来,作为达成共识的对立面的歧见与冲突的产生才是关键要素。

许多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似乎是与他建构系统的雄心有关,并涉及其理论的以及社会的或基于对话的理性的局限性。哈贝马斯关于语言达到理性之潜能的宣称推进得太远了一点。不过,这个理论还是可以作为一种理念和指称结构,在它的帮助下我们可能能够在各种社会关联中理解交往理性的程度,然后指出解放条件和压制条件的关键(尽管不是全面透彻的)维度。韦尔默指出,是否理想的交往情形在历史上是可行的,这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历史规划中,语法的深层结构被理解是如何可能的";换言之,"压制—自由的交往的'调整观念'可以作为思想实验,通过它我们可以质疑特定制度的合法性"(Ottmann,1982:

96)。但是要把哈贝马斯的方法视为调整的典型,这在以经验为取向的语境中是成问题的,因为难以避免在这种立场与对实际条件的描述之间滑动,这实际条件是与可欲和可实现相关的。批评也必须意识到人类生活的不可避免的不完美性,并且敏锐地注意到"过多的"曲解,而不是提高嗓门不加鉴别地一概反对那些没有遵从理想形态的情形。

121

正如我们将在第 5 章要讨论的,"未曲解的交往"概念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质疑。在这样一个视角中,也会反对加达默尔和哈贝马斯著作中的整体化对话和交往的整个观念。福尔热(Forget,1985:143)批评前者"设置了一个特定的领域作为普遍的绝对的领域,对话的领域、对话中的理解的领域,以及对仅仅基于排斥才能存在的"交往"作特定解释的领域"。解释学或批判解释学中的交往暗示着在谈话的参与者之间信息和意义的传播。根据马歇尔菲尔德所提到的德里达的"签名、事件、语境"(Derrida,1982),有人可能在另一方面宣称,表征有一种把它们自己从发出者(发出者的意图)和接收者(接收者的解释)分离出来的倾向,并使它们独立存在。它们也一般不包含任何单一意义的传播,而是不断地打破每一个截然不同的意义并不断地创造新的意义。这个观点包含了对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根本解构[或用早期批判理论家的术语来说是"非整体化(detotalization)"](我们将在第 5 章进一步讨论德里达)。

对这种批评的可能的尽管是部分的回应,将减少哈贝马斯的方法的雄心勃勃的理性和整体化的特征。在哈贝马斯启发下的研究中,一个更加经验化的应用趋向是福里斯特(Forester,1989;1992;1993)提供的,在这里会话和未曲解交往的理想情形的重要性被弱化了。相反,福里斯特提倡的是产生和再现观念、规范、信任和关注方面的交往行为研究。通过检视人类行为和组织结构的交往性质,他发展出了一种所谓的"批判的实用主义"。这一努力显示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如何能够与社会科学的主题发生丰富的关联,如果我们允许非正统的理论渗入哈贝马斯更为抽象和哲学化的理论的话。

哈贝马斯与早期批判理论比较

有时哈贝马斯被称为“最后的理性主义者”，这告诉了我们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哈贝马斯。他的整个理论规划概括起来就是试图考察和支持批判理性的可能性，其背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形，即占支配地位的合理性观点可以视为对理性的最大威胁。他一方面这样努力，同时又把“理性”放宽和提炼为批判的、反思性的和受对话刺激的能力。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念并没有引起实证主义、技术主义和官僚主义合理性观念的猛攻。他也不再屈从于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具体体现在尤为极端的公式化的后现代主义观念中，在这里合理性与理性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而其他回避了支配关系的理念和手段则获得拥护（如身体、愉悦、多元主义以及虚无主义，我们将在下一章再来看这些主题）。

122

不像理智传统中（他大体亦身处其中）的其他拥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已经抛弃了首先作为“缺点发现的文化批判”的功能，稍微采取了其前辈有时已经使用过的恶意措辞（如 Adorno and Horkheimer，1979）。相反，他建构了一套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的系统的哲学。其哲学的关键因素是把评价和批判转移或“分散”到社会市民身上，而不是把它们视为首先是自由理智的批评家的功能（Bubner，1982）。揭示特别的支配关系或意识形态不是哈贝马斯批判哲学的首要任务。他主要关注的是个体之间交往的批判基础、可能性暗示与障碍所在，指向的是“对话”能详细考察现存主导条件这一潜能，以便在伦理与政治问题上能获得有根据的立场。

类似的关于个体拥有更大权威这一观念，在批判理论的大多数早期表现中也是一个主导观念。甚至在最悲观的文化悲观主义者的著作《启蒙辩证法》也是如此，这部著作说过“完全开化的地球放射出灾难性的胜利光芒”（Adorno and Horkheimer，1979：3）。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看到了一丝希望，即启蒙可能会带来某种批判性的自知之明（Asplund，1992：57）。但是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而言，就像对马库斯（Marcuse，1964）来说一样，正是这被

社会机构暴露在社会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自我形象上的技术控制和管理控制的有力注脚,表示没有很大希望有助于理智的社会研究者达到更大的自主。通过粗略地识别和把握障碍来澄清某人自己的个体和社会条件以及欲望,这是可能的。通过理智震动的影响,主体感到震惊,于是对自我管理的把握就放松了。这是许多早期著作的类型特征,因而与哈贝马斯是很不相同的。他冷静的系统化,他对早期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详细讨论,以及他倾向于作长期考察、极详细的论证和无数的从属条款,这都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好辩式的零散的研究所不可比的。

然而,我们说过批判理论的不同拥护者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在回顾传统时,作者们毫不犹豫地把哈贝马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放在一起(例如参看 Connerton,1980;Held,1980)。其共同的因素包括对有助于解放的知识的兴趣,希望促使社会科学有能力激发自主、净化、责任感和民主的进程。批判理论认为现代人是被控制的、对象化的、消极的和墨守成规的,是与社会机构(机器)以及理性的支配形式相关的。然而,同时人也被视为部分或潜在地自主,能自我反思和批判地质疑。[5]批判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以及个人和公共制度的自我管理把个体变成了消费者和顾客而不是积极的(主动的)主体,这也是批判理论的不同拥护者的共同基础。

123

认知兴趣和认识论

我们知道批判理论反对实证主义(对关系作客观和中性探索的观念,以资料和假定的检验为枢纽的过程)。尽管其研究风格是解释的,有时被描述为批判的解释学(例如参看 Thompson,1981),但它还是与传统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解释学有很重要的不同。

哈贝马斯(Habermas,1972)从他所谓的认知的(知识构成的)兴趣方面,比较了不同的关于认识的观点。他区分了技术兴趣、历史解释学兴趣和解放兴趣。

技术认知兴趣是指对创造和培育人类生存所需资源的认识

发展,这些资源如适当的食品衣物生产与分配以及疾病疗治等。它预设了自然可以用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来控制。于是技术的兴趣刺激了与认识发展和维护对客观或客观化过程的控制所需的方法相关的研究。这要求隔绝对象和事件并把它们分成依赖和独立的变量以确认规律性和因果性。对假设进行确证和证伪的可靠程序的预设和建立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正是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如技术、医药,才是技术认知兴趣的最终理由。

历史解释学的认知兴趣关涉语言、交往与文化。拉德尼茨基(Radnitzky,1970)认为这是"传统传承的元制度"。其焦点是特定文化中或文化之间、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之间的理解。行为、事件、陈述、手势和文本被解释以便可以克服不同个体或传统之间的距离。因而其首要的兴趣是意谓和意义。

第三种类型的认知兴趣是解放的兴趣,它可以说为"以否定虚假本质约束为目的的行为"(Habermas,1973:176)提供了灵感。124 这种认知兴趣与解释学的区别在于它试图识别误解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来源。社会心理现象在结构上和潜意识上的来源都必须要考察,这不仅仅需要洞见,而且还需要哈贝马斯所谓的"解释性理解(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要素。哈贝马斯引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作为解放模式研究的例子。精神分析被认为是解放研究的模型。通过自我反思和对观念、感知、想象等的批判研究,有可能抵消限制了人的潜能的心理障碍。因而如此获得的理智上的洞见有助于与压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的。[6]

在某些方面这三种认知兴趣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它们对于公正的个体和社会存在都是必要的。对于自然法则、解决问题的技术以及资源创造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使相互理解和共同传统成为必要。解放兴趣依赖于经验分析的认识,尤其是为了从既定的自然法则区分出社会结构来,然后才能从无用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然而,尤其是在高技术的社会中,它也批判地审查技术理性的潜在系统和技术认知兴趣无处不在的影响,并对抗技术统治之取代作为社会统治原则的政治伦理立场这一趋势。

于是,规律性和因果关系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占支配地位的情

况下是合理的,但是根据批判理论这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的特征。[7]这种认知并不能产生进步和发展,相反只会易于把人们锁在固定的和客观化的范畴里。阿佩尔(Apel,引自 Frisby,1976:xxxiv)说道:

> 社会技术在"开放社会"模型中并不具有理想的前提,而是在下面这种社会中才有其理想前提,在稳定的准古老的统治结构的基础上,这种社会被分成了科学和技术上的有知识和无知识的、操纵和被操纵的主体和客体。

阿佩尔还宣称社会技术(在商务管理、社会工作、教育、心理特点等之中)发挥最好作用的并不是在个体基于有根据的讨论和批评清晰地表达目标和规范的时候,而是当他们几乎是充当"没头没脑的"自然对象之时,他们可以被置于重复的实验中来研究,可以在既定的条件下出于工具目的而被控制。可预言和可塑性(docility)不仅仅是社会技术的前提,它们也是社会技术的一种结果(参 Foucault,1980,下文第 6 章再讨论)。在高级社会技术的社会中,个体发展出了一种易于受社会控制的特征。

125

因此,批判理论反对在社会语境中运用实验认知,或其他类型的模仿自然科学的寻找规律的认知。这警示我们反对社会工程和专家引导的对社会各种缺陷的处理方式。

根据奥特曼(Ottmann,1982:82),认知兴趣概念的优点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事实,即人类兴趣是"生活和知识之间的中介",这"使我们对系统的基础不能单独只建立在生活或知识上这一观念提出质疑"。

认知兴趣观念讨论中的重要基础已经转入了解放的雄心上(例如参看 Fay,1987;Ottmann,1982)。这也是哈贝马斯想要强调的,以反对经验主义者和社会工程师的更为有限的认知概念。除了其他方面,哈贝马斯的关于解放如何实现的知性论(intellectualist)观点也有反对意见被提出来了。可以说,他的精神分析概念是一种凭借理智洞见的解放过程,它的确过分强调了理智成分的重要性,而低估了在最佳情况下那积极发生作用的因素是与情绪、移情接受以及其他非认知因素尤其相关的。对哈贝马斯的解放概念——也是批判理论家的一般概念——作为一种理智的和

理性的概念的反对来自若干方面。费伊(Fay,1987)指出达到对真诚的需求和理念的清晰理解是困难的,还指出了解放的非认知条件的重要性,这些非认知条件如可能发生在资源控制和防止传统影响的外部关系、身体(物理)因素、权力条件等。另一方面,我们很难去责备哈贝马斯或批判理论没有包含关于解放的所有可能起作用的因素。不如说,批判的社会科学应该被分配一种适度的有限功能。[8]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质疑它对政治—伦理现实从理论观念转变为解放实践缺乏任何系统的细致的思考。在指向变化的实践的分析中,把认知因素从非认知因素分离开来并特别强调前者是合理的吗?

另一个问题是评价知识对解放的贡献的标准。人们是努力使自己摆脱限制吗?遭到过抛弃吗?这方面可确认的结果可能不是评价知识价值的好标准,因为后者与社会行为和实践成就的关系再也不是简单或直白的。一种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并不必然地要远远地影响实践。哈默斯利(Hammersley,1992)指出,成功的行为可能正好建立在错误假设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认知可能伴随着不成功的行为。他认为根据有利于解放的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评判认知是错误的。

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是否兴趣能够构成认知发展的基础。学术知识的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引导其后之运用的具体兴趣和目的的。这没有直接触及哈贝马斯的观念,因为哈贝马斯的观念是知识构成的兴趣而不是知识的运用。研究中的兴趣因素是肯定值得思考的,它可能不是作为科学的基础而是作为对研究作检讨、评估和反思的有重大意义的因素。

126

批判理论与各种政治立场

与左派、右派立场相关的批判理论

可能有人会认为批判理论表达了典型的左翼激进派立场,因而它只能使那些有此倾向的人感兴趣。诚然,许多研究批判理论的学者是左翼激进派,而且反对已确立的社会的特定属性及其发

展是它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那些视当代社会为好社会的人在批判理论中将发现不了什么意义。

其实,大多数人都可能会同意,被视为当然假设的文化、已确立的意识形态、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的存在,可能至少有时妨碍或限制了人的思想和自由,因而批判考察应该不是件坏事。一旦制度化,甚至好的观念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批判意识更能够使系统、目标、程序、改革、控制和观念不被视为当然,而是通过被反思从而可能更"积极地"发挥作用。因此,批判理论并非必须建立在根本否定社会的基础之上,而可能是建立在承认特定社会现象能使基于解放认知兴趣的考察之为合理这一基础之上,这需要某种程度的否定性。在运用批判理论时重要的是,问题不被理解为可由少量的社会工程来处理的不相干的现象;而是根据整体—主体性(totality-subjectivity)关联来看待的,即批判理论根据文化上共有的意识和交往形式来看待社会。

批判理论也很好地引导自身对显然是进步的和解放的社会变化和观念作极仔细的考查。法兰克福学派及其相关团体含有某种保守的和精英的特征,尽管这在哈贝马斯那里并不显著。这些特征包括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反对大众文化和自主个体概念,这实际上是古典的资产阶级理想,尽管很明显它是许多现代右翼观点的对立面。市场资本主义很难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后者所喜欢的个性、自主和古典教育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商业主义和虚伪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相冲突。来自批判理论的并且具有明显保守色彩的最具刺激性的攻击可能是拉希对马虎的现代育儿习惯的批评(Lasch,1978;见上)。拉希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批判理论家是由于他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对现代意识和实践的理论化能力,并把它与基本的社会条件关联起来,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有,消费资本主义、分裂、职业影响,以及作为市场交易中和社会化过程中社会控制手段的心理意识和技能的传播。因此他的方法不是纯粹抱怨家庭破裂、放任式的育儿以及贫乏的道德的堕落,而是认为这是些能够通过加强道德态度而得到修正的现象。

127

因此批判理论有可能采取另外的立场而不是明确的左派立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行为和意识形态可以是批判理论考察

的对象,而且公共部门("社会的状态")、工会组织等也可以是批判理论考察的对象。甚至那些与批判理论自身的理想相符的拒绝已确立的观念和价值并寻求加强生活世界的社会运动同样可能是压制性的行为。例如,性平等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守旧的力量,通过这一力量,一种主要以金钱和职业为取向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由看似进步的兴致勃勃地进入大众传媒而传播开来。于是这些理念可能获得了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其结果是现有的金钱和职业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不为薪水而工作或不寻求职业生涯的妇女是被压制的",这一观点本身也是压制性的)。

批判理论通常与左派立场相关联,对于技术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深的怀疑。然而,那些把人们锁入固定的冻结的立场和思想模式的压制性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可以从保守的意义上来进行考查。森尼特(Sennett,198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描述了人们如何常常通过采用那些作为否定模式的权力来拒绝同样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像从前被阻碍一样,通过与权力的否定性联结和强硬的斗争而限制了他们思想和行为的自由。甚至革命者也可能陷入这个陷阱之中。于是反抗就要承担自由的缺乏。

最低限度的批判研究

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合理地把研究从解放的认知兴趣引出来了。解放的认知兴趣批判地解释了各种经验现象,其目的是刺激自我反思和克服已确立的制度和思想模式带来的阻碍力量。然而,批判理论进一步的含义还是可以设想的:研究被某种其他的认知兴趣引导而不是被解放的(解释学的、技术的)认知兴趣引导,但结果又并没有"反解放"。于是,根据它所具有的影响,这就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批判理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研究,它在加强和质疑已确立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中,避免明确地采用任一立场。根据客观或中性研究的概念,所有"好的"研究都必须同时避免这种立场,但是根据(至少)社会科学[例如,不仅仅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还有波普尔(Popper,1976)]的宣称来看,这种看法是天真的和过时的。换言之,要避免强化已确立的社会制度和主导利益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至少如果一个人要使自己同社会重要问题发生关联的话。

128

当然强化现存价值或制度本身并没有错。许多已确立的社会基本价值也是批判理论的拥护者所认同的(如与饥荒、个人暴力和虐待作斗争)。[9]但是,问题是研究常常不自觉地回顾和强化了现存形态。研究者自身是其所处社会及其被视为当然之观念的俘虏,于是帮助维持现状。

批判理论作为问题识别和质疑的研究立场的典范,其可能的作用应该是对抗任何这种不自觉的加强现存社会对思想的控制。因此,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有一种有限的解放目的,它更多的是努力防止研究有助于统治,而不是直接克服它(这与后结构主义有很强的相似性:见第 5 章)。

这比我们所可能想象的更困难。例如,如果我们决定研究领导阶层,这意味着太容易再现和加强"领导"范畴的利益和立场,并帮助这样一种领导阶层制度化。研究中所表达的关于领导阶层之本质的观念不仅仅是反映"客观的"情形,也构造了它们。如果一个"强大的"领导阶层在理论和研究中得到了许多关注,于是它在社会实践中就获得了某种重要性。领导者和非领导者于是都相信这个领导阶层对于社会运行是重要的,并将根据它来采取行为。"领导阶层"成为了许多语境中的社会关系调整的理想状态。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导阶层研究,而且大多数这种研究很难有任何实际的结果,但是值得记住的是,单纯对领导阶层现象的兴趣可能意味着对不对称社会关系的加强与合法化。在商业管理研究中,领导阶层和管理视角的优势可能事实上代表了对特定形式的制度化权力的适应,然后给它一个意识形态的托辞。

让我们来看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对"失业"的种种结果的研究。甚至这样一种研究也可能被视为解放的研究,因为它常常指出失业带来的破坏性的心理后果,并为弱势群体辩护,这种研究可能意味着某种特定的支配关系被再现了。例如,如果以关于"失业"的访谈为基础,结果是失业总是伴随着心理或身心的问题,研究可能事实上有助于再现对雇佣劳动、失业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的具体态度。"失业"加强了现存工作意识形态的力量。在许多国家中,工作意识形态依然充满着新教工作伦理的强大力量(Anthony,1977)。没有工作的后果可能不仅仅取决于某种

129

"自然法则",而且要看"失业"的社会结构,由此,这一问题部分地只是在于人们为了他们的个人认同、自尊和行为能力而需要一份工作这一观念的产生与加强罢了。甚至善意的研究也会有助于这同样的结构。[10]因此重要的不是采用太过狭窄或片面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思考社会和历史语境并把经验材料解释为部分由统治意识形态(以及材料的条件等)所产生的社会构造的现象。研究不必无批判地和无反思地再现这种意识形态,不必把盛行的制度的合法性视为当然——不过这很难避免。

方法论的含义

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批判理论首先不是一种经验取向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批评它缺乏对经验研究的兴趣并任由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完全漠视(Bourdieu 等,1991:248)。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提出了不少批评,却很少提供有关方法论的建设性建议。但是以批判理论为基础却有可能发展出引导反身性经验研究的实际指导方针。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下列所述大多很难从批判理论的经典文本那里获得权威认可,毋宁说这是我们在这些文本的启发下尝试为方法论提出某些建议。

受批判理论启发的处理过经验问题的研究者一般是用第二手的经验材料。拉希(Lasch,1978;1985)的"自恋文化"研究和齐厄与施图本劳赫(Ziehe and Stubenrauch,1982)的"新一代"研究即是如此。这些作者都综合了许多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因为后者通常是建立在不系统的观察和不是系统的大范围的经验考察的基础之上,所以其经验基础是相对薄弱的。因为这些作者关心的是广阔而复杂的那类问题,那类问题甚至在最为雄心勃勃的研究中都是很难做到通盘考虑的,所以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预期的。在对权威的研究中,森尼特(Sennett,1980)从多种来源使用了不同种类的经验材料。他没有去识别这些来源,但其中有的看上去是以他的熟人圈子来作的案例研究。

批判理论启发的是对更宽语境的思考,而不是对由扎根理论和民族方法学所拥护的更紧密的经验研究的思考(见第 2 章)。 130
正如安格斯(Angus,1994:87)所言,“文化批判的特定对象与整个历史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理论(包括其他方法)的要旨所在。如果可能对语境作更广范围的观察,那就自然要采用更自由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想象、创造性以及研究者自己的学习,再加上他或她的分析和解释能力都是需要具备的。批判理论抽不出时间来采取簿记员式的思想方法,这样一种方法是有方法头脑的学者的典型方法,他们喜欢对任何事物都非常仔细精确地记录下来。因而,给有批判倾向的学者的一条好建议是运用现有的经验研究和例子,然后以他们所选取的研究问题为基础来解释或重新解释它们。此外,在各种情形中又进一步出现的经验材料也都可以开发利用。这些情形可能是与朋友的谈话或者注意到藏在小镇或报纸上的广告等(这个过程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所介绍的相一致)。因而放宽对经验资料的接受是很重要的。然而,在当前语境中,更大的兴趣是在某人自己的经验研究中通过批判理论提供的洞见。后者也可以用于补充现有研究和某人自己的任意观察。

许多经验研究倾向于在极小范围内允许批判理论或者让解放认知兴趣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直接的观察或者从访谈中提取材料并不是批判理论所认为的研究的基本主题。整体性和主体性——至少最需研究的我们意识中更深层的障碍——都逃避直接的经验方法。我们总不能到处去询问别人关于他们的“心灵牢狱”或者“虚假意识”,或者“交往曲解”等,这些事情也不允许他们自己来观察。

不管是一个人接受批判理论的基本观念,即社会科学应该由解放认知兴趣来指导,还是选择有限地运用这一理论,本章余下部分的许多观点都是适用的。后者将意味着接受了:反身性研究不得不考虑意识形态—政治的维度,这一维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特征,然后避免无批判地再现统治观念和制度。不过,下文的论证的确要求两者之间有颇为不同的分量,即取决于是采用整个的批判解放立场,还是只想避免无批判地再现或加强统治观念和利益。

研究问题

一项研究工作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应该总是得到仔细的思考。如果我们要作政治方面的严肃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样严肃地注意到任何具体问题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偏向的那些特定利益。福里斯特(Forester,1983)指出，如果决定研究一所医院，那么就应该有助于加强医学和健康护理之重要性的观念，同时可能把注意力从预防性护理转移开来。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注意到的，社会科学很难避免要么接合要么指摘统治形态。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与具有明确后果的政治和研究政治的决断相关。

131

批判理论强烈支持独立批判的研究者的理想。阿多诺(Adorno,1976:112)写道："批判的推动力就在于全力反抗死板地遵从任何统治意见。"独立研究者的一个指导方针可以是提出各种研究问题，这些问题本是特定的精英集团不情愿回答的，但是从某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个指导方针是问这样一些问题，它们是对常识的冒犯，其观念将促进与已确立的模式根本不同的那种思考，换言之，即不是简单地采用传统的观点。对此，布洛维(Burawoy,1979)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他是不愿问一些一般化的普通问题的，他不问"为什么工人们不更努力地工作?"而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工作?"另一个佳例可以在阿斯普伦德(Asplund,1970)那里发现。他质疑这个假设：效用最大化既是正常又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偏离了这一条通常就需要作出"解释"了，因为它被视为不合理的，不是努力追求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 这里人们可以很方便地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不能当然假设人们不是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否有人的确投入到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确实可以看作一种现象(Asplund,1970:121)。

第三个例子在佩罗(Perrow,1978)那里，他主张研究"人类服务组织"(医疗护理等)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目标控制着所有这类事务，然后继续考察这些目标如何被更好地实现。佩罗又使问题转换方向，主张目标实际上与这类事务关联甚少，这类事务事实

上主要是由外部作用(就业、对不正常的人的管理)、领导者和全体职员的利益(和谐、工作满意、有利的条件,以及遵守"应该如何"的规则)驱动的。因而研究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多以达到目标?",而是"是什么实际驱动我们去做?"对第一个问题的无批判的接受加强了一个可能错误的观念,即组织主要是为了其委托人和官方的目标而存在的。

研究者以反对统治形态的方式提出问题,这一理念可能看上去有一种优越感并且缺乏对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团体的尊重。研究者不应该严肃对待政治家、商业管理者、工会等的重要性吗?好的,但是这种问题就如同被视为当然的指导原则一样也应该受到批判考查。精英们以某种立场来界定研究的主要领域,他们这样做自然是从他们自己的逻辑出发的,而且可能是从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的。但是,他们也可能代表了更广的或者不相矛盾的利益也未可知。即使精英集团和更广泛的群体之间(例如政治家和广大群众之间)有一致看法,这个看法也不必被批判研究者视为当然。重要的是产生特定立场和观点的结构与过程的合法性是应该得到检验的。例如,在什么程度上它们是交流争论的结果,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它们可能会被认为其所表达的是系统地曲解了的交往(如大众传媒的操纵)?

132

在纯粹实际的基础上很难自由地开展研究,因为在一般的研究团体中,批判的方法很少获得资助机构或统治集团的支持。与"客观的"限制同样重要的一个限制性因素是,研究者自己在研究团体中的自身训练、他们的非反思的态度,以及与统治立场的盲目因袭的关系(大多数学科都有一种很大的从事于"正统的猜谜式科学"的压力)。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应该问问自己如下类型的问题:为什么资助机构希望这一特殊问题得到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时尚、投机和目光短浅(或者以这种方式来阐述)?谁将可能得到或谁将失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正如问题设计者所构想的那样)?什么东西被视为当然?最低限度的反身性研究应该思考和讨论特殊的问题设计者在政治方面与既定研究主题相关的利益。

好,主要问题可能并不由任何这种外部限制和依赖构成。通常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倾向于遵循先前已经确立起来的关于何为

急迫与合理研究的思想形态。研究团体中的社会化过程是严格的。而且研究者是受他们的文化语境限制的社会成员。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是很难避免的。严肃挑战民族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并不容易做到。

经验材料的作用

甚至在包含有研究者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运用其他人的经验的批判项目中,经验材料依然不像在根据质性方法教科书而作的研究中那样处于中心地位。关注的中心从经验研究本身和资料转移到了对经验材料的解释和理性评估中,它由对周围社会语境的观察和解释获得进一步的补充(研究者已经对这种“生活民族志”语境有了细致的认识,正是因为不可能把一种形式化的研究过程置于某人自身和这种丰富的经验材料之间,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它。然而,所有这种不系统的经验材料的意义及其相关性都必须得到特别严格的反思)。这里的经验材料并不与在经验的质性研究或客观主义解释学中那样具有同样健全的特征。

133

有三个强大的理由不把经验材料看作全部真理或认识的决定性途径。第一个理由是,不同的现象应该根据整体—主体性关联获得解释,这意味着在具体研究中只有现象的限制性方面才能使自身获得阐释。因而对现象的解释需要的远远不止一批明确的经验材料,这些经验材料很少针对社会语境以及个体层次上的意义/意识。

第二个理由关涉着在主体背后起作用的潜意识中的社会条件、意识形态和交往过程,这意味着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含糊不清的。例如,如果深度访谈中的调查对象坚持认为领导阶层在某一工作场所(就工作效率和氛围而言)中是重要的,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领导阶层是否有事实上的重要性?这对于那些调查对象而言(对他们的信念和行为)是重要的吗?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这种意识形态——在最近大得惊人的流行的领导层文献中提出来的——那领导阶层是重要的吗?这些人具有(或至少是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看来是足够关注了的,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这种观点意味着什么,它从哪里来并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它可能只是一种“半深不浅的(semi-deep)”观

念,它可能很容易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变化,或者它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对相关的人们具有一种类自然法则的影响,如他们高度赞同他们老板的行为。也许甚至有一种自然法则是:大多数人是依赖于领导者的。(历史的变化表明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任何具体意义上不是这样的)因此,所谓的经验发现某人认为领导(雇佣劳动、高薪、独立工作……)是重要的,或者这与某种其他情形(满足感、合作、生产率)有关联,这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事实"在社会语境中从来不是独立的,相反,社会科学的对象恰好表示它们是社会语境的一部分。

第三个避免过分信任经验资料的理由是,对于被认为是目前存在的事物的研究,把我们的注意力固定在实际事物上,并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可能存在的事物转移开来了。例如,对失业的经验研究,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组织根据人们在劳动力市场内外的定位作严格分类的行为作专门的思考。如果我们严格遵循经验材料,我们就也要坚守它所强加的思想和想象的界线。现存经验形态被看作是或多或少给定的、自然的和中性的,而不是某一历史发展中的片断。于是,努力达到"严格经验的"就意味着是非辩证式的。不只是在边界上与以前的形式破裂了的工作组织、劳动力市场管理等形式,不被允许刺激对材料的解释。这些观念被降级于科学的范围之外了。 134

理论指称结构的重要性

批判理论中的理论指称结构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对研究者受困于经验资料——淹没于观察、访谈陈述和其他容易接近的基于解放认知兴趣很少能使自身获得直接而简单的解释的那些材料中——这一倾向的平衡中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被访谈者真的能够考虑到如交往曲解或者考虑到他们如何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心灵或文化牢狱的话,那么解放的研究将是多余的)。一种发展良好的理论指称结构还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好的解释,好的解释在批判理论中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观念会超出表层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思考的不仅仅是访谈对象(遵循这种经验材料)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他们为自身传递意义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处境,而且还要思考他们作为部分所处的整

体,以及在与潜意识过程的关联中这是如何体现为限制和“噪音”来阻止意义的发展和存在的建构的(Morrow,1994)。换言之,研究过程中需要多种不同的理论思考。

批判研究至少需要三种理论:关于语言和意义的解释学理解理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理论,以及潜意识理论(Deetz and Kersten,1983)。还可以加上人类学的(或乌托邦辩证法的)理论或理解形式,指出文化意义的相对性,这有助于防止研究者陷入给定的经验材料中并对抗民族中心主义。

这些理论几乎可以说构成了元理论,它们在总体上引导了解释和研究努力的方向。它们并没有代替对于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具体理论的需要。具体理论不必必须与批判理论相符,批判理论会重塑其他理论以便它们能够不时地用于批判方法中。事实上,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方法包含了对于代表传统(实证主义、功能主义)思维的现存理论和研究的仔细考查。

如果说在解释经验现象时,批判理论研究者带有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理论“压舱物”,这可能被认为意味着他们不是以其“实际情形”来看待“实在”的,而是盲目地读入了批判理论所指示的意义。一个人可能发现到处是交往曲解,意识形态统治或(非法)权力的使用。我们常常指出,对经验材料的解释总是源自某种理解模式而不是直接来自“实在”的实际“所是”。认为“客观实在”是通过对“资料”的正确收集和系统化而显露出来的,这种理解(误解)是天真的经验主义,由此以某种广泛的文化常识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未被承认的“理论”就渗透到了解释中。但可能有理由相信批判理论比其他方法论途径受到了更多的“有色眼镜”的影响吗?某种程度上,也许对于批判理论家之博学和理论熟练的严格要求会占据他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他们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来吸收来自经验材料的有趣的推动力。同时很明显这一理论尤其在有色眼镜(使用一个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充分的隐喻)问题上比本书前面所讨论的取向上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批判理论的兴趣在于考察引导我们采纳特殊观念并视事物为当然这一过程,所以它也能对材料采取一种实质上更开放的态度。于是,如果通过批判理论获得解释,那么经验材料就能够贡献大量的与其他方法的新比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倾

向于经验材料未被充分使用的潜能,因而它也可能会想要夸大批判要素。

解　释

因此批判理论是在解释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即它的拥护者感兴趣的是意义的层次,并且认为社会科学是提供含有内容和意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解释同时包含了理解和说明这两个要素(Morrow,1994)。比如在人种学的研究中,注意力在接近和远离之间摇摆。而为了使行为层次与更广的社会、历史和经济语境发生关联,为了避免陷入文化上共有的意义,批判研究的确特别需要"远离"。看上去自然和自明的事物应该被质疑。

有的批判理论家区分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例如,Deetz and kersten,1983;Frost,1987)。表层结构指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体引导他们的自觉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事物是自然的,存在的,或者可以使它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这里的深层结构指的是那些毫无疑问的信念和价值,那被视为当然的表层结构就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能够识别这种深层结构,当然尤其是那种导致了冻结社会制度和锁住思想行为的信念和价值。

一个好的解释迫使我们去思考、再思考。因而一定意义上解释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概念基础之上,但同时它必须挑战它们并质疑它们。这种类型的解释中可能有两个最主要的焦点。一是揭示某种特殊的被曲解了的或压制性的观念的来源,另外就是考察 136 这个讨论中的观念的内容。第一个焦点考虑的是导致交往噪音或理解和自我认识曲解的结构和过程。例如广告在吸烟与男子气之间,在百事可乐与年轻人之间,在流行与魅力之间约定了一种密切的关系(Leiss,1983)。另外一个例子是社会情形中的交往空间(言说时间)根据等级制度不对称地被分配这种趋向(Alvesson,1996)。这里关键不是指明信息或者具体实践的错误。它们可能完全是自我实现的"真理":如,当男人们在广告里展示吸烟时,他们可能自身经验到了更强的男人气概;或者如果管理者在会议上比他们的下属谈得多,这可能确立了他们的中心地位。毋宁说,这个观念是要表示很好地拥有材料和符号资源的行为者,

如何能够尽力发挥可以预期的导致偏见和选择性理解的这种影响。这样一种批判理论更加关心的是结构和过程，而不是那些看广告或管理者的下属可能支持的观点，因而它成了研究根本统治力量之影响过程的问题。另一种解释考虑的是各种概念和观念的内容。例如，有人可能从"管理是重要的"这一观念出发来解释，或者从"满足需求是一个消费问题"这一观念出发。这一内容本身可能要根据合理性来批判地考查。

通常两种类型的解释都是需要的。因此批判理论既要考虑思想（或者社会制度）的特定模式也要考虑其起源。这里也存在着检验解释的稳定性的某种基础。如果根据特殊概念或实践的内容和起源，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曲解，于是就有了批判解释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如果信息或概念看似合理，或者如果没有显示有任何片面的过程影响它，那么就不会激发任何批判性解释。相反，如果概念显得成问题（虚假、误导、被阻碍），如果它可以回溯到某种片面的影响（来自传统、统治意识形态或者拥有强大资源的群体），那么就有很好的理由作批判性的解释。在某些被批判启发的组织研究中，团体领导对其下属非法运用权力已经同时从两个角度获得了解释：从"过程"来看，一名统治者在特定的情形中垄断了交往以及实在的界定；从"内容"方面来说，传递了信息，给出了关于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存疑的表征（Alvesson，1996；Knights and Willnott，1987；Rosen，1985）。

同意可用的经验材料很重要，但是批判研究不能被限制在仅仅声明什么样的观念被经验材料明确地证实。明确地指向深层结构的经验材料是不存在的。不过，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对合理性作出（自己的）批判评估。 137

否 定

如果要产生有趣的解释，一个重要原则是以辩证的方式来思考。一方面是不同的已经实现的观念和实践，另一方面是对它们的选择，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紧张状态中，才有可能避免被已确立的观念和制度俘获（Adorno and Horkheimer，1979；Marcuse，1964）。通过否定现存秩序，就有可能以一种不同的有创意的方式来看待它。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在当代消费资本主义里,金钱是主导媒介,如此之多的活动、思想和需求都集中在消费上,消费是满足感、地位、自尊和认同之源。与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相对照,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没有这种消费最大化逻辑,在这里如果声明对占有和消费有兴趣就会被看作成问题的现象。薪水和消费的提高不是被看作重要的自然力量,而是可以被视为人为的(文化的)。不是以满足需求的方式来研究消费,而是可以从错觉、毁诺和挫折方面来研究。事实上有许多研究从"失败"的角度解释了整个现代消费这一课题——把提高消费和追求占有商品和服务当作幸福的手段(Alvesson,1994;Hirsch,1976;Wachtel,1983)。正如弗罗姆(Fromm,1976)所言,我们可以把整个 20 世纪在工业化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看作一个巨大的享乐主义的实验,它已经导致了一个鲜明的结论:物质幸福对人类幸福而言并非关键。

我们反对"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们深深地依赖雇佣劳动"这样一个观念,并假定了另一个观念,即人是潜在积极的想象的存在,人们可以充分独立地行为而不从属于某一雇主。如果某一特定社会中的人们不能达到这一点而是为了幸福而依赖于雇佣劳动,即作为一个被管理者而存在,这就突出表现为一个需要研究的现象。这种对雇佣劳动的依赖是如何产生的?工薪收入的心态和支持它的社会制度——雇主、工会、职业介绍所(job centres)及其他实体——可以被视为特有社会结构的表现,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人的训练已在特定方面被极大推进(从这一制度体系以技术来取代人类劳动然后降低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这一趋向来看,这一点就特别明显)。作为被雇佣的雇佣劳动者的对立面,有可能提出一种较少受限制的行为观念。劳动力市场被视为理性的社会制度,与此相比较的一个观念是,形式化的交换关系和市场理想(系统)如何渐渐垄断了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工作的特定概念。因而这一观念以及"拥有一份工作"的虚假本质,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研究者扩大劳动力市场概念至包含内部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的定价与分配及其在特定管理单元如公司里的机动性——可以视为在生活世界的消费和可供选择的工作概念上,强化了作为内部控制力量的系统、规范制度和权力群体。

138

通过一贯地寻求相反形象——不是为了提出某种理念而是为了提供有意义的对照——就有可能作出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经验现象在已确立的秩序和对它的超越之间的紧张状态中得以阐明。这不是把现存秩序与某种乌托邦相对照的问题,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毋宁说这是根据自然的、中性的、不成问题的或者不寻常的、政治的、非理性的、主观随意的等观念使经验现象概念化和被解释的方式问题。这是使熟悉者异质化(*Entfremdung*,陌生化)的问题,是使质疑自明现象并指出未来实在无需由现存事物来再现的问题。这需要想象。当然,不管怎样最终走向乌托邦的危险总还存在,而它是不应该作为目标的。在上文我们举的雇佣劳动的例子中,我们不是要把制度体系描绘成内在固有的腐坏,也不是要颂扬无政府形式的行为活动,而是要鼓励以一种更无偏见的方式来思考雇佣劳动的意义问题。

批判的民族志和其他形式的批判的质性研究

除了伴随着解放认知兴趣的一般的引导外,关于同批判理论的拥护者提出来的经验材料的互动程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或大致同意的看法。批判理论和质性方法文献很少非常具体地谈到任何与经验材料互动意义上的方法论(例如参看 Kincheloe and MacLaren,1994;Morrow,1994)。我们并不想穷尽所有可能性,而只是指出从批判解放的视角来看显得合理的经验研究的三种类型。我们集中看民族志,因为它依赖的是第一手经验及其与亲身参与者的观察相结合的资料,而且访谈允许研究者超越对访谈叙述的唯一依赖。批判理论当然也能导向更加结构化取向的研究(Morrow,1994),但是这里特别的质性维度不太明显,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处理这种研究。从哲学的—理论的,以及方法论的—实践的层面,对批判理论和质性方法的进一步处理,见艾尔维森与笛茨(Deetz,1999)。

即使批判理论典型地没有给经验研究以优先权,人们还是可以思考某种目标更高的经验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广泛的经验材料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我们可以设想研究更像传统的、归纳的或解释性的民族志。于是研究者大体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工作,同时也试图思考对于统治与解放语境的兴趣问题,并根据批判理

论(或某种其他的批判传统)来解释它们。 139

托马斯(Thomas,1993)举出了如下与批判取向研究相关的要点:本体论、主体的选择、方法、对资料的分析与解释、话语以及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反思。托马斯遵循的模型大体与归纳民族志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相同,只不过增加了批判这一因素。他认为批判民族志强调的是文化的压制性、限制性方面,它从非正义、控制等方面来选择自己的主题(中心);它更倾向于怀疑资料和消息提供者;它在解释中采用的是陌生化模式(在研究现象时,尽量避免已确立的思考方式,并强调任何非自然的或者陌生的现象);它从权力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并反思研究过程本身,两者都关涉研究者的参与是如何影响资料的,并且从研究的更广相关性来看,也就是关涉着"此种情形是何种情形(so what)?"这一问题。托马斯主张,这种形式的批判民族志,可以对抗社会科学中大多数经验研究的专门技术和权威这两个核心特征。[11]

批判民族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不断地运用否定——不是把事物视为自然的或理性的,而是视为不寻常的和主观随意的,视为冻结的和墨守成规的形态中行为和思想的表达(Alvesson,1993a;Alvesson and Deetz,1999;Ehn and Löfgren,1982;Marcus and Fischer,1986)。[12]

既然批判研究需要大量的反思,既然理论和经验资料不能简单而迅速地结合为一体,那么处理大量的经验材料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正如业已证明的,批判理论在处理经验材料时需要极仔细的解释和理论的推导。一种可能性是从大量的观察和经验现象中,根据解放认知兴趣来选择那种显得重要的部分。从实践上看,这将意味着即使现场工作的范围与传统民族志中一样广泛,对经验材料的编辑整理和对研究对象的描述也会有些裁剪,而更多的时间会用于对精选主题作批判的深度研究。

有人可能会想象,就形成文本而言批判民族志的结果大体上与通常的民族志是一样的——关注的中心也是经验描述,只不过伴有更具批判解放特征的解释(例如参看 Jackall,1988;Thomas,1993)。因而可以假设的是,批判理论的因素将变得不太明显,对材料只有部分的影响。这种方法在把对研究主体的自我理解所作的非常深远的思考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这一点上具有优势。

它与可以以合理的简单方式被经验地描述的事物(某种文化的成员所了解的"实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当这些解释与手头的资料最相关和最切近的时候,它才使得对解释的运用源自批判理论,这也就是说研究者没有太过致力于缩小理论和经验层面之间的裂缝(Alvesson and Willmott,1996;第7章)。

140

一种"全面的"民族志比上文所述更进一步地把中心放在经验上。在核心的批判民族志中,问题在于如何以对研究对象相对广泛的基本知识为基础,对较为有限的材料作出非常合适的解释。因此一种研究的可能策略可以是从更广泛的经验语境来选择,这种经验语境有助于理解被思考的内容或主题,并愿意接受批判性的解释(即涉及实在的结构、权力的强烈不对称关系、意识形态、自主以及交往曲解等相关的方面),而且集中精力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称这种方法论策略为集中的批判性解释,或精读。其重点是:通过访谈、观察等手段,研究者获得了对产生了特殊现象的语境的合适的理解。这种理解,加上理论娴熟的结构,指导了对经验核心的选择。于是一种有限制的经验材料就成了精读和仔细的批判性解释阅读的靶子。看上去经验研究最明显地具有批判理论的印记,至少在我们自己的关于组织理论的主要领域是如此,它致力于研究如下这种被详细界定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中起支配作用的行为者总是为他们组织中的下属界定实在(例如参看 Alvesson,1996;Forester,1992;Knights and Willnott,1987)。我们将在下一节来看一个这种研究的例子。

第三种主要是理论层面上的批判研究:运用、综合和解释现有研究,只不过增加一些她自己的一点经验研究,如短期的民族志和访谈研究。研究者自己的经验研究代表了整体研究的一小部分,并且不像上述的批判研究那样接受集中分析。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经验研究,它有助于缩小批判理论与现场("在外面")之间的距离。这样,批判研究可以获得更加经验的"感觉",这可以提高其研究的易近性与相关性。可读性与可交往性也可以通过运用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材料以提供例证(尽管其他方式的研究也可能有这一目的)而获得提高。这种经验也可以用于补充第二手的资料来源。这种方法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森尼特的权威研究(Sennett,1980)。

一个实例:对某工场的研究

罗森(Rosen,1985)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美国一个广告机构。作者首先感兴趣的是“支配力”如何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起作用,例如,对公司情形的表述是如何展开以强化“支配”概念的,而这又是如何反过来帮助再塑公司中不对称的社会关系的。 141

罗森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对一个广告公司——斯皮罗及其同事——进行了亲身观察。这个广告公司有大约 100 名员工。他描述并解释了两种详细的有明确规定的公司情形,即所有员工都会积极参与的周年庆典活动:年度早餐与圣诞晚会(Rosen,1985;1988)。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前者。

罗森(Rosen,1985)把年度早餐看作是非常明显的象征操纵控制的场所。他对这个早餐情形和领导在仪式上所讲的话作了记录并提供了细节描述和解释。这个早餐在费城一座豪华酒店里举行。酒店全体员工会确保为人们的需求和食物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这豪华的环境把广告系统与其他系统区分开来了,这样员工的归属意义就得以加强。根据罗森的说法,这种豪华的环境也暗示着,那些商业“成功”人士也有可能“进入”这种富丽堂皇的世界。大多数雇员平常没有机会进入这种豪华酒店,但这时他们来了,因为他们为斯皮罗的公司工作。这一情形暗示着工作越成功越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世界。

罗森还细致思考了服装问题。通常不同款式的服装表示不同的工作性质或地位。对于地位高的员工,规范系统有其相应的非常细致的规定,如严格的、更正式、更昂贵的服装。而对于一般地位低的员工的服装则具有更大的随意性。但在年度早餐庆典上每个人都穿同样严格的服装。这里,所有人都穿一样的服装就把所有差异都掩盖了。共性与团体性的观念在这里被强调出来了。

罗森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公司的发言演说。他还像下面这样详细地描述了为工作时间长的员工作报告的传统。这时,两位

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的员工获赠了礼物。其他工作了五年以上的被提到名字，然后他们都站起来接受礼貌性的鼓掌。然后是那些比他们在公司工作时间更长的员工。最后被点到的是已为斯皮罗公司工作了37年的那个人。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意。最后，全体员工的四分之一都站起来了。罗森(Rosen，1985：37)强调了关注忠诚的重要性。

> 对于雇主来说，"忠诚的"雇员可能比新的未被公司化的雇员更有价值。习惯了的工人已内化了公司的形式规则——被控制也就显得自由了——而且通过实践可能已经提高了技术，加强了客户关系等。

对资历认同的仪式化，赠予礼品和公开肯定的形式，表示和强调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精神联系。 142

我们在这里不会进一步细察罗森的解释。他的研究工作表明，从表面上看单纯而积极的社会活动也可以从支配力的角度来理解：支配力的具体因素是如何在社会关系中被象征性地创造或再创造的。罗森的主要方法是精读。他有广泛的经验支持他，这些经验为他提供了对他所关注的情形之更广的组织语境的重要洞见。这又意味着他可以看穿演说等情形下的各种陈述，一些新的听众可能会认为这些陈述只有表面价值。他也从未想过以夸张的形式来介绍资料。

罗森并不认为自己拥有特别多的现场参与者对年度早餐的看法。对此作点阐释会很有意思，但是这种亲身参与观察的一个优势是，研究者并不依赖于那些人现场感觉和传播有关控制(control)和支配(dominance)观念的能力。这些观念之所以起作用，就是因为它们并未被完全意识到，或者被认为是禁忌，即使人们可能在访谈中讨论它们并有些洞见。

这种表征模式的一个弱点是，有时在经验描述与理论分析之间有距离，因为过多地使用了研究者的理论架构。在涉及批判解释时经验材料不会为自己说话，哪怕经验材料细致入微。相反，论证、假设和推演则很突出。

总结:批判理论作为三重解释学

批判理论在研究中把注意力放在政治维度上。社会科学在关涉社会现象时不能够保持中立和客观。因而其核心与被表现和解释的方式常常倾向于巩固或指谪现存形势。社会科学赞成或不赞成不同的利益,不是由研究者的个人意愿决定的。它很难说是一个不断巩固或扰乱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和制度的问题,而应该是这些性质的混合,有时是在不同层面上。例如,从不平等报酬方面来挑战非正义可能正好再现了金钱的意义——当代社会支配性的媒介和价值。

在某些案例中巩固和复制的倾向是很明显的。精英群体的利益和视角在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例如,公司管理的视角和价值渗透在管理和商业经营领域的研究中。各种职业群体能强化他们努力实现职业化,然后是他们的地位和其他特权,如果他们的活动领域成了研究的对象,而研究又倾向于为他们如工人和护士的工作提供科学基础与合理性证明的话。与政治有明显关联的一个领域是性的研究。几乎不可能把研究中的性被表现或隐藏的方式与性—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分离开来。

143

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来看,在科学和既定利益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关联还不是最有意义的。更要注意的是,支配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研究中被无批判地视为当然并被再现(reproduced)的。作为社会中的成员,研究者倾向于把他们所属的特定社会中的现象视为当然,然后潜意识地传递了它的基础价值。实际上,某项研究中的反思通常集中在很有限的部分上。当研究者谈论他们的前理解的时候,一般只是注意到了带入某项研究中的所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印记中的一个有限的部分。

批判理论鼓励了比大多数主流社会科学的反思特征多得多也是更合适的反思。研究应该促进批判反思和从僵化的社会和观念形态中解放出来。这尤其适用于研究者自己。根据批判理论,研究过程必须包含自我反思,必须对抗从当然的文化立场解释现存社会实在这一自然倾向。这是一个学习保持克制自己把

社会条件和思想的支配形式视为自然、中性与合理的问题。

批判研究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三重解释学。在社会语境中,朴素解释学关涉的是个体对自身以及他们自己的主体或主体间的(文化的)实在的解释,以及他们为这指定的意义。双重解释学是研究从事解释的社会科学家,当他们试图理解和发展这种实在的知识的时候。因此,社会科学是解释解释者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相对照,自然科学当然要解释,但却是解释一个非从事解释的实在。自然自身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解释当中来。当然,甚至在这里资料也是通过解释构成的)。批判理论的三重解释学包含了上文提到的双重解释学,也是这里的第三种解释学原理。这种解释学包含了对潜意识过程、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及其他支配力量之表达的批判性解释,在看似自然产生的理解形式中,这些支配力量需要对其他力量有某种利益特权。于是,批判解释的关注焦点和兴趣产生了一种转换,从显示为自明的、本质的和不成问题的解释,转向了对社会生活所作的冰冷的、非理性的和可变的解释,后者成为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的对象。

研究中批判的—政治的维度或多或少可以给点分量。我们很难期望所有社会科学都首先或专门由解放认知兴趣来引导,其他认知兴趣在社会科学中也有它们的作用。在反身性研究中,这一意识形态—政治的维度必须要考虑到,但它对研究者的研究而言不必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我们看来,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研究者要承认,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在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政治的语境中进行的,只要不被认为毫无价值或完全被忽视,这里的研究乃是根植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的,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再现、强化现存社会秩序与对这一秩序的挑战之间。在好的研究中,这种承认应该在研究的语境中是可以辨别出来的。研究者应该避免迎合已确立的思想和支配利益。

144

我们选择批判理论来说明反身性研究中的政治意识。这种取向上的批判可以有多种形式。未曲解的交往概念的实在论可能受到质疑(即使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也有点太过“理想化”了),它可以被视为考虑到了交往条件中的干扰和成功的一种电话线隐喻。合理性概念,从历史条件来看是非反思性的,但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如高扬理性的西方世界,看上去比哈贝马斯所承认

的更可能发生。解放的观念有一个狭义的理智中心,并太少去关注权力关系和实践环境与限制。总之,批判理论采取了太过"理智化的"理论立场,这也使它很难适用于经验研究。它是高度理论化的(这意味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很容易预先构建那些倾向于被认为与批判理论的架构、假设和术语表相符的经验材料。批判研究容易"使得解释过程的方法论不清楚"(Denzin, 1994:509)。认为认知总是兴趣驱动的这个观念看上去颇为简化。就没有以认知本身为目的的这种认知吗? 当然,大量研究都与研究者自己的职业抱负有关而不与任何特殊的认知兴趣有关。从反身性方面来看,批判理论容易片面地把关注的中心放在被看作是社会及其制度的否定性特点上。在经验研究中,重要的是要善于接受社会制度非压制性的、更加"积极的"方面,并扩展解释的保留内容(Alvesson and Deetz, 1999)。然而,正如本章要表明的,我们感觉到批判理论在解释的第三个层面上有很多贡献,它展示了一种广泛而有力的传统与以研究的本质为中立这一天真观念相对。我们现在要从这个层面进入到第四个也是最后的层面了。

注　释

[1] 我们在这里采用的是一般公认的用法,尽管作者们通常并非不会偏离它。例如居巴与林肯(Guba and Lincoln, 1994:190)说"批判理论(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表层术语,它指出了一套若干可供选择的实证主义范式……"。就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许多高度区别的学派,从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放在同一个标签下不是特别有好处。更何况破坏"批判理论"这一术语的主流用法还会有造成相关混乱的风险。

145

[2] 阿格尔(Agger, 1991)表达了一个有些不同的观点,他宣称,就像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一样,批判理论的最大力量在对于方法论和经验方面的贡献。可是,他所提到的方法论方面的意义是很一般化的,如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而且他几乎没有参考任何具体的经验研究。一个更为通常的看法是,批判理论批判的是关于方法的主流观点,而没有提供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法(Eliasson, 1980)。

[3] 当然,这样一种接受的条件必须批判地加以评估。

[4] 这里的问题是: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构成了社会生活与言说行为

的必要前提的文化传统中梳理出有问题的文化观念。

[5] 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1992:288)认为"自主"是"对自身法则和基础作无限制的质疑……它是理性在一种无穷运动中创造自身的反身性的活动,既是个体的理性也是社会的理性。"

[6] 这是一个理想类型的问题,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以政治为语境的,它常常以压抑暴力的方式而不是以自由释放的方式被开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精神分析对于解放的贡献也是可疑的。在精神分析的实践和思想意识中当然也都存在反解放的因素。我们在本章下文可以看到,这一运动本来可以帮助建立一种治疗文化(a therapeutic culture),这种文化使得人们夸张地以自我为中心地集中关注他们的心理缺陷并依赖于治疗专家(Lasch,1978)。福柯(Foucault,1978)也强调有关性的话语的定序和构成本质。他指出"有关性的话语已有一个不断优化和价值稳定的过程"(Foucault,1978:23),这与其说是导向解放不如说是关注和控制个体内部生活的特定方面。然而,根据哈贝马斯,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原则上是采取解放的方式的。

[7] 批判理论宣称,社会现象主要不是受规律性支配的,规律性超越了历史和文化的变化。不过,我们应该考虑到其可能性,如人发挥作用的方式的特定方面是相对持续的,而不是仅仅与不同的社会条件相关的"模型"。

[8] 然而,有些批判理论家强调驱动和愉悦作为潜在的解放力量的重要性(Marcuse,1955;亦见 Burrell,1992)。

[9] 当然,这些价值的广泛和普遍的程度并非是毫无疑问的。传媒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个人暴力(动作电影)和身体虐待(令人大倒胃口的阴性理念)。

[10] 可能存在特定文化与社会语境内部的(雇佣)失业与心理问题之间的某种"自然法则"类型的关系,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短期来看,它也不能缓和识别有助于他们的心理素质的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安排的方式问题。然而,在更广的语境中,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来看,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为经验结果的研究或解释和讨论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而是思考某一特定的社会语境——特定的工作意识形态是其中心——是如何帮助构成这些问题的。否则研究有可能要谦卑地冒着无批判地再现和加强关于工作和(雇佣)失业的统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然后加之于正在寻求解决的问题中。

[11] 大量研究由于研究者的职业兴趣而有点狭隘,而其更广的社会意义是轻微的或不存在的(Deetz,1995)。这样一种研究环境把研究与在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紧密结合起来,这特别容易把研究与发表文章的结合看作一种游戏,发表文章在这里成了最终的目的。另外一个有关研究的问题是实际应用问题,这里所谓的"运用"很少能经得起严格的研究性的评估,在这

146

里成为“北极星”的很容易是金钱报偿,而不是在促进认识发展中的任何开放心灵的兴趣。在这种取向中,“此种情形是何种情形(so what)?”这个问题是由多重根据激发的,批判理论有助于赋予研究以更广阔的社会关联。

[12] 在肖伊尔曼(Scheurmann,1984)的著作中,一位来自南海岛屿的酋长对当代欧洲给出了他自己的人类学的、引人深思的图景。他发现我们用金钱来换取一切而不是呼吸,这个习性特别有趣。他认为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呼吸…… 147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动摇主体与文本

第5章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Destabilizing Subject and Text

本章所讨论的方法（或多种方法）起源于1960年代的法国，这时以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尔特和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观念领域开始消解，并被“后结构主义”（哈贝马斯等学者称之为新结构主义）方法取代。后一思路中最杰出的人物当数福柯和德里达。尽管福柯本人竭力反对，但还是经常被视为一名结构主义先锋。在后期的著作中，他有点动摇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我们将会在第6章介绍他的思想。后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那里带来了一些关键属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语言上受到启发的结构与符号互动的（索绪尔主义）论题。不过它打破了支配结构的主导中心这一观念，也打破了下述观念：共时的、永恒的要素比历时的、叙事的这些与时共进的要素更重要。文本成了与符号的“自由互动”，而无需固着于文本的制造者（主体）或外部世界之中。

自1970年代，尤其在利奥塔尔的著作《后现代状况》（1979）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一词变得越来越普遍。[1]这里在前线上不只是反对结构主义，而且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遗产，据称形而上学思想渗透到了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西方传统中，并且尤其体现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诞生，它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理性的、全局的解决和说明，存在某些一般性的原则，它们保证了知识的发展进步。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些东西并非名副其实，而只是各种神话或“宏大叙事”，颇富修辞色彩的主流话语，应该被微观史学——局部的、总是有条件和限制性的故事——取而代之。这些微观史学自称名副其实，同时也

并不试图抑制权力、冲突、矛盾和分裂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在任何话语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或者如同在后现代主义中那样公开出现,或者如同在形而上学中那样隐蔽地出现。尼采彻底消解了强势的、理性的话语,因此他是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位重要先驱。海德格尔以及弗洛伊德可以称为启发者(但很难称为先驱)。 148

后现代主义在 1970 年代也开始被用于建筑学中,指示了一种受传统和局部激发的方法,与非历史的和超理性的功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根据詹克斯(Jencks,1987),现代建筑学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死亡了,可以确定其死亡时间是在 1972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3:32,此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城、始建于 1952 年的超现代主义风格的布鲁特-伊果(Pruitt-Igoe)复合住宅群被炸药炸毁。该住宅群长期遭受居民的严重破坏,最终变为一座贫民窟。这座住宅群的建造依照的是所有纯功能主义的原则,有"敞亮的街道、阳光、空间和绿化",还符合一种医院隐喻:为居民注入清洁和健康。可是这一切却并未使居民感到舒适。尽管投入了数百万的资金来维持它的存在、修补损毁,但最终消失殆尽。于是,天真的理性主义沦为了非理性主义。相反,后现代的建筑学寻求小尺度、局部和历史性地出现的细枝末节,而"现代"建筑学却是尽力砍削这些因素。

本章要讨论的主要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S)和后现代主义(PM)中跟哲学和方法论有关的一些论题。另一方面,我们只会稍微关注与后现代社会有关的思想等。我们首先简要概览一下 PS 和 PM 的一些变种。接下来关注某些核心人物和论题:德里达和解构,利奥塔尔的知识观,主体(个体)思想,以及作为叙述和修辞的科学和文本制造。然后我们为受到后现代主义观念启发的研究给出一个经验上的例子。我们的批判在书的后部分,不过在下文的倒数第二节我们会做一种一般性的批判评价。本章结尾讨论 PS 和 PM 对于经验研究的一些隐含意义。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变种

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个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名称。因此我们不可能在两者之间建立任何确定的关系。[2] 穆白和帕特南(Mumby and Putnam,1992:467)认为 PS 是 PM 中的诸多学派之一,集中关注论说和语言形态,这些形态对于主体性和同一性的产生至关重要。有些作者只是简单地“忽略”后结构主义,认为它是在可被称为“PM/PS”的宽泛定位中的一个特殊变种,因而他们只提后现代主义。除了这些作者之外,几乎所有相关的作者都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置于这一范畴中。福柯一般被归属为 PS,但马戈利斯(Margolis,1989)把他与德里达等人明确地划清界限,认为他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典型”。他的辩护如下:福柯并不满足于解构对文本的“反应式的和寄生式的(reactive and parasitical)”态度,而是引入更为“整体性的(holistic)”努力,利用种种可取的理解方式,来重新思考历史和强势思想。(我们将在下面更加具体地考察解构。)这种论证一点也说服不了其他学者,认为福柯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的这些学者,其根据是福柯试图重新思考我们的主体概念,以及权力和产生权力的规训(discipline)概念。至于福柯自己,就如同有关学派的其他大多数核心人物一样,完全保持与那些标签的距离,而且尤其厌烦“后现代主义”这一名称(Foucault, 1983)。也许罗西瑙(Rosenau,1992:3)最好地描述了大多数人心中两“后”之间的差异,她写道:“后现代主义者更多地指向文化批判,而后结构主义者强调方法和认识论问题。例如,后结构主义者关注解构、语言、话语、意义和符号,而后现代主义者网撒得更大。”然而,这更多的只是强调,而非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区分 PS 和 PM 的理智世界的所有努力,其价值都将有限。

149

不过,所有这些带有哲学意味的主题,仅构成了近几年来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标题下所引发的方方面面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术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已经被当成口号,用于大量不同的主题,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彼此几乎毫无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谈建筑、艺术和文学中各种各样的风格

(Foster,1985);某种科学的和知识的概念(Lyotard,1084);一种哲学风格,经常伴随着强烈的语言关注(Derrida,1976;1978a;1978b);一种文化心智,或者适用更广泛(Daudi,1990),或者限定于理智方面(Bauman,1988);一种社会纪元,在现代西方国家被看作是肇始于二战结束后的某个时间(Jameson,1985),或者由计算机革命刻画(Lyotard,1984),由媒体和“想象”(模拟)的影响刻画(Baudrillard,1983;1985),或者还是由消费取代生产而作为经济中的核心元素来刻画(Jameson,1984)。其他建议包括,在某些合适的社会亚领域中的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即打破差异,如科学与亚学科(Jameson,1985),高等和低等文化(Lash,1988),或组织中的分工(Clegg,1990)。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可被恰当地用于指称东欧政治变革和“共产主义的灭亡”(Madison,1991)。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潮流,就跟它的相对面(counterparts)如现代性、巴洛克时期、文艺复兴等一样,不容易用现成的定义来把握。(众所周知,即使如“阶级”“权力”和“文化”这类常见的社会科学概念,也难于定义;顺便提一下,如“物种”和“质量”之类的某些基础自然科学的概念同样如此。)艾尔维森(Alvesson,1996)从更为怀疑的角度反思了一种急迫性,它经常体现在对流行观念的采用和获取中,这类观念很容易因为过度利用而丧失其实质和意义。PM/PS 这一术语的可选项可能还有:“解构主义”“文本性”“对话研究”或“反身性”,但作为标签,这些术语也并非没有问题。 150

至于政治立场,也存在着差异。所有变种似乎都有可能。在人们心中,有时后结构主义与社会批判主义的倾向挂钩,但这并非必然成立。许多后结构主义作家根本没有表达明确的政治承诺,这就是为何他们有时被看成是保守的原因之一——例如,在马戈利斯(Margolis,1989)看来,“德里达确实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Newton,1996)。由于他们平静地避开现存的社会“实在”,强调我们不可能对它说些确定的东西,更不会就社会改革的方向提出建议,因此那些说法可能还有点道理。不过,搅动局势、质疑(强势)表达形式的这种趋向,本身可以是颠覆性的。而且,由于 PM/PS 经常与某种意义上显得激进的视角如女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其思想自然而然也会步入类似的方向。[3]我们在后面会回

到这个话题。

关于批判理论和PM/PS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重要的不同看法。特别是在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重大差异,经常被强调。哈贝马斯(Habermas,1985)并不关心这一群体,他批判了福柯和其他人的新保守主义,而他自己也不得不受到后现代主义者对合理性的批判(Lyotard,1984;见下文)。但许多作者强调共同点,比如对现代科学观念的批判;普遍的质疑态度,如启蒙运动传统,包括工具理性;以及媒体和消费的角色。这尤其关系到更具批判性和颠覆性的PM/PS变种(Kincheloe and MacLaren,1994)。例如,许多作者用称许的词语指称福柯和批判理论(例如,见 agger, 1991; Alvesson and Willmott, 1992; Deetz, 1992; Sampson, 1989)。我们在本书中更强调差异,但我们也主张,两种定位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指向一种反思性的社会科学,并且它们都能在被指责为建构性张力的领域中发挥补充和平衡作用(Alvesson and Deetz,1999)。

在讨论过这些差异后,我们也许可以谈谈被定位为哲学和元科学的多数PM和PS的"典型"特征了。这里尤其有趣的是一些被引入的新思想,它们关系到语言、意义、主体、理论指称结构的可能性和可欲性,想象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风格和文本制造中文学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这些思想质疑了语言能力,质疑了学者描述外部实在和指示意义(内容)的能力,而在传统看来,语言是能够传达意义或内容的。因此,"表征"问题走向了舞台中心。据说语言是有矛盾的、是不可捉摸的、是隐喻的和有构成性的,而非毫不含糊的、本义的和描述性的。由于语言本来在学识中至关重要,因此这就意味着对诸如客观性、实在的反映、清晰性和合理性这类传统性质的质疑。正如布朗(Brown,1990:89)所言:

151

> 后现代主义把社会理论和研究的议程从说明和证实中转移到了学者/修辞学者的对话上去了,这些人力图指导和说服彼此。理论真理不是固定的实体,可以根据直线式或等级式的元理论蓝图而被揭示,而是在一种不断前行的自我反思的共同体中被发明的,在该共同体中,"理论家""社会科学家""靶子"和"批评家"变得相对而言可以互换。

此外,这还意味着研究者和研究的权威被从根本上受到质疑。研究者能谈论"实在"吗,他们的谈论在质量上优于其他人关于实在的陈述吗? 关于"真理""合理性""理性",甚至"好的解释"的观念,有何主张? 尽管 PM 和 PS 在某种程度上与解释学共有一种对诸如合理性、普遍主义和因果说明这类理念的深层怀疑,但它们并不持有这样一种思想:提出最好的或任何一种解释,拥有优越的、启发性的洞见,或找到一种非凡的整体意义。就如林肯和登津(Lincoln and Denzin,1994:579)所评论的:"如果后结构主义思想中存在一个中心,那么它就处于一种持续的尝试中:尝试从一个文本或任何文本中剥离它对权威的外部宣称。"(当然,作为一种规则,PS 的作者们自己声明废除其"思想"中的任何"中心"观念)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者关注理论的建构方式、其假定、其修辞策略和对权威的宣称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的想法不是要找到一种完整的理论指称结构来把分析引向毫不含糊的、符合逻辑的结果和解释,而是尽力寻求多重性、变异、对非一致性和分裂的揭示,以及多重解释的可能性。罗西瑙(Rosenau,1992:8)很好地总结了 PM/PS 方案(尽管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前进,她对主观性的最终介绍似乎是错误的):

> 后现代主义重新安排了整个社会科学事业。持有现代信念的人试图分离元素,阐明关系,形成一种综合,后现代主义者的做法则与之相反。他们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多样性而非统一性、差异性而非综合性、复杂性而非简单性……随着真理让位于暂时性的假设,社会科学变成了更为主观和谦卑的事业。

"实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征,这也是一个核心主题,应该听到多重声音,则是弥足珍贵的理念。真实表征和解释的这种观念遭到质疑,而且据称,社会科学事实上不可能反映"实在"。在许多变种中,甚至"实在"也受到了质疑,人类经验是靠论说自我构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存在"于外部,而是存在于语言中。在这些主题更为激进的变种中,对"实在"的描述几乎只是一种修辞策略,它是为了制造某条具体陈述的可信性和权威而被借

152

用和提出的。事实不能脱离虚构。常规社会科学妄图采用理性的方法,以此为出发点,从而提出可靠的结果,或提出那些体现出正确的或最好的现象意义的解释,而在费瑟斯通(Featherstone,1988)看来,PM/PS 抛弃了这种雄心壮志。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是"寄生式地沉迷于反讽、不连贯、不一致和社会学作品的文本间性"(Feathestone,1988:205)。

现在我们更为详细地讨论一些作者和主题,它们有助于这种取向的建立,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上面所勾勒的内容的理解。下面的讨论自然不是旨在完全覆盖这些行为,而是在于引出其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我们忽略了多个方面,如德里达—福柯之间的讨论和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当谈到该方法的重要灵感尼采的时候,我们的内容集中于这位多面哲学家的批判性方面。这位经常遭到误解的思想家的思想库蕴藏丰富,而批判则会掩盖它们(对反犹太主义和原法西斯主义的指责早在 1950 年就被反驳了;见 Kaufmann,1974)。尼采首先是一位善于对比图景或相反形象的大师,以至于有人批评他缺乏一致性,被忽略的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一种相反形象并不需要与另一相反形象保持一致。就如德里达(Derrida,1989b)指出的,存在多个尼采。然而,在图景或相反图景的背后,同样存在另外一种东西:尼采的批评者们经常忽略了,却启发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

德里达和解构

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几个变种构成了一些很好的示例,显示出了一种被反讽的修辞手法支配的思维风格(Lemert,1992;Rorty,1989;Sköldberg,2000b)。反讽不仅在德里达那里显得突出,也许还是这一方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悖论、谬论和逗趣的矛盾在这里层出不穷。例如,德里达在对黑格尔的一处讨论中,挑衅式地以一个平行文本大肆讨论同性恋和犯罪小说作家让·热内。像"延异(différance)"这样的"反概念(anti-concepts)"是另一个例子(对此更多的讨论见下文)。著名的"文本间性"问题表明了这种反讽的思维风格如何在进展中显露自身,也就是

说,文本如何被构想为随时间而出现的。单部作品看上去类似于混乱的无线电发射器,从它们想去描述的虚假实在中抽脱出来,到处充斥着或多或少可理解的片断的嘈杂声,这些片断来自世界文学库这一巨大的轻灵缥缈的大海之中。对文本的更加“客观的”、表征式的观念的反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53

解　构

“解构”运用了反讽的方法,它在被研究的文本中暴露了一个隐蔽而具有决定性的弱点——表面统一中的破裂。之所以是“表面的”,是因为文本在某一点上无法从其自身的前提中推出结论来。这种疏漏渗透在整个作品中。通过解构,被抑制在非存在范围内的各个方面,就被引到中心位置来了,因此边缘角色就转变为主角了。

因此,解构的意思是,建筑物表面的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破裂将被证明是整座建筑的缺陷的征兆;或者用另外一个隐喻来说,存在着一个明显无关紧要的伤口,但实际上它流出的血染遍了整个文本肌体。[5]因此,实际的统一不是文本中公开宣称的系统统一,而是另一种统一,现在被揭示出来,而之前处于抑制状态。在此我们发现 PM/PS 中有个矛盾,因为系统地分解了作品的统一性,而制造出了一种新的、第二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此前是隐蔽着、被抑制着、从属的。

事实上,它还导致了另一种统一性,即第三种统一性,因为解构并不满足于这种反讽的、颠倒的真理,而是把对它的应用甚至拓展到被研究的作品之外,从而进一步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意识,这新的问题意识又能为更普遍的发展提供基础。这就有点像下述情形:有人指出迪斯尼电影《小姐与流浪汉》那生动美妙的表面背后潜伏着暴力,它实际上是影片的主导情景。然后他把这种推理加以扩展,认为无论是和谐温情的家庭电影,还是动作电影,背后都有这种普遍形式的对抗,不过重要的是,它不能被还原成田园诗或暴力,而是有远大的抱负:比如延伸到其他的电影类型(喜剧等),甚至其他的艺术形式(戏剧、文学、歌剧等)。

因此,解构的第一步是打破,然后把一直被抑制的方面转成支配性的方面。然而,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颠倒两个对立面的等

级,把主从互换。在解构的第二步,我们消除两对立面的差异,并用另一个概念来取代整个的对立(Krupnick,1983)。这两步同样也揭示了"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第一步是对先前强势图景的瓦解,而偏爱隐藏着、被支配着的图景。第二步是对这两极的瓦解,并且同时取代它们,从而建构新的和更远大的东西,其中先前的两极最多构成特殊案例。

举个例子,而且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例子(Derrida,1976;1982):意义理论通常源于所谓的"概念三角"术语—意思—所指物(term-sense-referent)(Ogden and Richards,1956),或者换个表述,语词—意义—对象(word-meaning-object)(符号—能指—所指(sign-signifier-signified))。也就是说,一个概念,一个语词既详细规定了一套属性,它们在一起构成了它的意义,也规定了许多具有这些属性的真实现象(所指)。

154

统一性1:口语和指称之间的统一。在对此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德里达表明,在符号学、语言学、哲学和其他意义理论中,口语支配书写,他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这是因为,讲述更直接地表达了讲述者的意图,包括那些应用到外部所指的意图。(例如,逝去的人无法说话,但他的书写词语仍能存在,与他或她本人相分离。)语音中心主义导致一个流传更广、众所周知的概念: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的意思是任何事物来自也导向逻各斯,这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因此,现代西方哲学思维中的趋势是把任何事物都关联到它的逻辑—理性起源以及/或关联到理性目标和终点。

统一性2:书写词语之间的统一。德里达对统一性1以及所谓的口语特权地位的批判,导致了对脱离发言者(的意图所指)的书写词语重要性的证明。因此口语和书写词语的初始等级就被颠倒了。然而,尽管德里达想要绕开整体性和统一性,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却出现了新的、第二种统一性——书写、自足文本的统一性,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局外人可能会想把它称为"书写中心主义(graphocentric)"的统一性。

统一性3:原初书写。不过,解构过程不仅仅满足于颠倒等级(这一阶段是从口语转向书写词语)。我们必须有第三阶段,而这

进一步导向了更深层的所谓原初书写理论。这是言说和书写的前提,但在该理论中,言说和书写之间的对立消融了而只留下程度上的差异。即使在言说中也存在断裂:思维和言说之间的断裂,言说和倾听之间的断裂。原初书写是与非指称符号进行的一场"自由游戏",这些符号只是以一种不担责任的嬉戏方式进行对话。因此,如果吹毛求疵的话,我们可以说原初书写也是一种统一,尽管这与德里达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不是一种符号学之类的系统统一。在这种自我指称的符号闭合空间中,任何事物在发生的同时,却又并没有什么真实地发生:越是变化,越是老样子(plus c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这种闭合空间中的自我指称把我们引向上面已经提到的"文本间性"。它也存在不一致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提出批评:德里达为彻底的开放性和拆解所有闭合系统做出辩护,但与此同时却保持"文本"论题,"文本"自成一体,与外部世界隔绝,不关涉任何外部实在,只关涉自己。　155

延异(Différance)和形而上学的在场(presence)

文本间性的自由游戏可以用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来指涉,它有双重含义:它意味着差异(difference)和推延(deferral)。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都可以被看成文本,根据语言学(索绪尔)启发下的德里达的法国结构主义传统的看法,文本是由同符号之间的差异的游戏构成的。同时,作者意图——他/她关于所指的指示——的实现,实际上是无限推延的,它们只是在作品中留下"痕迹"。于是,文本使自己成为自主的了。

在德里达看来,这些差异和推延,换句话说,以所谓的延异形式出现的不在场,比在场重要得多,他认为在场渗透到了整个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之中。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德里达工作的重心。根据这种形而上学,某些底层的、更初始的或更基本的——时间上或概念上的——原则体现在更表层的、可观察的现象之中。因此,德里达批判的是以显现为基点的思维。所谓的显现,其意思是说,我们遭遇的事物背后存在某种东西,它是一种在幕后操纵的隐蔽的实体或权力。但是按照德里达以及一般而言的 PM/PS 的看法,不存在隐蔽的权力或实体,有的只是表层。

在场形而上学的例子很容易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哲学配备了这样一些经典范畴,如现象中本质的在场;偶性中实体的显现;人的实现(人文主义的一个目标);现象学中生成其世界的超验自我;存在主义的解释学中对存在的理解,该存在自我出现和自我揭示;结构主义的解构,还有它核心的生成原则,等等。社会科学中的例子可以是:结果中原因的在场,方法中目的的在场,表层结构中深层结构的在场,个体行为中的个人意图,权力执行中的权力基础,等等。

因此,德里达批判了整个西方思维的在场的形而上学。这是一条抽象、简单、基本的原则,而且它渲染了我们整个心智世界。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德里达自己的反讽思维,就会发现它似乎也难以避免相同的缺陷。比如,他写到,不在场(延异)在自由游戏中具有一种"在场"。[6]他想用两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第一,他说延异并不是一个概念。天真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这是一种诡辩:如果这个词语不是一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和非概念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德里达确实是这样写的吗?第二种辩护是,延异与形而上学的在场概念相反,并不具有内在建立的目的或目标(尤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某种源头的生成原则。所有这些都能受到质疑。一方面,德里达事实上似乎是以某些人为目标,即,通常所谓的游戏人(homo ludens),游戏中的人,这(明显)受到了尼采的"超人"的影响。因此,这就是差异和对立面的游戏的(人的)目标,延异就参与了进来:与符号进行游戏的个体,如德里达自己,从所指和诸如烦恼的各种外部责任中幸福地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再确定不过的是,延异是一种源头的生成原则,它是自由游戏的源泉,德里达自己甚至都说它先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本来就已充当了万物的初始源泉。应该注意,这种虚无或空洞的思想绝不是我们可能会以为的那样是什么新思想,实际上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莫名其妙地完全忽视了,但在佛教哲学(例如,参见 Murti,1980)中,它是十足的中心。即使是"自由游戏"也凑巧出现在印度哲学中,出现在著名的概念"利拉(leela)"*之中,它是神圣的创

156

* 利拉(leela),也就是游戏。——译者注

造舞蹈，没有目标，完全出于娱乐。因此，亚洲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场——不知情的观察者可能会认为，这跟任何被 PM 批判过的东西一样，是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符号。

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与印度哲学相反，德里达的否定、自由游戏中的不在场，具有一种深层的、确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其实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Nietzsche's will to power）。自由游戏就是尼采的强力（forces）游戏，一个自我指称的“系统”，其中不同的能量直接冲突：

> 因此，我们可以用延异命名不同力量以及力量之间的差异的“主动的”、动态的冲突，尼采设置了这种冲突以对抗整个形而上学语法体系，无论这种体系在哪里起到支配作用：文化、哲学和科学（Derrida，1982：18）。

尽管对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满怀敬意，不过我们必须说，尼采在对权力意志的追求，就像他批评过的任何思想家一样显得那么的独断。他没有提供任何论证，就断定了权力意志，就好像万物最终能被还原一样。[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德里达的自由游戏中的差异、不在场背后，存在一种终极的在场：尼采的权力意志，独断式的断言。尽管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及其哲学基础做了批判，但由于他未加反思地接受了尼采的同样未加反思的权力意志，而最终陷入了同样的陷阱。

概括来说，所有其他思想家都因为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受到批判，这种形而上学为所有这些体系建立了终极基础。作为对抗，德里达提出了建基在延异之上的自由游戏。但这意味着这样一种不在场：空间上的差异和时间上的推延。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差异化、这种不在场在自由游戏的情形中具有一种在场。因此德里达也深陷于他批判过的同样的形而上学的在场中。这会变得愈发清楚，只要我们看到下述事实：差异化可以归结为不同力量之间的差异，这种力量是尼采独断地构想的，是还原主义的权力意志论题，德里达明确继承了这一点。因此，这种权力意志是终极基础，就像海德格尔的存在，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an-sich 即物自身），柏拉图的善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在显象中显现它的在场。[9]因此，尽管批判了其他作者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但

157

德里达自己确实最终陷入了双重的在场的形而上学:首先,他说“差异”存在于在场的背后,其次,权力意志居于延异背后。

脱离指称的自由

为对抗德里达的脱离指称的自由,即自由游戏中外部所指的缺乏,我们可以对比另一位重要的当代作者克里普克(Kripke, 1980),在对概念三角“术语—意义—所指物”的批判中,他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自分析哲学的摇篮时代(包括弗雷格和罗素这样的思想家)起,就为意义树立了首要地位,而克里普克反对这种地位。相反,在大量的论证后,克里普克坚持指称的首要地位。在他看来,词语并非像罗素想象的那样是“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s)”,而是“固定指示词(rigid designations)”,其目的是为了“固定指称”。这就相当于在竞赛前给运动员一个编号。编号并不描述运动员,而是为了识别他/她。相反,描述则可能出错:“谁跑近了? 哦,是去年纽约马拉松赛跑冠军。”假如这位消息提供者并不知道那个运动员后来被发现服用了兴奋剂,并被剥夺了奖牌,那么他的这一描述就是错误的。再看另一个例子:用罗素的方式来描述德里达就是“《论文字学》的作者”,但是,假如经过仔细的考证,我们发现德里达让枪手替他写了这本书,那么这一描述就是错误的。

把词语看成是限定摹状词的观念,是与一种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维方式把定义放在中心,错误地把历史的东西还原成逻辑的东西。这就不得要领了,因为在克里普克看来,用词语指示确实具有历史的起源(例如,特别是如雅克·德里达在被命名时)。特别有趣的是,克里普克的思想(尤其是用于阶级时)预示了在现代哲学中复兴本质概念的可能性,因为固定指示所指示的是被指示的物体即所指中某种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指责后现代主义是“感觉中心主义”:(流动的)内在意义吞噬一切,什么都没留给外部指称。事实上,克里普克用了大量论证表明,语义学三角中的指称其实比意义更加重要。

与符号和市场的游戏

158

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正好发生在 1980 年代,这应该不是巧合。在那十年之中,一种制度成功兴起,它对这段时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制度完全可以用差异和推延来刻画,越来越多地体现了"与符号的游戏",以及从行动者和背后的实在环境中解脱出来。我们想到的是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对衍生市场——处理选择和未来——的解释,见 Bay,1998)。尤其在兴旺的 80 年代,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真空中的自由游戏,从所有对世俗事务的指称中摆脱出来。符号旋风刮起来,而不需要考虑恼人的实在。其基础是里根经济政策在这十年间带动的西方经济繁荣和货币市场的国际化/自动化。市场在东方取得的胜利,以及 20 世纪末指令经济(command economy)的解体,加强了这一趋势(比较 Madison,1991)。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后现代主义当然提供了完美的意识形态。针对地球穴居人的明快的反讽游戏,对于一个不扎根于实在的社会世界来说,它是一种理想的态度(比较 Baudrillard,1983,对"幻象"的论述,幻象是难以捉摸的想象或奇想,它们短暂无常,除了自己,不与任何其他实在有固定关系)。如果我们记得正是市场的另一极即指令经济或计划经济,成了许多后现代批评家偏爱的靶子,那么这种解释显得愈加有理。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优选经济——市场解决——的略嫌直白的寓言[10](有时候这种直白不只是一点点,比如在中国,根据媒体报告,在中国民主反对派批判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他们支持官僚统治精英,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抵御市场经济的壁垒)。1990 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衰退和金融危机,始料未及的巨大困境使市场经济无法在东方运转良好,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市场的意识形态投射——后现代主义。[11]这些观察关系到对有关方法及其解构为"市场中心主义"之可能性的接受。市场中心主义暗指一种隐蔽模式,市场看不见却是动力中心。这自然不可否认,但相反也意味着(既然这个中心是看不见的)该领域的所有作者可以是反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比如 Clegg,1990;Jameson,1984;Touraine,1992)。类似地,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在场的形而上

学的批判,并不与后者的反形而上学信息相冲突。

市场中心主义观念的根源或许恰好可以在两种研究典型中找到。PM/PS 的作者不厌其烦地提到经济的迫切要求,很难说是一种巧合。比如我们来理解德里达,下文引自斯皮瓦克(Spivak, 1976:xlii)

> 根据持续指导弗洛伊德思考的一种模式,踪迹的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生命的努力,生命试图用推延危险投资、建立储备(存货)的办法保全它自己。而且,所有引导了弗洛伊德主义思想的概念上的对抗都把每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关联起来,就像在差异的系统中的蜿蜒曲折的运动。一个概念只是另一个概念的推延,一个与另一个相异。

159

同样不太可能巧合的是,此种方法的大领袖尼采把他整个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未质疑,因而是教义式的)说成是自由力量的经济体制,他也把"自由力量的经济体制"指称为"权力意志"。匿名的市场力量在这里显现了,仍被德国哲学的服装掩饰着。权力意志作为一个"永恒的循环"是尼采哲学的中心论题,也是海德格尔解释尼采的中心问题(参看第 3 章)。而自由市场力量的游戏中永恒地不断重复出现者当然不是别的就是利益,它通过市场一次又一次地在其自身指称中产生了"超越善恶"的权力意志,这是市场自身刻画的隐蔽的行为者。"经济"一词无数次地在 PM/PS 作者的作品中出现,对"经济"一词的喜爱也正暗示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解构式地)提问,关于知识的经济隐喻的背后可能存在着什么,要么是计划取向要么是市场取向。我们的选项是对话、论证以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对此我们在上文已有讨论并将在第 7 章进一步展开。它并不是对主体之间的知识/意义的调和,而是在论说中对知识的创造。行为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某种程度的主权,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主权,而非绝对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既不在主体(绝对主权的行为者)的问题中,也不在 PM(绝对主权的文本性)中,这就避免了两种还原论。这并不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完美的、无噪声的交往,噪声、摩擦、误解、恼怒、"困扰"总会存在,并且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它也不意味着一种"超逻辑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里

市场竞争把行为者变成了傀儡。这些拥有一种不可还原的相对的主权,而且正是在行为者的相对主权与对话的相对主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产生了新知识。顺便提一下,我们在这里又可以与德里达(Derrida,1989a)来作比较,德里达在批评加达默尔的对话概念的时候指出,它以参与者的"善的意志(good will)"的根本公理为基础,与此相关联的话如下所引:

> 康德意义上的善的意志是"尊贵的",它是属于道德存在物的,它超越所有市场价值和任何可商的价格……因此这一公理会超越任何一种无论什么样的评估并超越所有价值,如果价值意味着尺度和比较的话(Derrida,1989a:5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加达默尔的对话概念当然容易被批评为一种夸大和谐的看法,顺便提一句,哈贝马斯的思想亦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其思想与加达默尔的思想间接相关。不过这里有趣的是,德里达批评这一概念正是因为它不能适应市场。这再一次加强了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市场中心主义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为市场中心主义的进一步的纲领是由这一运动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利奥塔尔作出的。 160

宏大叙事的衰落

利奥塔尔(Lyotard,1984)的观点陷入了与后现代主义和市场相似的形态:利奥塔尔反对"宏大叙事",认为这说的是神话或英雄故事,并解释了大量事件,它需要一种控制心灵的力量,这种力量以绝对真理或信条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举的例子是各种不同的系统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但是,甚至精神分析学、解释学以及其他精细而具有连贯性的研究方法都在这一范畴里。像其他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他关注的是细小的、局部的、片断的、历史地出现的、矛盾的和偶然的事物,与此相对的是一种统一的系统的建筑物,是思想的独块巨石和大教堂。[这里有一个先驱是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他在 1967 年的一部著作中介绍了"拼布工"(拼装),尽管这在他的著作中处于次要地位,但这一因素暗

示了思想的一种未来方向——见德里达,1978a。]利奥塔尔特别强调严格根据叙事来批判地分析主流叙事的重要性。甚至看上去"最真的"理论都只是故事、叙事,因而对它们的叙事结构的批判考查就成了根本工作了。(见第3章与里克尔比较)

利奥塔尔的批判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批判指令或计划经济的一种寓言,他赞同的是局部的、历史地出现的、片断的、暂时的、表面脆弱实际强大的市场。借用德曼(de Man,1983)在另外一种语境中使用的一个术语,利奥塔尔的这种寓言是"半意识的(half-conscious)",因为利奥塔尔明确地拒绝了计划经济思维,但并没有明确地特别拥抱市场解决这一途径。然而,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结论中明确说到,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在此范围内来研究,并努力达到其边界。在所谓的临时契约的形成中,市场的寓言最终完全明朗了(毕竟,契约和契约法正是市场的奠基石):

> 这一方向是与当下发生的社会互动的演化进程相符的:临时契约实际上正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域,以及政治事务等方面取代恒固的制度。这种演化当然有些含糊:临时契约之所以受这一体制的青睐,是由于它有更大的灵活性、最低的成本、及其相伴随的动机的创造性的冲动——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提高可操作性。无论如何在这里为这个体制提供一个"单纯的"选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都认识到了,随着1970年代的结束,对那种选择的尝试以类似的体制告终,它意味着取代。我们应该为临时契约的含糊这一趋向而感到高兴:它并非整个地从属于这一体制的目标,而这个体制却承认了它(Lyotard,1984:66)。

161

利奥塔尔也反对另一种批判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思想形式。对后者的批判是:他从根本上高估了摆脱纷乱和矛盾的交往自由的重要性,而且他为行为者之间的对话给定了一个错误的终极目标:共识(consensus)。利奥塔尔也发现了这种对话的价值,但他不接受哈贝马斯对它的协调。纷乱和矛盾将总是每一个对话名义下的都应该有的一个因素。而且更进一步说,对话的目标并不是共识(这只是一个中间阶段)而是"形似性(paralogy)"——

一种丰富的“歧见(dissensus)”,它瓦解了主流话语。共识可以要么基于解放的概念,要么是使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在前面一种情形中,它建立在“宏大叙事”上,它宣称发现了最终的解决办法。另一情形是通过权力利益的作用在工具意义上激发起来的。两者都是会引起反对的。而且,根据利奥塔尔,凭借着哈贝马斯那包含了这种对话最高准则的精神,对话的参与者通过对话达到统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最高准则是不存在的。利奥塔尔和特博(Thébaud,1986)把这一推理线索发展成了这样一种概念:不同行为者之间以权力意志为中心成分的自我指称的“游戏”。这样一种对对话的指示(或描述)听起来可能有点苛刻,但是在这样一种对话中,权力意志有一种多元论的而非武断的特征。张力、歧见和差异都是这个游戏中的不可还原的要素,其目标是创造性地发展而非完全战胜对方(因为这意味着张力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丧失)。尼采对此有显著的影响。

同样的推理线索也适用于科学,这里利奥塔尔赞成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5)的多元论。他认为在科学中新理论是混乱的和灾难性的理论,它们矛盾、含糊,它们的兴趣在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一些理论优于经典的、整体的和牛顿式的同质系统。因而科学在其内部结构中并非完全透明的,对它们的对象也不是透明的。利奥塔尔反对传统的表征和反映思维,根据这一思维,科学话语中的真理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利奥塔尔所把握的不是符合而是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论题:理论中创造性的原初的要素是科学结论中的重要因素。德勒兹(Deleuze,1983)在讨论尼采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尼采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而不说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他也强调,在地位和重要性上,创造先于表征,原创先于模仿,行为先于反应。那么,其有效性是什么?利奥塔尔的回答是,每一种科学的“语言游戏”都创造了它自己内在的确认准则。因此这些都不能从外部进入,而是通过科学话语自身产生的。同时这当然意味着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批判,根据这种科学哲学,科学活动的最高标准才得以建立起来。因而,利奥塔尔同意某些作者对持有类似观点的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实证主义的批判绝非巧合。利奥塔尔也考虑了实用主义方法标准的知识价值。于是,真正起关键作用的 162

不是真理的内容而是其适用性。对这个有效性问题的一个类似的回答是,它由市场价值决定,在市场价值里,知识随之被看成是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见柏格(Berg,1989)的讨论。这回过头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后现代主义的半意识市场隐喻的解释,对此我们在上文刚刚讨论了。

利奥塔尔的思想看上去应该成功地转型了。但是却并没有免于被批判。例如,罗蒂(Rorty,1992)和卡尔霍恩(Calhoun,1992)争辩道,利奥塔尔与更为普遍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以多元论的热情激烈地反对了科学的一般规则和标准,过分强调了不同观点立场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 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们从不同的传统凝聚在一起,或者同一传统中人们通过不同规则相互容忍,这看来首先应该是为了交往而打破障碍这样一种情形,而不是为了……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发展(Calhoun,1992:266-267)。

不同理论语言的不可完全翻译性与不可通约性并没有妨碍一个人学习多种语言。利奥塔尔从他的洞察中研究了太多的关于翻译和科学标准的多样性问题。罗蒂认为,没有发现可以作为普遍性翻译手册的某种宏大叙事并不必然会在科学内外阻碍和平社会的进步。

我们也可以问,如果用利奥塔尔的思想反对他自己的思想会怎样。难道利奥塔尔自己不会试图为认识的好坏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吗?进而这不跟他所批判的科学大教堂式结构一样是整体性的吗?又是一种"宏大叙事",不过这次是以一种真正超越的形式,因为它包含了所有普遍性的认识。他支持一种更为相对性的、摇摆的、矛盾类型的认识,以此作为治疗人类思想便秘症的万灵药。但是事实难道不是,他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后现代主义自身——不也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吗(亦参 Deetz,1992)?否则,它确实成了一种"宏大叙事"。换言之,难道怀疑和不可判定性不仅仅是认知过程的一个部分吗?它们不必有更进一步的综合补充吗?(除了歧见之外,利奥塔尔当然也谈到了共识,但这显得主要是口头说得好听,对于他而言,共识、整体与和谐代表的是非常边缘的价值)因此,难道不必为城市提供宫殿,不必为流浪者

提供帐篷吗?而且哪里才是中级建筑物?商人的优雅公寓,工匠的简陋住处,穷人的可怜小屋,还是茅草盖顶的农舍?难道它们不是都有自己的所在,如公园、街道和广场吗?难道这所在不又是整体风景的一部分吗? 163

对(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

大多数支持 PM 甚至 PS 的作家并不满足于推翻传统的关于语言和理论的指称结构的西方思想,他们还把注意力转向了个体的思想。这个词事实上很少使用,用得多的是"主体"。法国结构主义者和海德格尔都曾激烈地批判个体主体思想,PM/PS 建基于这一批判并继续批判着,但同时又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发展着它。这些都与传统背道而驰。据说这个传统把有意识的、自主的、整体的和有限制的个体视为意义的承载者和一种积极的"活动着的"被整个社会包围的主体(例如,见 Deetz,1992; Foucault,1980; Hollway,1984; Weedon,1987; Willmott,1994a)。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人文主义者的单一的主体性是西方的发明,这个主体性在任何时候都是稳固的和完整的。这一思想甚至受到那些并不与这一学派直接相关的学者的质疑。人类学家格尔茨总是把它看作西方民族优越感的一个例子,主体思想宣称个体是一个连贯的、独一的,以及从动机和认知上来说或多或少综合的宇宙,它是意识、情绪和行为的动态中心,这个动态中心的表面与具体社会和自然背景相关联。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个体概念占支配地位,他们想把主体从中心位置拉下来,即使之去中心化,并把重点从感知、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构成问题转向语言和论说语境,这一语境在社会上创造了受时空限制的主体性的形式和表达。主体性意味着个体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情感与感知,她对外围世界的自我洞察与态度。语言不是对主体性的表达,而是据称构成了主体性。语言的运用引发了思想、观念和情绪。接下来的主体性是不稳定的、矛盾的,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构。思维和行为"有赖于主体性与有效话语之间的循环"(Hollway,1984:252)。我们如何说以及别人如何说我

们,在某时某刻构成了我们的主体性,其可能发生的条件是各种论说场域,语言从这里流出,我们从这里发现自身。这样,某一个体可以被称为一个妇女、一名工程师、一个纽约人、一位母亲、一名时尚的瘾君子、一个纳税人或者一名滑雪者等,各种各样不同的主体(主体性)将被激活。这些个体又反过来可能因为有效的话语而以多种方式受到质询(被拜访),例如,不同的话语将产生母亲身份的不同意义。各种不同的情形需要特殊的身份识别,反过来具体的身份识别又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征:工作可能代表严格的要求、压力、机会或挑战;性可能意味着可欲性、欣赏、一个"性对象"角色或性陷阱;一种特殊的关系可以由忠诚、要求、强迫、道德、牺牲或自由意志来表征。因此,依赖于语言、表征和论说语境,不同形式的主体性被建构起来。威登(Weedon,1987:34)写道,经验没有任何内在本质的意义,而是从意义的话语系统在语言中获得其意义,在这一话语系统中,常常包含着关于社会实在应该如何来描述的矛盾的说法。

164

社会结构和物质条件意味着话语和语言表达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并把人们局限在各种形式的主体性中。所以,话语并非自由地发展的,也不是以任意的方式运转的。特定话语占有支配地位,例如,某些特定话语指示了关于何为自然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的感知和思想观念,甚至自然地把男人和女人说成整体的跨文化的范畴、性结构、消费和物质生活标准的意义。同时有不少话语和语言可以互动而作为主体性的指示者。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方法内部有些作家甚至想完全抛弃主体(关于 PM/PS 内部立场的范围的评论,见 Rosenau,1992:第 3 章)。但是大多同意使人类主体去中心化的思想,把它看作一种社会和话语过程的结果而非来源。

女权主义者尤其是这一观念的杰出的采用者。例如,弗拉克斯(Flax,1987)、弗雷泽和尼科尔森(Fraser and Nicholson,1988)和威登(Weedon,1987)指出了在根据可靠性和自然性来看待男性和女性的每一陈述中的名为社会构成而实为主观的因素。同时他们注意到强势话语中的内在固有的强大惯性,这强势话语渗透并植根于物质结构、法律等之中。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关于个体的这一观点把很多传统社会科学头足倒置起来,强

烈地暗示着这样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一切都被理解,从认知、动机、身份创造、性和价值到社会和文化形态。还应该指出的是,在这一场景中先于 PS/PM 之表象的很多行为和社会科学已经有点超出于自觉、认知、综合、理性主体之外。作为例子(高度多样化的)我们可以提到精神分析学、批判理论、行为主义、角色理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以及当然的结构主义。这些理论没有一种其意思是:关于主体的理解 PS/PM 没有表达新思想。

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批判是,它的许多支持者看上去过分强调了主体去中心化的重要性,把某种万能的方法归之于语言和话语。不过可以合理地宣称,语言实际上被转换成了超级主体。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语言还原论看上去随之产生了(在这方面,PS 还只是为 20 世纪哲学带来了极端的"语言学转向")。看上去物质生活条件可能有一种持久的影响,不管它们在语言中如何被确切地表征,同样地,潜意识的幻想(它没有必要必须以纯粹语言学的术语来理解)也可发挥它的作用。进一步,赋予主体以一种引导自身"接触"话语的能力看来是合理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巫毒崇拜或者白板,这只能唤醒一种明确由任何话语(某种权力允许出现)决定的自觉意识。[12]

165

实际上这就像某些(大多数是二流的甚至低俗的)PM/PS 信徒正在跳入错误结论的深渊:主体是话语的结果……于是它们当然必须是易变的,不断转换的,等等。但是对主体的批判的全部意义不在于转换方向,其所带入的新问题也不是讨论主体的变化无常。毋宁说是把主体看作某种先在的确定性的事物,PS 把它定义为主观化过程的结果。现在,这种结果当然可能或多或少是稳定的,但是这将依赖于形成我们所讨论的主体的话语的稳定性,而且它当然不是事先就作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认为所谓的宏大叙事太强大了,那就很难避免这样一个结果:甚至进一步粘合主体,支配话语甚至是划定话语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要设想谈论易变的和短暂的主体看来是尤为恶劣的,因为所谓的主体将由最为强大的话语支持和稳定,这种强大话语首先有助于它的产生。另一方面,如果有若干竞争性的小型叙事,这将使得主体更加易变,如果有人接受 PM/PS 的思想的话,即主体是由话

语而非其他方式产生的(尤其是如果有人接受这样一个思想的话,即我们生活在某种场域中,这个场域所支配的宏大叙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破裂了)。因而很难不承认主体的某种惯性,甚至是很大的惯性,不管它是否被外在地产生,只要有积淀。主体的底层充满着厚厚的概念"问题",这些都不容易去除。有一个通常的经验,有些人比别人更加沉稳、迟惰,等等,而 PM/PS 关于易变主体的观点并不能解释这一观察。

另一方面,PM 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它暗示着动摇了思想的主流模式,而不是表达一个更"真"的看法。大体说来,PS/PM 所捍卫的个体的观点可以引发对妨碍人发挥作用的无差异性和一致性中的某种自负的颇多质疑。我们当然同意更大的敏感度——而非过度敏感——对于矛盾和机会的发生以及随时的主体内部取向的发展与主体性在话语中的突显之间的变型和互动,都是值得探求的。于是关于哪些主体性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以及这些主体性和身份认同如何随不同的社会关系和过程而发生动摇或变化的问题成了中心。

166

> 在这种可以说类似的过程中有不少要研究的关于许多场合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什么情形下,哪些身份认同可以合并?哪些变得明确了或占支配地位并且有多长时间?在这种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多重结构和分散控制的空间里,无意识的后果是如何影响某种显著的身份认同的合并的结果的(Marcus,1992:315-316)?

顺便提一句,身份认同几乎可以包括一切:家庭成员、雇员、男人、妇女、看电视的人、年老者、晚会赞助者等都是身份认同的例子,它们关涉着不同的语境。身份认同可以界定为个体对其自身的陈述(参 Ricoeur,1992),对"我是谁"式的自我界定,及其独特性和时空变化中的连续性的陈述。在变化的时连续性的时空中,多重身份认同(至少在后传统社会中,身份认同是多重性而非单一性的)被构建起来了。

即使对主体的一般理解只是被后结构主义者作了稍微的修正,其具体研究结果仍然会引人注目,不管具体的研究取向如何。即使主体根据标示了某种一致性(比 PS/PM 的宣称更大的一致

性)的心理学或者社会逻辑来行为,也仍然有十足的理由假设,在各种不同的语言学的语境中——这是经验研究的出发点,主体对不同类型的论说特别敏感,这里显示了有重大意义的分歧。论说的本质化在"带有情感的论说情形"如会话中,比在许多其他更加社会化和有物质限定的语境中,有着更大的意义和更强的敏感度。例如,在访谈或民意调查中,主体被期待对特定交谈作出回应,因而主体所选择的话语是否真的导致了表达一致而明确的洞察、情感、观点、动机、计划和认识,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明确叙述问题的不同方式或者个体通过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明显留下来的不同"痕迹",能够导致流行的主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材料的相当大的变型。(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回到这一问题,在第 6 章再进一步来谈)[13] 因而,在经验研究中相当有理由认真关注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看法。

研究者作为作者

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显示出对作者身份的重要性的兴趣。他们强调一种转变,即从对理论、资料和解释的强调转向以语言和表象作为研究中的核心要素。特别是文化领域中的许多人类学者及其他学者宣称把作者身份和文本的产生放在研究工作的中心地位上(Clifford,1986;Geertz,1988;Marcus and Cushman,1982;Marcus and Fischer,1986;Van Maanen,1988;1995)。这些作者与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特征的哲学家如德里达有很大的不同。把作者身份置于关注的中心意味着注意到了以研究文本为基础的工作,研究文本是从整体上作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例如民族志的研究。因此,关注的中心不是对有限的文本段落的解构。另一个区别在于对理解文化的兴趣,即对超越文本的"实在"的兴趣,尽管从"实在"应该如何被表现而言被视为是开放性的(确切地说,这种"实在"因为强调的重点在于文本和虚构,所以往往是颇不明确的)。因而,对于表象的总体策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对此的意识以及这种类型的实验是被鼓励的。

167

人类学者及其他文化研究者作为作者在研究中特别引起了

兴趣,大概与民族志研究尤其是那些涉及"异质"文化的研究相关。大量的经验材料和研究者必须作出的数量惊人的选择,意味着经验实在明显从来不能明确地决定最终的文本,这个文本应该报告了"研究的结论"。在其他更结构化的研究情形中,有着更多的弱化的(驯化的)经验材料,如标准化的资料,这可能更容易使人确信,对经验实在("资料"及其"过程")的自觉表征可以使研究文本(不完全地)提供关于这一实在的线索。然而,所有这些实际上意味着问题被掩盖了,而不是消失了。在人类学中,看来特别中肯的是关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焦虑,即研究为某种实在提供了总体描述,其中研究者为他者辩护并阻止任何其他可选择的声音,因为人类学在历史上与殖民主义(这些日子主要处在科学帝国主义的形式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占主导的形式之中)和民族优越感密切相关。而且,研究者的主体性在民族志的研究中特别显著。民族志学者只能在相当次要的程度上伪装:对于特殊的程序上的方法的坚持保证了科学的可靠性,尽管他们一直很努力。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业已论证的,甚至程序操控的质性(或者量化)研究("采蘑菇式研究")也不能避免让关于语言、视角、隐喻、中心、表征等的价值判断、解释以及一大批的——通常是潜意识或非反思的——选择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之中。在人类学者和民族志学者那里,尤为显明者在其他类型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很重要的:作者身份、风格以及文本的制造是所有研究的中心,这远胜于"写下来的结论"(Fine,1994;Richardson,1995;Van Maanen,1988)。这里,作者的声音也暗示着对其他人的声音的抑制。

格尔茨(Geertz,1988)写道,人类学者时刻被这样一种思想困扰:民族志描述中的关键因素是与"认识机制"相关的。"认识机制"要问的是:如何获得移情与洞见,其他人的思想与情感如何能被证实,以及文化的本体论状况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与这些现场工作问题相对,他设置了所谓的论说问题。这是一个精心制作一个文本的特殊方式问题——凭借词汇表、修辞学和一系列论证,再结合研究者的"签名"或作家特有的身份认同。在经过对现场调查问题的如此长时期的忧虑之后,现在到了人类学来认真对待作者身份问题的时候了,格尔茨这样论证道(我们在第3章评论了格尔茨关于作为文本的文化的观点)。

168

表征(representation)和表象(presentation)问题于是成为了关键性的方法论问题。传统的看法被抛弃了。传统的看法是"写下的结论"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有限的部分,这一研究过程大体上取决于理论、资料收集、分析和解释。为了强调书写和文本特征的重要性,已经把中心放在这方面的研究的文化研究者,运用了各种不同的隐喻。格尔茨(Geertz,1988)的著作有一个副标题《人类学者作为作者》,克利福德和马库斯出版的论文集的名称为《书写文化》"。范马伦有一本书名叫《现场的传说》。这一标题受启发于现场记录和最终报告以及研究者必须要作出的无数决定有着类似于故事的本质。

这些作者对于文本角度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在解释学者如里克尔那里也存在。解释学形态的表征关涉的是被某种风格或某种根本隐喻激活或允许的解释类型(Brown,1977; Morgan,1986; Sdöldberg,2000b; 并见上文第 3 章)。与这种解释学形态的表征相比较,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什么被作为表征的精选形式尤其是主流形式的结果而被掩盖了。有人注意到,运用批判性的反讽,某种已确立的风格是如何总括理解、创造权威以及某种提供真理或好的解释的努力的合法性的。例如,杰夫卡特(Jeffcutt,1993)表明了英雄式、悲剧式、浪漫式和史诗式风格是如何刻画组织文化研究的,并指出了它们的局限。解释学指示正确的或最佳意义的理念被拒绝了(把解释学从后现代主义在这一点上区分开来的线索并非必然明确,尤其在对叙事和意义分歧感兴趣的里克尔那里不是如此)。

实际上虚构因素和政治因素被强调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成分。可以描述或解释的中性的简单的社会实在是不存在的。研究者必须对语言和文本作积极主动的研究,语言和文本,同意谓和意义之间的关联含糊,显示出它们的局部、语境和主观性的(arbitrary)本质。虚构因素或多或少是作者创造性的发明,它是不可避免的。形成虚构性假设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是政治上的。无数的选择取决于价值和利益。表征是选择或不选择什么来关注的问题,以及被观察的对象是如何提供出来的问题。这里与批判理论有着明确的关联,但是后现代主义作者普遍倾向于一种关于社会的多元论观点。这说明了,在面临许多的可能性以及语言

169

与表征形式的重要性问题时，为什么“政治”思想比选择背后的支配利益和意识形态更是研究者自己（或多或少是主观性的）选择的问题。然而，有些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强调从两个方面关注表征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的意义是，某种特殊实在的再现/建构（再—表象），即这如何被很好地把握和解释；另一方面的意义是，研究者表达了怎样的（谁的）利益和观点（声音）（Linstead，1993）。因而表征的问题包括认识论和伦理—政治两个维度。这能由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的论文集副标题得到阐明，其论文集名称是：《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尽管存在差异，但批判理论和（多样的）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在为经验研究重构传统式的主流的（新）实证主义和归纳议程这一方向上是相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更加着重地强调研究结构而不是描述何者被研究。研究中的虚构想象或文学的因素因而也是重要的（如同它们在现代解释学中一样）。批判理论对谈论社会实在的“有效的”或可洞察的可能性远远不是反经验或持怀疑态度。（当然，这两个阵营内部都有很强大的变种）

后现代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拒绝传统西方科学中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排除了来自合法的保留内容的特定表达形式：修辞学（通过定义明确的、透明的语言学形式）、虚构（它被界定在与事实的否定性关系上）和主体性（为了达到客观性，它是必须要消除的）（Clifford，1986：5）。由于这些被拒绝的要素仍然都是社会和人文科学不能排除的中心成分，所以它们必须在文本中得到反思和明确的表达，但这并没有构成刻画民族志的唯一特征：

> 民族志文本的制造者（但为什么只有一人？）不能避免表达的修辞、图表和比方，这些表达方式在对民族志作解释时就选择或赋予了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尼采主义者比实在论者或解释学者持此观点的人更多，所有被建构的真理都通过排外主义和修辞学的“谎言”而得以可能。甚至最好的民族志文本——严肃的、逼真的虚构——都是真相的系统或真相经济。通过它们所作的权力和历史研究，是它们的作者所不能完全控制的（Clifford，1986：7）。

克利福德指出了四种阻碍民族志（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形式一

样)描述社会现象的情形:

1　总是文学作品的问题,视语言学工具而定,这种语言学工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描绘了"实在",其中运用了语言的隐喻特征和意义的局部、语境特征。　170

2　民族志的作品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它们被限定在语境上(它们来自并构成了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修辞上(表达习惯引导了文本的制造)、制度上(一个人总是在其内部,或针对具体传统、学科和受众来写作的)、政治上(表征文化实在的权力是不对称地分配的)和历史上(习俗和限制随时间而改变)。

3　文化由多重声音组成,但民族志很难表现所有这些声音,而是倾向于强调某些甚至只有一种声音,要么是作者自己的声音要么是某个其他人的声音,并根据作者的情形表现出来。

4　文化永恒地变化着,但它难以避免稳定的描述(根据 Clifford,1986:11,"文化"没有静止站立的形象)。

根据这一点,客观性和纯粹资料就显得相当神秘和天真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分就变得模糊了。对作为历史结构的科学文本的理解就意味着宣称"真理"被理解为修辞学上的表达,它能不断接受可供选择的解释。这反过来意味着读者变得更重要了。文本成了并非它自己"内在固有"特征的表达,而是读者接近它时所具有的性情和创造性的表达(Brown,1990)。文本向着不同的解释开放。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理想视角中,作者身份增加了不同阅读的机会。读者变得有重大意义了,他们不是正确结论的消费者,而是处于更多主动和更少平庸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中有趣的读物可能与其作者的意向相分离。

这里的关键概念和流行语包括多重声音(multiple voices)、多元论、多重实在与歧义。好的研究文本应该避免根据整体单一逻辑(monolithic logic)而封闭起来。相反,矛盾、片断、反讽、自我反思和多元论必须渗入到整个研究工作中——除了此前的思考与笔记之外还包括对最终文本的写作。

经验实例

后现代主义者对经验研究的讨论或尝试颇受限于其角色。有许多例如关于如何不去引导民族志研究的一般化论证,而更具体的指导方针或者关于应该如何从事于此的例子,迄今很少。大多数作者称他们自己为后现代主义者,坚持此语境下的否定性的方法:就像批判理论家一样,他们更加清楚而明确地表达的是他所反对的,而不是他们所支持的。

171

因为文本、语言与表征具有如此的中心地位,所以许多研究者视经验文本为文本的同义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谈任何超文本实在至少是不直接地谈它的原因所在。对文本或者更狭义的在文本或相近形式中(如广告或公开讲演)所显示的社会现象与事件的解构是典型的例子(例如,见 Calas and Smircich, 1988; 1991; Linstead and Grafton-Small, 1990; Martin; 1990b)。

然而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提供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实例,即陶西格对哥伦比亚的殖民恐怖和萨满疗法的研究,这为后现代的经验主义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实例。[14]他的书就像一个破裂的三棱镜,每一面都能闪耀出强烈晃动而又难以把握的光,传达出被考察对象的看似自相矛盾、多重而又难以捉摸的"意义"。陶西格受到本杰明等人的很大影响,他在书的一开头就引用了本杰明的如下一段话:

> 其方法本质上是表征。方法是漫谈式的(digression),表征就是漫谈式的……。其首要特征是,缺乏一种连续的、有明确目的的结构。其思考过程总是不倦地重新开始,又绕回到原点。这种不断的歇歇停停的思考方式是沉思过程的最佳模式……就像马赛克维持了一种雄伟壮观,尽管它们是以变化无常的小片片的形式构成的,所以哲学沉思也并不缺乏动量。两者都由明显不同的部分构成,而且对于超越性的神圣形象和真相本身的理解,没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思想片断的价值越大,越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指向底层观念。华彩的表征依赖于这种价值,就像漂亮的马赛克依

赖于玻璃胶的质量一样(Taussig,1987:xvii-xviii)。

这段引文是陶西格方法的中心。他把描述(表征)视为本质。这适用于像书信、传记和文学描述这样的文本,以及口头证词、会话和陶西格自己参与其中的对话。描述不断地创造着生活,它表示评论与漫谈就是它们自己的"实在"。其间没有任何统一的、根本的目的或结构,这表明断续的重要性。个别比一般更强大、更重要,"一般"只是在围绕着片断的模糊闪烁而又稍瞬即逝的氛围中被表达的。断续只是片断的另一面,片断通常有一种辩证式的、自相矛盾的表象,并置着马赛克式的根本不同或相反的碎片。整体被打破,表面"背后"和片断背后没有任何事物:既不是一切都能被还原到它的特殊内容,就像在存疑解释学中那样;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协调意义,就如同在真势解释学中那样。陶西格只是顺便作了一些一般性反思,不过这些反思总是或多或少地被特征描述淹没。这也是与他所主张的描述性表征比论说性表征更重要这一观点相关的。 172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陶西格在从本杰明那里借用来的另一个观念即蒙太奇(montage)中发现了一种关键性的方法。事实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因为那被考察的是它自身,它自身就被视为蒙太奇。作者参与了一场降神会(séance),服用了一种能引起幻觉和腹泻的药物南美卡皮木[研格(yagé)]。他批评了传统的关于这降神会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降神会是从混沌走向秩序(意义)的创造仪式。研格仪式更是一种"辩证形象"(与超现实主义一样)的蒙太奇,同把神圣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已确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从幻觉和翻滚的记忆片断——在充满着跳跃的阴影和杂乱感觉的房间里,在东拉西扯胡言乱语中摇晃着一些记忆的图景——而来的"神秘洞察"不能被认为是深刻的神秘的或其他之类的洞察。与其说不能这样认为,不如说它们是以蒙太奇的能力激起突然而无限的对相异者之间的关联,其关联的建立和打破的过程是无止境或几乎是无止境的。
>
> 蒙太奇:整晚的更迭、断裂、移置和变换,以及突然的中断,往往是仪式初显秩序时的中断,稍后又呈现出同样的秩

> 序，然后在一波又一波的连续中断中化入了视镜中的虚幻的秩序、模拟的秩序、群体的秩序。中断去大便、去呕吐、去拿布擦脸、去厨房拿炭烧香、去请巫师定身（没人能知道他们下一步会被放在什么地方）、去恐惧私语、去反复地玩笑戏谑（尤其是这样）、去停止飞行中的歌唱来阻止狗的狂吠……在断裂和变换中开放了一个宇宙（Taussig，1987：441）。

在这个语境中，萨满人成了纯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空虚的空间，一个满是想象的可能性的调色板”（Taussig，1987：444）。这与把萨满人视为“野蛮狂热的人”、半是魔鬼半是神的群体这一观点根本相对：在这一说法中，这些想象的可能性已经在一种特殊的形象中定型并个性化。借用本杰明在讨论布莱希特的英雄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戏剧术语来说，对于陶西格而言萨满人更是一个“空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相互矛盾的戏剧。

> 萨满人在这个舞台上想要留住时间、发泄粗鄙的活力、发挥灵敏的感官，这是通过奋力超出大笑和死亡之间的混沌，建构和打破一个存在于这两极之间的戏剧化的空间而实现的（Taussig，1987：444）。

这对实在提出了质疑，把实在转变成了某种摇摆不定的东西。研格（yagé）仪式从根本上并置和联合了有着“对实在的强烈感觉的”幻象（Taussig，1987：445）。每天在寓言般的和戏剧性的行为之间更迭，真理成了由行为者引导的公开实验，而不是某种隐藏在表象（surface）背后的东西。正是表象本身——不断被中断和碎裂的结构状态——才是真理。行为者们通过表达他们自己的表征创造了表象，同时又诠释着它，于是就在表征和枝节表征（representation-as-digression）之间滑翔。

173

在伊利亚德（Eliade，1974）的萨满教研究中，一种重要的象征性因素被认为是天地之间的世界轴心，即神话诗中的世界图景的中轴。在对这种研究的含蓄的批评中，陶西格（1987：444）注意到：

> 如果我们能够从根本上谈论世界中轴，那么这个中轴就不应是从地向天伸展，而应是在创造和毁灭的蒙太奇中的大笑和死亡之间来回摇摆——从与大便的臭味相对的芬芳的

花香、与青蛙和蜥蜴相对的花儿、与蛇和短吻鳄相对的鸟儿、与呕吐和烂醉相对的头清脑醒这些迹象中来理解萨满人。

于是,真理不是抽象和超尘脱俗的,而是具体、特殊和感官的,同时又是开放的,总在行为者的持续的新创造中,超越了尘世与寓言的边界。在这一思路中,陶西格想到我们应该研究表征——文本与口头陈述,而不管这些表征是否可能指称任何外部实在,这无论如何将总会受到质疑。表征是(创造了)它自身的实在,在幻想和真实之间没有严格的限制或界线。这并不意味着鼓吹任何"魔幻现实主义",陶西格视"魔幻现实主义"为文学上的贵族现象。它更与巴赫京辩证的、矛盾的、"粗俗的"诗学相关,在他的诗学中玩笑与严肃、高级与低级一起唐突地并存。

陶西格的著作有一个长处,在它的最好的章节中,看上去就像重新创造了拥挤的、难以捉摸的和混沌的生活自身的片断,把美丽与残忍、痛苦与狂喜、肉体与精神关联起来。然而其纲领性的杂乱、具体化和特殊主义的确给人过多深刻印象的描述,理论则往往降至了灰姑娘的角色。它在中途又会转向某种更重要的东西——有巨大吸引力的新的描述。于是循环闭合了,我们部分地回到了经验取向的方法中,尽管有新的名称与弦外之音。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如符号互动论/民族方法学这样的微观社会学方法感兴趣,而后一方法的支持者也对前者感兴趣,这不是巧合。

对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批判

在上述不同语境中,我们同等地批判了不同意义上的 PM 和 PS,或者它们的不同论题。不同作者之间和包含在这一方法内部的观点之间有着巨大的变化,结果使得要提供一种适用于所有甚至主要部分的 PM 和 PS 的总体上的批判,并不完全那么容易。上述更正统的和激进的立场(如德里达)之间,以及较少神秘与更加综合的取向之间(威登、克利福德与马库斯)意义的转换当然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好。前者——常常是哲学式的——可能很容易被批评为缺乏社会兴趣与关切,但很难去攻击,它们更具有一致性,而与其相反的立场却可以适用于更折中的类型。然而,在某

174

些观点上其目标范围看来相当地大。这里我们将主要谈我们所认为的与社会科学中的经验兴趣相关的视角。这样一种视角自然意味着对哲学熟练层次的设置相应是比较低的。

缺乏构造性

总体的评论是后现代主义既显得过于怀疑又显得过于武断:过于怀疑在于它躲避了更为系统的理论;过于武断在于它在文本间性的密闭的房间里移动。这两种特点显示了对辩证法的惊人的缺乏:第一个特点通过对立的批判达到了系统理论却把后者排除在外;第二个特点通过对立的互涉文本达到了外部所指,却也排除了后者。

后现代主义批判了其他的整体化取向,关闭了系统。然而,正是这同一种方法通过文本间性建构了一种极端封闭的系统——无意义符号的"自由游戏"被密闭地封锁起来以与所指和主体相对抗[正是这样一种重复的现象,黑格尔(Hegel,1967:225)称之为"无趣",黑格尔在这里反讽了那些允许自己给人留下他所谓的"坏无限"印象的作者]。卡尔霍恩(Calhoun,1992:278)评论道: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方式通常是他们所质疑的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者的镜像,他们理解差异,特别是德里达的延异,认同一元或普遍主义一样僵硬的理论绝对是他们的敌人。而如果积极的一元认同是一种强烈反对差异的形式,那么绝对化的差异就是一种强烈反对主体间性的形式。更明确地说,这种主体间性是在人、传统和文化之间搭起桥梁的人类意志。

通过对已确立结构作颠覆性破坏这一取向,后现代主义需要一种寄生虫式的偏见(Rorty,1989),这也显现于它的许多(反讽)评论和补充说明中,以及它对边缘和非本质因素的中心关注中。其中心关注不是创造它自己的认识。因此它缺乏一种它自己的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因此,其他人制造的文本(对于PS/PM而言,更是成问题的文本)是后现代主义者工作的前提条件。后现代主义的贡献除了一般理论和哲学的阐述之外,于是被局限

175

于评论和/或分析的、只能在手头的在具体文本(语境)中才能获得理解的事物,即分析的出发点与文本相关。对于更广泛兴趣的洞见也许能在这里产生,例如,如果一个人深入探研典型的或有重大影响的文本的话,就几乎不可能实现认识发展或产生任何更一般的理论价值这一进步。解构的第二阶段中被创造的新的(准)概念代表了要获得这种进步的努力,但是他们往往犹豫,只因 PM 如此地害怕理论,尤其是在这种尝试性的阶段,或者如此地害怕积极谈论与群体的真实关联而绝不是害怕谈研究者—作者他们自己。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1992:16)注意到了一种"当代作家自我包含的趋向:作家为其他作家来写某些作家。"

对构造性的缺乏还与一个事实相关联,这个事实是:后现代主义"好像要谴责一切,却没有任何建议",仿佛"破坏是后现代心灵似乎最擅长的唯一工作"(Bauman,引自 Billig and Simons,1994:6)。然而,认识的发展不只是要撕裂旧系统,还要建构新系统。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系统中还是在批判上,这一过程并未结束。我们必须同时避开整体化和极端怀疑论。[15]边界的超越和综合之间的辩证法驱动着认识的进步。超越边界导致了旧综合性的打破,而如此被打破的基础随着时间的发展又成了更高层次的新综合的对象,等等,可依此类推。因此,本书牵涉到了超越与综合之间的辩证法。

其他方法存疑的表征

另一个批判涉及的是许多二流的不太熟练的 PM 和 PS 的好辩性,尤其是在更加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中。PM/PS 的作者们攻击他们所谓的"现代主义",并作出取舍,但看上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纯粹的争论而不是确切地阐明其他观点的构成。已经有了大量有趣的批判,但长期下来这么多的争论确实是单调乏味的。它很容易导致对于相反立场的过于简单化的描述,特别是如果对这一运动的原创哲学家的术语断片当作行话隐语不加反思地运用的话。一个常受青睐的好靶子是传统西方的主体思想:主体是理性的、一致性的、综合的、受目的支配的,以及是意义的创造者——PM 和 PS 经常引以比较他们自己的理念。[16]然而,这种狭隘的、自以为是的西方迷思,当然没有得到从海德格尔到结构主

义、从批判理论和精神分析学到行为主义的某些更有影响的科学哲学传统的拥抱。关于这一科学哲学传统我们这里还只是提及极少的相当不同的一些类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PM/PS 的创始者们从这里吸收了他们许多的灵感。

176

诚然,二流的 PM/PS 并未宣称所有西方思想都是源自这种理性人类主体的观点,而这种方法的典型之处在于,其思想拥护者们并不参考会允许 PM/PS 和西方人文主义所持有的连续统一体的观点更加明朗地显露出来的那些早期理论的变种。二流的 PM/PS 常常看上去更加喜欢抽象层面,在抽象层面上不同观点的多重性被聚集起来,由此它们的差异就被隐藏了。几乎所有被谈到的"现代主义"都关涉着一大批不同的理论方法。通过选择比较它们自身的某些具体取向——因而既实现其所需的新闻价值又有助于强调某种特点——PM 和 PS 的拥护者们在与某些不太有吸引力的理论如实证主义比较时常常显得更具原创性和"先进性"。这可以由本章开始时所引的布朗的话来阐明。布朗的雄辩表明,在 PM 之前只有实证主义(说明与证实)。帕克(Parker,1993)曾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在有些不敬的醒目的"现代主义"这一标题下纠错后启蒙运动思想总计至少四十年时间,因而拒绝在所谓后现代主义之前出现的丰富的各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相当平和地宣称 PM 只是长期的后经验主义冒险的最新形态。我们已经注意到图尔明(Toulmin,1953)所支持的科学的观点与这里引用的布朗的观点类似。PM 对作为"反思"的语言批判在很久以前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和海德格尔那里(Heidegger,1962)就已经出现了,他们两人的作品都不能称为,或者回头看作"后现代主义"。

许多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家,其中包括克利福德(Clifford,1986)、马库斯和费希尔(Marcus and Fischer,1986),尝试发展这样一种风格,即避免或极力贬低作者的权威和任何总体化倾向。在对此的批判中,桑格伦(Sangren,1992)揭示了一种修辞伎俩,这种修辞伎俩渗透在这些作者的文本中,并有助于使得它们自己的说法比其他文本的那些看法在理智和精神上更加高明。他指出了其他观点是如何以一种 PM 的变种所喜欢的方式来编造的。受布迪厄(Bourdieu,1979)的启发,桑格伦认为后现代主义最好当作职

业策略来理解,在这种职业策略里,年轻人才可以不顾所有已确立的权威开拓出自己的一片空间。他批评 PM 仅仅在文本中设置权力,并强调研究团体中的权力关系甚至比理解文本创制特点更重要。PM 的作者们通过使以前的风格类型和人类学(这种情形下的)具体作品非法化,来强调他们自己的立场观点。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尽管他们的漫画式描述有时太过分了。但是考虑到其自身的标准,其中需要最小化存疑的表征和避免权威陈述,所有这一切对于 PM 而言是特别尴尬的。

对上述仍要补充的是,对于我们的认识而言,迄今尚未注意到的是,虽然 PM 如此强烈地把批判的中心集中在人文主义主体等西方思想上,但是它在对待一个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的巨大的亚洲哲学文献库却是如此地绝对沉默。这一巨大文献库的一个要点——或许甚至是唯一要点——恰好是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固定边界的批判。确实,亚洲哲学从来没有试图把这种二分法融入或还原到文本上。但是它为欧洲中心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竟然没人注意到思想史上这一巨大的传统,从未有人讨论甚至提及它,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 177

谈到对其他取向上的误表征,我们可能也要思考"反映"这一思想成规,它嵌入了大多数思想学派之中,这常常成了实证主义的靶子。在不少情形中,反映看上去是反映稻草人之类的事物——这些学派其实是非常成熟的而非后现代主义者(及其社会构造论者联盟)习惯于描述天真的实在论。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深入研究所有不同的现行思想,这些思想由后现代主义者/社会构造论者在"反映"、"实在论"、"表征思维"等名义下集中在一起。然而,在某种情形下,其雄辩还是值得一评的。我们正在思考实证主义以及 PM 对它的表征,尤其是 PM/社会构造论作家在区分实证主义自身内部的实在论者和工具论者时的失败更是引人注目。工具论者不是实在论者,实在论者亦非工具论者。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很新鲜,但事实上,工具论正被视为实证主义的主导风格,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不能被贴上反映理论的标签。确实,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在实证主义里头有一种强大的主流的唯名论和非实在论的思潮,它与后现代主义相通:理论只是语词,是为实在虚构的结构,我们最终无法对它有任

何认识。例如,科学哲学家邦奇(Bunge,1967)把自己看作一名实在论者的异端分子,他毕生顽强地与主流工具论者(然后是非实在论者)的实证主义作斗争。本章下文我们将讨论时下关注的索卡尔争论(Sokal debate),那时我们将会看到,索卡尔经常被批评为哲学上幼稚,他自己就是一名天然的实在论者,并为他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构造论的论敌起着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作用。关于社会科学中的实在论与工具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对抗,可以特别参看如基特与厄里(Keat and Urry,1975)和霍利斯(Hollis,1994,尤其是第3章论"实证科学")。关于应用科学,我们只需转向如经济学,在那里工具主义非常普遍,而且以"我从来无意于成为一个实在论者"这样的反驳来回应缺乏实在论的批评,几乎成了一个标准模式。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至少在其主流形态上从来没有真实描述实在这个目标,其目标只是整理资料归入方便取读的盒子里并希望能预言导向成功的行为。这事实上与魔术的基本观念是一样的:"它成功了,我们不知道是怎样或为什么成功的,但它成功了!"

178

语言和文本还原论

有时我们也有一种感觉,值得称道的对语言和文本的兴趣被夸大并导致了一种还原论的态度。当然,(文献)文本回应其他文本,但是关于它们不会因此(含糊地)指向一种外在的实在,这是一个太过勉强和过度夸张的论题。这自然是一个两者的结合问题。社会科学家通常只研究文本,有的是理论上的,有的包含了与行为者的访谈以及来自行为者的文件。即使可以从先前关于某主题的文献的回应来得到证明,但如果宣称这些文本根本没有指向一种"超文本的"社会实在,那也是荒谬的。关于文本的后现代观念事实上特别暗喻着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中的一架闲置的发动机。

有时看上去社会科学中的文本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隐喻似乎被遗忘了(按理说,社会科学的思想是研究社会的)。隐喻的观念是通过在被聚焦的对象(社会、组织、人,或任何被研究的事物)与对此对象的修饰(文本、话语)之间创建一种张力来产生洞见。(亦见上文第4章)如果这一任务要成功地完成,重要的是研究者

承认这种张力并且不能让隐喻来控制被理解的对象。因此，社会不是文本，但是如果把它比作文本（看作类似于文本）的话，就有可能理解社会的某些方面。后现代主义作者倾向于强调语言的比喻和隐喻的本质，这应该意味着他们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然而，有人经常会有这样一种印象：隐喻（修饰语）“管”得太多。德里达所理解的文学和写作没遇到任何阻力地转入了“实际应用领域”。[17]于是并没有真的允许被聚焦的对象来影响文本在具体语境中被理解的方式。隐喻为颇不相类的社会现象创造了太过标准化的图景，这含有一种风险。看上去几乎就好像从后现代文学理论和哲学而来的洞见只需要译入被研究的领域就可以了，而这一领域（对被聚焦的对象没有任何测定）里的思考和经验研究的观念或结论，在修饰语起作用之前有必要对它们不作任何“抵抗”或添加。被认为是语言之特征的逻辑产生了不可阻挡的作用：人、组织或任何被考察的对象，都被看成是与语言逻辑密切相关的（Cooper，1989；Shotter and Gergen，1989）。但是文本与社会（组织、男人或女人）之间的差异必须要考虑到（参见 Sangren，1992；Thompson，1993）。除非隐喻的两种成分的影响之间得到平衡，其价值将是有限的。与其说是社会科学受到了文学理论的启发，不如说是社会科学被转入了其中。

后现代主义者对某种“外部”事物（主体、所指）充满着恐惧，由此不难看到一种回到母亲子宫的渴望。这里，有人可能把对后现代主义的同样的这种批判转而指向其他研究途径：对表象的边缘化，某些方面“藏在背后”的东西。联系到德里达（Derrida，1976）自己对卢梭性生活的讨论，有人可能也会思考到，可以说一直只是触及自身的文本的观念与手淫的关联[德里达自己指出“散播（dissemination）”的隐喻在这里很有趣]。有人可能会顺便注意到，文本间性的问题与修辞学的问题相联，它有一个回应然后对回应作回应的本质过程。而修辞学者并不把否定实在的存在作为规则。

179

也可能有人坚称，文本间性[18]中有着相当多且比德里达欲承认的更多的结构。例如弗赖伊（Frye，1973）和怀特（White，1985a；1985b）表示，存在叙事的深层结构，它对文本有很强的影响（亦见 Propp，1968），关于社会科学的应用，见舍尔德贝里（Sköldberg，

1994;2000b)。但深层结构预设了一个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文本层面，超越了纯粹的评论（或漫谈）层面。研究与我们自己的活动相关，既要有建构也要有破坏，既要有系统也要有批判。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纯粹的解构是贫瘠的，纯粹的建构是武断的。科学活动不能只局限自身于对现存系统的反讽式评论或轻蔑。（许多变种的）后现代哲学化的风险是导致了对理论的敌视（如利奥塔尔的风险）。

可能夸大了的对于语言和文本的片面兴趣，以及甚至更大程度上的对理论的敌视，与对研究中的权威和整体化的恐惧相重叠了，这种恐惧渗透了 PM 和 PS。在某些方向上，尤其是在文化研究中，看上去有一种深深的焦虑，唯恐主流的声音会影响文本，就好像这是一种强大的、清晰的或有着潜在危险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力量。这就像研究者把读者想象为渴望消费（社会科学的）文本，好像他们不会自己思考一样。就如桑格伦（Sangren, 1992: 283）所说，"如果'文本'的权威如同某些文学评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有效，那么作者就是国王了"。因此文本被赋予了一种几乎是神秘的力量。可能是作者全能想象和他们的自我中心的幽灵纠缠着他们。对于那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而言，语言上的微妙可能比他们所处的更广的社会语境要更加重要："通过使得文本权威代表普遍的文化权威，文学批评家作为那种权威的编造者和解构者，把她/他自己放在一种具有超越权力的位置——如果不是一个国王，至少也是一个高级牧师"（Sangren, 1992: 283）。

PM 和 PS 许多问题中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们经常与他们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严重地自相矛盾。根据帕克（Parker, 1992），现代主义的特征是，相信把考察结论传达给另一个理性人的可能性，而后现代主义却把这看作是一种理智上的帝国主义，忽视了"意义在根本上的难以控制性"。如果我们要严格坚持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写文章或专著并且把它们寄给科学杂志或出版商。我们所保留下来的所有职业就只有诗人和文案人员了。然而，事实上看上去很少 PM 支持者那样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信条，他们相信他们的评论者和读者相当理性，而且他们想控制自己的意义。他们把作品投给期刊以获得评论，而且似乎是根据"现代主义的"原则来写作的。当然，这可能是适应主流学

180

术团体所强加的限制以提高论文发表和采用的机会的问题。所谓的语言不是透明的或有表达力的并且不能反映真实世界这个理论，特别受到后结构主义者的珍爱，这个理论几乎不可能用来处理社会科学中的文本。威登（Weedon，1987：22）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语言既不能反映和表达社会的也不能反映和表达自然世界的内部意义，但也写道（Weedon，1987：12）"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妇女会忍受那种把她们的利益从属于男人的利益的社会关系，以及使得妇女和男人采取特定的话语立场来代表他们各自的利益那种机制"。有人会想知道这一说法是什么意思。看上去是想要反映"实际的"现象，如（a）妇女的忍耐，（b）她们的利益，（c）社会上的性观念，（d）机制，以及（e）代表所谓的利益的话语立场。根据后结构主义者的信条，语言很难有作出这种反思的可能性，至少不是威登所暗示的那种明确的反思。要补充说明的是，甚至对于一个顽固的毫不怀疑语言的反思性质的客观主义者来说，威登所称引的实体都太难以捉摸且无法通过语言来把握。

在我们看来，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映研究文本中的矛盾和不协调上，因为这很容易导致卖弄学问和偏狭小器。但是，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之间的显著矛盾——如一边是极端的语言中心论，只允许解构文本，一边是坚定的现实主义——将为某些批判辩护。

另一个例子是拒绝后现代主义的作者权威，支持自我再创造文本。实际上，当关系到某人自己的权威时，这个理论很难贯彻。例如，德里达自己就曾威胁一种合法行为来阻止他的一篇文章转载于他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讨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论文集中，这篇文章是发表在法国一家著名杂志《新观察》上的一篇访谈。美国方面的出版者被迫删掉了这篇在书的早期版本中存在的访谈。此书的编辑披露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德里达在版权之争中想要上诉，而正是这同一个德里达，在他的哲学研讨中曾经指责所有版权概念包括商标、西方形而上学之类，等等。整件事甚至变得越来越奇怪了，如果我们记住这是一篇访谈的文章，访谈涉及两个"作者"，出版者实际上已经被《新观察》授权出版并翻译这篇访谈。见沃林（Wolin，1993：ix-xi x）。事实上，当他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德里达在这里比许多非解构主义作者走得

更远。

索卡尔事件(The Sokal affair)

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的讨论成了索卡尔事件(常被称为“索卡尔恶作剧(Sokal hoax)”)的中心。一名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一本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一个刺激的标题《逾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转换解释学》(Sokal,1996)。文章发表后,索卡尔揭露整篇文章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但听起来严肃的行话,任何熟悉物理学的人一看就会把它当成玩笑抛开。换言之,这篇文章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恶作剧,一个为了揭露后现代主义和社会构造论的粗率水准而作的滑稽的模仿。索卡尔在作这个玩笑之后又写了一本书(Sokal and Bricmont,1998),这本书对于巴黎知识界的左岸派(Left Bank)而言不啻于扔下了一颗炸弹。杰出的物理学家温伯格(Weinberg,1996),回应了索卡尔的文章,攻击了相对主义和社会构造论。这次批评都持实在论和客观主义的立场。索卡尔是一名善辩者,他请所有认为实在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人从第十二层办公室的窗户跳出来。他的批判多是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权势集团,如克里斯蒂娃、拉图尔、博德里亚、拉康和德勒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德里达和福柯却躲过了枪林弹雨,只受了一点点伤。

索卡尔事件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学术的分水岭,暗示着自中世纪以来存在了数百年的“大的”大学争论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战斗。只不过大多数论争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这好像是突出了这场讨论的(后)现代性。一方是忠诚的现实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他们坚持真理是由(自然)科学规定的;另一方是后现代主义者和社会构造论者,他们拔剑捍卫的是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回应对他们的指责,指责他们思想粗率,指责他们通过使用从自然科学借用来的看似深刻的(实际毫无意义)语言来胁迫读者,指责他们自相矛盾以及根本缺乏清晰性,等等。相反他们认为这种攻击是一种佛朗哥式的病态性恐惧(Francophobic),是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把社会构造论者排除在学术工作之外,等等。至于文化差异,在理解法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隐喻语言上,美国科学家的确看来有很大困难。例如,布里

克蒙（Bricmont，1997）在评论拉图尔的后现代性定义时在这一点上就很明显。拉图尔对后现代性的定义是："后现代性是指对后现代的这样一种感觉，即时间之箭不再是连续的，不再有过去或未来的清晰组织。"布里克蒙从一个物理学科学家的立场说，对这句话显然一个字都不可理解，尽管它背后有一种思想。另一方面并不否定后现代主义者存在太多过度的修辞和无实质意义的空谈。但是从现实主义批评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常常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粗俗而过时的实证主义者的偏见（这早已被众多科学哲学家从理论上摧毁了）。 182

双方的观点都显得有点偏激。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坚称"实在"不是别的而就是社会建构。与此对抗的总是索卡尔的"窗户"论。阅读博德里亚对发生在波斯尼亚的暴行的冗长泛滥的述说是颇令人痛苦的（众所周知，他为之辩护的是海湾战争乃捏造的媒体事件）。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者同样激烈地坚称，事实上没有任何主体（间）性，自然法则才是永恒的，是最终的客观真理。与此对抗，科学史的研究，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已明确显示，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主体性的实质要素。事实上，如果说研究者是机器人，自然科学家也是机器人，那倒是奇怪了。不过还有比如对量子力学的（权威的）哥本哈根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地融合在实验情形之中。这是一个主流观点，（比如）马里奥·邦奇（Mario Bunge，1967）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实在论者和科学哲学家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来为维护它：在邦奇看来，主流的粒子物理学并非实在论。这可能会使得那些相信所有 PM/社会构造论之外的观点都是顽固的实在论的人感到惊奇（如果有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种强实证主义而只听说过非实在论的现行的工具主义（见上文）的话，他也会感到惊奇的）。

走出索卡尔事件争执双方的两极化立场，我们相信，问题并不是是否存在实在（reality），或者它是否是被解释出来的，而是"实在"是在多大程度上被解释并且如何解释的。如果地球明天被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上的人全被毁灭，直到这次灾难事件发生之前仍然有一段人类历史，尽管没人去写或解释这段历史。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仍然存在过大屠杀，即使没人曾被允许写这段历史，而且此事的所有痕迹都被擦除。解释将有些不同，即使

它不存在,但仍然有个实在存在。

*

从以上所述来看,似乎完全严格地从质性的经验的社会科学语境中来理解 PM 和 PS——至少在其严格意义上——有点困难。它们开始有点像政党宣言或者政治国事和社会世界的神圣命令:人们在"正式"场合承认它们的忠诚,但实际行为却往往颇为不同。某种理性的表象风格,努力实现某种程度的意义控制,试图确立拒绝其他人的个人权威和强势声音以设法改变权力关系使之有利于其自身所处的领域,沉迷于明确指向"外在"世界的实在论的本体论陈述——许多人都犯有这些过错,他们承认对 PM 或 PS 的忠诚,就如同那些宣称"现代主义"立场的人一样。我们也许可以说其先锋们说教的是 PM,自己却以其作者身份活在现代主义里,至少部分时间活在现代主义里。我们真的不能期望任何其他东西。但是一旦某人超越了其纲领性的声明并把自身与社会现象关联起来,这就会给我们许多与这些论题相关的问题的指示。

183

这种 PM 和 PS 有重大教训,质性方法论可以从中受益,大多数的益处都可以从我们的讨论中找到。下一节我们简要地发挥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观点。

质性方法的含义

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不谈方法论。有人甚至会说后现代主义是反方法论的。"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是与这一取向相符的口号。与它较为接近的方法是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Rosenau,1992:118)。然而,这里有的思想是有着经验兴趣的受后现代主义启发的作者所暗示的。它们与许多其他的解释和批判取向上的研究者所持有的思想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不同方式上的解释中的材料,而非对某种鲜明模式的依赖,才是对双方同等重要的。恩与勒夫格伦(Ehn and Löfgren,1982)讨论了一些

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法,此外把视角化当作一条原则来强调。这牵涉到,把熟悉的现象视为陌生,设法把某人对经验片断的理解与来自参与观察的最初印象区别开来,努力理解不同种类的形态,转换思想层次,并努力用明喻(隐喻)来思考。另一条原则是对比,即尝试从其反面意义来理解现象。不过,这里有必要小心简单的二分法。一些对子,如混沌—秩序,理性—非理性以及男人—女人,会掩盖一些重要因素。根据恩与勒夫格伦(Ehn and Löfgren,1982:112)"在任何特定文化中,不会只有一种混沌或只有一种秩序,而是有若干种"。恩与勒夫格伦(Ehn and Löfgren,1982:113)也支持戏剧化:

> (在心中)把看似不相容的对象和事件联合起来。颠倒社会等级,让个人转换角色、兴趣和语言。与经验材料互动做实验仿佛它是一根舞台支柱或一个纸玩偶。勇敢面对每天实际生活中的禁忌、分配和圣牛*引导思想实验,可以让落魄者住进主管公寓,让五旬宗教徒与嬉皮士在一起,让一名女教师与樵夫在一起。

184

作者指出,不只是形态或语境必须认真对待,矛盾和差异也要认真对待。他们告诫过分强调前者的风险。

这与马丁(Martin,1990b)的方法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尽管马丁的文本倾向于使用解构的方法。恩与勒夫格伦(Ehn and löfgren,1982)没有提及后现代主义或通常被包含在这种名义下的任何作者——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他们的著作出版时尚未广为人知。这表示,就方法而言,自由型的解释研究(恩与勒夫格伦是典型)与实用型的解构[马丁 1990b,及其他如穆白与斯托尔(Mumby and Stohl,1991)是典型]之间的差异并非必然如此巨大(通常"解构"似乎是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指示着对文本的宣称的批判看待,它与例如意识形态批判并非十分地不同)。就他们坚称文化意义不存在却可以通过解释引出来而言,恩与勒夫格伦是与主流的 PM 不同的。进一步,他们认为有可能且急切地需要创造一种有连贯性的文化分析,并能经受住研究者

---

* 圣牛(sacred cows),指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译者注

自己的尝试检验以使之既站得住脚又可信。因而,与 PM 和 PS 通常所主张的相比,其本体论更加"稳定",认识论更加"理性"。

因而与经验研究相关的 PM 与 PS 的独创性并非首先存在于如何处理"资料"的思想主张中,尽管其更为严格意义上的解构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征。毋宁说,PM/PS 的更具体的贡献与以下三点相关:第一,他们坚持尽可能地避免采用理论和解释层面上(这里,许多 PM/PS 作者会用其他不同的术语,我们这样用只是出于方便的考虑)的明确观点,并使来自它的伤害最小化。第二,他们坚持,研究应该留心关于事物的臭名昭著的含糊、差异和分歧。第三,他们强调权威的问题,即所有研究都是与研究者把某种明确而合法的意义归之于某一特定现象相关的,这反过来又支持了作者在与其他声音的比较关系中的权威。还应该强调的是,关于多重声音理念具体在经验研究中意味着什么的问题,PM/PS 文献只提供了模糊的指示(Kincheloe and MacLaren, 1994; Marcus, 1992)。从这些关于何为好的研究的模糊迹象出发,我们在这里将发展一种实用性的后现代主义质性方法。下文就描述了一种非常自由的方法,它使得 PM/PS 是有益于经验研究工作的,而不是对这一取向中的核心观念的忠诚应用。

185

多元论

多元论的理念要求文本中有多种声音。这里"多种"的意思很难说得确切。它有赖于研究主题、经验材料、理论的出发点、文本形式(包括对篇幅的限制),尤其是研究者(实际的)和读者(预期的)的忍受力。文本自然不应该太长。

按照我们有利于经验研究的这一目标,这里我们从经验层面开始,然后从理论层面上作补充(我们知道经验材料和理论之间的界线很宽泛,以至于这两个"层面"不能清晰地区分开来。经验材料是有理论灌注的,而理论不能没有观察和感觉)。在研究规划和随后的文本中,研究中遇到的各种声音必须以灵敏而多方面的方式来处理。许多研究者同意这一点,但是"资料"被"处理"和解释,作为一条规则优先考虑了形态和关联。当然,这在量化研究中是很明显的,但也是大多数强调过程和规则的质性研究的特征。在范畴化和集合的帮助下,资料在研究者的条件下得到了平

衡。在这个过程中,声音的多重性要么被降低了要么消失了,这都是为了得出结论。诚然,不同类型的现象(不同的经验、意义或价值)受到了关注,但依然是以一种程式化的方式被研究者“驯服”的。规律性被认为“可以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找到”(Huberman and Miles,1994:431),寻找规律性这一目的的限制性在于要求严肃对待变种类型,并且防止听到和描述多重声音。

有的作者视民族志为后现代视野下的天然的经验方法。例如,林斯特德(Linstead,1993:98)把它看作一种有能力去拥抱多方视角和情形的方法论,它可以被视为对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片断的天然的方法论和论说上的回应。我们在第 2 章注意到(林斯特德也提到了),传统的民族志表达了基本的经验立场,因而自我远离了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后现代主义需要与民族志完全不同的焦点,即对文本的有限片断的解构。也许我们可以说,PM 暗示着两种极端的变种——解构主义者的类型和后现代民族志。在前一情形中,研究者能自由驾驭与某一特殊文本作者的已有意义的关系;在后一情形中,他们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并认为与主体性的各种形式相联的声音应该听取。除了不能很好地与严格意义上过分强调明确量化的方法相容之外,原则上可与 PM 或 PS 结合的方法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限制。多重视角可以在任何质性材料中得到强调。对文本(文本的章节)作近距离研究需要许多深入的分析,而作为勤勉的经验研究的一个结果,民族志产生了多方面的资料。下文我们不看解构主义者的类型,而只看广义上的经验主义的冒险如民族志和开放的或半结构化的访谈(通常与多个或许多个体进行访谈)。 186

PM 反对传统的限制声音立场数量(范畴化和综合化)的研究理念,支持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中应该给予它们以足够的空间这样一条规范。在实践上,这可能意味着研究者在经验工作中(观察、访谈)以及在对经验材料的更为雄心勃勃的解释中要寻求变化。允许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甚至更为关键的是为多重自我的显现提供空间,因为正是若干声音立场而非单个的自主和一致内核被认为刻画了个体的特征。不只是考虑或主要考虑主流的声音,而且还要特别考虑边缘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宁可要非典型,典型与非典型之间的二分——有时应用于质性研究的某

种温和的量化方法——是要完全避免的。多元论的理念可能意味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现象。如果研究某公司的领导阶层,那么,也许年长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文化群体,高级和低级的管理人员,非管理人员,颂扬管理的立场("管理很重要"),独立于管理的立场("我是一名专家")和拒绝管理的立场("我一点也不在乎老板"),现在的和以前的管理者及其他雇员,所有这些人都要有机会让他们发表意见,也就是说,看是否这些声音出现在材料中(当然,有的声音的出现是由于研究者的介入鼓励才出现的,比如在特定的观察语境中来提问或置身于其中)。当然必须要加上限制,但是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要包括什么要排除什么。而且为什么他或她要选择排除某些声音?可能这些被排除的本应包括进去呢? PM 取向的研究者必须严肃对待排除问题。顺便提一句,应该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在第 3 章提到过,自 19 世纪以来,来源批判学者已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了。只不过,后现代主义者给了它一种新的说法。

这并不是仅仅听到各种相关范畴的问题。对社会学的情况介绍范畴保持怀疑是很重要的。不同的范畴或身份认同,如管理者、妇女或中年人,不是简单被"给定的",他们也是产生了影响的论说结构。[19]身份认同并不提供任何表达声音的基础,毋宁说,正是通过发出声音才产生了身份认同。通过与一名妇女身份的人作访谈,或请某人描述他们与"老板"的关系,我们就建立或确定了某一特定的身份认同,如"妇女"或"下属",相应的还有与他者(男人或管理者)的关系中的依赖、独立或拒绝之类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或范畴本身是有问题的:它们确定并且排除。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仔细考量,天真的语言上的陈词滥调必须避免,或者最好有意识地处理好。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下级管理者来绕开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区别问题。管理者一般是更高管理者的下属(Laurent,1978)。这意味着根据其下属,即与上司的关系,来谈一个人在管理上的地位。或者,我们可以考虑到管理者(在效果、名声、事业上)依赖于他们的下属,并从如何处理这种依赖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管理层。我们也可以避免任何对于管理者的指称,无论是否为下属,也只是问一些一般性的问题,然后不太强烈地唤起被访谈者的某种特定身份,而最坏的情形甚至把被访谈者固定

187

在特定的身份上，言外之意就是倾向于从事某种特殊的事件讲述。主持访谈者也可以通过在不同语境中质询（访问）被访谈者，或者至少在管理层研究的语境中，以非常规的方式，如作为家长、中年人、长期服务者、修道士，来明确改变声音立场。不管是否运用更加开放或系统地改变了的方法，各种不同的声音立场和伴随着的趋同或相异地出现的事件都应该被灵活地讲述或解释。重要的是避免固着于"管理者"的标签并把调查对象的身份认同钉在它上面。

一种有充分根据的排除过程

看上去仿佛我们主张的是一种无限制的广泛的经验研究方案。重要的不是要包括所有与既定范畴和声音相冲突的可能范畴和声音，而是要反思排除的过程以避免与已确立的范畴和区别相纠缠。于是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声音的载体，有的对主流（语言学上的）习惯构成了挑战。比试图包含或尽可能地包含一切声音的做法更加重要的是，在经验平台所提供的视野中，去拥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多元论和被平衡的多重性。

排除的问题自然渗透在所有研究中而且也是决定研究问题的核心。运用典型的 PM 的口头禅，它在自身内部受到了政治的和诗意的指责。批判理论尤其是 PM 强调了这一点，并主张甚至政治上深思熟虑的（与"中性的"对抗）研究问题也需要一种选择了的世界结构，既要揭示也要隐藏（也许应该指出，PM/PS 的政治概念在它主要被应用于特定的微观层面上是部分中性化的，为的是表示研究者是选择实在的表征来作解释的。因而，社会中的总体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形式没必要阐明。从 PM/PS 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主流（没有实质）需要揭示，而 PM/PS 有时甚至可以把注意力从这里移开。PM/PS 内部的变种——尤其是从政治方面来说——意味着在这方面就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在作概括时必须小心谨慎）。 188

然而，排除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样的群体或范畴被排除了的问题，也不是对此的表征是如何在研究者（获得了对研究对象的特定图景）控制的选择过程中作出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可以归于个人主体的不同声音是如何被处理或忽视的。在 PM 看

来,个体不是以单一的(乃至支配性的)声音来谈话的,而是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例如,评价、思考、感觉,以及事实信息如何传送,可以以不同方式来建构。例如,某一访谈能够产生解释以显示主体正在表达多重性(多重论说的构成)。必须强调特定访谈中的含糊性。根据 PM 和 PS,个体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致的。(我们将在第 7 章提供一个基于访谈材料的实例)

从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于是我们在两个维度上有了多元论/排除的问题:一方面,不同的群体、范畴和个体在研究过程中和文本中如何来表现或使之沉默;另一方面,这些群体和个体主体内部的不同声音如何能被允许留有空间或被排除。我们曾注意到,这里的重点是范畴化(通过把主体锁定在身份认同中)部分地影响了沉默,这就是为什么对群体的简单夸张解决不了问题。

与经验材料互动的谨慎过程

研究者解释、选择和叙事的方式对于合理文本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在可能立场的多重性被真正平等地表达的意义上,这就再也不是真诚的多元论问题了。研究者的角色不应该被限制在打开录音机然后打印出被访谈者的故事。不可回避作者的劳动和满足(Geertz,1988:140)。根据陶西格(Taussig,1987),研究者不过具有与其他行为者或声音立场大体相同的意义。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严格地低估了研究者—作者的角色。在 PM/PS 启发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根据材料的表征和阅读(一种 PM 式的解释)来展开包括/排除的谨慎过程。此外,在经验工作期间和之后,理论及其指称结构当然是必要的。这里争取某种多元论也是重要的,因此多重性可以以一种良好推理的方式得到强调。对不同隐喻或理论视角的好的认识,以及把这种认识自觉运用于对解释工作的引导,是一种可能性(Alvesson,1993a; Martin,1992; Morgan,1986; 并参见上文第 3 章)。当涉及强调文化研究中通常沉默的声音时,理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妇女特别受压制,可能没人想到要说些什么来批判或质疑这种状况,这是因为男人对女人的支配这一点被男人也被女人视为"当然"。[20] 于是理论可以用来"发现"或支持更多的"研究驱动的"边缘化的观点,也可以用在缺乏这种显露于比如访谈陈述之中的可能观点。

189

有时代表了他们的特定"兴趣"或可能的观点,不能直接显露在明确的声音中。比如关于某种生产过程或消费类型的影响的研究,就不可能去作关于自然的访谈(Shrivastava,1994)。研究可以有效地考虑到超越那些与人的各种自利相连的方面,例如与一般的动物或自然环境福祉相关的问题。(动物权利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所提出来的观点,当然代表了动物和自然,但是对打猎、屠宰场或汽车驾驶员的研究,不会机械地包含这些取向的人们)即使后现代主义者警告不要给研究者的精英主义太多的余地有时是合理的,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建议研究者批判性地检验什么样的视角和声音未被包括进来,或者在特定的经验材料中太弱但是有很好的理由根据广泛的思考可以强调的那些视角和声音,研究者的立场和受教育情况应该使之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矛盾的态度和把某种(主流)意义赋予PM/PS 所支持的现象的谨慎小心,是反对制造黑体读物的*。这两条原则——防止作任何的强调和研究者"积极地"强化弱势声音或者是补充缺席的观点——本来不必互相冲突。如果研究者允许他们自己的黑体读物后跟着可选读物,而且/或者如果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对资料的描述以使可选读物得以可能,那么这一困境有可能得以解决。重要的是不要以把研究者论证的主要线索当作唯一合理或清晰的最好论证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在PM/PS 看来,更多的研究者驱动的首创性,应该是经验研究产生的文本中所出现的声音的一种补充,而不是设置一种可选项来反对出现在经验文本材料中的声音。

避免整体化理论

从 PM 的视角来看,对于理论指称结构的怀疑与自我批判是完全合理的。大多数理论倾向于产生明确而清晰的意义。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世界与经验之间、文本与实在之间、结构与行为之间的不妥协的关系依然是存在问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允许以任何既定的或传统的社会理论上的解决来把秩序强加给本无秩序的事物上面(Marcus,1992:323)。即

190

---

* 黑体读物(bold readings),即把字体打黑加粗以示强调这样的读物。——译者注

使研究者避免根据系统与和谐来思考,而是强调歧义、不一致、矛盾和断裂,他们这样做也往往是从优先考虑了这种意义类型的指称结构出发的(Alvesson,1993a)。如果不假定有序,那么无序很容易地享有了特权。通过运用不同的理论或不同的研究隐喻,使得强调和处理多重性变得更加容易。如果研究者始终一贯地意识到他或她的解释所隐藏的东西,那么整体化是可以避免的。通过使被选择出来的解释面对其他解释,一种互动就加入到了支配性的与可选择性的解释之间了。文本与理解就被打开了。对于 PM 而言,关键是要避免简单的对立,因而甚至被选择的可能解释也应该回过头来又受到其他解释的挑战。也就是说,德里达关于"转换"的思想显示了某种特定意义是如何依赖于受到压制的方面的,而"隐喻化"在两种措辞之间显示某种重叠(Cooper,1989;Linstead,1993)则示例了这可以如何做。一个问题是,这显得最适合于非常有局限性的经验材料,如文本,从社会现象方面提供的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可能解释,包含着对各种根本隐喻的作用和对平行读物的制作(Morgan,1986)。另一种可能性是为已选择的根本隐喻去寻找隐喻,以展开一种"隐喻的互动"(Alvesson,1993b)。最初选择的隐喻于是在另一个隐喻的帮助下被重新组织了。在后面两种情形中,不是对语言表达的细致考查问题,而是由允许歧义的两种或更广泛的理论视角一起发挥作用的问题。

与平行解释(多重读本)一同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可以是:选择两种或三种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允许丰富地综合合作与竞争、协调与紧张,然后想出这些视角需要什么样的问题,以此来开始一个项目的研究。当这一经验研究完成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分析就形成了。(关于例子,尽管并不特别属于后现主义的例子,见 Alvesson,1996;Borgert,1992;Martin,1992)关键是要避免综合,至少是过多或过早的综合。或者,某些思想和部分材料可以被综合,而多重性、矛盾和紧张也应该强调。于是,解释既可趋异亦可趋同,而无需优先考虑任何一方。在另一种可能即隐喻的游戏中,研究或多或少是以通常的方式来引导的,也就是说有一种连贯的指称结构(根本隐喻)。于是整个初步的文本,包括已产生的解释,就得到了一次再解释,在这一再解释中已选择的隐喻通过新的隐喻得以阐明(Alvesson,1993b)。例如,我们可以从"策

略”（在操作中或多或少视大大小小的决断而定的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公司的活力，不过接下来要把这些策略视为符咒（Broms and Gahmberg，1983）。在应用了第二个隐喻之后，文本是以一贯地强调新意义与歧义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的。（这也是向扎根理论中的实质和形式层面之间的转变注入新生命的一种方式，见第 2 章）断裂与开放获得了展示和强调。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回头来看这些思想。 191

作者身份与语言敏感度

另一个重点是研究的风格。对此我们有过提示，它很难再遵循一种整体单一逻辑。研究者不能藏在官僚主义的方法论程序和支配性习惯背后来写作，但他们必须对他们的文本负责，并在文本中表示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不同视角和方面的表现都服务于将文本打开。这些不同视角和方面的表现，要么是由于试图把多重性引入研究的表征中，要么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已被解释和综合的经验材料面对着不同的理论指称结构。读者的活动和再解释的能力于是被以不同的方式刺激了，而不是当一个文本自己尚且昏昏之时还想使读者确信作者的认识是最好的、其研究的结论是真理。

也有其他写作方式可以比较容易地降低研究者的权威并鼓励对文本的更积极和富于创造性的阅读。不同的作者暗示着不同的写作风格，包括独白式、印象式和反讽式等（Brown，1977；Jeffcutt，1993；Van Maanen，1988）。它们与更加惯常的现实主义的表象模式不同，而且关涉着读者的不同阅读模式。特别的兴趣已体现在对话体中，研究者与对话者共同对文本负责。这里就有了关于对象如何被描述的“协商”的问题了（Marcus and Fischer，1986）。然而，这与多重声音的理想有些偏离，因为这对话的思想暗示着只关涉到两方，尽管这两方可能是若干已表达观点的媒介。研究者可能依然会鼓励与读者的对话，指出文本中的有关问题和缺陷。这样就有可能向读者提出研究者未能解决的有趣的问题。于是，作者变得可见，读者被迫参与进来。研究者的主体性的恰当角色将会从书页间呈现出来。避免行话、修辞伎俩、形式化参考以及其他的推销权威的策略也有助于产生更开放的文

本。（关于研究者加强其文本的权威所使用的策略，见 Calás and Smircich，1988；Sangren1992）

PM/PS 关于主体通过语境和语言来支配——作为论说结构的主体性——的理论，自然有着对于从例如一场访谈中何者可期的重要暗示。下一章我们将了解到，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要了解理解访谈陈述（或者，就此而言，是如何理解一般意义上的陈述）是如何地困难，而这一证据大体上支持了已由 PM 与 PS 提出的更哲学化的观念。这对于那些想要运用经验材料来阐明要么社会实在（"外在"）要么个人经验和意义的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在具体的访谈情形下，被访谈者如何表现或描述实在，与他们或实在的实际情形（或者他们如何感知外在实在）关系不大。毋宁说，这是他们临时发展一种主体形式的方式问题，以及他们如何在与访谈所创造的局部论说语境的关系中来描述实在的问题。这种情形所具有的重要的方法论暗示是，避免完全依赖访谈（或者，更有甚者，依赖于问卷调查，鉴于调查对象所提供的意义中语言的含糊性和丰富的变化，问卷调查是极不可靠的）。参与观察被推荐为一种在非凡现象上产生经验材料的方法，至少是方法的补充（即民族志方法）。然而，甚至所谓的"自然语境"中的观察也受到了语言的不确定性本质的强大影响。当然，这里有个观察语言的问题：通常大量可能的表征中，哪些是研究者所选取的？但是对社会条件的观察通常是有关语言行为的（毕竟社会互动是围绕着言说的），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就像访谈那样，这些行为与"客观"条件——更大范围的社会实在，以及人们把意义传递给存在和他们自己的方式，有着同样模糊的关系。民族志的关键点是资料超出了访谈语境（当然，不过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语境，即参与观察的语境）。不同视角的可用性提高了，更有趣的解释范围更大了。

192

语言的意义和特征的更大敏感度也必须充满于解释和写作中。语言能够反映复杂的实在这一信念与现在的通常情形相比较应该被相当程度地弱化。尽管我们并不完全接受后现代主义者以语言（只）是结构性的这一思想来取代语言之为反映的观点（语言具有毫无疑问的表征能力），但是根据不能作任何形式的表征的封闭（无所指）逻辑，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一维度仍然必须要重

视。这可能意味着语言及语言的运用本身就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是理解语言背后的东西的媒介（见下一章论话语分析）。这也意味着更加需要微观锚固制度层面的概念——把这些与实际过程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例如参看，Collins，1981；Johansson，1990；Knorr-Cetina，1981；Sandelands and Drazin，1989）。由于语言提供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基础，而不是能建筑理论的积聚稳定的建筑木块（积木），所以问题在于一个人应该设法建多高——至少如果有人仍然坚持经验基础观念以及理论与“实在”的（无论多么无关紧要）关联的观念的话。 193

研究与文本的微观政治学

最后，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PM 与 PS 关涉着研究的政治因素。与例如批判理论相比较，微观政治学在这一流派（多种流派）的议事日程中有一种不同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研究的文本总是关于权威因而也是关于权力的。颇为狭隘地聚焦于“文本政治学”和鼓励研究者反思他们自己的权威宣称，其结果是将产生某种事与愿违的非政治化或弱化政治的风险，因为它变得太以研究者为中心了。我们已提到过自恋与自吸（self-absorption）的问题。[21]然而，这并不是要否定我们所作的任何陈述中的洞见的深刻价值，因为研究者（或者就此而言在任何其他语境中）将总是表征政治的对象。如何作出表征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主观随意的，既然语言与“外在于语言”的实在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关系。一种表征可能会阻碍另一种可能的表征。即使是对某些人来说显然是好的描述和分析，如解放的或显然是单纯的（又称中性的）描述和分析，也总是潜在地成问题的。甚至揭露出来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糊涂的。再次表示，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视角应该被整体化，即把它视为研究和文本全都围绕着它的绝对核心的要素。其结果是行动上的完全无能，以及作者式的自恋。对语言和文本政治的细致入微的认识直接暗示着质性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以洞察力处理多元论/排除问题的重要性。一种开放式的书写和对不同理论的指称结构的思考，可以提供一条通向实用地、反思性地处理表征和书写问题的路线。

对实用主义的后现代方法论原则的概括

上文讨论的理念涉及多重声音、有良好推理的排除、谨慎的解释、面对"整体化"理论的谨慎,等等,需要通过对观念和某种可能性的怀疑来平衡,这种可能性是指"无止境地采用变换的看上去具有无穷优势的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任何一个是由批评家或考察中的文本作者所'持有的'"(Bordo,1990:42)。其他修正的观念有这样的价值:严肃地把经验材料理解为对某种(模糊的,往往是片断的)社会实在的指示,并坚持某种程度的分析焦点和深度。194 基于此,我们指出了多元科学研究项目与文本中的四个核心要素,简要概括如下:

- 不同身份认同或声音之潜在可能性中的多元论,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声音又与贯穿于或被视为存在于研究工作和研究文本中的不同群体、个体、立场或特别利益相关联。
- 对于研究过程中的个体参与者所传达的(同一个个体参与者作出多重表征的可能性)多元论及其变种的接受。
- 关于现象的可供选择的表征(比如,对于不同种类的描述性语言的运用)。
- 对不同理论视角(根本隐喻)的把握,并且对于对这些视角的批判及其问题颇为熟悉。这使得公开的和不同种类的读本在研究中显现出来。[22]

要在同一个文本中,在以上所有这四个维度上达到一种高程度的多元论和最低限度的排除,是几乎没有可行性的。一种可能的研究策略将是设法使上述维度中的一个或两个最大化以注入多元论的产生中,并且接受较少得到思考的未被最大化的维度上的多元论。其关键是产生开放文本,它刺激了读者的积极解释。研究者应该避免因为把自己太严格地放在读者和被研究的声音之间的位置上而"关闭了"他们的文本。

结 语

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当然大量研究文本是否有

此表征是有疑问的——的醒目标题下,许多颇为不同的思想被提出来,从根本上打破了实在论者的观点和诸如解释学批判理论的思想取向。尤其是看待语言、理论以及权威研究的新方式获得强调。这些思想中的某一些——断裂、变种——应该在本章的规划中得到反思。

我们有权基于我们自己的最小信念颇为残酷地批判了 PM 和 PS 的某些思想,更多的是根据质性经验方法所暗示的实用主义的立场。让我们现在引出一个上文只是简单触及了的论题。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关于后现代洞见与何者可以应用到人们自己的生活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23] 如萨鲁普(Sarup,1988)所言,我们(西方人)是按照人文主义的方式生活的:我们感觉到自身是积极的主体、有目的、有意图并有责任,而且是意义的创造者。但是这并不必然是我们理论化的途径。这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把个人信念与学术理论信念之间的重叠部分最大化——研究的目的甚至可能是与前者产生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参 Bourdieu 等,1991)。不过断裂太大就成了问题。理论应该能够丰富我们的自我理解并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要完全接受例如 PS 的主体和语言理论,那就要开始把我们自己看作"纯粹的"语言附属品,并且避免所有参考语句,如此,我们存在的结果将是荒谬的。 195 我们并不想过分强调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对来自 PM 和 PS 的洞见作精心选择与整合是非常可能并可欲的。然而,非常适合这套整合的理论可能会有变得贫瘠和与社会不相干的风险,因为这种整合很难被完全严肃地吸收到非学术的情形中来。

我们的总体评论是,PM 和 PS 满怀着好辩的热情,但目标太高。由于采用了一种相当严厉和绝对的立场,他们使得自己很艰难,尽管他们有时也设法以更好的方式来推销他们的思想(Alvesson,1995a)。这特别适用于经验研究。PM 和 PS 几乎不鼓励这样一种活力,甚至任何倾向于外在于文本的情形的陈述。然而,我们指出过,我们对于这一取向的看法不仅仅是否定,我们在 PM 和 PS 中同时发现了大量有趣的思想和论题,多少加了一点盐。我们愿再次强调此领域中的许多不同的立场,并指出我们只能占有主要线索的仅仅一小部分特征。

这种取向(确切地说是对不同变种的总结)作为对于研究的

更传统观点的矫正和灵感之源是很重要的。对天真的实在论的批判得到了相当的强调。这一取向对筑入了社会话语并麻木地进入了巨大的制度化陵墓的虚假理性和整体化结构的批判亦有其优势(即使我们可能会问,是否这在 PM 出现之前,并未开始在社会科学中衰落)。对于叙事、局部、片断和矛盾的集中关注很是适用于它,正如在所有人类认识中所指出的不可还原的矛盾性与不稳定性那样。如果从所指分离的思想不被认为有某种普遍有效性而只是作为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因素,那么它可能会在如下方面传达出重要的洞见:最有价值的贡献还是属于对语言之重要性的日益增长的敏感度,理论的指称结构和研究的整体单一风格隐藏了什么,主体(至少是部分地)是如何由语言构成的,以及研究的政治因素。PM 和 PS 把研究的权威放在中心位置。他们也鼓励从已确立的知识传统中解放出来,并以一种更加实验式的态度来对待它。

后现代主义者质疑是否“诸如统一性、同一性、永恒性、结构和本质等属性优先于不调和性、不一致性、多元性、短暂性和变化性”(Chia,1995:581),这一质疑是很正当的。并非要颂扬授特权给这里的第二套概念,而是要同时避免这两组范畴化的思考形式,并放开对任何一种形式的选择运用,只要这一形式看上去可能是值得遵循的最富于成效的路线。

196

注释

[1] 建筑学理论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Jencks, 1987)。

[2] 我们在此简要地报告一下这些概念通常被使用的方式。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明,我们并不认为两者之间有任何严格的界线,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某一名称或另一名称可能看似更为恰当。

[3] 不同的作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做了区分。罗西瑙(Rosenau,1992)谈到了怀疑的和肯定的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者强调分裂、不安、无意义、缺乏或道德界限和社会无序。肯定派不那么极端,看到了积极的社会变革的某些可能性。福斯特(Foster,1985)在反应和抵制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了区分,前者坦然面对现状,而后者抵制当代的(无/有)秩序,而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议程。后者类似于怀疑论者和他们的反主体、反人文主义、反表征和反历史的立场。

[4] 这里使用的某些词语一般没被后现代主义者使用,或者,即便被使用,也必然以不同于(例如)解释学的方式得到理解。例如,为了识别一个模型、指引一种优越的意义或真理,常规研究中的解释就是仔细考虑资料,如果是在 PM 中使用,解释则是实现行动纲领的多元建构和多重布局(Rosenau,1992:118)。不过,从根本上说,在解释学框架和一般问题中,"解释"这一概念,远不同于它在 PM 中的对应词——"解构"(Hoy,1996b)。

[5] 格拉夫(Graff,1979)论证说,后现代主义变成了同语反复,因为在每个文本中,它都发现了它预定存在的伤口。

[6] 德里达(Derrida,1982)确信,延异并不构成一种不在场,因为这或者意味着纯粹的空洞,或者意味着直接与在场的观念有牵连,他想避开不在场—在场的对立,以避开在场的形而上学。因此,延异既不会构成某物的在场,也不构成它的不在场(被看作是非存在,也就是说,空洞,或根据经典的在场形而上学的说法,就是当前显现自己,即表象中的本质的在场,等等)。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延异可以是任何其他情形而不是德里达为该词所提供的两种意义上的任何一种意义的不在场。推延是某物在一段时间中的不在场,差异是两个或更多事件的相似性的不在场。

[7] 此外,德里达(Derrida,1982:2)告诉我们,延异确实是个概念。

[8] 在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下,海曼(Hayman,1980)认为,高度发展的内省能力,是整个尼采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特色。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尼采就可能通过内省达到了他的权力意志的思想,把权力意志作为其存在的基础,然后把这个洞见传导到他的环境上。(不过,我们应该稍微留心海曼的传记:他的性格有点不平和,他近乎执拗地总是过分强调一个主题——尼采走向疯狂的一生)

[9] 顺便提一下,这同样也适用于前一后现代的作者,如福柯,他的系谱学仿效尼采,一直旨在表明,不同文化现象的历史起源并不像传统的、被接受的观点所描述的那样显得高贵或合理,而是对不同行为者的赤裸裸的权力意志的表达。

[10] 1970 年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激进社会思想没有得到回应后的宿醉头痛,有时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无疑是一致的。经常被算作后现代主义前沿人物的人中,有几个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如博德里亚)。觉醒导致对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偏爱(Lash,1988)。伯曼(Berman,1992:46)写到巴黎知识分子:"听起来就好像,他们在无法跳入现实之后,于 1968 年的 5 月撤退,决定再也不走出去,把自己禁闭在巨大的形而上学坟墓中,这个厚厚的、结实的坟墓提供了最后的慰藉,不使他们陷入痛苦

197 的希望之中。他们的后现代世界构成了明智的引退公社,一个保持冷静的好场所。”

[11] 据透露,其领军人物之一保罗·德曼在二战期间表达了对纳粹的同情,这个事实有助于颠覆这一定位,尤其是在美国。

[12] 某些 PS 作者谈到这一主题。例如,威登(Weedon,1987)认为个体主体并非只是一个供话语权力展开的消极场所。他写道“个体有记忆而且在论说上已经构成了认同意义,它可能拒绝特别的质询或者从现有话语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中产生新的意义”(Weedon,1987:106)。这一说法并不完全代表整个文本的立场。威登在其他地方认为话语是具有能动性的,并认为个体是从属于这些关系的。其中心论题是“主体性是话语的结果”(Weedon,1987:86)。

[13] 此外有一个问题是研究凝固了对个体的某种特定描绘。这是内在固有的,许多科学观察被这样引导,研究者典型地把自己限制在特殊语境中,例如实验室或精神分析者的长沙发。(Rose,1989)

[14] 马库斯(Marcus,1994)认为这一研究是“后后现代主义的”。不过,这一术语所指在我们看来更适用于(晚期)后现代主义,而与更具批判性的或否定性(早期)类型的 PM 相对。

[15] 这里要坚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怀疑的态度应该要有区别地对待。经验主义宣称,理想和理论根据洞见、实用价值、经验支持等而改变,而且也应该据此来评价。未作区分的一个问题是“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不过任何其他人也都可以这样。某些所说的内容是有趣的和迷人的,但也将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后现代主义没有提供区分这两者的任何方法”(Rosenau,1992:137)。

[16] 威登(Weedon,1987:33)比较了后结构主义关于主体的观点和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关于主体性的“不可还原的人文主义本质”的观点。

[17] 福柯在他的“考古学”阶段的思想中,把核心放在话语甚至是论说结构(认知体系)上,他的这一思想被用来使文本还原论合法化,这就很随意地忘记了福柯在这一阶段之前尤其是之后都绝对没有使自身局限于话语而是集中在非论说性的实践上。

[18] 我们发现这一术语很有用,如果被充分理解比后现代主义中的通常的被充分理解更少整体化的话,即与主体和所指物(所指)都相关,不论这种关联如何的细微。

[19] 在我们中的一个人与公司的一名妇女所作的访谈中,非常清晰地出现了对不同(语言上)身份认同的敏感性。她基于自己的雇员和下级管理者的身

份回答了关于工场的问题,并积极地谈论了公司。然而,当问到作为一名妇女她如何看待她的上司这个问题时,她的回答很不相同。她称他们为"男性沙文主义者"。因此,这鲜活的性别认同产生了一种对组织的态度,这一态度与访谈中以其他途径所表达的有根本性的不同。

[20] 表征,包括"妇女受压迫",当然从来不是不可质疑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根据的。

[21] 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刺激也会导致非政治化,因为其"滥交式的批判"是针对一切的,显然对急切需要批判考察的事物没有任何基础性的评价,这些批判考察是根据如解放理想或有理由的抵抗,或者另一方面,根据非官僚化、个人责任和个体主动性。根据比利希和西蒙斯(Billig and Simons,1994:4)的理解,"批判如无政治方向将无法控制"。另一方面,许多当下的社会科学、作家接受了后现代主义与指向另一个方向的"左"倾社会结构主义之间的(理论上颇不稳定的)联盟。尤其是索卡尔及其实在论同事的许多法国反对者处于这一取向上。 198

[22] 所有这几点,但尤其是第三和第四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重叠的。对不同隐喻的使用同时影响了描述(初步的解释/阅读)和更进一步的(解释学)类型的解释。但是强调的重点从多元论方面看可以变化,在多元论中研究者要么在初步解释中要么在接下来更具总结性的研究工作中探索了歧义而多重的意义。

[23] 登津(Denzin,1997)注意到,表征(把握社会生活的无能或困难)与合法性(放弃传统的评价研究的标准)的问题导致了实践的危机(怀疑社会研究影响行为的能力)。 199

第6章 语言、性别、权力：话语分析、女权主义与系谱学

Language/Gender/Power Discourse Analysis, Feminism and Genealogy

我们将在本章讨论某些取向，我们感觉它们乃是时下人们关注的兴趣点所在，而且因为太重要而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外。但在我们目前的规划中，我们没有像对待前四种取向那样对它作同样深入细致的探讨。前面那些取向上包含构成了反思性社会科学的一般论题，而我们在下文讨论的这些稍微不同的取向则代表着重要的当代维度和方法。大多数人肯定会视语言、性别和权力为三个基本的维度：语言是引导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创造我们的符号存在的媒介；性别是思想的基本的二分式，它刻画了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权力使我们陷于它的不断重复使用的诡计和陷阱之中，某些科学家（如韦伯）把它视为真正的社会组织和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纹理细致的基础结构。

20 世纪期间，语言在哲学上占据了核心位置。这特别是由于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不同的论题、文化和地理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由于法国哲学自结构主义鼎盛以来，从索绪尔的作品中受到了语言学的启发。我们在论解释学的那一章里提到过，对语言的兴趣已经从有限的语言学单位逐渐转向了更大的文本单位——话语。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时下关注的论题，我们在本章中专门开设了一节来讨论话语分析。话语分析加深和改变了前几章谈到过的对我们如何处理经验作品中的语言的质疑，并有助于对资料方法的根本假设提出质疑。在与质性方法论的关联中，话语分析尤其与之相关，因为话语分析说明了运用访谈（质性语境中最通常的方法）的问题，而且在努力发现“事物如何”时“自发地”产生了（对亲身观察的文档记录的）解释。

另一个主要领域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对广泛的社会形式中的子群的研究。阶级是这样一种领域，尽管近年来不是中心，它也没在任何重要程度上与质性方法相关。种族划分是正在兴起的一个论题，不过我们不能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强势主题。[1]另一方面，现在性别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无可争辩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下文将会论及。我们设置一节来谈种族划分与社会阶级也本应是合情合理的：现代研究中的主宰力量该被指责的不仅仅是男性主导和对性别的不充分的反思，还有白人（西方的）中产阶级贡献者的占主导地位以及他们的（我们的）文化的强大影响。然而，本书的意图不是要去囊括所有重要的论题，而是偏向于讨论反思性的经验社会科学，并提出与此语境相关的具体意见。女权主义将要代表出现在社会群体中的不对称性这一类型的问题。女权主义——或广义上是性别研究——也与我们这里的论述特别相关，因为它更多地谈的是质性方法而不是阶级或种族研究中的方法。因此本章第二节谈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也有政治—意识形态维度，尤其是含有涉及范畴与心智集合（mental sets）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的论题。这种去稳定化是后结构主义，一定程度上也是批判理论的特征。而且，女权主义在这里代表着一种研究线索，即突出了既在政治方面也在研究方面被剥夺了基本权力的社会群体。 200

最后，对于权力的研究是常青的，尽管总有人宣告它的死亡，它甚至还有了新的基础，特别是由于风靡研究界的福柯的著作对此表示了巨大的兴趣。福柯的思想与特别的方法论相关，他把焦点集中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上。本书要论述的权力并非首先是——或至少不仅仅是——“外在的（out there）”权力，而是与知识密切相关的研究语境中的“内在的（in here）”权力。因而福柯的权力概念对于方法论语境有很大兴趣而与研究对象无关。因此我们用下文的第三节来作这种权力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当福柯阐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的时候，来自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论题也发出了别样的光芒。

这里选择的三种研究角度适当补充了我们在前几章里的讨论，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穿透了一种或多种取向。话语分析的若干属性也出现在后现代主义中。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同时与批

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点。福柯的著作与后结构主义接壤,也与批判理论的某些类型以及尼采哲学类型中的存疑解释学有大量相通之处。当然,语言、性别和权力它们自身之间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将会看到,在下文我们分别给出的描述中,所有这三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重叠着的。

话语分析

对研究中的传统语言观点的批判

前几章已经指出,认为社会实在可以用明确的术语加以描述,这是颇为天真的。人们描述他们的内部实在或外部状况的能力不能被视为当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指出了这一点。相当明显的是,人们在访谈、著作或其他日常互动中所说的,可能与其"实际"所想的不同,或者说态度和行为并非总是彼此若合符契的。但是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可以问,是否人们实际上拥有从根本上明确(可能明确)被表达了的确切的毫不含糊的概念或价值和态度。让我们设想我们已经撇去了所有问题,如不诚实、自欺、禁忌、误解和主持访谈者的影响,它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在人们所说的话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Van Maanen,1979),然后为我们自己创造一种"理想的"讨论情境,调查对象和主持访谈者在这种情境中真诚地、公开地和清晰地表达他们自己。但是甚至在这样一种"最佳的"条件下,也有理由怀疑是否关于人们理解实在、表述经验或感知自身等的方式的陈述,毫无疑问地实际反映了特定思想、信念或自我形象。问题在于,为了使之可理解或有意义,言说必需是有语境依赖的——不仅仅是因为很明显人们在公共的和私人的环境中向同事、研究者或者在他们的私人日记中(社会语境)相异地表达自身,而且因为人们的言说在更细微的层面上也是依赖于语境的:如同历史学家早已指出的(见第3章),它可能受到交谈中先前所谈内容的影响(受到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如主持访谈者的影响),或者受到各种言说被组织起来的方式的影响(微观语境)。语言运

用的方式并没有反映多少个人内在的主体世界，因为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暂时的世界。对主体性（情感、态度、观念、价值）的解释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都不具有一致性，这部分是由于语言的运用与假定语言对它有所理解的现象之间没有一种一对一的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了对所谓的实在论语言观的关键批评，这种语言观把言说看作理解行为、思想或事件的相对明确的入手处。这里有两种类型的批判，一种是语言哲学的，另一种更多地来自研究人们的陈述行为的行为科学。由里克尔和若干后结构主义者等所构造的语言批判，强调语言从本质上是隐喻的、比喻的以及有语境依赖的，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复杂的环境（见上文第 5 章）。或者根据萨廖的说法，语言并不反映实在而是对它"视域化"，即戴着有色眼镜来表述它。行为科学角度的批判关涉着这样的假定，即人们将以相类似的方式来描述同一个行为或现象，以及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描述同一个态度或观念时将总是具有一致性的。不过这些假定是不可靠的。根据波特与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的观点，通常更合理的是，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人们的陈述的基础之上，最低程度地预期两种情形中的一致性。　202

让我们以广告业为例来阐明这一点。斯莱特（Slater，1989：122）已经注意到：

> 在这一行业中代理商向他们的委托人承诺对消费者的行为具有完全而永远有效的力量，同时又告诉大众这一行业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而只是反映流行趋势或者提供信息，这是老生常谈。

这当然可能简单地被视作一种对机会主义的描述。也许某位广告人可能"真的"持有这样的观点，或者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一名广告专家在某种研究语境中接受访谈，比如在这一语境中在以任何特殊方式表达自身时没有任何金钱兴趣，这名广告专家可以同时表达这些观点，甚至其他观点，这都是在同一访谈中进行的。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假定没有（也许真的有）这样一种正好被人的视点隐藏了的清晰的思

想,而不是去试图发现广告影响下的"真实的"或真诚的信念。比去推测"真正的"思想或信念更好的是去探索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类型的说法。毕竟,言说是我们可以与之相关联的最好的对象。可能普通的广告专家对于广告的影响问题没有任何一致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有时被更适时的说法隐藏了。也许专家关于主体的思想是零散的,不是在他们的意识中作为一种明确而清晰地界定了的部分而存在着的,而是与大量其他思想、概念和联想有着动态关联而存在着的。对这一"思想",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些部分的片段的思想的每一次激活,也都需要引入许多其他这类要素,这些要素根据问题所由以提出的语境将会有特别的变化(Alvesson and Köping,1993)。可能这个问题最好说成是"不可决定的"问题,而不是某种稳定的信念或态度问题。

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在近年出现了,它非常重视表达模式,这就是话语分析(DA)(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显示出与后结构主义的某种相似性,在后结构主义那里人们被假定是不一致的,语言并没有被看作是对外部或内部(心智)情形的反映。DA与后结构主义(PS)的主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在经验和系统上着力的研究,避免了有时颇为啰唆冗长的哲学化,而这种哲学化正是PS的特征。我们在这里的陈述和讨论主要是基于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与许多其他作者不一样的是,我们在下述DA的"话语"中包含了口头和书面的社会关联中的各种语言运用(言说行为),即言说和书写文档。话语是一种社会文本。把中心放在话语上意味着与"作为社会实践之一的谈话和文本"相关联(Potter,1996:105)。

话语分析拒绝运用社会科学中的实在论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目标是通过发现经验材料中的形态来反映外在于语言的实在。这同时适用于量化和质性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思想通过迫使人们作有限制的回应或选择性的(问卷调查、实验)反应,或者通过让他们或多或少自由地说话或行动(可自由回答的访谈、现场观察),来减少不相似性与含糊性,然后发展范畴以把握和减少其变种。这样,相信我们能够发现行为和/或思想(意义)中有趣的形态。对致力于量化的方法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问卷调查研究的风险是,我们只为人们提供了在问卷上打叉的机会(于是,对问

203

题措辞或可选项的最轻微的变动都会导致新的不同的"标记"行为),而那些在实验室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则只被要求在人工的和单纯的环境中来行为。质性方法在与这里相关的这些方面上是优先的,但是甚至这些方法也倾向于过度强调言说与潜在意义或实际情形之间的关系。话语分析者感觉到对于所说到的事物的变型的认真关注还不够。大体来说,总计所有运用于行为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意味着言说与陈述之间的一致性被过度强调,而不一致性则被掩盖了。也感到一致性的存在——存在于某人的言说中或不同个体的陈述之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描述之有效性的保障。

波特与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声称,学者们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人们的陈述之变种,尤其是在心理学中,是由于分析策略偏爱于言说的限制性、范畴化和选择性的解释。限制性意味着科学家通过应用不同的方法来"锁定"主体,这些方法迫使他们进入特定的反应模式。这是实验、问卷调查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结构化访谈中的情形。范畴化意味着所有陈述都指涉各种更广的范畴,然后它们被理解为基本的经验材料。事实是不同的评估者可能将某一特定的言说指向同一范畴——内容分析中的一种有效性标准。这一事实没有防止对某一特定范畴内部的区分与变型的忽略。类似的评估也能产生,因为人们有某种共同的对语言习惯(范式、学校教育)的预想观念,因此他们可能会并不必然地公平对待经验材料。选择性的解释意味着在前结构理解——理论框架与不太自觉的个人和文化上的观念与信念,包括当然假定与预期——的基础上,科学家基于如下这样一种方式来构造一种陈述:意义的潜在的多重性被忽视,而赞成所谓的"基本"意义,研究者相信这一基本意义表达了交流中的调查对象的核心思想(这一批判可指向实际上的所有质性研究,尤其是解释学,还有扎根理论、现象学和批判理论)。

话语分析研究

因此 DA 只对论说层面(我们已经知道,它指向所有形式的言说与书写)感兴趣,而强调的不是寻求减少语言运用中的变种。204 所以,DA 忽视了或至少减弱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潜在实在"

(Potter and Wetherell,1987)。[2]如果某人在某种情形下显示出某种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又显示出有点矛盾的态度,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反映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人的实际所想,也不能把其中的某种态度视为真诚的,而另一种态度则是有些"不真诚的"。话语分析将宣称,如果我们以一种完全无偏见和细致的方式来看待人们的陈述,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几乎总是包含着大量的变化。(因此,这种变化或者含糊性当然就成了"潜在实在",于是这被排除在 DA 的大门之外的"潜在实在"又从后门偷偷溜进来了。)同样一件事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但关键是同一个人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件事。波特与韦瑟雷尔以若干经验例子对此作了解释。这都意味着并非真的有可能简单地说何为"真实的",何为"不真实的"。但却有可能集中关注反映了态度的言说,并问某人自己如下问题:在什么情形下表达了不同的态度? 这些言说是如何建构的? 它们处在什么语境中并完成了什么功能? 这是话语分析的任务。

话语分析宣称,人们通过语言来从事建构社会世界的活动。它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们在先前存在的语言资源的基础上积极作出陈述。第二,他们不断积极地专心于从无数的词汇和可用的意义结构中选择某一些而拒绝另一些。第三,这被选择的结构有它的意义:表达模式有一种效果,它能影响观念,能引起回应,等等。(矛盾的是,人、陈述、选择、影响、回应等在这里都显然被看作是真实的)

话语分析从下述假定出发:

1 语言被用于多种功能并有多种结果。
2 语言既是建构性的也是建设性的。
3 同一个现象可以用若干不同的方式来描述。
4 因此陈述将有相当多的变种。
5 没有绝对正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变种或者把"原义的"或"精确的"陈述从那些夸张的或错误的陈述中区别开来,然后避免变种的问题,这些变种使得研究者的工作面临一种更为"现实的"语言模式。
6 语言运用中的建设性和灵活性方式本身就应该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Potter and Wetherell,1987:35)。

因此，DA 意味着研究会话、访谈陈述和其他语言表达，而没有得出明确"超越于构成了讨论语境的微观环境之外的任何结论。换言之，会话或访谈本身成了陈述的语境。"访谈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互动的场所，而不是被理解为从调查对象那里收集资料的机制"（Potter，1997：149）。 205

C. W. 米尔（C. W. Miller，1940）在许多年前就已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注意到通过语言把握"真实的"动机或"真实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并强调不同动机的陈述有强烈的社会依赖。在不同群体中以及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对动机所作的支配性的语言表达有着巨大的变化。米尔建议把中心集中在"动机语汇"上，即人们陈述并设法解释他们的动机的方式。

波特与韦瑟雷尔及其他许多人（如 Hammersley，1992；Hollway，1989；Silverman，1985；1994），告诫研究者注意防止采用"实在"的观点的风险，访谈主体把"实在"当作客观真实的甚至是主体"心智世界"的一种真实表述来传达。很显然甚至诚实可靠的言说都必须基于它们由以产生的特定语境以及注入了这一语境的语言规则来理解。[3]诚实与忠诚的陈述可能正好包含了矛盾或至少是不一致的言说。（在历史学家那里，数百年来这一切都是很平常的，尽管他们得出了部分不同的结论，见第 3 章）

波特与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提出了若干总体性原则来引导 DA。一是强调接近主体在谈话和写作中的陈述的重要性，这里的谈话和写作是指"其本身而不是作为通向'超越'文本的如态度、事件或认知过程之类事物的次级路径"（Potter and Wetherell，1987：160）。另一条重要的原则是，有价值的不是样本的规模，而是对可能相当少的陈述中微妙之处作细致的研究。传统研究的目标是获得大量显示一致性的资料，这些具有一致性的资料又可以被解释为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些陈述可能反映了超越于它们自身之外的某种"实在"。在 DA 中，一致性也是有价值的；但仅仅在如果研究者希望在语言运用中发现规律和形态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不一致性、变种至少与一致性具有同等的价值。

话语分析常常感兴趣的是从事件的自然过程中产生而不是从参与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中而产生的陈述或文档。这可能

是会议、疗法或咨询会、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举行访谈,它们与传统访谈的不同首先在于回应中的变种与一致性同样重要;其次在于允许回应中有变种的方法而不是使它们发挥支配作用的方法;再次,被访谈者被视为会话中的积极参与者而不只是"回答问卷"的人(Potter and Wetherell,1987:165)。

当然,解释并不关注明确的形态或"主旨"。玄妙、矛盾和含糊的领域都没什么价值。分析家应该感兴趣的是陈述被组织的方式,话语中的细节,以及实际所说或所写,而不是关于所谓本来意思的含糊观念。

206

波特与韦瑟雷尔意识到,他们的方法可能看上去有点神秘,只有学术上的价值。但他们声称它有广泛的应用领域。语言的运用绝对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通过交往行为被建构和再现(reproduced)。关于它们的知识对于许多职业以及人们在不同语境如政治争论中所受到的影响的全部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对话语分析的批判与评价

我们发现,DA 的观念及其一系列的关联如会话分析和民族方法学都是令人兴奋且值得认真关注的。我们承认,把语言上的言说看作对外部或内部实在的明确反映是成问题的。语言描述(非凡的)情形和内部安排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把只关注语言运用和言说行为看作一种总体上过于狭隘的研究途径。如果我们这样限制我们的研究,那么重要的(而且也是公认困难的)问题就仍然留待回答。如果除了语言所有的焦点都排除在外,那么研究就有变成平庸的风险。许多关键问题就悄悄地消失了。DA 的一个劣势,与其他以语言为中心的方法一样,是以过于激烈的方式把人的心理内容掏空了。帕克(Parker,1994:244)指出,有一种趋向是"一贯地拒绝需要超越或外在于实际从文本中读出的个体的心智机制或者意图"。言说在 DA 中获得解释,是根据它们的效果,根据从它们那里所产生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所说或所写的背后意图或认知过程,这是一种成问题的功能主义(Bowers,1988)。如我们所见,尽管总的来说是一种专门的文本还原论,但 DA 还是不能避免把这些效果或功能说成是真正的"外

在"存在。

我们的评论所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一个特别的研究领域的DA,我们发现如果稍作狭义的理解,这也是有趣和完全合理的。毋宁说,我们审视的是这种方法对于把中心习惯性地放在观念、行为和社会形态上这种研究所具有的隐含意义。话语分析能为有着更大志向的质性方法贡献什么样的洞见呢?

话语分析与其他形式的对实在论方法的批判(例如后结构主义和其他语言—哲学类的"反客观主义")一样,在从关于其他社会现象的陈述和言说行为得出结论时要求比从这些特定的陈述和言说行为本身得出结论更加小心。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没有任何强大而有建设性的理由来使我们自身完全远离于解释言说中的意义的可能性——这些意义超越于言说自身和它们的微观语境。在由波特和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及其他语言取向上的行为和社会研究者所提供的选择中,有一种夸大和过度强调不一致性、变种和言说行为的语境依赖之重要性的趋向。作为一种与天真实在论抗衡的力量,它是合理的。但同时,不一致性和变种自然是指一种运用标准。对言说或词汇运用的细节研究直接显示了意义的势不可挡的多重性。但是语言在许多情形中(含糊地)传达洞见、经验和事实信息的相对的能力也是没什么价值的,而强调其澄清现象的能力的实用价值也同样没什么意义。话语分析家以及许多现代语言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使他们自身完全远离于表征性的观念,而相反强调的是语言的含糊性以及人们的陈述中的许多变种。与这种倾向以及实在论者的传统的表征性观念相对比,我们更愿意强调语言传达某种超越其自身的事物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能力,以及相对的一致性中的变种和作为现象而非其自身语言运用之线索的不同言说的价值(Alvesson and Köping,1993)。[4]

207

我们仍然有必要区分意义与指称。意义上的含糊并不必然表示指称上的含糊,反之亦然。其次,对于这两种意义的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含糊性的接受不等于对非实在论的接受。第三,DA对社会结构有一种实在论的观点,只有存在这些社会结构,然后才能谈论,等等。

这指出了需要对我们研究中的谈话和语言运用保持反思与

怀疑而非范畴化。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各种不同的言说可以被适当地理解为简单的言说,以及它们可以多大程度地运用为对其他现象作更广泛的解释的出发点,思考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其他现象(而非言说)反过来包含着应该彼此分离的两个要素:概念(价值、观念、动机,等等)与"客观"条件。然后我们应该思考访谈陈述、书写文档以及自发的谈论(在参与观察的情形中记录下来),假设它们不同程度地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解释:

1 论说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语言运用与表达模式并不代表或被解释为其他什么(如反思外部条件或语言使用者的心灵),而是代表研究对象自身。因而,除此之外有趣的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念、其他人的动机、事件等等所采取的方式。在许多情形中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2 观念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基于对访谈和自然情形中的言说的解释,来谈论概念、价值、信念、观念、意义和想象。
3 行为与社会条件层面。在这里研究的目标是谈论稳定的关系、行为、事件、社会形态和"外在"结构,对这些目标不必赋予一种客观的或健全的特征,它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被研究的个体或集体的语言或"主体性的概念"。

208

认真对待话语分析思想,而且不是简单地把自身限制在语言运用和言说行为的研究上,这样才能系统地谈到上述三个层面,这要求研究者对于经验材料在这三个层面上应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作出前后一致的明确论证,或至少在分析中努力记住这三个层面,并且不时地对它们作更加明确的参考。把处理陈述时的问题和不确定性理解为对人的主体性以及"外部社会实在"的反映,这是在如此运用陈述之前的一种健康的怀疑和在社会行为语境中研究语言时对有趣的研究选择的更强偏爱。因此这样一种研究将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这两个层面通常是占主导地位的——获得较少的结论(作出较少的解释),相反它将有利于在全部三个层面上展开,尽管也许常常特别强调的是第一个层面。这种研究途径的例子可以在艾尔维森(Alvesson,1994;Alvesson and

Köping,1993)那里找到,这个例子说的是对广告以及广告业的一种研究,它所处理的是话语(例如,关于广告中人的身份认同的话语)、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委托人—代理商之间的互动)以及论说与经济物质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DA 本身不能完全没有实在论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阻碍了 DA 有效地把中心集中在言说层面上的不一致性和变种。因此如果超越这一层面并应用于外部论说现象,那么 DA 的基本思想就有可能为质性研究贡献新的、能引起争议而又激动人心的洞见。

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在本质上意味着从妇女或性别的视角来看待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通常以维护妇女的利益为目的而获得批判性的研究。女权主义有许多类型(若要对此获得一种概览,见 Calás and Smircich,1996),类型之间在政治学和认识论上都彼此不同。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追求性别平等,不过除了与妇女机会直接相关的那些方面,它没有对社会的其他方面提出任何明显的质疑。激进的女权主义完全使自身远离于男性统治的社会,并以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观点批判性地审视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一种全新的性别关系。若干激烈的变种都与批判理论有着某种相似性(例如参看,Benhabib and Cornell,1987),尽管已有意见批评批判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晚期的变化——忽视了性别的维度并以一种偏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Fraser,1987;Meisenhelder,1989)。从认识论上来讲,从新实证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有观点都是在女权主义内部提出来的。 209

这么广的范围自然使得我们很难在简要的概览中公平地评判女权主义。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或者认识论上的女权主义方法,所以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常常指向不同的方法论。我们在这里将把自己限制在指出性别维度的重要性并且为甚至在没有主要关注性别条件的研究中它可能如何被思考提供某些线索。

如果允许整个这一运动内部有相当程度的变化与冲突，那么，可以说有三种核心要素刻画了主流的女权主义。第一，在实际理解所有社会关系、制度和过程中，性别是一种基本论题。第二，性别关系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与支配、不平等、压制以及冲突的状况相关联。第三，性别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意味着它们不是自然规定的，它们也不是必然的，毋宁说它们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结果，而且可以通过人类的行动从根本上改变它。

女权主义宣称，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是男性支配的，这大体上决定了问题的提出（或不提出），以及回应这些问题的方式。甚至研究被引导的方式与何为"科学"的标准也反映了通常的男性至上主义者的价值和男性的观念。妇女作为一个范畴，她们的愿望、经验和视角，都被忽略了。传统研究在其关注中心、其语言的运用以及它的结论中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男性至上主义者的表达。于是，社会中的不对称的性别关系被合法化和再现了。

人们觉得女权主义应该为社会科学贡献——某种程度上已经贡献了——对现有理论的成型的批判和再评估，这些理论大多含有性别偏见或对性的盲目。女权主义的另一个贡献是指出了一些被忽视的领域如工场里的性骚扰，或者表示那些难以捉摸的条件如何有助于创造种种社会结构。例如，哈丁（Harding，1987）提到了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社会实践中的生殖、性别特征以及母性的变化已经影响了社会状况、经济及其他公共制度。第三个更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贡献是发展了一种使社会"理论化"的新方式。阿克（Acker，1989：67）描述了如下一种女权主义范式，她认为这种范式尚未获得发展。

> 一种新的女权主义范式将把妇女及其生活以及性别置于理解整个社会关系的核心位置。这种范式将不仅仅提出新的妇女和性别问题，也有助于创造更复杂而充分的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陈述。这一女权主义范式也将包含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妇女的类型和形势问题上产生了有助于妇女而不仅仅是关于妇女的认识。

女权主义也遇到了困境。如果集中在妇女角度的直接利益

问题上，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忽视间接决定性别关系的重要条件。而如果引入一种包含有更广泛的一套社会条件的性别视角，那么就会有这样的风险，即视此视角为只是指示了讨论中的现象的狭义方面，或者发现自身在面对更具支配性的视角时的劣势。在这两者之间女权主义要面临选择。

性别曾被视为某种简单而明确的概念，只不过是作为其他因素的又一个补充变量罢了，现在性别研究已渐渐地从这种性别概念转向了一种更为复杂而难于固定的性别概念。三种基本的研究途径可以在这里识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一研究领域的不同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基于 Harding，1987；亦见 Oleson，1994）。由于总是作这种概览，所以这是一个简化的问题。（关于可能的分类，例如参看 Calás and Smircich，1996）

性别作为变量的研究途径

第一种研究途径是性别作为变量。据称传统的（男性支配）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点，经常在对两性之间作出概括时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差异。因此，对性别的理解，尤其是对妇女的（劣势）条件的理解，需要我们区别对待男人与妇女并且不要假定研究可以同等地看待他们，或者妇女的特定情形可以忽视。因而，任何对经济、社会或心理现象的理解，都必须从如下认识出发，即男人与妇女之间的可能差异（在诸多其他差异当中）必须从情形、经验、歧视等角度来考虑。这一研究途径依然与通常一样主要是基于十分看重"客观性"与"中性"的传统科学的观点。

这一视角的许多拥护者都从非常简单与无可置疑的性别概念出发。很少有范畴会像（生物学上的）性别联系那样容易确定。但是进一步审查性别的重要性，以及什么决定了对男人与妇女的特殊对待，却是很困难的。

这种研究途径可与量化或质性方法相关联，不过前者可能更平常。较少例外地，这种"变量"的研究途径与哈丁（Harding，1987）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的经验主义相一致。在所有要素当中，这一视角典型都有主流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观点，但是却宣称社会偏见与对妇女的否定态度的存在，或者简单地忽视性别问题，导致了研究的贫弱。他们的抱负是要通过清除所有非理性的（怀有

211

偏见的)要素来提高研究的科学质量——客观性、中性与精确性。这通常意味着提倡一种有性别意识的新实证主义。但是甚至使研究远离演绎、假设检验的各种方式和其他经验主义立场的丰富标准,都可能与女权主义者的经验主义有关联。这可能意味着是以例如扎根理论为基础(Zuckerman,1993),或者以某种其他的基于资料的方法为基础的。

女权主义立场的研究

第二种研究途径强调获得更广和更深的关于妇女状况和经验图景的重要性。这里的观念是研究各种从妇女的视角或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现象。首先必须确定什么可以被认为是妇女的利益和经验(它可能与男人的利益和经验相符或偏离)。尽管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携手并进,但女权主义立场的研究与激进的和批判的女权主义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这种立场的研究非常强调与政治和实践的相关性。这不仅仅是一个寻找抽象意义上的真理的问题,甚至更重要的是刺激社会变革与解放。

原则上,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比性别作为变量那种女权主义甚至有更广泛领域的适用性。性别在理论上可以"读入"任何事物。据称(非常正确)科学在传统上几乎都只是由男人引导的,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其假定、重点、中心,甚至科学观念和方法论都带有特定的男性色彩的印记。尤其是,主导原则与科学规则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男人统治的一部分。实证主义和中性的不带偏见的科学家的观念被视为典型的男人的发明。从方法论上来看,可供选择的研究途径更受欢迎,这可以看作更与妇女的视角相协调,此外还可以看作允许突出个人的经验和理解(Acker el al.,1991)。这意味着在研究中让妇女发出声音是很重要的,以及基于她们的经验来描述与解释社会实在是很重要的。

女权主义立场的研究通常与妇女对歧视和压制的具体经验相关并由于这种具体经验而合法化。弗格森(Ferguson,1984)提倡对官僚主义作女权主义的攻击,即攻击更普遍流行的组织形式和刻画了其特征的男性取向的合理性,揭示其自身的个人主义、等级制度、缺乏感觉、没人情味、竞争心态等。她呼吁基于妇女的

“具体而共同的经验”对现代组织的压制性特征作批判性的理解（Ferguson，1984：27）。[5]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何种程度上妇女的经验是一致的，这是允许质疑的。妇女们自身内部有很大的差异，有赖于种族性、民族性、阶级归属、年龄、职业、性取向等。其个人的背景、生活方式、生命历程和对政治与伦理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变革是如何动摇妇女的地位、观点和经验的。有人认为，宣称以“妇女”的名义来发言，可能事实上只不过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罢了。这种风险是巨大的，专注于妇女的“具体而共同的经验”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将是很有限的。[6]　212

如果我们以话语分析的精神认真关注对经验的陈述中的变种，那么这种研究尤其具有适用性。无论如何都有可能避免以聚焦于历史的和社会的确切条件而产生的过度概括问题，并有可能区分不同群体的妇女及其观点、经验和利益。例如，阿克等（Acker，1991）曾研究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结束之时的妇女问题。但是甚至这些作者在其 1982 年的初版论文的文后附言中也注释道，她们低估了与阶级相关的变种及其他差异。

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

第三种研究途径表达了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立场，并且质疑了其他两种研究途径视之为给定和毫无疑问的性别范畴。诸如男人与女人、男性与女性这样的概念的意义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含糊而多变的（Calas and Smircich，1992a；1992b；Flax，1987；Fraser and Nicholson，1988；Weedon，1987）。

经验主义与妇女的视角都试图为女权主义科学揭示稳定的基础，这种科学至少在某些方面会优于传统科学，而后结构主义则怀疑关于理性、科学、进步甚至主体的任何普遍的基础性观念。女权主义者为发现真理——就此立场的支持者来说的真理，真正的女性观点或者可靠的妇女经验中的真理——而作出的努力可以被看作另一种错误探测（fault-finding）的宏大叙事，防止了我们理解的多重性与含糊性，并抑制了可能的声音。

性别被看作社会和语言结构，在时空上是有限制的，也就是

说，是受关于“男人”和“妇女”的意义的现有观念和概念以及创造了性别的社会和论说实践决定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强调社会结构的暂时性和脆弱的本质。性别作为身份认同和经验的标签与线索被认为是短暂和矛盾的。因此，这些女权主义者使自身远离于另外两种研究途径所特别强调的妇女的视角，这一视角是基于妇女独特的和完全不同的经验与利益这种观念的。不把男人与妇女说成是肩并肩互相支持而存在的，不把明显相分离说成是综合的和一致的主体，相反，强调的是性别关系是关键，以及这些关系不会有明确的理解。“女权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发展是性别关系的存在被质疑，性别再也不能被看作简单而自然的事实”(Flax，1987：627)。

213

这种女权主义于是就把兴趣从性别的本质观念转向了对观点多样性的强调。这样一种问题层面有一种被忽视的趋势。性别主要是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话语问题——这种研究途径导致了对动摇观念与语言运用的兴趣，而非任何明确或“积极的”论说。[7]因此，可以指向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见第5章)也适用于此。马丁(Martin，1994：631)批评“反本质主义者”妨碍了这一领域的理智发展：“我们坚持尊重妇女的多样性，我们互相谈论约束我们的野心，限制我们的视野，从特定论题上撤退，抑制自己过多使用范畴或概念，并回避归纳概括。”然而，没有多少学者对这一极端的观点采取多样性的看法。事实上，甚至女权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也常常避免采用一种明显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完全忽视人的肉体，而把压制性的不公正的陈述简单地看作语言表达问题。

女权主义者通常倾向于后结构主义，把这种哲学立场与某种对女权主义者的立场的政治保障结合起来。在上文第5章讨论威登(Weedon，1987)时，我们注意到这种混合的话语可能具有的矛盾性与不一致性。不过，结合对超越于纯粹文本—语言操作的难以捉摸和易变的“现实生活”的兴趣，思考女权主义所强调的多样性与结构因素，可能是最有效地促进女权主义与性别研究的方式。

*

于是，这三种研究途径的不同的结合与/综合确实出现了，尤

其是在现代实践上的质性的经验研究中。（上文提到，基于女权主义立场或后结构主义的变种来设想量化研究可能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基于后者困难还要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三种研究途径的要素都可以纳入思考，如果研究者在某一特定研究领域有经验上的兴趣的话。从“变量”女权主义研究途径来研究例如基于性别的劳动分配是可能的，然后超越这一焦点来看比如导致并由其再现的这种劳动分配的社会结构过程。例如，在对劳动力市场及其组织条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自问如下问题。在工作和社会地位上，两性是如何分配的，即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基于性别的工作分配是什么样子的？特权等是如何分配的？从性别的视角来看，招募、挑选与晋级是如何运作的？存在性别特异性的经验吗？获得什么样的权力和支配条件？通行的权力关系、优先权、意识形态等偏向于两性中的某一方吗（通常是男性或者尤其是男性）？两性是如何由组织条件构成的，即男人和妇女在语言运用、互动形态和社会实践的组织中是如何被“创造的”？以怎样的方式可以从某种性别的视角来对组织作描述？观念、价值、行为和实践可以根据男子气和女子气来解释，或把它们解释为大量不同的男子气和女子气的社会结构吗？什么样的含糊性、变种、片断、矛盾与开放等可以引入到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中？这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打破所有统一的，看上去强健的，以提供真实回答为目的的“事实发现式的”陈述？当然，不可能继续无止境地不加限制地混合各种问题，研究途径的连贯视角和理解它们的指称结构，至少在元层面上是必要的。认真注意到了性别结构并至少触及这里提到的某些论题，这种案例研究的例子见霍尔（Hall，1993）与莱德纳（Leidner，1991）。 214

女权主义与方法

存在特殊的女权主义方法吗？我们知道，妇女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中有一些大的变种（在性别研究领域内外），这些研究者主要倾向于传统认识论观点的颇多。然而，常有人声称妇女研究的特征是质性方法，在这一方法中研究者与被研究的主体这两者的主体性是中心——首先是通过移情和承诺，其次是通过个人经验。这有时被认为是妇女一般所喜欢的方法，比男人较少倾向于

接受相分离的观察主体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是断裂的这一理念,这尤其得到了女权主义研究的提倡。研究者与主体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在这里被认为是很重要的:“除非发展一种信任关系,我们将没法相信我们对妇女生活与意识的研究实际描述了在她们日常生活中对她们的意义,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有效性”(Acker el al.,1991:149)。程序与形式上的方法被弱化了。研究具有了解放认知兴趣的特征,并常常指向日常生活。在伦理、团结以及最小化与研究主体相关的不对称性上有明显的兴趣(Acker el al.,1991;Finch,1984;Olesen,1994)。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这种方法论上的研究途径主要与女权主义的立场研究相关,但是对后结构主义感兴趣的质性取向上的经验主义者与有经验上的倾向的学者仍然可能支持这些方法论理念。这种研究途径被批评为对“真实的”或“真诚的”经验的存在与理解它们的可能性过度自信(Hooway,1989),还被批评为在研究者与访谈主体的关系中最小化不对称性观念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Hammersley,1992)。

215

更一般来说,与性别相关的关于量化与质性资料的观念也要注意到,前者被视为“硬性的”与“男子气的”。在一篇题为“真正的男人不收集软资料”的文章中,盖拉尔迪与特纳(Gherardi and Turner,1987)以一种反讽的模式思考了这一问题。他们宣称,收集硬性资料意味着严格的决断、“无聊的”急躁、基础材料的硬核以及具体回到相关课题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上的预期。另一方面,软资料(soft data)则是“温和派”。

尤其是在典型的女性领域,如很难界定极端敏感的暴力、性虐待与强权,妇女研究者努力思考了方法并发展它们(Widerberg,1992)。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对方法论作讨论的更一般的贡献出现在贾加尔(Jagger,1989)那里,在那里所有研究中的情绪的核心重要性得到了强调。我们将简要评论这位作者的那些值得一读的文章。

贾加尔攻击了传统的关于情绪的观点,这种观点视研究中的情绪为某种可明确定义的并与好的科学不相容的因素,并像疾病一样侵袭着不太成功的研究者。她认为理性与情绪之间的分界线是人为划定的,无情绪无情感的科学家是虚构的。研究心理学

支持了贾加尔：科学家深陷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常常显得不太愿意接受那些撞击了他们的典型确信与既定利益的事实证据（Bärmark，1984）。对于科学家描述他们自己的和反对他们同事的观点的方式的研究表明：他们宣称他们自己的结论基于经验材料和其他理性基础，他们的反对者的结论则被说成是受到了非理性元素的污损，比如投机思想、社会纽带、特定方向上的个人投资和心理属性（Gilbert and Mulkay，Potter and Wetherell，1987，有提及）。这种情绪化的态度关涉的不仅仅是理论和已发表的结论，也有研究过程中的因素。对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对他们的现场记录怀有强烈的情感（Jackson，1995；比较 Strauss，1987）。

贾加尔反对认为情绪是研究中的错误或偏见之源这个观点，并主张情感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个体特有的气质，毋宁说，它们被社会建构在不同的层面上。情绪依赖于人们对情形作解释的方式，因而与认知层次以及人们如何处理印象并作出判断密切相连。文化预期与规则在这里很重要。每一种感觉或情绪都预设了对环境的某方面的评价，相反，每一种对情形之判断的评价都暗示着那些有着共同评价的人可以被认为是以类似的情绪对它作出了反应。因此在许多情绪反应中存在着主体间性。我们只是不得不考虑由存在于研究（这种研究认为情绪是贯穿研究过程的重要因素）的所有方面——从被选择的研究领域到特别关注以及在访谈、描述和分析中运用的词汇——的价值（表达或未被表达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情绪的作用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思考和他们采纳重要研究主题的态度中，而且存在于他们所作出的特定观察中。216

> 正是由于观察指向、形成和部分地界定了情绪，所以情绪也指向、形成甚至部分地界定了观察。观察不是简单的一种消极的吸引注意或记录刺激的过程，而是一种积极的选择与解释。选择什么以及如何解释是受情绪态度影响的。在个体观察的层面上，这种影响对常识总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常识，当我们高兴、沮丧、恐惧或自信的时候，我们将观察到世界的十分不同的特征（Jaggar，1989：29）。

情绪在个体层面上很重要，同时它也是社会现象。主流规则

与价值必然反映了支配群体的兴趣与文化理念,这也适用于我们感知、解释和反映生活的各种领域和制度(如科学)中的情感的方式。流行看法认为"科学"是无情感和无情绪的,这可以看作对主流情形的一种表达。情绪是研究者的动机和方向选择的特定方式以及处理研究主题的特定方式的不可避免的重要部分。研究过程应该由个体研究者对他们自己的情感的自动思考与聆听来明确引导。同时,应该深切注意到被研究主体的情绪,不管他们研究的是什么。这并不需要暗示什么"情绪研究",也就是说,研究是完全处于情感的影响下的。关键在于不管研究主题是什么,这一维度是重要的。又据贾加尔,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非法的情感,也就是说,不是由精英与支配性的规范系统所培育的情感。

由此可知,对于情感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的自我分析是研究尤其是质性研究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自然不是情绪宣泄的问题,而是在经验和理论工作之前或期间的解释与处理某人情感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给予情绪比观察、理性或行为更核心的地位,但也不应该使它从属于它们。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研究者应该听到他们的情感并处理它们,比如在进行访谈的时候。在面对访谈主体或观察到的情形时研究者的感觉是什么?直觉印象是什么?研究者不情愿问特定的问题吗?既定描述中的潜在语气是什么?把研究工作视作不仅仅是一种感知或认知的问题也是一个情绪的问题,看到这一点可以提高研究的价值。

217

这些观念并非是特别针对女权主义的。我们在第3章看到,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理性与情绪的不可分离性(进一步的讨论见Sköldberg,1998)。许多针对实证主义的一般性的批判也已经强调了研究者整个人的重要性。例如,阿多诺(Adorno,1974)写道,在精神分析的模式中以及伴随着对家长制度的间接批评,甚至心灵的最高客观化也是由人类的鼓励才培育起来的,没有这些的话任何洞见都不会产生。扼杀了思想之父即激情的那种思维必然为这种愚蠢的形式付出代价。波特的立场与贾加尔和阿多诺很不相同,但他也承认"没有激情我们将一无所得——当然不是在纯粹的科学中。'追求真理的激情'这一说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喻"(Popper,1976:97)。某人也可以设想研究者采纳贾加尔的思

想而无需对性别维度作任何特别的关注。同时,对研究者是情绪空白这一观念的如此强烈的对抗来自女权主义者的阵营,这确实不是巧合。理性的、非情绪化的、"冷静的"研究者这一理想是一种男子气的理想。在妇女对研究者的研究中,当然有若干例子把她们自己的经验、情感思考处理为她们的方法系统的一部分。在对性骚扰研究中,维德伯格(Widerberg,1992)就是一个例子。

对女权主义的批判性讨论

女权主义强调在研究中对性别敏感度的重要性。有的教科书暗示了一种更狭窄的性别关系图景:男人是压制者,而妇女通常是受害者或者可能是某种反抗力量的成员。某些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政治推力,也许刺激了这样一种角度,但是有一种风险是:把男性压制当作性别关系中的绝对的支配性因素这一思想,导致了一种思路更加狭隘的观点。例如,哈丁(Harding,1987:8)宣称:男人想要理解妇女问题时常源自"渴望抚慰、控制、剥削或操纵妇女"。这一宣称看上去在研究语境中把太多的罪恶归因于男人的动机。一般来说,近来的妇女研究常常比以前的研究较少挑起争端而是更加开放和更加作自我反思(例如参看,Flax,1987;Fraser and Nicholson,1988;Skeggs,1997;Gherardi,1995)。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女权主义中相互竞争的方法与批评争论的多重性,在这里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有些女性研究者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男性参与到妇女研究中来。她们特别强调接近与移情的理念,并以很好的根据宣称,在某些问题上妇女发现很容易理解其他妇女(Finch,1984)。在承认共同的性别有时不仅仅是一种优势而简直是研究中的一种前提条件的同时,在许多问题上人们可能都会感觉到一种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异性相接触和相互理解的感觉,并感觉到与恰好同他有同样的染色体和同样的身体解剖结构的那个人相对立。不过,好的研究的另一面——使自身远离的能力——也很重要。一方面是移情与理解,另一方面是批判质疑、反思、概念化与理论抽象,在这两方面之间斡旋的能力是好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如文学或新闻业中)的特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够把某些东西视为可能会过于容易显得熟悉或自明的那些特异且引人注目的东西,这是很

218

重要的。与研究主体相对的异性研究者（还有另一种伦理关联或阶级背景下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令人感兴趣的方面，这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我们觉得例如在关于商业或军事行动、大型狩猎中的“男子气概的”领导层的民族志，若由（女权主义的）妇女来写，应该会比由男性商务顾问、军官或者满腔热情的狩猎者（可能是武装起来的物权崇拜者）来写更有趣。反过来，我们不要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男性研究者——不必定是支持女权主义者——能作出令人感兴趣的关于妇女和女性环境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某些妇女研究中过于狭隘地强调接近、移情与身份认同，这有些令人担忧。也许由男人和妇女共同开展的研究将能最好地达到对接近/远离关系的最优化，这也就是设想性别关联本身在与某一特定性别研究相关联的接近—远离关系上是有影响。也许最富有成效的结合是一个有“男子气”研究取向的人与一个有“女子气”研究取向的人的结合，这不一定意味着男性研究者与女性研究者的结合，因为这两种取向与人的生物性别不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关于男子气与女子气的研究，例如参看 Alvesson and Billing，1997；Marshall，1993）。如果许多妇女研究者都有一种客观主义—量化取向，而某些男性研究者更倾向于解释的方法，那么性别的重要性不应该被过分强调。有一种风险在于：对男人和妇女的简单讨论再现引起了老套的性别模式，因为人们几乎总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异（Alvesson and Billing，1997）。因此，比生物学性别意义上的混合更重要的是不同性别关联的经验与态度之间的结合。[8]

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要为女权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作出任何特别的贡献。不过，我们提供的作为质性研究之核心以及显示出反思因素的某些维度在基本观念上还是与女权主义相关的。与主流的女权主义相关联，话语分析者对通过各种言辞陈述获得真诚、深入的主观经验的可能性所提出的批判，看上去尤其具有相关性。无需盲目宣称经验只是孤立地由话语和文本性构成的，我们仍然要深切地关注经验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差异。我们曾指出，我们有点怀疑波特与韦瑟雷尔使语言作为与主观或“客观”实在相分的一种自主的研究对象而孤立起来的做法，我们确实感到在把陈述与“真正的”经验和实际情形关联起来之前保持谨慎和

219

小心是很重要的(Hollway,1989)。因此,在研究真的能开始评论"超越的"现象而不是论说行为(如访谈或日常陈述)之前,需要对性别话语,包括对实际情境中的性别陈述的近距离研究作更多的思考(对这种论说焦点的说明,见 Marshall and Wetherell,1989)。对性别构造过程的动态研究,例如,职业与行为是如何被解释与/或描述为"男性"或"女性"的,也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可遵循的线索(见 Hall,1993;Leidner,1991)。

除了父权制(社会被视为一种性别约束系统)之外,更积极地尝试把其他隐喻引入到解释作品中来,也能鼓励一种更反思的态度。这个问题是所有研究都会遇到的,如果我们迷上某一特定的隐喻,那么它就会失去控制并开始"指挥这个世界"(Asplund,1989)。它通常有利于把与性别有关的现象从那些绝非由父权制、性别等级制度或约束之类概念触发的视角区分开来。例如,可以说现代社会打破了僵硬的社会边界,包括性别边界。组织与其他制度有时不仅仅可以被描述为性别歧视的,而且可以被描述为维护平等的(Billing and Alvesson,1994;Blomqvist,1994)。许多基于性别的组织研究采用了一种狭隘的方法,盲目地从妇女被冷遇的情况出发,并且完全不顾或者至少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大量的现代组织实践能支持妇女的职业生活,例如愿意以合理的方式来任用有资格的员工。(这种平等并不必然就是性别中立,其前提也应该从性别视角作批判的探索。见 Ferguson,1984)

也许更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地思考除了性别之外的其他维度。这并不是意味着简单地增加变量,为"男人"和"妇女"附加其他社会学的、制度化的标准变量如阶级、年龄或种族,以便从两性内部择出变量来,或者也不是意味着把焦点放在有特定的妇女利益的问题上。与孤立地把焦点放在性别上的研究相对照,我们可以思考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中性别理论和对性别的兴趣属于指称结构与研究主题的因素,但是在这一理念中研究者对于"其他非制度化的维度可能被证明至少同样重要"这一思想也是开放着的。在一种更广泛的研究途径下,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不会为性别给出任何超过其他方面的预设的特权。

非女权主义者研究中的性别讨论

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批判性别研究，而是指出其他研究可以从这里获得教训的方式。实际上，性别维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是重要的，而且重要的是甚至与性别并不主要或直接相关的研究也应该发展出性别方面的某种敏感度层面。从理想情形看，性别研究者应该扩大和变化他们的兴趣范围，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比目前更关注性别维度（Alvesson and Billing，1997）。这将有助于对抗阿克（Acker，1989）所谓的“女权主义的贫民区化”。至少对性别敏感范畴和思维方式的最小洞察应该为所有社会科学预期。一条适当的建议，尽管是一般意义上的建议，当然就是阅读女权主义者的（性别研究）著作，并且始终在心中记住性别条件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与澄清性别论题并不直接相关的研究在其与性别相关的思考中会很熟练，但却有可能分辨出性别盲（或性别忽视）研究与女权主义研究之间的中间形式。底线应该是非女权主义者的反思研究不应该（不自觉地）作为性别关系中的一种保守的力量，再现那些被视为当然的观念和性别偏见制度。

在思考性别维度时我们可以设想如下一些层面：避免再现不对称的性别关系和保守传统的性别概念；当它们显得特别相关的时候，强调性别条件；采用性别隐喻作为补充视角。

避免再现社会支配情形的那种性别思维，这应该是对于所有研究的明显的最低要求。然而，一定意义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对于自觉的女权主义者的研究而言，也极少完全避开盲点和偏见。而更严重的性别盲形式，如陈规老套，是应该可以避免的。拒绝明显的有性别关联的语言可能是一个问题，例如，用“man”来同时包括男人和女人，用“mankind”表示人类，或者用“manpower”表示人力资源；或者无批判地采用普遍意义的专门指代，如“管理者”或“作者”用“他”指代。这可能不是一个从男性抽样到一般意义上的人们作概括的问题；或者，如果两性都包含在一个抽样中，通过粗略的考察来看是否有任何明显的差异存在的问题。如果实情如此，那么差异至少应该被提及。某些思想也应该被赋予研究主题以性别本质：在没有为性别条件给出一种误导图景的意义上，正是“完全的”性别中立掩盖了不对称的性别关

系并且/或者代表了一种明显的男性逻辑，这一点是不是非常清楚？

真正要紧的是研究者应该停下来时而想一下性别问题。摩根(Morgan,1981)对男性研究者的忠告是，他们应该不时提醒他们自己，他们是男人，这可能甚至对——或许尤其如此——那些对性别状条件不感兴趣的研究者也是有用的。思考一个男性项目的报告草案和为这个报告所作的研究可能是一种良好的练习，这鼓励了反思与修订。如果我们仍然天生地更重视实践，或者更相信这种策略，那么我们就可以为容易陷入的陷阱开列一个清单。不过我们可以提到值得思考的一点，即参考文献和经验材料中提到的妇女的数量。如果她们大体上被忽视了，那一定是该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了。也许整个规划表达了一种根本的性别偏见？也许整个领域或传统都渗透着男性态度？这自然与下面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是：在参考文献或研究主题中有一部分是妇女问题，这是其自身中具有迫切重要性的问题，特别是因为研究感的兴趣不在生物学意义上而在研究者的取向上，尤其是在性别研究的语境中。根据典型性与定量来进行的这种思维在我们看来太机械了。我们建议注入反思，而不是任何确切的公式和规则。

221

在有点更具野心的思路中，研究者可以通过自觉强调性别这一条件来支持具有性别敏感度的社会科学的观念，无论何时经验材料都表明这些是很重要的，或者支持这种语境中特别有趣的观念。经验材料本身当然不能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向上产生任何明确的图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解释工作。但是研究者可能从准备阶段就易于接受从性别的意义上让经验材料“视角化”(角度)，尽管某些类型的经验材料将使它们自己比其他材料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方法。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教育环境与选择或者消费形态中可能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如果向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的观念充分开放，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更细致地探索这些差异的发生与重要性。这里的关键点是研究者应该也从性别的角度有兴趣和能力来公平处理经验材料。这不仅仅是设法保持开放心灵和公正的问题(通过捍卫和努力实现这些美德，研究者很容易使自身屈从于所有形式的常识与文化观念)。如果经验材料要被作出与性

别相关的解释,为了发展开放的程度,就需要一定量的性别理论研究工作并学习性别敏感度范畴。对直觉的非理论的依赖——通常由常识和个人的"理论"来引导——常常不会有用。

第三种更具野心的方式是允许女权主义者的观念无需直接把论题主要界定为性别研究,这将包括性别思维作为其他被采用的隐喻或视角的补充。因此主要兴趣不是澄清性别条件或者强调性别视角,以此作为理解被研究的对象的钥匙。不过性别范畴常常有助于阐明各种事物,这些事物也(也许主要是)根据其他范畴来看待。例如,恩与勒夫格伦(Ehn and Löfgren,1982)把"男性"与"女性"看作重要的文化组织原则,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种类的文化。例如,我们可以把官僚组织(在韦伯的意义上)或支配性的领导形态——在此系列中首先是领导者,然后是领导、计划、协调控制或者与其他人交流"想象"——在某些方面看作对"男子气"原则(无论好坏)的信息携带者,而无需把这些表现简化为纯粹的男性的发明。

这意味着研究者不是简单地消极地等待经验材料"产生"性别差异——例如,男人和妇女在材料中明显以不同的方式(模板式)行为,或者自发地谈论性别关系而无需受到直接的鼓励才这样做。相反,研究者在其解释中积极调动起了性别这一视角。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探究,是否性别解释在其他视角以其特定立场所能提供的观点之外,是否能再产生些什么有趣的看法,然后增加他们对原本不被认为有任何特别的性别因素的现象的理解。

这一过程可以被一项对于广告代理所作的民族志研究来阐明。本书的作者参与了这一研究(Alvesson and Köping,1993),并非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项研究应该集中到性别条件上。然而,结果是工场的劳动分配遵循了一种明显的基于性别的形态。极少例外地,研究中的男性代理占据了主要位置,而年轻漂亮的女性却被发现只是较低的支持角色。这一简单的经验观察使我们对通过性别所作的劳动力分配以及广告代理中一般的性别关系论题作了更细致的研究。我们这样做是通过问相关问题并且审查访谈报告与观察规程,并在心中始终记住性别关系。于是某些性别因素就出现了(可以说我们正在遵循刚刚讨论的第二种研究途径)。不过,我们更进一步把性别概念引入了理论的指称结构,我

们用这种结构来解释其他论题而非性别特异性的工作分配。性别维度能够阐明"广告工作与身份认同"(我们以其他的非性别特异性理由也聚焦于此)的论题,而且我们发现它启发了对广告工作(情绪、直觉、非理性)的特征以及对从妇女的温柔特质而言广告代理商与其委托公司(依赖的、消极的)关系的特征之陈述的描述。换言之,性别理论被运用为工场研究中的补充视角,这一工场研究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意作性别研究的(见上文第三种变种)。

系谱学方法:福柯

数十年来,福柯是社会权力研究中的领袖人物。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提到过,他的作品对反思和方法论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他把焦点集中在知识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上。Foucault,福柯(1972;1973)最早拥护"考古学方法",这一方法思想是要破除解释学的解释和相符或反映式的实证主义理论,并制订出一种总体上的规则系统来思考整个时代,而不管陈述的真理及其(深层)意义。他为自己布置的任务是去追踪有秩序的知识或"认知"领域,这与整个时代的话语相通,而无需对话语的真实意义作任何深度解释,亦无需在与实在相符的意义上对其真理性作出承诺。由此,可以说福柯的出发点是一种激进化的现象学。我们在第 2 章了解到,胡塞尔已经从真理方面作了一种还原,把它取消了或把它放在括弧里,现在福柯继续了这一意义因素。这里没有任何巧合,因为福柯是非常有名的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学生。 223

福柯在与话语分析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话语"这一概念。福柯用话语"来分析假设、范畴、逻辑、宣称和接合模式的各种构造"(Miller,1997:32)。于是话语不是被视为社会语境中的任何语言运用,而是被视为一种架构和推理逻辑,它通过贯穿社会实践而系统地构成了它的对象。福柯的兴趣主要在话语如何构成对象和主体上,而不在于对社会互动中的语言运用的细节关注。

权力问题甚至在早期考古学阶段就不断被提及,但它是从属于话语分析和对知识形式图之兴趣的。后来福柯对权力问题的

兴趣不断增强,并且引入了"系谱学",在系谱中研究的是话语的起源而不是潜藏于话语中的某种潜在的观念或概念,它从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规律性来看待这种话语。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源头上系谱学家评价了随机性、间断性与权力。也就是说,话语的出现就如同它们的联合一样不是既定的而是偶然的;它们在时间中是脱节的,当它们相互合并时,它们是暂时地部分意义上地,而不是对原初思想的持续、协调的表达;它们起源于粗俗的物质主义,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权力意志,而不是如同下文所宣称的合理化那样由高贵的理性支配(Foucault,1972)。

在福柯的系谱学中,尼采的影响很大。尼采最早创造了系谱学的方法并为其命名,从这个事实来看尼采对福柯产生影响的原因就很明显了。福柯(Foucault,1978;1979)运用系谱学的研究规划广泛研究了监狱体制与规训监控的发展,还运用于对性别关系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中。考古学与系谱学互相补充,考古学研究话语的形式,系谱学则研究它们(与权力相关)的起源(Foucault,1988)。考古学提供了关于论说构成的遥远而相背离的描述,系谱学则批判地忠于对社会实践之根源的探究(这里福柯的思想与批判理论相近)。然而,两者的互相补充并非绝对平衡,因为福柯思想在系谱学阶段,系谱学是占主导地位的(类似地,在福柯思想的考古学时期系谱学其实已经出现了,不过这时是作为一种从属因素,受考古学兴趣的支配)。

224

系谱学阶段的第二个转变与对权力的日益提高的兴趣有关。福柯现在研究非论说性和论说性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先前,话语与(考古学的)描述处于中心位置。自其专著《规训与惩罚》以来,像社会制度这样的现象(监狱、精神病、家庭、宗教、市场、性等)就更加重要了。例如,精神病学知识是基于对(不同群体的)精神病人的区分、分离与控制而形成的。对此的权力是获取知识的前提条件,这使得仔细的观察与分类得以可能,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同时,知识又使权力可能:权力的运用不是主观随意的,而知识——关于精神疾病的话语——是权力的基础,是精神病制度的功能。

权力与知识

福柯(Foucault,1978;1979;1980;1982)对权力的理解从根本上破除了更为传统的理解方式。他不用传统的社会科学范畴或观念,如个体、结构、兴趣或意识形态,他也不限制或界定权力。对他来说,权力并不构成某种可以对其自身作孤立研究的抽象属性。它缺乏本质,是不可测度的;它只存在于关系中,或存在于在行为中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因此,福柯对谁以公职、魔力、知识或任何其他权力基础对别人"拥有"权力的问题不感兴趣。这样一种方法导致了把权力视为某种明确的核心化的事物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弱化了现象并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多面向的特征。在福柯看来,权力不允许自身局部化和固定化。

因此,制度并没有创造权力。制度的作用实际上是组织或者可以说是"悬置"已现存的有着非常广泛的事例支持的支配关系:"国家统治或法律、一家之父、市场上的金钱、黄金或美元、宗教上的上帝、性习俗中的社会性别"(Deleuze,1988)。评论两个引到的现象:在社会性别存在之前两性关系就已存在了,王室统治权力的出现事实上只是作为一种把微观权力综合在一起的一种策略。关于国王的权力,福柯举例表明,王室的逮捕证(有封印的密信)——今日自愿接受精神治疗的先兆——如何成为了在微观层面上除掉家庭、工场或邻里败类的愿望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种原初的具有内在固有属性的统治权力的表达。实际上这微观层面把它当作一种"公共效用"用于解决冲突(Deleuze,1988)。

225

权力关系可以从它们被表达的技术和形式来获得最好的理解。权力的运作是核心论题:使权力生效的实践、技术和程序。在福柯看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们才可以以一种富于成效的方式来谈论权力:

> 与"极琐细的权力仪式"隔绝是福柯大多数后期著作的概念基础。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将识别权力仪式——本瑟姆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以及忏悔——发生的特定场域。他将使用这些来局部化并详述权力是如何起作用的,它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Dreyfus and Rabinow,1983:110)。

因此，权力在原则上到处存在。他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微观语境中，而不能限制在任何特定的单元或规模上，如单一民族国家、公司的领导层、资本主义制度等诸如此类。制度——学校、工厂、医院——构成了规训影响的细网。在对《规训与处罚》的评论中，格尔茨（引自 Hoy，1986a：143）写道，福柯显然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进步的框架，并把发展描画为“不自由的增长（the rise of unfreedom）”。对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研究要求我们：

> 不要把统治的影响归因于“占有”，而要归因于性格、操纵、策略、技术、功能；要求人们应该持续地以一种紧张和动态的方式来破解某种网状关系，而不是破解某人可能拥有的特权；要求人们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永恒的战斗模型，而不是通过订立契约来调节处理或者征服版图。简言之，这种权力是被运用而非被占有；它不是统治阶级所获得或维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地位的总体影响——这一影响通过那些被统治者的立场体现或展开来。进一步，这种权力不是被简单地运用为对那些“未拥有它”的人的一种义务或禁令；它赋予他们，由他们或通过他们来传播；它向他们施压，只是由于他们自己与它作斗争，拒绝它对他们的控制（Foucault，1979：26-27）。

福柯没有界定权力，也没有形成任何关于它的明确的理论，这是其权力概念的必然结果：

> 相反，他视权力为对实践的公开安排或者被强加到大量形式中和一系列不同的社会领域上的公开的结构。在福柯那里，没有任何权力理论限制了这种分析领域；没有任何理论秩序设在“权力”会“是”什么样子的边缘上。除非在实践中或通过实践权力才存在，否则权力不存在，这样的权力潜在地到处都是（Beronius，1986：32；引者译）。

226 主体性自身，作为一种关于自身的复杂的矛盾的和变换的观点，通过表达了权力的社会实践而改变或再现（Knights and Willmott，1989：541）。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主体——行为者——藏在社会实践背后（广泛的行为方式），而福柯却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的分析策略中，历史和文化上决定的实践先行并构成了主体。

于是,诸如"理性""疯癫""犯罪"和"性行为"等现象是并非作为人类功能之一部分的能独立存在的自然的对象。相反它们被认为是非自然的对象,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构成:它们同时也是特定形式的认知对象,是历史上具体改革和管理规划的靶子(Beronius,1991)。因此,疯癫并不仅仅是存在于某一特定群体的人的大脑中;毋宁说,它正是通过各种技术和程序才使得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疯癫成功地成为了知识和行为(监禁、治疗)的特定对象。在行为、姿态和生化过程等形式之中有一种"未经加工的天然材料",不过,那被理解为占有、不道德、上帝的惩罚或者精神病者,是材料和认知层面的区别、分类和配置行为的一种结果。

福柯的作品表示了巨大兴趣的不仅仅是使权力研究专门化,而且是所有反思性的社会科学,至少是以任何方式与此相关的。不同形式的知识是服务于权力的,这些知识以一种规训的方式起作用,其中确立了常态与背离。于是,科学与其他规范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已经确立的观念有助于调节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行为。根据福柯,知识不可能从权力中脱身出来作出中性的洞见。权力与知识是相平行的概念,不过当然不是同一的。笛茨(Deetz,1992:77)指出,福柯"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知识的(of)权力不如说是知识中(in)的权力"。权力的运用与知识的应用/发展相互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通过对现象作分类、编码、校准、计算标准轨迹,并且分割这些现象,某人处理这些现象并同时获得对它们的知识。知识与制度控制关系密切——在学校教育、精神病、矫正治疗、性咨询、育儿、公司管理等事物中。福柯的目的不是要从意识形态(大体被认为是偏见、错误观念)中分离出真理(科学、知识)来,而是要揭示出"政策的真相"是在权力—知识关系中建构起来的。知识是权力运用的基础,而权力运用也会产生知识。从另一种方式来理解,权力成了知识中的关键维度,这知识是由制度实践及基于知识的制度实践所支撑的。不仅仅公开的压制性的知识,而且很大程度上甚至"建设性的"与"进步的"知识,也与权力相关并以一种规训的方式发挥作用。

解释学在这些规训的方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也适用于甚至更强烈地适用于存疑解释学,弗洛伊德是其代表人物,由此个体被认为导向了对他们的真实自我的理解。福柯认为这　227

些实践是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的，而解释学实际上是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紧的是，既不要像现象学那样解释个体的日常行为，也不要像解释学那样解释背后隐藏的意义，而是要把焦点正好放在解释学的"方法"本身上。人文科学包括了解释学，它在规训的"生物权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或间接地调整并由此创造了现代人的身体。生物权力可以被描述为"一套历史实践，这套实践产生了被结构主义系统化的人类对象，和被解释学解释的人类主体"（Dreyfus and Rabinow，1983：103）。生物权力，控制人的生命的权力，它在我们当前的时代构成了首要的权力运用，因此，在工厂、医院、中学、大学、军营以及监狱这类体制中能发现直接而明显的制度组合调整中的表达。例如，工厂车间层面上的规训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上的原因而引入的，而是作为已经存在的生物策略的展示。我们在这里就在结构内部转变为对象了。不过仍然有方法把我们转变为温顺的主体。而更微妙而间接的形式则是由告解室提供的，在那里性的关系是核心。整个现代医疗行业可以看作这里的第二种表达，更具操控性的因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地介入了人类的生活情形之中，它可以归属于基于人文科学观念的间接规定。与旧有的工厂规训相比，这也是组织化行为的软方法的基础。组织化行为依赖于动机理论及其他可欲方向——如指向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上的主体化精神分析理论（Sotto，1990）。

一些方法论原则

从他的权力概念出发，福柯在《性史》（Foucault，1978：98-102）中构想出了四种方法"规则"（不被认为是"紧迫的方法论"，而是"至多是……提醒注意的指示"）。这些规则在这里以性别关系为例来阐明，但它们当然也能运用于别的领域。

1 *内在性规则。* 权力与知识从来没有分离而总是融合在一起的：权力/知识。因此，没有"纯粹的"或"天然的"知识。我们回想起，权力在实质上也首先是局部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它是与从"权力—知识的局部核心"展开相适应的。这样一种核心是忏悔程序，例如，在治疗情形中治疗专家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小孩的身体，其性别关系是 19 世纪发展的强

烈的兴趣,以至于它被"全部观察群体,父母、护士、仆人和医生"围绕。

228

2　*持续变化规则。*　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持续变化着的。存在特定的权力/知识形态,不过这些形态不是静止的,而是构成了"变换的母体",它可以在这个或那个行为方向上改变。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对婴孩期性别关系的兴趣,就逐渐变成了现在对我们成年人性别关系的兴趣。

3　*双重条件规则。*　局部手段和关系必须与总体策略相符,相反地,总体策略只能在局部手段和关系中具体化。因此,除了"把性医学化和非生殖器形式的心理症化",马尔萨斯的人口统计学策略也把家庭视为一个固定的点,因为对于其他权力中心而言,它是局部而相对自主的。

4　*话语的策略多价(polyvalence)规则。*　话语出现在权力领域,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它们从来就不是明确的,而是复杂、矛盾和不稳定的。例如,同样的话语既可能是权力的工具,又可能是权力的障碍。领域内部的不同力量把它拉向不同的方向。因而,它是一个考察某一特定话语所处的情境问题,它在手段与策略层面上,在权力之间展开,而不是简单地去确证它是某种特定的总体策略的一种表达或结果。

自我与伦理学

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其《性史》的最后几卷的完成期间,福柯开始深入思考古迹古物的历史。于是他开始认识到主体的构成(主体化)更早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并没有如同他先前所设想的那样进展。尤其是,看来古希腊已经从事了权力操作,可以说权力把它引入了自我反思、"对自身的关怀"(Foucault,1988),以及如同雕塑那样创造了一个自我中。这提供了接近那超越了先前所运用的两种维度(知识与权力)之外的自由维度,而且这一维度不会被前两种维度同化,尽管自由要运用知识与权力以作为前进之资。除了先前的基本问题"我知道什么"以及"我能如何做"之外,现在又出现了自我认同的问题,"我是谁"(Deleuze,1988)。这种对自我的关系产生了一种主体,这种主体实际上先于规训方法的主体化过程。于是我们可以谈论福柯思想中一种

新的第三期伦理学的阶段,不幸的是他是在 1984 年快要去世时才对此作出解释的,并没有充分展开。于是,第三种主要的维度出现在福柯的思想中,伴随着知识与权力但并不能还原到它们,这就是自我。

229

应该注意到,这种关于主体的(积极)构成的观点,与我们在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后现代的主体化观点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前者当作对后者的批判。这样一种自我的积极作用,即自我反思并由此产生主体,当然被排除在后现代观念之外。根据后现代观念,主体是由话语产生的。实际上,甚至在福柯思想的最后阶段,主体被产生的方式仍有知识与权力形式的色彩,不过重要的是它不能还原到它们。因此,在这一时期,主体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反抗已确立的权力/知识形式的力量而发挥作用的。但是这一主体不是旧有的、不可改变的个体,它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过程,一种新的、动态的创造,一场支持“差异、变种、变形”反对那种权力的(微型的)游击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迟来的福柯版本的主体化中,主体主要不是一种“社会结构”,而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的结构,尽管已确立的权力/知识形式的结构不断地试图以其已结晶的形态来为它打上印记。这场主体与权力/知识之间的战争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从来不能预先决定,也从来不能最终决定。

*

德勒兹(Deleuze,1988)粗略地以下述方式描述了福柯的社会本体论。最终在时空中有一种无定型的巨大而汹涌的社会的天然能力。它们被构造进入了自由流动的策略和权力游戏,这反过来又沉淀进了“可见和可说的”社会阶层中,那是知识与权力渗入其中的论说和非论说形式的实践。主体主要由包藏着的社会天然能力(尤其是在时间因素和记忆力形式下)创造,但是后来将由策略和社会阶层的多因素来决定。

批判性的观点

由福柯强烈刺激的权力研究有变成一种理论万灵药的危险。去理解明显中性或“好的”关系与实践如何根据权力来阐明,这在原则上是值得称赞的,但风险是这一观念将太过强烈地需要经验

材料。这一趋势可以回溯到尼采的影响。我们在第 3 章中注意到,在批判基础哲学的时候,尼采自己正在做还原论的基础,即权力意志,任何其他事物都最终由此再现。这种现成的包装正是福柯所继承的。很难设想任何观察会否定福柯的权力观点。一切都可以从属于福柯的术语,其风险是将会发现这种视角不仅仅是“一切(everything)”可以从属于福柯的术语,而且有一种结果是“没有任何事物(nothing)”可以从属于福柯的术语。这一风险不应该被低估,即预设控制了结果——某人会发现在这种情形下所寻找的是局部权力/知识。关于权力与知识的范畴联系的问题应该也包含着福柯自己的研究方案。批评家要问福柯自己的知识产生了什么样的权力以及他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Dews,1987;Walzer,1986)。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福柯自己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研究阶段,以免他的思想被权力问题整个地吞没。 230

另一问题是福柯所支持的这一微观焦点的局限性问题。对权力具有中心或本质这一观念的批判是令人信服的,但这并没有阻碍某些明显关键的现象逃离福柯的视角,例如,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或单一民族国家的关联(Walzer,1986)。他反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是正如克莱格(Clegg,1989)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不提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那么我们将很难理解 1980 年代引导新自由主义政治的重要性。沃尔比(Walby,1992)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变得太分散了,而且对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关系的根本方面,都缺乏洞察。牛顿(Newton,1998:425)认为,福柯忽视了“权力关系中社会建构的稳定性”。一个相反的看法是,福柯感兴趣的是权力的微观层面和特定形式,他的目标不是考察其他类型的现象。另一个说法可能是他从来没有以政治正确为目标。

许多批评家所集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对新形式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的悲观主义观点。一切都倾向于成为权力和标准化的问题。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对可能超越它们的那种事件,或者何者构成了权力的最低“否定”形式作鉴别的指导方法。例如,福柯的观点在突出技术、司法和医疗进步中的积极特征上是无能的(Dreyfus and Rabinow,1986)。一切都“成问题”,没有任何线索指

明何者将“尤其成问题”。因此,通常认为有政治的和批判的风险的分析转变到了它的反面,以至于它没有了批判的优势变得无关于政治了。禁止问题由以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标准化立场,很容易变成一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其对立面的普遍特征。“成问题”者(值得作详细批判)只能根据“不成问题”或至少“较少成问题”者(的可能存在)才能分辨出来(参见 Dews,1987)。另一方面,这是福柯的一种自觉的选择。他的取向是在微观层面上同时从理论与政治角度反抗关于权力的流行立场与策略,他可以称作一个永恒的反叛者或者加缪笔下的一个神话人物西西弗斯*,而总体上不是一个革命者,或者像我们在第4章中讨论的那些批判理论家。理解他的出发点以及对权力与知识的本质看法,这当然还是唯一的实际出路。福柯自己坚称,他并不认为他所关注的一切都是坏的;另一方面,大多数事物都是“危险的”。因此,重要的是观察和反抗在每一种既定的时空情境中的“主要危险”,也就是说,关键是从若干可能危险中选择最低的危险。所以,福柯把自己称为一个“超越悲观的激进主义分子”(Dreyfus and Rabinow,1983)。

231

第四,布迪厄与沃昆特(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批评福柯片面地把中心集中在肉体、规训的生物权力并低估了渗透在社会各种“领域”的更加微妙的“符号暴力”。这一批判看来是没打中要害,因为我们了解到福柯也包含了权力的操纵方面。不过,这是以间接的方式达到对身体、生物权力之规训的迂回路线。福柯的权力观念被布迪厄和沃昆特讽刺性地描述为有点青春期特征,反映了青少年的焦虑,面对着规训的要求和成年人世界的制度化!

自然,上述这几点批判很难被福柯的支持者们接受,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其公正性,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福柯是社会理论的非常重要的灵感之源,对质性的社会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巨大的原创性,其中表现在他拒绝接受传统的社会科学范畴,他打破了这些范畴并以全新的范畴取而代

---

* 西西弗斯(Sisyphus),古希腊神话中的君主科林斯王。他不服天意,挑战命运,触怒天神,死后入地狱,被罚推巨石上山之劳役,但巨石被推到山顶时总会滚下来,于是又要重新把巨石推上山,永远如此。——译者注

之。同时,福柯的研究工作是在一种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传统中(韦伯、批判理论等)进行的,这一思想传统把探照灯打在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上。而他则为这个传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维度,他常常非常出人意料地和创造性地提出一些概念形式,并移置了考察焦点,在更具体的层面上与细节的经验研究相关联,就像绘画艺术那样,它们具体明确而总是栩栩如生(Deleuze,1988)。不幸的是,受到福柯的强大启发的细节研究的确看上去是比较少的,都只不过是讨论到它。

关于方法的一些普遍含义

乍一看,福柯的文本可能看上去属于历史编纂学甚至观念史的领域。他自己拒绝这个标签,正是如此,他实际上研究了现在的社会,是从镜子的背后来看的,即运用了一种系谱学的方法。这当然意味着福柯的系谱学可以为所有社会科学作出许多贡献。而且,在受福柯的系谱学启发或运用了他的系谱学的社会科学中,史实性是核心。通过探索被考察的当代现象的常被压抑的“不光彩的”根据,我们对它们获得了一种新的不同的视角。我们 232 所关注的与通常不同:看哪,它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

那被压抑的正是:权力总是与知识缠结在一起。因此没有“天然的”或“纯粹的”知识。对权力—知识关系的一般性认知当然是重要的。它有效地摧毁了关于研究的任何永恒的中性观念,和高贵的理性或进步的本质。甚至声称以解放的模式发挥作用或产生了洞见的知识,也能通过通常的中间理念和观念有助于刻写或多或少有限制性的主体性形式。各种平等观念——包括由这条原则指导的研究与理论——通过确立思想、感觉和行为,形成和调节了我们的自我理解。甚至“进步的”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过程观念也包含了权力的维度,这里的主体性过程寻求的是推翻关于自我的固定的观念(自我摧毁作为理念)(例如参看,Deetz,1992;Weedon,1987),而在权力维度中被赋予了稳定性、一致性与“本质性”的否定性价值产生了一种(值得欲求的)新的主体性形式。于是,一种更加易变、活泼、非中心的主体成了标准,个体据此标准被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监管和正常化。这是一个灵活而非僵硬的过程,它不能还原到其中的权力因素。

走出权力—知识之关联或应付策略的困难在于刺激反抗，即设法逃避各种决定和分类。依此思路，如同依（其他）后结构主义的思路，屈服于固定范畴成了研究过程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其中甚至包括引起了对明显为好的观念的怀疑，这好的观念如代表受压迫者的（决定性的）利益。（当然，福柯自己总是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既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中）

福柯的资料来源大多是文献。不过，他也赞同访谈对话的价值而且自己作了许多了访谈。那么，我们该如何使用研究中的访谈材料？下面这段话给了我们以指导：

> 我们不必设想这样一个话语世界，认为它在接受和排斥的话语之间是相分离的，或者在支配和被支配的话语之间是相分离的，不过它作为一种具有多重性的论说因素可以以各种策略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区分我们必须重构，其所包含的有的要说到有的要隐藏，有的要阐明有的要禁止。根据谁在说、他的权力立场以及他偶然所处的制度语境，它暗示着变种和不同的结果，而且它也包含着转变和为了相反的目标而重新利用（Foucault，1978：100）。

这也就是说，微观权力是首要的，我们必须在特定的访谈陈述中来研究它，而没有预设任何总体上的压制性机制。首要且最重要的是：话语是在什么样的策略中加入的？于是，从权力方面来看，说什么不说什么？这里，由于是在后现代主义中（因而这一程序与解释学中的程序根本相异），所以我们忽略了陈述以及其中任何潜藏的意义、逻辑或真理内容的原创者（见 Deleuze，1988）。代言人只是随后进入这一图景的：谁在说？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有着怎样的具体的权力立场？她或他所根植的制度语境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出于不同目的的移置或可能的矛盾运用？一般规则是把资料，任何形式的资料，当作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上的标准话语的表达"（Miller，1997：34）。

233

德勒兹（Deleuze，1988）特别强调福柯思想中可见与可说、非论说与论说之间的差异。也许最相关的属于可见的研究实践，是对显示了权力的特殊安排与实践的细致观察。如果我们采纳权力只存在于行为中这样的观念，即在学校、社会关怀、心理疗法、

消费咨询、性别平等方案等各种人类进步的语境中，通过不同的论说实践构建一个微观权力运作之网，那么观察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就变得十分重要了。甚至有限的情形也可以产生一系列的解释。在艾尔维森(Alvesson,1996)那里，对一个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信息发布会”的观察，(尤其)从福柯的视角来看，它可以用一整本书来解释。这里应该持有与前面段落中关于访谈的立场相似的立场：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达到行为始作者的“真实”意图的问题，而是描述行为自身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策略问题，并且不管所谓的意义或始作者，这些都只是随后才进入这一图景的。基本的总体规则是把所有经验材料都理解为与特定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上的标准话语的表达。

结　语

本章我们所处理的三个向度与前面几章所述主题相关。它们都是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提出的更广层面的反思的可能入手处并帮助作这种反思。

有时这些方向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关于性别的话语分析研究(Marshall and Wetherell,1989)，有受福柯启发的特定的女权主义(Ferguson,1984; Weedon,1987)。尽管都用了共同的术语“话语”，但福柯与话语分析却指向了非常不同的研究。也有某些方法同时受到多种取向的启发(Miller,1997; Parker,1991)。不过，我们讨论这三种取向的目的不是为了它们的综合。我们在本章中为它们分组实际上是因为它们对反思性的质性方法有着很有意义的贡献，它们增加了与前几章相通的不同洞见。我们想再次强调这些取向是社会科学中与质性方法有着重大关联的例子。 234

与构成了本书的支柱的四种主要方向相比，话语分析、女权主义和福柯的系谱学在更高的程度上代表了特定的研究方案。(不过，女权主义比另两种更广泛和混杂)所以它们的反思能力更有指向性和更受约束。[9]它们能为解释学、批判的和后现代的反思注入有价值的因素。它们质疑社会互动中语言表达的意义(意义的不确定性)，把性别理解为政治与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一个核心

维度，表明在看似好的研究（包括声称解放妇女）中由于知识/权力的不可分离性所以权力也是在场的。同时它们反思的焦点更窄，并且不具有与我们认为扎根理论、解释学、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所可能具有的同样普遍的相关性。[10]（这不是任何对重要性所作的评论或排名。后面几种方向上的更一般特征可能会引起批评，被批评为缺乏对关于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突出贡献）

我们构造科学哲学和质性方法之间的相交部分的相关知识的模式当然有部分的主观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思想家和文本很少使自己直接地走向范畴化。设想出同我们在这里所选择的思想不同的情形是可能的。女权主义可能被视为一种政治方案，而我们本来可以把它与批判理论放在一起来论述的。福柯本来可以与后现代主义（如果有人强调这一主题的哲学与反乌托邦态度的话）或者与批判理论（两者都被刻画为反抗自我管理与合理化过程）相关联。福柯与早期（令人沮丧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结合起来，而哈贝马斯的（更积极的）交往理论可能代表着另一种立场，等等。然而，这本来应该意味着把本章所理解的研究途径强行放入它们并不十分合适的语境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本书这样的情形以便引出这些思潮的当代价值。 235

注　释

[1] 关于种族的质性研究讨论与概况，见斯坦菲尔德（Stanfield，1994）。

[2] 不同学派在如何看待语言运用与某种"潜在实在"之间的关系上有些不同。有的强调谈话和言说，而不直接说它们所从属的社会文本。其他人则对社会文本感兴趣，他们把制度性的会话视为文化上决定的现象，视为带有不同传统和不同程度的普遍性的不同会话和交往的文化（Linell，1990）。另一种划分关涉的是是否所关注的中心放在只以谈论的形式或者也可以以（其他种类的）陈述的形式所作的语言表达上。会话分析家常常强调制度化的谈论，它有着特定的形式，有些重复和仪式化，比如专家与外行之间的讨论（Linell，1990；Silverman，1993）。话语分析家感兴趣的是语言表达，甚至其他形式的例如不直接包括在会话和书写文本中的言说（Potter and Wetherell，1987）。互动的效果不必是这里的中心。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会话（conversation）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严格。

[3] 当然,对“诚实”的评估并不简单。从这种方式来看,它可以理解为被赋予了这种道德品质和可信赖性的某人的修辞行为的某种结果。西尔弗曼(Silverman,1993:96)注意到,“也许我们感觉到当人们实际上在再现一种文化脚本的时候,他们是最可信赖的。”

[4] 聪明而有抱负的访谈主持者常常强调这样一种理念:与研究调查对象确立友好关系、建立对话和联系,可能还要作返回访谈(return interviews),目的是建立进一步的访谈基础并且能够评估访谈陈述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例如参看Collinson,1992)。这样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但它们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问题,陈述语言在其描述和意义传达上是不完美的,陈述不仅仅是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时总是变化着的,甚至在某一特定情形中所产生的一套言说内部也总是多样的。访谈主持者充其量能够获得的是——如果他们想要描述某种超越语言运用的某种东西的话——贯穿于不同访谈与场合中的“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的言说。但是如果我们认真注意到话语分析的思想,那么我们将可能预期返回访谈首先会产生研究陈述之变种所需的大量材料。在阿克等人(Acker et al.,1991)的著作中,描述了一个含有四次返回访谈的案例。访谈陈述的内容变了,作者把这解释为由对话取向的访谈所鼓励的反思而形成的发展。其他解释当然也有可能,也许使接受访谈者采用了研究者所描述的规则,或者培养了他们描述具有一贯性的事件的能力(这种事件不必意味着更加“真实”,更何况是更加清晰或组织良好的事件)。进一步的可能性是被访谈者并不想重复她自身而是可能已经修正了陈述以使之更有趣。当然也有可能强调陈述发展的主观随意性。这里的要点是陈述的变种常常随着时间变化,而且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它们作解释的问题。然而,如果非常有雄心地努力建立长时间的接触,以及可能以其他方法(非正式的互动、观察)来补充访谈,那么,发现由研究主体所表达的某种“稳定化”的意义也不是不可能的(关于这样一种研究方案的说明,见Skeggs,1997)。

[5] 可以说弗格森(Ferguson,1984)代表了女权主义立场的一个变种,其主要兴趣集中于对男人统治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其出发点是关于普遍的妇女观点的思想,而另一个变种更加是经验式(empirical)与体验式的(experiential),其出发点是妇女日常生活的陈述(例如,Acker et al.,1991)。

[6] 比较艾尔维森与比林(Alvesson and Billing,1997)。不仅仅妇女们自己的变种对这一研究空间具有限制性的影响,而且这一研究空间由于某个事实也缩小了,这个事实是,许多经验和互动可能是男人与妇女共同实现的(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范畴内部)。

[7] 然而,语言的中心比话语分析典型地要更少限制与更加广泛。

[8]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女权主义者拥护一种特定方法并强调研究者的生物性别,她们以此来看待在方法上接受"支持女权主义"理念如接近、经验和反权威态度——许多持解释立场的男性研究者都是这样做的——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但是与这些男性研究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女性研究者使用了问卷调查与统计资料并通过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宣称了权威与合理性。在性别研究中这两者何者优先?

236

[9] 许多女权主义者不愿接受这一宣称。当然,有可能辩称,性别无处不在并且任何社会现象都要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获得理解。类似地,例如语言、权力、阶级和文化(引用某些不同的因素)等也可以如是说。这里的关键是要指明一种特别的研究策略和反思路径,而不是要确定哪些现象有最重大的意义或者分布最广。

[10] 至少,这也许适合于福柯,这位权力哲学家。然而,有许多福柯,那位名叫福柯的作家可能比第2~5章所讨论的任何研究途径都更加丰富而多样(也有更多矛盾)。

237

第7章 关于反身性解释：解释层次的展开

On Reflexive Interpretation the Play of Interpretive Levels

本章将把我们已经触及的各种论题发动起来，把它们带入互动之中。因而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总体的指称结构和一些具体观念与建议，以便主要在质性研究中加入反身性的因素。

我们首先简要概述一下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要点，然后来看看某些对于传统经验研究之批判的更典型的回应，其回应深切地关注社会研究的结构、政治、性别、语言等方面的本质。我们将批判地检验这些回应，尤其是语言还原论的趋势（语言维度的整体化）。接着，我们将构造一种综合的立场，我们称之为反身性解释。这里我们需要与若干解释层面相连的研究中的反思：与经验材料的接触、对解释行为的自觉、对政治—意识形态语境的澄清，以及对表征与权威问题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将指出一些方法论策略，这些策略本着一种反身性解释的精神缓解了研究中的困难。我们将简要描述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它们对于不同的反思领域有不同的抱负。

然后我们讨论质性研究的标准，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来看看研究被概念化这一方式的重要性，也就是看看为了这一活动要用到哪个或哪些隐喻。某些用于质性研究中的显著的隐喻被注意到，我们尤其思考了一些避免“资料主义”的隐喻。这里我们也触及了使研究者角色概念化的方式。我们的目的是就如何把握更复杂的观念和与若干解释层面相关联的必要条件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在我们看来这关涉着一种非还原论的、高度反思性的社会科学。

四种轻度反讽的取向

为了不被困在某种特定的固定的立场上,这一立场将与我们所支持的反思性立场相对抗,我们有必要与各种讨论的立场保持一定距离。因而留有一点反讽是很重要的。下面让我们不成熟地描述一下四种倾向。

238 扎根理论是那些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人尤其是有新教信仰的人的教义。成功需要一个净化的过程,达到它就要抛弃理论的信号灯。如此只有那些勤奋的学者才能看到实在,只有他们才能理解。这种神圣的状态是通过长时间艰苦勤勉的工作达到的。如果抛弃了直接而狭窄却又正当的经验路径,就只有真正的勤奋的人,才能避免自由思考和享乐主义者的理论松弛所带来的堕落与危险,因为自由思考和享乐主义允许不虔诚地思考重大、自由而又危险的思想。这里所谓的勤奋的人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收集了大量资料,并把它们抬进各种各样的范畴集装箱,接着它们又被堆积起来创造出一种大教堂式的结构,其顶部就坐落着理论(小写的理论)。扎根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新教徒的路径,在这里资料的积累导致了谦逊却又确切地回到了一种有限而可靠的文化资本储备的形式。扎根理论家属路德一派。

解释学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方式。解释学中的宗教因素来自它的起源,即是作为一种解释圣经疑难段落的手段。解释学者正与上文提到的权力相关。上帝没有任何要求。毋宁说,少数被选择的段落都被赋予了神圣的灵感。这来自文本阅读,要么是逐字逐句地要么是隐喻式地。神的宽恕表现为文本潜藏意义即神圣之光的显露,它是通过研究者接受天主教世界秩序的循环过程而实现的。对教义的解释是一体而不可分的,纯存在有一个先知是荷尔德林,而海德格尔是他在地上的绝对可靠的牧师。但是教会内部的改革家开始谈论意义的分歧,即含糊性,以及其他异端的发明。古代教父必定躺在他们的坟墓中呻吟:这是否意味着唯一正确的教义正在被毁坏,而神圣的三位一体也从三方面的统一变成了放肆的多神论?

批判理论也欣赏灵感,不过是反宗教的。因而,批判理论家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在精神上有一种更宗教式的转向,他们对真实信条和那本宝书(《资本论》)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感兴趣的是应该如何把这些信条教化付诸实践。批判学者没有传教的热忱,他们被面对权威时的焦虑以及妄想狂驱动。(至于拯救的最终到来,是从宗教中拯救出来的问题)权威问题导致了一种相反的依赖。批判理论的追随者使自身远离现存制度与权威,并投入到与它们的战斗中,对于这些理论家而言,它们的存在就是要被反对。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法是常青的(与老朽的方法相对)。妄想狂与某种恐惧相关联,即对老大哥(资本、技术专家、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实施的精神控制感到害怕。不过批判理论家不会让他们自己受到控制。自由思想不仅仅是被允许,而且是必须的。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思想必须是勇敢的和自由的。然而,有一种被设置的纯粹境界,即不受限制的合理性。“曲解”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教义反对任何冲突因素,自我宣称权威,基于水平交往和表示恩惠的对个体的解放建立起了一座无神论的教堂,水平交往是与作为宽恕罪过的手段的垂直交往相对的。 239

后现代主义也被认为有权威问题。不过在这里,对于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恐惧与对其他人成为专制者的恐惧是一样强烈的;人们看上去似乎害怕被万能的妄想而推动;权力存在于语词中,而他们已经接近了语词本身。问题是野兽是不可控制的。要把握某种出版物无异于妖术。由于害怕自己内在天生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变得害怕接触:接触实在(经验材料)——即某种超越文本边界的事物——是危险的、不愉快的和忌讳的。其背后是害怕(理论上)变质。净化的观念并不完全缺乏。不过我们自己的小范围的安全是可靠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放情任意,尤其是与我们自己互动。这为后现代主义者带来了最大的满意度。与批判理论家一样,后现代主义者也是自由思想家,只不过规格比较小。这里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不过是“小型的”。任何更具野心的自由思想都能唤醒对后现代主义魔鬼的恐惧——这位酣眠的暴君运用他的魔法文本及其宏大的邪恶叙事为学术界和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把存在都统合起来了。

方法论策略——终止(resignation)与语言还原论

我们已经了解到，无论是研究问题，认知兴趣，语汇表以及感知、表现、评估与衡量那些宣称了“实在”(经验材料)的各种因素的方式，还是理论和元理论，描述的方式，宣称权威等，都不能被视为当然或者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理解。毋宁说它们都能而且必须被质疑。倘若描述或解释“客观实在”(或者人们的主体间的社会构成的实在，或者他们的内在心理世界)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决定停止做经验研究，然后投身到理论问题上；或者我们应该告诉人们经验研究应该如何来引导，而我们自己无需做任何事。最后这一策略并非不普遍。因此，我们已经注意到，看来有更多的学者在写作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甚至一般民族志；与之相比，实际从事这种有点严格技能形式的民族志学者就要少些(至少如果在我们看来“民族志”的意思是长时间地在某一“自然”环境中作参与观察)。因此，终止这种经验研究观念也许是一种可能的方法论策略(或反策略)。对于为一大堆研究问题提供好的经验回答的能力缺乏自信当然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对于研究问题，研究团体甚至他们的赞助组织一般都期望有答案。

240

不过，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应该放弃做经验研究的雄心。相反，这种批判以及它所带来的洞察可以鼓励更大的自由，而且以更老练的心态对待经验工作，刺激这种雄心与目标作更彻底的再定位。简要地说，这表示较少地把焦点放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关于事物如何“实际如此”，以及关于并未受到把我们束缚在“资料”上的那种经验规范的其他优点(例如创造性的观念)，经验材料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不太强调资料的收集与过程，而是强调解释与反思，这种解释与反思不仅仅与研究的对象相关，而且与研究者自身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元理论和语言语境相关，这显然是质性研究值得遵循的合理而富有成效的路径。

这更具体地能承担些什么？在对这一点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们将看一看一些提供方法论策略的尝试，这些方法论

策略尤其允许从后现代主义阵营提出批评。我们考察了某些隐藏意义,尤其是那些从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话语分析的观点而得出的含有语言中心的意义。我们反对这样做,相反我们要寻求构造一种其中质疑了语言的方法论研究途径,尽管我们没有片面地集中在这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尽量依赖上文第 3 ~6 章所提出的观念。

对传统的认识论与方法有一股反对的浪潮,关于此浪潮有各种各样的回应,我们对此已经提出和讨论过。格尔茨(Geertz,1988)在民族志领域就提出了四种回应:文本实证主义(狭窄地集中在尽可能细节化地描述的陈述上,如同特定类型的会话分析一样);共同的作者身份(在这里考察的主体在谈话的同时也是研究者—作者);自白主义,这里,研究者以及他或她作出的反应是中心(见 Van Maanen,1988);以及作者通过反省可以排除曲解或主观性以便能够与被研究的实在自由相关,这样一个观念。这最后一种回应尤其是传统上归纳经验主义者所支持的更具野心的变种。在上文各种语境中,我们已经涉及了所有这四种类型的回应,但是并没有发现它们中任何一种有特别的成功。文本实证主义太狭隘,风险是对外在于这一狭隘的应用领域不能说有任何兴趣。这也适用于话语分析,尽管较少被强调。共同的作者身份意味着,要么研究者必须校对各种陈述并对材料作实质的编辑整理(陈述是由研究主体作出的),要么研究者就要冒着使读者面对长篇而又无趣的报告的风险。而且,这种工作通常被限制在容易被读者把握的访谈陈述上。很难想象被研究的群体的任何代表人物会提供关于环境与事件的细节观察的大量文献。(这通常需要数小时的记录和抄写,而且无论如何还要预设有参与观察的训练)自白主义有一种取代客观主义风格的优势,客观主义"有一种谦逊的、不装腔作势的风格,它努力从最初所显露的无序、怀疑与困境中拼合出某种合理的连贯性出来"(Van Maanen,1988:75)。如果走得太远,它很容易滑入自吸,并且只留给其他人的观点——只有当它们影响了作者的时候才是令人感兴趣的——以很有限的空间。认为反省的观念有助于去除理论及其他后盾,以便经验材料获得最大的公正,这种观念是不堪一击的。没有语言、文化和理论上的后盾,研究者不可能找到他们的方向,不可能

241

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解释或写出任何有意义的作品。

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变种的因素当然能够被包含作为反身性方法论的部分而不支配它。很可能设想某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可以与文本实证主义,或者也许更相似地,与话语或会话分析关联起来。话语或会话分析意味着研究者极仔细地注意到特别有趣的陈述或会话,并以严格的分析术语来解释它们。回顾一下我们在第6章讨论话语分析时候的评论:在超出陈述并把陈述运用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思之前必须小心。研究者可以允许被研究的群体中的某些特殊代表(重要的关键性的代表)在研究文本中就特定的问题表达自身。也可能由研究者从他们自己的明确而自觉的主体视角来描述特定的、精选的环境或阶段,然后反思研究者与研究如何产生互动。(根据 Van Maanen,1988,自白主义的风格通常没有主导民族志的研究,不过它与现实主义的陈述站在一边)反省与自我反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整个研究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们与对某种关系的理解结合起来,它们具有相当大的价值。这里被理解的关系是指:根据其所见与所不见,特定理论与文化立场各自的意味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起作用的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可以被有效地包含在研究中,不过不允许支配研究。它们并没有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提供解答也许是有益的。

另一种回应把焦点集中在语言上而不考虑语言之外,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比文本实证主义者和话语分析家所偏爱的方式更自由一些。我们将稍微细致地考虑这一变种,因为修辞—语言在今天对于传统经验研究仍是一种显著的选择焦点,它在某些方面与后现代主义相关,且往往有些重叠(见 Baker,1990;Shotter and Gergen,1989;1994;Simons,1989;Steier,1991a)。我们将集中在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的文本上,对于方法,它比此领域中通常所使用的要更加具体一些。

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认为语言的根本特征阻碍了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的目标是建立"真理",也提供依其他维度谈论某些有趣问题的可能性。他们感觉到更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研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它是建立在语言能反映实在这一错误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与许多其他有着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批判不同,后者

242

视研究者的感知和认知倾向为中心要素(例如参看 von Glasersfeld,1991)。根据后者的这个观点,对实在的感知必与感知者有关:对象不能脱离主体,或者知识现象不能脱离认识者。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并不认为观察者是同化(absorbs)对象的人,而是宣称正是共同的语言做到了这一点。换言之,在对经验研究的批判中,他们更倾向于社会语言而不是个体认知。确立关于"客观实在"的真理的"障碍"正存在于语言的本质中,而不在研究者的主体性中。在他们看来,发现一种外在于语言的客观的(或主观的)世界并对它作出评论,这是不可能的。[1]语言是一种互动的文化现象,不是一种由研究者控制的透明的中介。与上文提到的有着语言取向的其他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后结构主义者、话语分析家)相似,他们强调语言的主动性(active)与行动性(performative)方面。

认知取向上有反思性精神倾向的研究者主张应该反思自己的性情、观念和思想模式,而与他们不一样,格根与格根则希望研究者把注意力指向共同语言,它不仅仅是经验基础上的客观认识的障碍物,而且也构成了避免立场僵化的积极的可能性。

> 因而反身性的尝试是与强调扩展语言理解相关的。其目的是更充分地认识到所选择的立场在语言上的隐含意义,并引出对可能声音的表达或对人的活动的透视(Gergen and Gergen,1991:79)。

格根与格根反对实验和其他类型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式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固着于特定的语言范畴,因而很难产生新的知识。相反,他们说道,我们可以设想各种经验结论然后思考它们如何影响理论。如果我们考虑到各种可能的结果,并尝试发展理论以便综合各种设想的结果,那么理论将被丰富。这是格根与格根的所谓反身性方法论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要从与不同的人进行会话开始,然后与他们一起建构新的理解特定现象的方式。这被认为是社会—对话方法。它与质性方法的重要不同在于其主要目的不是去理解事物如何"是"(从行为、情绪或思想角度来说),而是产生陈述,在这些陈述的帮助下可以创造各种描述和意义。因此,被研究的主体就与语言发展者一样有趣

了。格根与格根的许多批判的目标显然是针对量化方法,量化方法提供了很小的范围让主体去表达意义,除了那些包含在研究者前结构范畴中的意义。(格根与格根来自学院的心理学领域,在那里有强大的新实证主义因素,在那里个体一般被理解为被研究者放在严格的结构化——通常是实验上的——环境中的对象,并且只提供极少的机会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洞见)

于是格根与格根主要把他们自己限制在语言学的领域。研究是一个丰富这个领域的问题。这当然有趣,但它的意思是不去谈论任何这类"实在",甚至排除了谈论它的可能性,至少从某种宣称了真理的陈述来看是如此。格根与格根以及与他们有类似想法的人大概都相信实在是存在的,不过在语言的作用下它并不能被精确地描述。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某程度上格根与格根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对语言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就倾向于对非实在(非表征)的语言观点整体化。因此,一旦特定的语言传统从文化上确立起来并被视为有效的"工具",那么就应该认真对待语言能透露给我们某些关于我们个体的和社会的实在这种相对的能力。它能掩盖和束缚特定的现象,它给予它们以一种过分健全而明确的特征,语言的这种能力必须牢记在心。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生硬而含糊的工具,它形成了"视角化"而非描述或从整体上从"外在"现象抽离出来。

格根与格根对于考察什么样的洞见存在于语言自身内部以及代替经验分析这方面的价值的论证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他们的意思是,例如,如果把筑入了文化密码的妒忌定义为"由受到别人喜爱的某人的吸引力而产生的一种否定性的情绪状态",就有可能断定,经过几个步骤就会得出"那些低自尊的人比那些高自尊的人更容易妒忌"(Gergen and Gergen,1991:81)。这里有个反对意见是:很难看出来这样一种语言是如何使这种论证和结论得以可能的。毋宁说,这是一个发展特定论证的问题,它确实需要语言的支持。但是专门强调这一点,或者强调某种语言学焦点的新颖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暂时离开格根与格根的指称结构,我们自己的经验观察也不支持这一结论。

被别人(也可能被他们自己)说有妒忌心的那个人,并不必然就是低自尊的人。不管这两个概念是否常常归于同一个人,部分

回到格根与格根的指称结构,这同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经验上的问题。也完全可能直接相反地宣称,妒忌通常与高自尊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扩大了自我的范围。自我实际是脆弱的这一抗辩(counter-argument)的一个循环,因为它将意味着与妒忌结合在一起的所有形式的自尊必须被定义描述为脆弱的。这当然显示了这些作者排斥性的语言学方法的问题。[2] 一种可能的研究工作——超越书桌与辞典范围的考察也许是值得的——将是把关于妒忌的陈述同把关于高低自尊的陈述关联起来。可以要求人们想想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熟人的"妒忌"程度和"自尊"的层次。然后应该有可能看到是否"妒忌"和"低自尊"显然赋予了同一个人,也可以观察到陈述中的变种,这可能比格根与格根的语言焦点的推理思路的暗示更强。[3] 244

语言还原论的确看上去相当狭隘和贫乏。它把研究领域限制在纯粹的语言上,完全不关涉"实际"行为、事件、情绪、观念和思想等。然而,作为反思的一种来源,这种方法毫无疑问有它特定的作用。重要的是考虑语言的突出特征及其反思"实在"的有限能力。格根与格根的思想对于批判把陈述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外在"现象之间的关系天真地等同起来的倾向也是有价值的。下面的语言运用规则通常把调查对象带到问卷上来以产生看似表示了事实关系的回应。例如,塞尔策与巴斯(Seltzer and Bass,1990)发现,如果下属在问卷中对他们的管理者倾向于表示积极的态度,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说他们单位是有效率的。这被认为是对下面这一观点的支持,即某一特定的领导层对工作的开展有积极的影响。不过,这一结果可能同样可以认为是调查对象遵循语言运用的文化规则的一种结果。如果你对一名管理者表达一种十分积极的看法,你也肯定会说你的单位是高效率的(Alvesson and Deetz,1999)。有人可能会补充道,对一名管理者特点的评价与对一个单位的效率的评价通常是非常不确定的,正如这样一个结果所表明的:大多数被积极评价的管理者,他们单位也被认为很有效率。

然而,我们愿超出对语言和语言运用的聚焦,更广泛地思考质性研究的因素,并且来看看诸多层面上的反思,以此作为对于注意到在社会和文本意义上的研究被建构和作建构本质这一洞

见的回应方式。

关于反思

反思的意思是思考某人的行为条件，考察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个体与理智参与的理论、文化和政治语境影响了与被研究对象的互动，通常这种方式是难以被意识到的。[4]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思考我们的思想、观察以及语言运用的前提。所以，反思是很难的。对施泰尔（Steier，1991a）而言，反思（反身）的核心包含着对我们从社会上建构我们自己同时也建构着我们研究中的对象（“外在”）这一方式的兴趣。因为如果没有建构，没有作建构的和被建构的自我，将没有任何意义：

245

> 没有什么事物的意义只在它自身里。意义并不单独只来自理解或者甚至观察，因为没有这种“单独”。意义也不是藏在本质的周围等待用感官来发掘，毋宁说它是被建构的。在“被建构”这一语境中，意味着在解释行为中产生（Steedman，1991：54）。

因而建构的过程需要某种事物来建构（外在事物，只要我们不是讨论纯粹想象的对象），需要建构了研究者（社会、语言、范式、局部研究团体）的建构主体（研究者）与社会语境。简单来看，研究语境中的反身性意味着注意到这些方面但又不由这任何一方面来支配。换言之，这是一个避免经验主义、自恋以及不同种类的社会和语言还原论问题。[5]

在某些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中，如此坚定地强调了某种特殊类型的自我反思以至于极少有精力留给任何其他事物，如经验研究。往往是修辞或交往的因素才吸引了注意，其他一切都被排除在外了。不仅仅是批评家，甚至不少倾向于 PM/PS 的作者，也都有自我反思的孤立主义、自吸与无能文本（impotent texts）的风险（Brown，1994；Newton，1996）。例如，贝克（Baker，1990：235）担心过分的文本/修辞意识会把研究者带到一间满是镜子的房间，一种自我满足的元语言，这将把他们从世界的其他领域孤立

起来。为了对抗这种趋势,根据贝克,有必要扩大我们的修辞和文本的焦点以使之包含研究者对其自身的认知,即他们作为修辞学家(雄辩家)是社会和政治语境的一部分。通过把我们自己写入这一点上,并认识到我们是在社会以及政治语境中从事劝导的工作,我们就有可能避免自恋式的自我中心主义。

在我们看来,这一被暗示的结论太笼统,并与对于方法的文本/修辞角度所可把握者的强调和过高评价的关联太密切。在我们看来,整个反身性观念正是打破指称结构的能力,以及理解何者不能说的能力。直接扩展它就会走向整个反身性观念的反面。

在反身性语境中,在特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被始终严格坚持的意义上,关于理论的一致性是没有明确的要求的,或至少不是一个重点。毋宁说,反思的要点是打破一致性与狭隘地集中于某一特定方面,在某人支持的思想模式(并且很容易被禁锢在其中)中质疑内在固有的弱点,打破和改变特定的语言游戏而不是扩展它。这自然甚至可以适用于后现代主义,其支持者倾向于宣称他们发现了反思的金钥匙,例如,通过强调研究工作和文本的虚构的本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像许多其他反思取向的作者那样宣称,贝克不经意地阐明了问题的核心,他坚持一种特殊的逻辑而不是指明某种新的出路。[6]

246

当涉及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在语言上用心的学者如肖特与格根(Shotter and Gergen,1994)的反身性时,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们把视域限制得太窄了。在试图强调对话维度时,社会因素成了建构实在的人际互动问题了,而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则被忽视了(Newton,1996;Willmott,1994b)。这可以与例如布迪厄(社会领域)或者批判理论(支配的意识形态或历史文化条件)作比较,他们都以他们的特殊方式提出了宏观语境如何影响研究工作的问题。有些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批评的对象代表了一种“反思的还原论”,这反思性的焦点太狭窄,其自身内部极重要的特定因素有过分的特权。

更合理的是要求反思性研究者在元理论的层面上有某种一致性。[7]这一层面比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福柯、性别研究等所在的层面更“全盘化”,因为后者处理的是社会科学条件的特定因素、知识的政治和性别本质、语言的特征等。在我们看来,反身性

的元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深入的问题或者把注意力放在某个反思论题上的问题。毋宁说，它是不同的这类深入与其他更基于经验的研究中的因素之间的最初运动，它使我们不被锁定在某种特殊的哲学立场上。因此，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元理论不是任何一种理论，它更是一种注意到和调解反思的各种核心维度的结构，以便开始反思这一行为并维持反思论题之间的运动。这种结构为多层面的反思性活动赋予了某种特定的结构和系统化。当某种思想模式与另一种思想模式相遇时，反思就出现了。元理论大概是一种广泛的指称结构，用以刺激和构成反思。我们把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指称结构称为"反身性的解释"。

反身性解释

解释的广度与变种

在质性研究中我们已经辨别了四种相对突出的因素或层面，这在上文有很长的讨论（第 2 ~ 5 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注意到的，吉登斯（Giddens，1976）提出了"双重解释学"的概念（对解释主体的解释）。循此思路，批判理论所拥有的观念就可以称为"三重解释学"。下一步就应该合乎逻辑地称为"四重解释学"（quadruple hermeneutics）了，这个术语的拼写太繁复，可以简写为 quadri-hermeneutics。我们将在这里运用这一表述，不过是有限制性的。[8] 其要点存在于反思和解释的原则中而不是在几个明确的层面中，存在于一种运动中而不是一种静止的四级结构中。这种运动可能产生比我们所已经触及的四个层面更多（或更少）的层面，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人们也可以使用与我们所强调的不同的其他理智来源。我们选择的是用"反身性解释"这一术语来指明贯穿于各个解释层面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本书所举的例子是基于经验的解释学、意识形态批判和后现代主义。只有这里的这一变种可称为四重解释学。于是，反身性的解释是主要观念，四重解释学是对它的应用的一个实例，在四重解释学中四个层面是中心。

247

我们对"反身性"一词的使用与其他作者对它的使用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也视反身性为"在背后起作用的理解方式,以及对现有理解方式的反思"(Clegg and Hardy,1996:4)。它涉及"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方式的元理论反思",而且"根据普遍元理论范畴,是完整地关涉形成研究的总体过程的一种应用实践"(Morrow,1994:228)。我们与其他强调一种更广泛的多重领域的反思的作者不同。在我们看来,极为强调某一特殊因素的研究和方法论是特定方式上的反思,而不是反身性。

"反身性"一词有双重意义,也表示诸层面的互相反思。例如某一主导层面能够对其他层面作反思。两个或多个层面可以处在一种互动的状态中,相互影响。(关于这一点后面设节详谈)我们将称这种双重本质为"反身性"。另一方面,我们还为"反身性"保留了包含对特定方法或解释层面作集中反思这一因素。大多数其他作者看来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反身性这一术语的。[9]我们想把集中性和有些专门性的反思性与我们所称的多维度互动性的反身性作比较。要强调的是反身性工作中的广度与种类。只在我们想要强调我们的反身性解释的实例时,我们才特别地使用了"四重解释学"这一术语。

"解释"意味着没有任何自明的、直接而明确的规则或程序,关键因素是研究者的判断、直觉、"看待和指出"的能力,以及对或多或少明晰的对话的思考——与带有研究立场背后并非不变的研究者自身因素的研究主体,以及与读者一起思考(参Maranhão,1991)。

实际上,研究或多或少自觉地在两个或更多这些层面之间滑行:对经验材料的处理、解释、批判性解释和对语言与权威的反思。除了最专业的或"食谱书"式的研究,从没有任何明确的、高层次和多维度的反身性意义上来说,这适用于许多好的质性研究,尽管常常是直觉的或非反思性的。反身性中的不同因素——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孤立起来——与诸如"收集和处理资料"的研究相比通常不太被注意到。反身性解释的要点是既在研究过程中也在(最终的)文本作品中,更明确地带出这些因素。因此更加要求研究者去正面论述经验研究的重大问题,比如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对于研究的政治语境的立场。反身性解释是经验主义 248

和理论主义（运用单个的、抽象的架构作出拥有特权的理解）的对立面，甚至也是所谓的“反思的还原论”的对立面。“反思的还原论”片面强调研究的某一特定方面，例如，它的性别的、论说的或修辞的本质。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助于减少困境和可能的“损害”。这“损害”可能是由这种宣称引起的：研究是提供确切真理、权威解释或者关于面对被研究主体的自由度之限制的高级洞见的。反身性解释也打破了后现代主义，这通常得到了确切的阐述。反身性解释的观念将为除了对文本—权威关系的质疑之外的要素留有空间，并要避免前者占支配地位。对修辞—文本维度的整体化和特权化是要拒绝的，这尤其是因为经验材料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

在评论了认识的通常状态之后，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解释的四个方面或层面（表 7.1），我们把这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核心。当这些不同的因素或层面相互冲突斗争的时候，反身性就产生了。正是在这些关系及其交界处反身性出现了。这种研究途径基于一种假设——或者暗示着——即没有因素是整体化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严肃地看待，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代表着正确或最重要的洞见。在这方面，这一方法与例如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不同，后者把科学的基础带入语言中，超出它就只是建立在沙滩上；它还与女权主义式的研究途径不同，后者讨论社会现象以及知识的性的本质，却忽视了“非性（non-gendered）”的方面。

我们可以从资料建构层面入手，在这一层面上，研究者作观察、与人谈话、创造经验现象的图景、作出初步的解释，等等，而且在这一层面上，解释的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对研究者、自己来说都有点不明确。我们可以谈未经加工的解释或与经验材料密切相关的解释或低抽象的解释。[10]于是经验材料要受到进一步的或多或少系统的解释，受到某些观念的引导，这些观念可能与学术理论（科学范式）或其他指称结构（文化观念或当然假设、隐蔽的个人理论等）相关。在理想情况下，研究者允许经验材料激发、发展和重塑理论观念。而这多半不是因为客观资料谈到了理论（毕竟资料是结构并取决于视角），毋宁说是理论允许思考经验材料中的不同意义。同时必须强调研究者的解释的保留内容（repertoire

249

of interpretations)限制了作出特定解释的可能性。解释的保留内容的意思是某些特定解释被给予了优先性,其他解释也是可能的但不那么容易被强调,还有其他的解释甚至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得到强调。一名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自我利益存在于一切事物的背后,他就可能很难注意到任何利他主义的经验暗示。对这类事物的建议要么没被注意到要么很简单地搪塞过去。然而,研究者(理论)与被研究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应该在解释者的资料结构上被强调。矛盾的或意外的经验材料(访谈陈述、事件观察)可能会影响解释的保留内容,这是难以控制的。在与资料关系密切的层面上,反思是通过影响解释的保留内容来加强这种相互作用的问题。

表 7.1 解释的层面

方面/层面	焦点
与经验材料的互动	访谈中的陈述、对环境的观察及其他经验材料
解释	潜在意义
批判性解释	意识形态、权力、社会再生产
反思文本产生与语言运用	占有文本、宣称权威、表现在文本中的声音的选择性

允许研究者在特殊解释上作选择,在这一语境中是关键。[11]四个方面看上去有核心的重要性:在理解各个方面的能力意义上的创造性,理论上的老练,理论广度与变种,以及元理论层面上的反思能力。这里的第一个层面某种程度上是其他三个层面的结果,但此外这些都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个体能力、研究环境、研究者的网络关系等。

因此,在经验材料与解释的互动中作反思的一个条件是,解释的保留内容的广度与变种。如果某人几乎倾注其一生的精力在某一理论上,那么他(她)的解释的保留内容将被限制。前结构的理解支配了理解。反思能力如果没被完全排除就至少被降低了。与这种认知偏见强烈相应的是研究者自己的情绪。(这两个要素能相互强化)如果某人在某一特定理论上做了不少工作,那么作为一条规则他将变得在情绪上依附于它。经验材料将倾向

于从大体上强化这一理论。或者,“拒不服从的”资料总是被借口需要作更多的研究而被摒弃。[12]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至少拥有两种或更多理论的某些知识,而且对它们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那么情况将会不同。于是,经验材料能产生对某些完全相分离的解释(或者也许是若干解释)的思考。或者我们可以说资料的结构被适当的思想处理了,“资料”至少是暂时地更能保持开放了。(不过最终研究者不得不排除某些可能性并降低意义的多重性)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增强了反思(反之亦然)。如果有点机械论式的来理解,那么后者的方程式就成了:丰富的资料(意义的多重性)加上解释的保留内容的广度与变种。这提高了“以经验为基础的想象”的机会(Norén,1990)。

250

关于创造性与泛读

于是,诀窍就是你去控制理论(解释的可能性),而不要让它们来控制你。一个补救办法是熟悉可能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不应该太相似(如精神分析学的若干变种),再加上一些元理论反思。对于创造过程的研究表明新思想常常是由看似相分离的现象的合并所触发的(Koestler,1964)。因而从若干本质相异的领域来熟悉材料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性的一种策略。另外一种策略在第2章讨论过,即尝试面对前概念时做到心智空白(白板)。不过如果加上一种归纳性的方法,它就可能导致无多少意义的研究和常识——只不过用行为者自己陈述的不同表达来重新形成认识。真正重要的是设法排除常识的前概念。与溯因性方法(abductive approach)以及面对前概念[13]角色时较少的天真态度相结合,这一策略可能会导向有趣的结论。这两种策略一个是广泛的阅读,一个是“空白”,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例如,在设法排除狭窄的集中在经验上的领域内的前结构理解时,没有什么能阻止某人作广泛的阅读。[14]应该也可能通过在这两者之间的转换来结合这两种创造性的策略(Gummesson,1991)。进一步,重点强调也许可以放在它们中的任意一点上。不过,这种强调的转换不能转换到任一方向上的单一方面,其风险是终结在博学的经院哲学或天真无知上。实际上,这两种策略可能是互相关联的,既然广泛阅读很难与太过近视的阅读结合起来,而排除一种狭隘的

研究部分也就预设了某些其他形式的指称结构——也就是说,预设了我们不会终止在纯粹平淡的范畴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研究结果的庸俗化上。我们在第 4 ~ 6 章触及了这种类型的阅读理论,其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排除,这恰是通过向更常规的思想和传统的理论提供强大的对立观点,然后放松对前者的把握。

排除(shutting out)要么出现在研究过程之前要么在过程期间——在第一种情形中要尽量不去过分地读太多被狭隘地聚焦的领域,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则要努力忘却它。第二种情形下当然是选择了对已接受的智慧作批判。不过,这也有消极地固着于此的风险。自然,最好是对现有研究作多途径的阅读,其中不仅包括批评也包括尝试发现新的和富有成效的方面。问题是这一切都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成功而优雅地摆脱这些困难的人也许没必要通过从事于经验研究来对认识作出有益的贡献。另一个策略是研究相反的、更适宜于弱势的、不流行的、破坏性的或被遗忘的理论,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之父曼德尔布罗特(Mandelbrot, 1977)偏爱这一策略。要补充说明的是广泛阅读并不必定意味着肤浅。相反,相对系统地深入到一个新的理论领域比在许多相分离的领域中的收获更容易得多。这是由于每个好的理论都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对这种理论的每一种应用都需要对它们的整体有理解,也就是说,无论何时结论都不能止于肤浅的折中主义。

251

关于研究者想要研究的部门文献,根据文献自身的特征而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途径,文献自身的特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可能鼓励也可能阻碍创造性。如果文献的特征是理论视角的多重性,或者包含着向不同的阅读开放(或者能很容易地使之开放)的文本,那么我们就可以花时间作毫无风险的阅读。但是如果文献是狭隘的并且大体由统计学研究或其他对"事物如何(how it is)"的研究构成的,都是从一个更高的统一的支配性观点来看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谈创造性的话,就要小心别花太多宝贵的时间来读它。

要补充说明的是上文提出的要点是与研究工作的创造性因素相关联的。但是研究包含着许多其他事物,包括把所有特殊的贡献都与其他研究以及正在讨论中的贡献的提供关联起来。为了避免重复劳动,研究者应该熟悉其他人的研究情况。因而总体

上的研究过程要求对集中领域的阅读。背景阅读也不能由于采用排除策略而避免,事实上尤其不能排除这样的做法:如果一个研究者用了任何一种上述形式的排除策略,于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在已经发展出一种思想之后要使自己熟悉并联系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开始所作的排除不应该最终作为一种避免阅读的借口。重复发现的风险,这里也有一种重要的伦理因素:一个旁观者如何能够区分下面这两种情形? 一是,研究者没有阅读先前作者的作品,而他所提出的思想可能略有变化的形式但还是先前作家的作品中所暗示了的;二是,研究者阅读了先前作者的作品但是没有评论他们的贡献而只是简单地为旧思想贴一个新的标签(原本地介绍其他人的思想)。原则是,最先提出了某种思想的人应该给予他相应的荣誉——这需要对所有潜在相关的文献作广泛的研究。(另一条原则是旧概念的新表述,不要去研究)

252

关于隐喻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元理论意味着首先是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尽管人们可以设想其他的变种),它不仅仅鼓励反思,而且在两方面推动了经验材料与对它的解释之间的创造性。[15]第一个方面是要问,最初自明的有时研究者自动作出的解释,其背后隐藏着什么。元理论质疑了支配性解释形态的合法性。例如,批判理论宣称,"发动了"社会主导理论的制度化结构权力和主导意识形态非常普遍地受当局的青睐,而经验材料自发地"承认"的正是这些东西。福柯也有类似的质疑,尽管他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的。第二个方面,元理论提供了思考经验工作过程的可供选择的出发点。它们可能激发对资料证明的否定,并且/或者它们可能强调可选择性的表征的矛盾意向与潜能。因此,在对经验材料(资料或者某人自己对它们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观念)采取一种较少自明或天真的态度这种方式上,研究者(与读者)的思想是有活力的。于是,基于常识的经验主义与前概念的陷阱就被避免了,创造性被激发了。这可以用图 7.1 来表示。

因此对这若干层面的思考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认识到各种层面之间要互动,不同层面不能分离地理解而必须是连续的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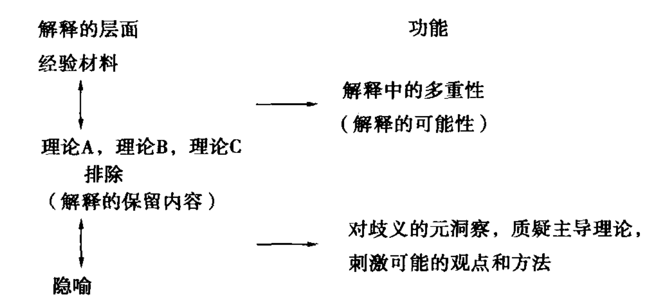


图 7.1 经验材料、解释的保留内容与元理论之间互动的可能效果

体,反思由这一认识得到加强。这并不是正是因为经验材料没有解释就变得无意义和不可穿透,如果没有解释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曾指出过,资料是通过建构和解释而被创造的)。解释需要经验形式的内容注入或纯粹的理论思考。元理论(主要是后现代主义,不过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批判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寄生式的特征,需要某人(其他人)的资料或理论以拥有评论之资。正是在解释的各个层面的相交处对于(可能的)反思的启发是最大的。其中也存在着质疑元理论的潜在可能性。显然在能归于某种外在于它们自身的最终标准的意义上说,这些都不能使它们自身合法化。狭隘的科学哲学的熟练在与经验研究的关系中还不充分,毋宁说,元理论的价值取决于一种刺激更具反思性的经验研究的被证实了的能力。因此,元理论不直接决定经验材料如何被解释,实际上材料有着元理论的印记,元理论通过理论可以构造和引导解释工作。其要点是,理论影响经验材料的解释的同时,这材料自身——通过理论解释过滤了的——也提供了让元理论间接地进入的有效材料。 253

因此,以其他层面为代价只加强某一特定层面不是我们的目的。毋宁说,在反身性语境中所有层面都应该被视为重要,而不能彼此还原。连同供反思的主题一起,都可以用图 7.2 来表示。这种反思是由不同解释的互动产生的。左边的垂直箭头表示各种层面的互动,这应该是自明的。长长的水平箭头表示这些互动的结果。中间的垂直箭头表示某种可能的变种:解释与自我批判/语言层面之间的直接作用大体上绕过了批判层面。在它上面的短箭头表示更强调解释(带一点批判思想),而在它下面的短箭

头则表示更强调自我批判和语言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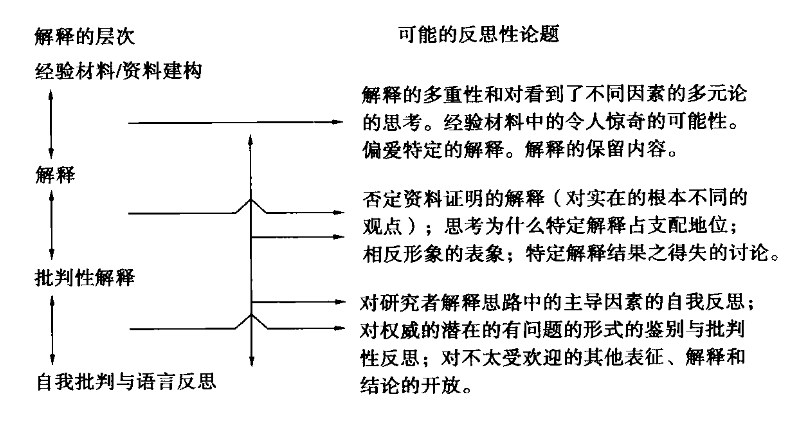


图7.2 不同解释层面之间的互动

因此,这里所提出的特定意义上的反身性解释的整个要点是,把质性研究界定为四个不同层面上的解释问题以及对研究工作的反思问题,其途径是通过考察比如由层面之间的交接与冲突所突出和尖锐化的问题和论题。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通过处理经验材料,研究者很明显跨越了元理论的领域,而与经验层面有了明确的重新连接。

思考各种趋向与反转

这一运动可以有多种趋向,可能最明显的是被暂时解释的材料(“资料”)受到解释学类型的解释,这种解释学类型的解释反过来又受到批判考查,接着是修辞上的自我分析,以及通过更明确地开放文本尝试处理文本与权威问题:注意到研究文本的修辞本质,指出处理主题上的歧义,指示被描述事物中的限制性与主观任意性。但是也有可能朝相反方向运动。相对地不可解释的(资料绑定的、被粗略解释的)材料能加强对更为哲学式和语言式解释的反思。例如,经验研究可能直接地导致(广泛阅读的)研究者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或至少表示一种不成问题的适度表征的可能性是渺茫的。面对含糊的——多样的、不明确的和不连

254

贯的——访谈陈述,研究可能会感觉到,比如很难对“外在”现象作出描述。相反,陈述的变种可能被研究,显示出看似健全厚重的社会实在的脆弱。或者有可能经验材料中的特定因素刺激了解构或某种类似的集中处理。研究者也可能遇到他(她)感到可以用各种方式运用的丰富材料。艾尔维森(Alvesson,1996)描述了一个引起了多重解释的经验案例——一个大公司的信息发布会。在一种更广泛的民族志研究的结构中,其情形被记录下来并被发现有作单独研究的价值,这一研究成果是独立于作为整体的民族志之外发表的(除了源自于此的背景知识是用过的)。

255

经验材料也可能刺激研究者采用颇为不同的语言学—哲学的立场。特定现象使自身极容易导向表征。在其他情形下,语言的行为与结构的维度更加明显。那些喜欢以一种秩序的方式来看待理论和哲学行为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太折中甚至缺乏洞见。研究者确实不应该像这样在不同立场之间摇摆吗?我们同意,对文本的语言学立场本不应该像一个随风倒的人。但是却有可能采用一种并非完全范畴化的或“固定的”语言观。例如,托卡斯(Tsoukas,1991)宣称,隐喻的语言立场适用于产生思想和理论,不过应该在经验研究与验证中补充一种更原本的(反映的)立场。这里的问题是“有意的不一致”,尽管是在关于语言的潜在透明性和反思能力的大体传统的观点构架内。只在观念产生阶段才允许对此观点的偏离——其特征是需要概念的精确性(precision)与“严密性(stringency)”。

文本看上去是不自觉地或无意中在这一点上不一致,这并不罕见。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这可能主要适用于那些自身坚持一种自觉而显著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立场的研究者。无论如何,有着社会科学兴趣的后结构主义者有时发现,要避免以一种暗示着语言能反映外部情形的方式表达自身是困难的(我们引用了Weedon,1987,其上下文在第 5 章中)。与语言的“反映”观点——按后结构主义者的方式——的显著不同很容易导致不一致。理论的立场很是限制了可能陈述的范围,而且要谈“外在实在”——这样做是很诱人的——而不超出这些限制就会变得很难。一个较少被根本阐述的关于语言学立场的观点,在关于某项研究中的语言和表征问题如何获得更特别的对待的问题上,要求特别小

心。借这种语言学立场,意义的不确定的、多重的和流动的本质被考虑到且未被整体化(被片面地授以特权)。不管研究者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思考与经验材料相关的对于语言的问题化(非反映式)概念的需要是有建设性意义的。伦理思考可能在这里出现了。解构、反讽、修辞分析、指出陈述的声名狼藉的不确定性本质——这一切可能更适用于与文本的关系,这文本表达了支配行为者的兴趣和意识形态,而且也许甚至显示出对社会弱势群体或遭到虐待的人群的漠视。也许除了新纳粹256 主义,没人会——有人可能会希望——把奥斯威辛幸存者的陈述视为解构的有趣文本。

为了在对语言的态度上允许一定的自由范围,我们可以采取上文所指出的存在于典型的与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建构主义之间的某种立场,例如,把语言理解为"视角反映"或类似的思路。

换言之,我们的意思是思考有关语言的不同解释和立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材料作反思并对抗顽固的立场,是否是这样一个问题:接受看上去明确而不含糊的经验观察、主导的解释线索、权威的批判,或者关于语言与表征的某一特定的观点。整个思想都是要避免固着于某一特定的逻辑类型,它可以是经验的、解释学的、批判理论的或语言学的(性别、阶级、强调权力/知识的整体性质等),而确实没有为其他立场留有空间与能量。不同种类的认识论上的反思立场之间的这种互动当然不能保证高级的反身性——这首先不是一个尾随的过程,但它的确意味着这种反思的条件得到了改善。

反身性解释中的方法论策略

在前面部分我们在原则上同等看待各种因素。而实际上这几乎不可能遵循。一个原因是研究工作很容易过分抽象。另一个原因是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倾向,至于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方向上就有不同的侧重,这有赖于研究的问题与目的以及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重点所在来设想与之相应的不同种类的反身性解释。要点是所有这四种解释的因

素都应该出现在四重解释学的过程中，而不让任一因素占支配地位，如果我们要坚持这种类型的反身性的话。某一领域或层面的解释与反思的缺陷可以由其他因素之和部分地消除。像前面一样，我们描述了被设想的理想情形，而不是试图阐明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如何被引导的。

在这种经验取向的研究中，首先要思考的是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制作与谨慎的解释从而对现象获得好的认识。由资料驱动的这种（反身性）研究是与上文第 2 章所描述的以资料为中心的方法不同的，在后者那里，“资料”不是被理解为“未经处理的”材料而是对经验情形的一种建构，其间充满了与解释工作的一致性。因而针对经验材料的态度变得有点更自由了，并且要求作自觉的解释。过程中对严格度的要求是宽松的，而对于与所有经验材料的解释本质相关的反思而言，则是增强了的。除了对权威与表征问题有明确处理之外，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与自我反思的因素也包括在其中。 257

在洞察驱动的研究中，重点在于解释学过程。洞察暗示着一种比直接给定的或老套的理解更突出的意义，这正是这种研究过程的北极星。解释工作在这里（尤其）是核心，而经验材料——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则是尝试评估意义和发展揭示洞见的主题。批判的与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得到了与资料驱动的反身性解释中的因素有类似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可能意味着，比如在研究的开始与结束时，研究者穿越了所有层面，但是在此过程的主要阶段，他或她坚守着经验的或富于洞察力的解释层面。

批判性的解放驱动的研究是不太看重建构资料形式的经验材料的典型。相关经验材料作为其一个部分的更广的语境不能在一种具体的经验研究中规划出来，这意味着在这里必须把其他因素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的经验材料放在核心位置——例如，对于社会的认识取决于社会成员关系，和对于某人所面对或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现象所作的反思性的批判观察与对此形成的印象。我们曾指出，解放研究需要许多思想，而资料取向的工作（访谈、观察）只是构成了被制造的整个事件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广泛经验工作与高级批判解释之间的结合当然是可欲的，而时间和资源因素则倾向于限制前者。不过它仍然是重要的。

后现代主义者的民族志包含有比解放驱动研究更多的经验材料，因为它对于以一种非权威的方式允许听到被研究主体的声音有很大的兴趣。[16]提及声音的多重性，我们可以谈谈这里的研究的多音驱动(polyphony-driven)模式。对这些多重声音的兴趣意味着理论熟练程度和研究者更高层次的解释范围被缩小了——宏大叙事和研究者的权威压制了多重声音。但是如果不同的声音不能汇成合唱或持续统一的声音的话，那么甚至多音研究也需要大量的解释工作。批判理论刺激鼓励了多重性的反思，这反过来除了提高研究计划在更广领域的政治相关性之外，还为不被注意的更安静的声音提供了更大的被听到的机会。

在某种程度的独立意义上，研究过程中的不同因素有着相对重要性，我们可以设想解释的类型之间的不同种类的运动。某一变种可以出现一次或两次，例如在某项研究的开始或结束时，研究可以外在围绕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远离其“核心领域”，强调解释和反思而不是那些从原则上刻画了这项研究的东西。另一变种可以是研究者在不同因素之间不断地移动，但是花最多的时间在主导此项研究的因素上。因此，资料驱动的反身性解释将包含着要么不常见却重要的批判性解释和语言反思的成分，要么常见却更有限的成分。在前面那种情形下，研究过程被明确地分出了序列，而在第二种工作模式下其特点是在各种因素之间作重复运动。后者可能需要更多的经验和能力，一方面是处理资料和反思如何做，另一方面是不同层面上的可供选择的解释的可能性，它要求研究者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轻易地作出转换。

258

反身性解释的一个实例

我们现在以具体的经验例子来阐明我们关于反身性解释的思想。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只抄录了一个访谈的摘要，不过这是很细节的一处，以便读者可以自己评价我们的材料。我们将来看看这一文本能如何解释或再解释，以及如何可能反思这些解释。

一个经验上的实例:一名广告大师的谈话

下面几段话是一个广告机构的创立者谈他为什么要开创这项事业,以及他为了做这件事如何"背叛"了他的前任老板(N)等所发生的种种。我们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只作了极少的修订)来描述这一事件的过程。随后的解释部分是取自一项对广告和广告机构的民族志研究(Alvesson and Köping,1993:第 5 章)。这项研究大体上说明了解释性的(解释学)反思性研究,它用这一材料从习语、表达价值以及合法的动机或使动机合法化来引出对广告业文化的解释。接下来的解释和反思与材料在原始研究中被处理的方式是有些不同的,主要是更广泛地参考了批判性的和后现代主义的论题,以及更明确和系统地参考了解释学的维度。

> 每个开创自己的事业的人都有许多不同的理由。需要某种风格类型是你的梦想。你想要看到你自己内心珍视的观念、思想和哲学是否会有结果。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开始时间?这很难说。这种情形在你的生涯中可能会来得非常早。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缺乏能量、成熟或机会来做它。我做这个机构的理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想看看我是否能成功地应付我自己。时间是附带的问题。N 的业务管理如此彻底地失败倒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他们的事态越是表现出来,就越有压力越是焦虑,我就越是深信我想走出来。我该怎么做?我很喜欢与那里的许多人一起工作。我也感到对他们有某种责任,因为我还是 N 的部门主管。于是我突然想到开创自己的事业可能会更好,而不只是走出去(我知道我应该自己做)。于是我跟两个人说了,这两个人已是我这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一个是文案员,一个是项目经理)。我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组建一个公司。他们说有。于是这两个核心成员就到处去问其他人是否想加入我们,最后又有七个人加入进来。为什么剩下的不也加入进来?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决定是很难作出的。一个人应该带上所有人吗,或者只是带上他喜欢与之一起工作的人?我觉得我在担负着一个重大的责任。一下子就雇十个人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必须保障薪水和成本。出于这个原因,我想我只能

259

雇用那些我真正信得过的人。我想我是相当困难的,这样我就与十个人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这一地区"违约"是违法的一种。在创建这样一个公司的时候不要瞒着你的老板,这很重要。你可能会想我正在这样做了,因为我有这些开始我自己的事业的想法,而且我已经邀请了若干同事加入。不过,我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客户,而这正是界线所在。我背叛了并被起诉,不过没有任何结果。这很难获罪,除非被告事实上盗用了公款。我假设你可能会认为使另一个团体失去潜在的收入就可以称为盗用,但是在这个业务中你在短期内根本不知道是否客户仍然是你的!

一个为 N 作规划的连同媒体营销和业务上的其他合伙人一起召开的会议计划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它将被认为是一场"开球",我感到这是提出辞职的最佳时刻。就在会议之前我在走廊上碰到我的老板并上前与他讲话,我告诉他我要辞职:我要辞职并且要组建我自己的机构,有十个人将跟我走,那天晚上我就要回家。每个人都在阿姆斯特丹而我只是回家。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再来试图说服我的盟友留下来并迫使我受到冷落。你多年来学了几条谋略,而我在另一端已经自己运用了。抓住这个机会,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假如我们不去阿姆斯特丹,我当然会在瑞典来这样做。但是时机到了,我就必须行动。这听起来都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但是这就是在这场游戏中你该做的。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双手绝对干净。尽管我不去想,但在道义上我有很多要感到惭愧的。我想他们有更多要感到惭愧的,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业务疲乏。公司不再是在瑞典,事态急剧直下。他们想要我留下来,于是我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一个晚上。但他们知道这没有意义——我意已决。我还打电话回瑞典说有人会来劝你们都留下(Alvesson and Köping, 1993: 102-104)。

解 释

这个故事可从许多方面来解读。倾向于论说的解释者如波

特与韦瑟雷尔(Potter and Wetherell,1987)当然会用大量篇幅作各种有趣的评论和解释。话语分析启发了我们的解释,但我们不会 260 完全只用论说的方法,我们自己更满意的是两种特别有价值(有趣)的论题:动机与道德。

第一位的解释　在决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思路来解释这段谈话之前,当然必须思考各种目的指向。有的是技术性质的,就主持访谈者而言,是与误解、歧义、隐晦以及过度影响等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两名主持访谈者觉得进展令人满意。这次访谈作了持续数周的参与观察,它为获得一种好的理解铺平了道路,并确保能更容易地建立起关联(深层次的接触)。而且,访谈主体表达清楚,其语言是经过了很好的组织,无论是制成书写文档还是随后的出版,他的叙述都只需作极小或根本不需要作修改。

不过,特定的解释的确先于对以上材料的抄写。因此,这里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料问题,不是说对其范畴化或解释只是后来的事情。事实是,在所有研究中解释都是先于资料的。这是贯穿全书我们都要系统坚持的一点。人们可以谈论初级(或粗略的)解释,这对于我们避免未作整理的感觉印象的大杂烩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位的解释是在这样一种访谈所需要的互动之前或其间作出的:研究者"解释"什么可问,谁人可问,访谈过程中说过什么,正在说什么,什么有趣味,什么问题可能得到回答。访谈期间有趣味的和有意义的也被解释,什么是易于理解的回答,访谈主体是否理解研究者为什么想要他或她的陈述,等等。录制的磁带也必须要解释以便访谈能被转写。[17]

访谈主体也作解释。访谈是对主体的解释工作的一种表达,既与生活的相关方面又与访谈情形相关。主体说些什么取决于主持访谈者的各种观念以及或多或少不自觉层面上的访谈语境。承认经验材料是一种建构,并思考所有观察、访谈陈述、问卷回答等的解释特征,是反思研究中的重要因素。

把初步的解释从良好推理的、次级层面上的解释区别开来可能是困难的,在后者中研究者不是建构而是(进一步)解释或探索深层的"资料"。这里我们可以谈次级层面的解释学(second-level hermeneutics)。我们正在谈对初步解释的解释,如对上文摘录的

解释。这种解释一般是明确的、自觉的,研究者典型地认识到其他解释是可能的。在目前的情形中,把解释的层面互相区别开来并不太困难。初步的解释产生了上文的叙述。下一步就是去密切地看待它。在那些通常的情形中,有必要编辑访谈记录——使它们有意义或把它们缩减到容易处理的篇幅上——而在描述复杂的行为或事件时,这两个层面就变得更加混杂了。[18] 对会见期间所发生之事的解释一般需要一种更直接的解释而不是转写一段访谈录音。如果经验材料很广,两个层面的融合也就出现了,而且在作更仔细的解释之前对它作出选择是必要的。然而,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样一种复杂性与我们要讲的情形并不特别相关,于是我们将进入第二位的解释。

261

第二位的解释　在对上文访谈寻求理解中,重要的思考是与对所作陈述的性质评估相关的。按常规,这些都被视为对实际的即与历史相符的条件(机构建立之时就获得了条件)和/或访谈主体的(当下)概念、观念、价值、动机的反映(尽管是不完全的或含糊的)。由于访谈的论题部分涉及机构创立之时主体的思想和动机,所以使这两个变量相分离是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说"实际"条件包括创立机构之时主体的思想和动机。因此,主体的感知世界是对(先前)"实际"思想和动机的(当下)感知。

从史实编纂上来说,我们应该从考察其真实性入手。在这一具体的案例中,所幸的是我们对其真实性有个人的认识。尽管在这一案例中真实性已经确立起来了,但仍然有编辑经验材料的问题,这些经验材料上文已经触及,在这里我们将不会作进一步的发挥。但是这样一种真实性的问题是重要的,不过,在离开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想先花更多的精力来阐明这个一般问题。在另外的情形中,真实性的证明常常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例如,这是基于访谈的匿名公司研究中的普遍问题。公司的真实身份,就像访谈主体的真实身份那样常常被掩盖了。同样的原因,磁带记录通常是不可用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保障以防止编造整个或部分访谈材料。而且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参与观察的研究中。我们怎么知道研究者真的作了参与观察,而不是捏造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反应或回答可能是确保学术研究者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们真的不应当受到这种不诚实的指责。是啊,他

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诚实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诚实不能简单地视为当然,哪怕是在学术研究团体中。

我们在第 3 章讨论了相当多的甚至杰出的研究家都捏造资料的情况,不过这并不是说天资不行的人陷入这种同样的诱惑如为了使资料与理论更好地相符这样的可能性就小。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弄虚作假行为,但是毕竟在自然科学中控制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经验材料在原则上是向外界公开,因此实验或观察是可以被其他人重复的(这当然也可能有不同情形,取决于被引导的研究的敏感度)。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范式常常并不是也不能包含可复制性,这就把防止欺骗的障碍给移除了。(对卡斯塔尼达的民族志研究的讨论——它是否是虚构的——是这个问题在总体上的一个好例子)也有一个有趣的灰色地带要加以思考,这个地带处在明显的彻底的欺骗与绝对的诚实之间,在这个灰色地带中来自访谈和参与观察的资料可能要有轻微的改变以适应理论。因为这个灰色地带不像公开的欺骗那么张扬,所以它一般不被注意和讨论,甚至是研究的一片处女地。在我们看来,伦理学——伦理密码与持续的伦理讨论——将是一个对抗各种可能的大大小小的欺骗的办法。伦理自觉在研究风气中是尤为重要的,在这里资料(经验材料)之间的明确区分受到指谪,资料被视为有理论承载,实在被视为由社会建构,而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边界也消融在了叙述与修辞中。这并不是意味着对被描述的研究风气的批判,而是用伦理自觉来补充它,以防止可能的滥用。

262

对偏见的批判考虑到了只来自单方面述说的信息(四个员工陪着访谈主体一个人)。一种互补的图景本应包括至少一个在那时与 X 的雇主的访谈。因缺乏这一点,我们只能得到故事的梗概:X 在辞职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有十个雇员。这当然也适用于甚至更大程度上的相关动机。X 是真的想验证他的“哲学”的生存能力,还是受到无聊的赚钱欲望的驱动?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某种意义,我们需要一个更广的图景,从支持者、对手以及那些中立者来看待 X 的行为。但是这些都没有获得,这使得很难说 X 的真实动机是什么[19](他的动机之一真的是公司的失败管理吗?或者正是 X 的背叛才使得公司垮掉了?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有可能,

或者两者都是)。从事件的时代性来说,这一访谈是在事件发生了七年之久后才作的。记忆对如此长远的事情的曲解是自然的。从依赖性方面来讲,对实际驱动力的陈述是与如"梦想着开始我自己的事业""哲学"等说法相符的,这是可以从企业家文献中了解到的,正如中世纪关于圣徒(圣徒言行录)的传说是根据某种模板作出来的(见下文我们对习俗(convention)的讨论)。不过,企业家的模板不是十分丰富和细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转向另外一个更明确的模型,即广告业的企业家精神(见下文)。总体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来源材料对于偏见、同时代性和依赖性而言其价值很低(解释学论题1;见第3章pp.70-75和98)。很难明确地谈论外部事件(除了1983年发生的某种背叛),而评论动机尤其难,对于这动机除了主体想要呈现给主持访谈者的自我形象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其他实际线索。而留给研究的显然正是这个形象。

263

因此,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客体的"和"主体的"(感知的)焦点之外,还有第三个可能的焦点,即论说(见Mills,1940)。至少在我们看来,注意到创立者如何表达他的动机是有趣的。我们并不由此使自己直接接触到"真实"动机(例如通过同情,像第3章谈到的柯林伍德;解释学论题2),而是直接关涉言词的使用(解释学论题5~8)。我们在第5和6章已经注意到支持这一点的论证,这个论证说,看上去源自统一整体与合理的主体的陈述应该小心地对待。人们表达自身及其动机的方式很受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标准的影响(Silverman,1985;1993),因而陈述染上了社会习俗的色彩(Harré,1989;Slugoski and Ginsburg,1989)。支持我们的焦点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对于动机(米尔斯称之为动机语汇)的讨论可以多谈些处于被讨论中的整个部门或职业群体的典型特征。(当然,我们不能根据单独的一次访谈就谈太多。但只要我们认真地解释,如果它结合了其他质性材料,那么一次访谈也可以提供很多信息。这里我们将自我限制在对访谈的解释上)因此,关于表达模式与合理动机,人们所显示的对于驱动力和社会习惯的理解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对广告价值与理念的洞见。应该强调的是,我们不认为真实的或表达出来的动机总是不同的,或者它们总是一致的。尽管我们强调,动机在其中被表述

出来的社会语境——例如,广告的宏观语境与研究者作访谈的微观语境——自然影响了给定动机的选择,我们的意思并不是由此就说"实际的"动机被系统地纠正或曲解了。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深入研究可能的"实际动机"。所使用的方法更是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视域的融合(解释学论题7)。换言之,带着我们的前理解(根据话语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对广告和陈述之不确定性的前理解),我们进入了同它的远离(distance)关系与亲近(familiarity)关系之间的轮换过程。

在上文一长段引文中一开始就说:"需要某种风格类型是你的梦想。你想要看到你自己内心珍视的观念、思想和哲学是否会有结果。"这里暗示着有一种明显不同的特别类型的人,这位创立者就属于这种人,这种人是特别的,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思想、情绪和哲学尤其值得表达和验证。这一陈述也暗示着这些人有一种内在动力使他们自己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某人发起自己的机构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这驱动力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说,是与被讨论的人相关联的(而不是与外在影响因素如经济条件、上帝或者对妻儿的责任相关联),对动机的如下的可能构想是不被使用的,如想赚钱、使自决与权力最大化、留名于一家公司、能走出困境等。外部限制与动机在陈述中是不突出的。母公司中的情形被弱化为一个被随意决定的"适当时刻"。一个人可以预期被构想的动机以便外部条件可以被描述为新创业的一种重要背景。但这并非实情,这大概不是巧合。还要注意的是创立者陈述的核心是他自己的创立活动。另一因素,他的"背叛",在这么长一段陈述中只明确提到一次。正是这内在推动者、这意志强大的行为者才是描述的主体。"自己开创事业"比"背叛"更适合这一形象,这是一种更好的辩解。

264

尽管"自己开创事业"的表述出现频繁,但个人对此的占有权并没有被特别强调。这创业者的陈述并不指涉一种建立在个人占有、独立与努力工作的基础上的小型事业的意识形态。其所唤起的创业者的意识形态不是中产阶级的理想。商业利益或某种产品观念并未被提到,而多被提到的是创立者(及其同伴)的内在品质。其根本观念是看是否"你自己内心珍视的观念、思想和哲学会有结果。"某种"主观取向"比市场或产品取向更被强调用来

作为自己创业的基础。情绪的维度得到强调。例如，访谈主体说“我做这个机构的理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想看看我是否能成功地应付我自己”。这种表达模式可能是有代表性的，确实对广告业来讲是这样的。这种动机在社会上是可接受和可尊敬的。（如果要说得更明确点当然需要作更多的研究）

我们也愿意从道德故事的角度来简单地讨论一下这次访谈，这可能会给出这一业内的道德讨论的线索。这里我们愿提醒注意的是，这个故事的英雄（这位创立者）听上去有着轻微的道德可疑的风险，尽管从根本上来说是善的。他说到他用了一个聪明的计谋针锋相对地比他的老板抢先一步。其间所强调的是一种情有可原的境遇：主人公把自己放在“谋略”这一端，而他的老板则“有更多该羞愧的地方”。这暗示着，伦理问题总是突然出现在这种创业的线索上。访谈主体说他遵守商业规范，在创立自己的公司之前他不会违背这些规范而与客户接触。在访谈中他说他担负起了一种“巨大的责任”，以及“相当困难”地同以前工场里的十个人开始了新的工作（有人可能会说访谈主体与另外十名工人——大概是技术熟练工——的背叛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因为十之八九这可能是导致其母公司衰落的一个强大的因素。然而，在这访谈中，母公司的衰落却成了主体行为在道德上正确的一个理由）。

265

总之，这一陈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印象，这个行业里的人的特征是他们内心强大、有着深层的主观动力（属于纯粹的工具思维），至于道德问题与游戏规则，也有点厌倦（Alvesson and Köping，1993：第9章）。这种研究摇摆于部分（访谈）与整体（广告业）之间。另外一方面是在前概念（关于访谈主体内部或之间的动机不一致）与概念（以变种分析和不一致分析的形式来加深前概念）之间交替。

迄今为止，解释学的解释（论题7）的焦点是伦理和动机语汇。让我们现在简要引入剩下的两个层面。这些因素——顺便提一句，很难使它们明确相分——也许可以在上述的解释中发现其踪迹。下面我们将对它们作进一步详尽的说明和深入的研究。我们从后现代主义启发的一种解释出发，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首先采用批判理论的方法。

对权威与表征的解释　这主体的陈述可以看作"商业精神的艺术家"这一论题的一个变种。这似乎对广告人尤其是其领导层支持这种身份认同很重要。这种解释可以给出一种精神分析或市场导向的倾向。在第一种情形下,是通过以这种方式描述某人自身以加强某人的职业身份认同的问题。这种身份认同由叙述行为构成(Czarniawska-Joerges, 1994; Dunne, 1996; Giddens, 1991)。在市场情形中,它是一个销售给那些有特定取向和特定能力的人的问题;而在广告的情形中,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就有点不明不白了,这一访谈可以视为一种"销售谈话",主体在这一谈话中显示了他的能力(Alvesson,1994)。他是一个有"某种风格类型的人",他想要看看是否"你自己内心珍视的观念、思想和哲学是否会有结果"。他显示了一种企业家精神,结合着某种意义上的责任的机敏和某种冷酷。也许他要说的就是他正适合这一行业,他以研究者作为他这一信息的中介。

为了在主体陈述中显示多元论,我们应该指出叙述中所援引的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一种是在情绪上被驱动的广告人,这种人想要验证自身以及他(很少是"她")自身内部所拥有的品质。另外一种身份认同是工具理性人,他有效地防止了他的老板采取相反的标准。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区分来自浪漫的和狡猾的商人之间不同的声音。在这段引文中,声音的多重性也包含着一种关于责任的故事。这一主体担负着为十个人提供生活费的重大责任。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故事说法,即对前任老板和同事的不忠与背叛,他们工作的未来保障正是由于主体的背叛而遭到了损害。关键是,即使我们把所有这些陈述都视为接受访谈者的主体性表达,视为个体在由主导话语所产生的主体立场之网中如何定位的暂时表达,也必须说这种主体性既非明确也非具有一致性,毋宁说它意味着若干非常不同的话语构成了不同形式的主体性。文本中的这些多重声音正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观点相符,这可以与主体所认为的我们人类有某种"内在自我"的观点相比较——这暗合着传统的西方人关于个体作为一个统一主体的观点,这一观点与身份认同的多重性有部分的冲突。

266

另一种可能性将是把这些陈述视为反映了一种相对连贯的主体性——对野心、价值、动机和意图的表达看上去是趋同的而

非指向分裂。决定不考虑完全相信主体的所有宣称,研究者可能以某种超越主体的方式自居。如果陈述被视为对文化习惯的表达,例如"动机语汇",那么主体自己的愿望就被忽视了,主体自己希望的是这些描述被视为对自己的自我知识和思考与传达经验的能力的真诚而诚实的表达。

与此相对抗,有人可能会争辩道,上文的解释并没有为研究者提供一种依附于总是忽视了主体的自我理解的其他理论的解释中的优先权,而是把焦点实际放在某种高级理论上,可以是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或合理的选择(预期的投资回报掌控着一切,包括你有几个小孩、你跟谁结婚)。不过,这里所提出的解释的确表示了面对访谈主体从研究者方面而言的某种程度的权威。动机和伦理上的话语得到了强调,而个体所宣称的严肃对待则并未被完全接受。(它并未被完全否定,不过遇到了怀疑)关于与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相关联的主体性的特定观念,赋予了研究者某种优势以更好地理解这段引文所表达的现象。因此,被讨论的解释可以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包括研究者和"当事人"的不对称性的知识宣称。研究者把自身描述为比研究的单纯对象"更有魅力"。也许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大多数质性经验材料相比,上文给出的例子(在这例子中,这些陈述倾向于使自身被完全引用,而在它们作为其中一个部分的已出版的研究中确是这样引用的)在与表征和权威问题的关系中相对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一个理由是,其中介是语词(它可以相对容易地置入文本中)而不是非语言的行为(它很难以同样的方式复制,因为语词和行为代表了不同种类的中介);另一个理由是,它构成了一种仅仅需要在复制之前作稍微整理的陈述;第三个理由是,既在访谈语境中也在已出版的文本中,主体被允许有侧重地讲述。否则,在大多数质性研究中,研究者要更广泛地"处理"文本。主体在访谈时被控制,其陈述被编辑(以便使之更易于理解),研究者必须解释主体的意思,并且只选择先前被编辑的访谈的部分内容(可能是以编码即标准化形式)。这并不是一种批评,因为这种编辑修订往往是必要的以便制作出一种在理性上易近和有趣的文本。在这些情形下,在处理与权威和表征相关联的问题时,问题会更多。

267

批判性的解释 前面已经指出,批判性的解释可能正好挑战了参与到既定研究中来的个体的感知与价值。这里我们可以建立在上文提到的观念的基础之上,即访谈主体在这个故事中表达了一种市场取向的态度。主体大概通常表达他们自己类似的观点。根据西尔弗曼(Silverman,1985)的理解,访谈是“道德故事的讲述”。被访谈者通常以一种政治自觉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陈述。从一种批判的理论视角来看,承认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涉及社会精英阶层时,也在涉及其他与所述有利害关系的人。(我们在第 3 章已经了解到,这也是对偏见作历史编纂来源批判的基础)在与高级管理者的访谈中,主体自身及其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图景往往是一种正面价值:合理性、创造性、依赖性、目标取向、变化的意愿、客户和市场取向、为组织成员谋福利——所有这些除了在他们所描述的公司和其他组织的取向上被宣称之外,也在被访谈者的个人取向上被宣称。(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参看 Jackall,1988;Watson,1994)

我们可以从批判的视角问一些问题,比如在研究组织的时候,到底允许谁来发言。公司主管及其他精英成员通常会过度表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例子中,接受访谈的是顶端人士。这当然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最好还是注意到并强调这里所涉及的个人不会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宣称事情的“真相”。另一个普遍问题是,只有那些仍在公司或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或任何正在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才能作为访谈的对象。再加上那些停工的、被解雇的、退休的、自己创业失败的人等作为补充对象,这是个好主意。这些人可能不仅仅提供其他视角,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他们的谈论会较少受到限制。[20]在上文的访谈中,以及对它的研究中,被访谈者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相对成功的广告机构的创立者。他有很多作为访谈对象的优势:他语言熟练并且有有趣的故事可以讲。对于研究者来说,像他这样的人——社会距离不是太大——可能比低层次的组织成员更容易接触,很好地组织的叙述更容易运用到研究报告中去。作为精英阶层中的一员,他(太)容易被赋予某种特定的理解、认识、揭示核心问题的能力等,这可能会使研究者特别关注他的陈述。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管理层研究,所以这项研究从社会群体——研究项目和文本给予了他们以空间——的角

268

度,再现了某种系统的偏见。(在目前这个例子中,问题并不太严重,因为研究的确表示了对其所述有点怀疑的态度,而且某些下属包括妇女也允许在整个研究中发出他们的声音)

在访谈中可以分辨出来的市场取向不应该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个局部现象。人们应该抓住机会宣传他们的个人能力这并不是一个"假定"。但是正是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市场关系越来越重要,而且善于"经营印象"和调节某人自身、职业和他的公司形象也是很重要的,于是当代人已经内化了一种市场取向的态度(例如参看,Alvesson,1990;Fromm,1955;Lasch,1978;Sennett,1977)。一个人必须能够不断地"推销自我"。尤其是在广告业内,广告主管和机构难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因为对行为的评价通常是主观性的,对实际工作者来说重要的是给出一种能作出某种独特而高级贡献这样一种印象。因此,创立者的叙述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经济环境,其所述必须放在这个关系中来理解。

这里要注意几个不同的语境。从批判性的理论视角来看,例如,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关于广告的叙述。批评家的评论声称,广告使人成为物质主义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消费,把消费当作一条幸福之路;它美化了年轻人,关注的是外部表象,鼓励了性别模式,使人自我感觉良好,使语言通俗化,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Lasch,1979; Leiss,1983; Pollay,1986)。仔细考察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的不太显著的结果,而不是接受它的表面价值并在研究中作为某种自然规定来再现它,这是批判性解释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这个访谈中关于商业中的"内部"关系暗示着一种相对较低的伦理标准:精明与谋略看来是普遍性的。从他自己来看,我们的被访谈者在道德上是远非干净的,但是他以前的老板更糟,而他则是以前策略的牺牲品。因此,在道德怀疑、广告产品的"精明"本性与这一行业的内在运行之间的某种相符是可以指明的。

269

第4章讨论到,研究者应该反思他们的工作在与再现或质疑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的作用。他们必定不能只是藏在与其主题相关的中性研究的神话背后。重要的是提供视角而不要太受被观察的行为或访谈陈述的限制,要在更广的语境中来思

考这些东西。

这些阐述足以表明批判性的解释与讨论——不要总是狭隘地指向报告的经验材料，还要受现场氛围的激发——可以如何带入到图景当中来。然后，应该适当地回到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层面上，并且评论批判理论刺激的与表征和权威问题相关的反思。我们也可以回到经验（初步解释、资料建构）和解释的层面，根据后现代主义和批判性的解释层面所提供的新的洞见来修正这些看法。不过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会在这里讨论这种路线。

最后的评论　我们认为反身性的解释可以根据文本的最终成品以不同的方式来运用。一种可能性是上面的段落内容是研究者自己思考的过程，它将导向对最终发表文本而言的各种解释和反思的综合或选择，尽管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会比上文所提供的文本更简短。（如果是那样的话，上面这个文本将更像研究者的分析作品而不是一个最终完成的研究文本）另一种可能性是解释和反思的各种层次在文本中都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特定的部分，就像这里的粗略分析一样。至于分配给反身性解释的空间及其类型，最终的研究文本不必就完全与上面所提供的这个文本完全不相类。某种与第二种类型接近的类型可能往往更受欢迎，目的是把握反思及与此相关的提高对这类作品的保障。我们相信直接影响文本的最终成品的理智上的作品更令人满意，至少对喜欢写作的研究者而言是如此。应该要更加注意反思性的工作，如果它在最终文本中被给予了更多空间的话。一种不利因素是，这需要大量的文本，以强化某些精选的用于解释的经验材料。一种可能性是去引导广泛的经验工作，例如民族志的研究，然后基于某些有根据的原则来选择一些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剩下的经验材料就可以被用来发展研究者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应该提高对所聚焦的材料的解释质量，并对描述和分析作补充和平衡（Alvesson，1996）。

有许多因素影响文本以反身性理念——研究任务、被选择的反身性解释的变种、研究者对文献的熟悉、理论的和制度的基础、风格等——来组织和产生这一方式，这意味着引入任何特殊的形式以作为普遍标准没有任何意义。反身性解释研究的理念可以与不同形式和模式的表象结合起来。

关于质性研究标准的一种含义

一些最新的观点

全书的大部分内容，我们都在为关于质性社会研究的引导方式的一种特殊观点而辩护。我们现在就来以更加广泛的方式来讨论研究的某种合理的标准，以此作为优先于资料和理论的第三种可能选择。

后结构主义者以及批判理论家和一大批其他非实证主义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作为科学的最终尺度的真理标准问题——理论由反映了“外在客观实在”的经验证据获得证明(Denzin and Lincoln,1994)。我们发现许多作家都完全拒绝任何有关科学能够可靠地反映和解释“实在”这样的观念，尤其强调的是与非语言的实在相关的语言自主性与歧义性。通过强调研究者对“实在”的积极的建构——通过感知、认知和对语言的处理以及与其他研究对象的社会互动——就出现了对传统经验认识论的一种根本批判。经验材料对理论的依赖性的相关观念加强了这一论证。对此我们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历史的和可变的性质，在某种语境下可能为“真”但在另一语境下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毕竟，发表了的研究成果也会影响社会条件。作为一条原则这较少适用于个体性的研究项目或文字作品，而更适用于群体性的研究结果。

关于发表了的研究发现被融入到后来的研究项目这种方式，孔达(Kunda,1992)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即对一家美国高技术公司的组织文化的研究，在许多讨论组织管理和文化的学术性作品中都特别提到这家公司。这反过来又常常被公司的管理者和其他雇员读到，这就内在地影响了公司内部的观点，尤其是它被描述的方式。孔达研究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带有以前的公司研究色彩的观念和社会实践。他自己的研究结论也成了经验环境的必要因素。如果大学教师最初教给学生特定的模式和语汇，数年后再对同样这些人(现在作为专家学者)作访谈并问他

们“事物如何”,这时候同一类互动的另一种表现就出现了。被访谈者就会倾向于使用他们曾经学过的模式和语言来解释“情况怎么样”,这并非必定是因为它们特别“合适”,而是因为它们看上去适合于运用在访谈的情形中,在访谈的情形中一种已确立的和已被采用的语汇被用来创造秩序和便于对难以解释的这个凌乱世界的相互理解。271

这为双重解释学以及它所关涉的循环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阐明。研究者研究作解释的人,作解释的人有时也阅读(研究者)对于(实际工作者的)解释所作的解释结论,这导致了重复解释。当研究者(相信他们自己)正在产生关于其他人的文本的时候,而这其他人的文本又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研究团体的)先前文本而产生出的文本。要确定哪个是原始文本已变得不可能了,这是为后现代主义者青睐的一种观念,我们在第 5 章可以看到。

冯格拉塞斯菲尔德(Von Glasersfeld,1991)拒绝传统的关于知识应该与“存在”世界“相符”的观点,相反,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知识显示它的功能性价值。知识的价值必须通过它实现什么的能力来判断。利奥塔尔(Lyotard,1984)也有类似的思想,尽管他是从颇不相同的出发点来看的。好的理论与研究的主要标准是其实践的或技术的价值,也就是说它能引导行为。“实际工作者”基于知识提供给他们的相关洞见和线索的能力将首先决定知识的价值。(事实上,在科学语境中,常常是研究者的同事解释了这种评价,不过他们也在关注着理论的可能的实用价值)

我们对这种研究方法稍有疑问。它与技术统治论者的方法太容易相关了,知识由此降格为各类公务员服务的手段。诚然,“实际工作者”可以指任何人,从家庭主妇、选民到社会工作者和管理顾问。但是有一种风险,即技术价值观念首先导向了对于各种代表性精英有价值的知识。他们根据新知识有最佳的选择来改变实践,至少在诸如学校、工场和社会机构等制度中是如此。功能性标准可能也意味着足够具体的知识首先转化为具体行为是受到鼓励的。例如,各种综合的文化或历史条件知识很难显示其实践价值。我们在这里不会重复第 4 章所提供的批判理论的论证,但愿意简要地提醒读者注意,在适应当前社会条件的狭隘形式和趋势中,作为社会科学之理念的社会工程学的缺点。我们也

许不应该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可以有许多形式。由批判反思而作的知识上的断言也可能导向对特定问题和限制的克服，这可以根据实用主义的效用而获得评价，尽管在更为理智的知识与实际有用性之间很少有任何非常直接和特殊的关联，同样地，有着更加显著的实用特征的知识也被认为导向了直接的实际结果。

也可以说，（“实际的”）实用主义效用思想是基于研究者所使用的语词与实在之间某种形式的相符的。知识的功能性——例如，“心理失衡的知识能导向对缓解焦虑的治疗吗？”——最好由对尝试运用某种特殊的知识而来的经验结果的研究来检验。[21] 所以，功能性的思想不应该与某种经验检验的思想过于分离，尽管我们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区分“真理”与技术的—实践的价值。

272

好的研究的另一个标准已经提出，即它应该是“多元的和民主的”。善于接受多样性是很重要的；阻碍与限制应该要避免，而且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关于实在应该如何表现和/或解释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都促成着社会实在的建构，他们还促成对“真理”的创造。社会科学知识不能——如实证主义者所希望的——把知识对象同所有真诚的人脱离开来。根据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彼得斯与罗兰布勒 Peters and Rotenbuhler，1989）主张我们的真理必须要被证实——使之为真。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没有任何有效的影响，或者不起“作用”，这意味着意向、观念和发展新实践的努力并没有在社会实在中被充分具体化。因为即使研究是一种建设性的活动——不仅仅是实施了建构的实际工作者，而且包括研究者（von Glasersfeld，1991；Steier，1991b）——研究与其他文化活动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与那些支持各种社会领域的“反分化”的某种后现代主义者相比较，例如 Lash，1988；Willmott，1992）后现代主义者的多重声音的思想在这里进入到图景中来，如同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的方法论所暗示的，集体会谈是一种产生思想的手段和谈论现象的方式，集体成员对此现象既有经验又有知识（更年期、自杀企图、失业、管理等）。也如同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它们意味着研究者与主体应该有共同的权力来建构意义：“‘主体’成了‘参与者’，由研究产生的许多解释（或理论可能性）被扩展

(expanded)而不是僵化(frozen)了"(Gergen and Gergen,1991:86)。

建构主义者的研究中的主要标准的表达有点含糊，但由此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并以解放(emancipation)为目标：

> 实在不是固定的或给定的，你参与了对实在的创造那么你必须确保它不是僵化的。因此，保持自由选择的开放和选择的新鲜，并且给人以你自己想要的自由——同时也为他们着想(Ravn,1991:97)。

这听起来是诱人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问是否研究者的前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固定的或给定的"，是否提供了一种或多或少僵化的(建构的)实在。而且与布迪厄、沃昆特(Wacquant,1992)一道，我们可以进一步问是什么建构了社会建构者。这是社会构造论的核心所在。

笛茨(Deetz,1992)通过综合来自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有点不同和更具批判性的民主理念。这里有一种更加清晰的关于开放(造成"暴露")社会强势话语的思想。研究者不是去纯粹表达"主体"或"参与者"的观念和意义，这些观念和意义提供了多样性的对话，研究者力图指明的是被提到的主体从未或很少清楚表达过的可能话语。笛茨(Deetz,1992:341)参考了福柯、威登(Foucault and Weedon,1987)以及主体性过程的理念，并宣称"作为社会行为的交往其关键是克服某人的固定的主体性、概念，以及某人向着人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开放的策略"。这种交往既适用于日常生活也适用于科学文本。因而好的研究成功地突破了主体性的固定形式。

273

从语言学上看，认为好的研究使得新意义和理解得以可能，因而也是新的行为选择，这一观念只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颇为生硬的关于好的研究的标准。我们如何知道研究项目"成功"了？尤其是，不情愿地承认经验材料提供了评价的基础，这使得对理论和思想的评价更难。即使资料与理论从来没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如果我们剥夺了经验材料任何支持或反对观念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标准的讨论也会变得甚至更加有问题。而且，对语言学和社会物质条件文本化的过度聚焦会很容易导向仅仅包含着空谈建构

的“自由计划”,如果它们被严肃看待并能刺激具体行为,那么它们将会不时地关涉与物质实在相关的相当实际的问题。后者比语言建构一般更具惰性或者甚至更难对付。正如汤普森(Thompson,1993:197)所说:

> “根据它对被视为当然的事物的挑战以及它同时开始行为新起点的能力”(Gergen,1992:48)来评价理论是不够的。如果在乱哄哄的说法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组织实在,那么在多重声音或“快乐话语”中就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有用性(Jeffcutt,1993)。

批判理论更倾向于思考经验条件和基于材料的限制,而且在对寻求确定的主导关系上也更加仔细,与批判理论相比较,更为多元和一般的“开放”研究中的内在不确定性更加显著,因为它缺乏方向。在“开放”“方向自由”研究中的标准问题更加显眼,尽管我们承认批判理论和解释学也可能难以评价。有非常明确的意义的研究不可能制订任何简单而清楚的规则来评论被讨论的研究。

作为论据的经验材料

我们同意建构主义者如格根、冯格拉塞斯菲尔德以及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好的研究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即语言所遵循的是与其他现象(行为、社会关系、观念等)不同的逻辑。关于语言应该尽可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客观地或社会地建构的实在这一理念,应该被相当地淡化。但这不必定意味着某种经验联系或关系的理念应该彻底地放弃。(或者也不意味着,与经验材料的关联只是根据与实用主义的或解放的价值——假定这些东西可以被确立起来的话——相关的“功能相符”才构成的)这一争论中的一个问题是,各种论战者看上去要么支持某种健全的经验本体论(或者其论敌说他们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伴着对经验材料的理论灌注本质的表面指称,有点轻微的修正,不过这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到这一方法;要么放弃所有对“外在于”语言的经验实在的所有指称,这种语言是偏爱片面的语言学焦点的。(许多支持作为好的研究之尺度的功能性或实用性标准的人,基于语

言学的方法也这样做,其中有格根和冯格拉塞斯菲尔德)对于被研究的社会实在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可以坚持作为好的研究的一种重要标准。[22]认为理论与思想在经验条件上应该有很好的根据,认为应该有可能用它们来阐述这些理论和思想,这一理念并不意味着挑战语言"反映"实在这一观念。我们已经注意到,有可能在理论、研究者(研究团体)、语言和资料之间设想一种比实证论者和归纳法优越论者明显信任的那种天真的变种更加含糊的、不确定的和中介式的关系,而不是无止境地采用一种语言学的或文本还原论的立场。在我们看来经验材料能启发思想和理论,能赋予它们以可靠性,澄清它们,而且在理论的情形下,使它们更加迫切。经验材料不能明确地证伪或证实理论,但它能产生证据来支持或反对对于理论思想和理解世界特殊方式的挑战。有时它对于允许通过解释经验材料(对于一种已经被解释的实在的解释)来破坏一种思想或理论也是颇有成效的。不过从通常意义上说,上文提到的存在的歧义(在语言与特殊语言学意义上的经验实在之间较高程度上的不可通约性)意味着这样一种破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更一般来看,经验工作刺激了对理论思想的修订。灌注了理论和解释的资料的完全本质,自然在这里进入到图景之中来了,从而降低了对构成和理解社会现象明确说是或否的能力。

因此,在我们看来,通过资料来确证的标准相对于谈方法(质性的和量化的方法)的著作通常所主张的标准应该被淡化,关于经验材料之本质的观念与传统的认识论相比较应该要改变(参见 Guba and Lincoln, 1994; Kvale, 1989)。经验材料仍然是重要的。但是这是一个赋予它一种很不鲜明而健全的特征的问题,一个把它看作一种可商的表达、依赖于视角的解释,以及在含糊的语言中传达的问题。经验材料应该被看作在无止境的争论语境中为某种特殊的理解社会实在的方式作辩护的证据。经验材料根据语境和它被理解的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分量。这与把不同(理论)立场之间的某一辩论中的裁判员身份归之于经验材料是不同的。于是,由问卷产生的资料可以作为相对弱的证据(甚至,尤其是关于表面看上去是具体"事实"而实际上是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如薪水、性别、年龄等),而由较长时期的参与观察所产生的对经验材

275

料的解释可以增加关于如何解释社会实在的论证力量。又来看反映的隐喻,我们可以说经验材料类似于满是凹凸不平的镜子(研究者、语言、理论、实在)的大厅里的一幅画,而不是对"实在"作单一反思的结果。而资料不能证明任何东西。[23]

经验研究的标准

西尔弗曼(Silverman,1997:25)提出了两个标准来评价所有研究,"即,让研究者成功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他们? 研究的问题真的具有理论和/或实践意义吗?"我们同意这些标准是重要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表示过的,可靠性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反身性的理念表明除了处理和严格分析资料之外有必要认真对待其他因素。如果作为寻求真理之一部分的经验材料的核心重要性被弱化了,那么就应该有可能给予其他优点以更多的空间。我们可以脱去束缚了我们自由思考的经验的紧身衣,或者使它从属于描述现存"实在"的具体片断的固定过程。但是,正如我们在这里不断注意到的,这并不意味着允许草率或"什么都行"。相反,打破所有形式系统是我们最后要提倡的,不仅仅是针对"什么都行"这一形式,还要有不同于传统的某种程度上更加严格的其他要求。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要寻求的,好的研究的特征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至少应该有如下一些:

- 经验"论据"与可靠性。
- 对社会现象的解释维度的极端重要性持开放态度。
- 对研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以及研究中的问题作批判性的反思。
- 对语言的含糊性及其在传达关于纯粹经验实在的知识时的有限能力的自觉,以及对于处理这一问题(表征—权威问题)的方式的修辞本质的自觉。
- 建立在所提到的问题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发展。

276

这导致与我们通常在谈方法的著作中所发现的相比,对于质性研究中资料处理因素的强调的降低和有些更自由的看法。这并不与遵循一种细致的程序那样重要。就是因为其他标准已经涌现出来了,但这并不能说研究成了一种无定见的活动,没有任

何要求。上文提出来的标准——实在是含糊的，应该考虑到并详细说明解释上的不同语汇和方法——实际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熟悉广泛的文献和观点的角度，以及从理智的灵活性、可接受性和创造性的角度来说。在对经验材料的整理中它也刺激了连贯性与思想性（关于高度反身性的和经验上含糊的研究的佳例，见 Skeggs，1997）。对不同解释的（可能性）的表象要求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把所有这些都看作同样好或同样"真"。实际上，可以强调一种解释，比如这是因为它被感觉到与经验材料而非其他更能相符，或者因为它看上去更加丰富或在洞见和理论思想上更可能开辟新天地。如果多种解释被提出来，那么随后的标准必须是，根据某种既定的尺度它们优于其他解释并对认识的贡献尤多。这一点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典型主张不同，后现代主义者偏向于强调具有自身价值的诸观点的多元论并且弱化了评价解释的标准。

观点的丰富性

在我们看来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观点的丰富性。富含观点的研究与经验条件有某种关联，这些经验条件也明显超出了经验材料（初步的第一级的解释）所能够说到的。因此其新颖性的价值——发展洞见质疑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变得重要了。这是一个在认识论上实现突破日常认识的问题（见 Bourdieu 等，1991）。某种富含观点的解释在与经验材料的关系中显得合理，但是在严格证明的意义上，并不需要从它那里获得强大的支持。资料可以说使解释得以可能并支持了解释，而不是明确地导向解释。经验材料可以为解释提供灵感和论据。（自然它也可能为其他并非优选的解释提供论据，而这当然必须在反身性研究中认真思考与讨论）经验材料也可能致使某种特定的解释不可能，或至少暗示了没道理、没意义。资料可以在生成意义上作为解释的一种跳板发挥作用。更加重要的仍然是，把被研究的现象看作某种事物（Asplund，1970）。因而解释行为是关键。这里，经验材料（被建构的资料）开始起作用，如同解释的保留内容和反思性元理论开始发挥作用一样。因此，富含观点的研究，能在下面这个紧张的领域中找到，即熟练的经验接触、据报道的第一级的解释、

277

对它们的想象与相对自由的处理,与解释的保留内容中的能明确判断的深度与广度上的结合之间的领域。在含糊的经验材料中,尤其是在以思考的方式致使材料含糊时,存在着观点丰富性的条件。[24]这里也有在创造性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过程中有着某种系统方法的可能性。在我们与经验材料的关系中,告诉人们(以及某人自己)我们应该富于想象力、创造性和自由(在不受已确立的框架限制的意义上),这总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反身性解释的研究过程中,具有助益这些理念的潜能。从不同的出发点出发并挑战以前的解释,使得为被研究的材料提供有巨大影响的歧义得以可能。因为可供选择的意义与解释出现了,这为进一步的创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中,创造性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远离支配性的和已确立的角度的方法。与那些由更广泛的解释的保留内容、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引起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合作,正好刺激了这样一种脱离。

经验研究中解释的丰富性可以在经验支持和创造性地自由表达之间的紧张情形中找到,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创造性的行为暗示着超越对于经验材料的共识性意见。因而,说某种解释是创造性和新颖的并不与把主体间性最大化为达到"客观性"的方式完全相容。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限制在每个人都已经同意的解释上,那么就很难说出任何新的或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了,有重复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危险(我们在第 2 章已有批判)。富含观点的研究通常避免了关于"事物如何"的明确陈述,并强调了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看待事物的重要性,它允许对所涉及的经验情形作出新的理解。通常我们不得不在经验支持与观点的丰富性之间设想出某种权衡,因为它们内在地互相反对。不过经验材料越丰富,越是可能为富含观点的解释提供令人满意的支持(相关的佳例可以在 Jackall,1988 和 Kunda,1992 中找到)。要不然我们可以设想,要么研究凭借着强大的经验支持获得了观点的巨大丰富性——这将会有点降低对创造性和高层次解释的要求,要么经验材料为观点丰富的解释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这些大体上是作为与经验材料的创造性的富于灵感的互动的一种结果而实现的。这可能——加上其他的灵感之源——在产生的意义上(generatively)发挥作用。

于是,最初的经验材料(最初问到的问题和/或创造性的结构化的观察)有时能产生观点的丰富性,尽管熟练解释注入的层次比较低。找到这种研究的真正的佳例并不容易,因为创造性的解释和有趣的理论思想典型地超出了经验材料的明确论证。明茨伯格(Mintzberg,1975)研究主管人员的工作,他也许要算在这种例子里头。明茨伯格对许多主管作了直接的观察并注意到他们的典型工作日包含着与公司各种其他成员的大量非常简要的互动。这从根本上偏离了先前关于管理工作的一个被广泛持有的观念,即把管理工作视为一种更理性化的和系统化的事物,大体包含着订计划、作决定、管理等。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形是,观点丰富的贡献是源自对于或多或少广泛的经验材料所作的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性解释,经验材料本身是不会把我们带得很远的。(例如参看,Freud,1953;Foucault,1979;Geertz,1973;以及 Laing,1960;亦参 Asplund,1970)注意到下面这一点很有趣:被认为重要的理论如组织理论,由于它们在任何经验材料方面都有强大的支持而很难流行起来,这方面的缺陷可能是相当大的,但仍然不应该影响理论的流行。毋宁说,这些理论之流行是因为它们诉诸了想象,或者是因为它们是优雅的或被认为开辟了新天地(Astley,1985;Weick,1989)。

因此,根据解释的丰富性标准,好的研究使得对社会实在的相关片断作新质的理解得以可能。这代表了一种与以前观念的决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产生性的(generative)能力"能挑战指导性的文化假设,能提出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根本性的问题,能培养对'被视为当然'事物的再思考,由此能为社会行为提供新的选择"(Gergen,1978:1445),这是重要的。读者被鼓励思考再思考。观点丰富的研究能激起问题。有回应,哪怕是一声"啊",也应该属于正常的读者反应。这个观念是,丰富的和被自由地解释的资料应该激发富于想象力的丰富性,同时经验材料除了作为动力发挥作用之外也限制了想象。

我们不想把这种研究理念提升为唯一正确的,哪怕是从反身性解释的出发点来看。后者可以导向各种各样的研究,甚至一种更实际的、相对具体的、资料取向的研究也是可接受的,只要避免经验主义的陷阱,只要研究者认真思考资料的结构化本质并开放

它们的歧义与矛盾以及可能意义的丰富性。正如我们先前注意到的，不同的问题和目标必须允许影响研究理念的形成，而同时问题与目标必须被反身性地确定。所以，观点的丰富性作为好的质性的一种标准，可能有时显著有时不是这样。

279

反身性解释与相对主义

在研究团体内部弱势的普遍规范系统以及缺乏评价标准的意义上，相对主义问题可能也要通过每一种研究中对强烈的内部范式的要求结合对范式间的关联要求来避免。这后者与我们关于好的研究，即高度反思的研究的元标准相关。（因此我们不再把观点的丰富性说成是一种可能的标准）因为难以确定是否本书中所提出来的关于高层次反思的标准是否在特定研究中已经达到了，所以这种方法要求研究团体中的某种对话能力，更确切地说，甚至外在于有限群体对特定学派的支持。范式间的关联有时被认为是各种观点之间的对话形式中的理想。不可通约性问题阻碍了固定化的标准的比较与转换。然而，至少某些作者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83）、摩根（Morgan，1983）和罗蒂（Rorty，1992）主张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没有排除调解某些本质不同的立场的可能性或至少是排除相互理解的可能性（第 2 章）。反对这一观点的理由是，语言和政治立场的不同以及人们普遍的不变性和不能容忍阻碍了对话（Jackson and Willmott，1987）。主导的关系以及在研究团体中为地位而斗争并不利于回应好的论证。对健康的范围广泛的争论的另外的障碍可能是，“争论往往受当代流行爱好与时尚（如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学者们往往被以非常相似的思维方式学派化，结果争论就倾向于缩小范围而不是扩大范围”（Newton，1996：20）。因而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能性的，但从实践上看它们常常遇到困境。

研究者受困在某一特殊范式里以及迷失在他们自己的语言游戏中，这一强烈趋向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弱化。不同时期的不同学科特征是在变化的程度上趋向于主流或多元。如果后者流行，那么研究者攻读其他不同的领域并因而获得对其他视角而非他们自己的视角的某种理解，这并不罕见。加强这一趋向的一种方式是支持元方法论的理

念，元方法论暗示着研究者自己的观点不是整体化的，这是我们在这里所支持的。因而，在个体研究计划中得到鼓励的多元论将与研究团体层面上的多元论更加一致。

对元原则如四重解释学的采用，可以产生某种对于不是特定认识论立场——准确地说它有损于其他立场——的保障。以一种元解释的方法论以及不同领域（反身性）中的反思的方法论，研究者可能被迫至少在某种场合进入一种范式间的领域。这种保障可以对抗经验主义、苛评和文本/语言学还原论，以及对性别、阶级或种族（特权）问题的过度敏感。这样它应该可能增强对观点之间的批判性对话的根本接受。 280

可以说，元理论可以作为范式之间的“管道”或联络线，这也就是说，这些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并不彻底，因为元层面使之有可能建构一个维持交往的通道系统，而对于彻底的不可通约性的天真梦想必然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是另一种可以克服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贫瘠的二分法的方式，我们在本书中还讨论了其他几种方式。

关于研究的隐喻

到本章这里为止，我们已经尝试在前几章通过我们的阐述来展开诸要素，尤其是经验的、解释学的、批判理论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并且基于这些立场构造了一种由科学哲学指导的方法论。在这一节和下面部分我们将为理论阐述补充关于如何处理具体研究工作中的理念问题的一些更加具体的思想。这是一个为了对研究作日常思考提供基石的问题，和如何避免失去方向并推动复杂研究过程的问题。于是我们有点脱离了我们的主要阐述而冒险进入了一片良言忠告的领域。

我们在本书中所支持的观点也可以根据研究的可能隐喻来构造。我们坚持主张——特别是在第 3 章——富于成效的方法是根据我们由此出发并引导了我们思考与写作的隐喻来看待社会现象。在我们所讨论的这种领域即质性社会科学中的研究的隐喻是什么？

看来有种主流的概念把研究描述为**采蘑菇**。（对于有的地区的读者而言蘑菇是在超市里购买的，那么也可以用“采浆果”来代替！）所有谈论资料的收集、资料的占有、资料的编码和分类等都指向了这种隐喻。通过对大量充分的“资料”作仔细而辛苦的收集与分类，未经处理的材料要做成美味佳肴，可以根据食谱书（比喻“资料处理”）来准备。已经很明显，我们认为采蘑菇的隐喻是没有成效的，至少是关于研究的主要隐喻是如此。经验材料——访谈陈述、社会状况观察——不能被具体化。采蘑菇的隐喻可能便利了某些实践方面，但它表达了一种与更加反思性的研究理念相对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观点和立场。

281

谈论“资料收集”在质性方法论语境中不幸也很普遍。我们感到许多人并不认为这个概念是一种隐喻。甚至解释的和批判的学者也常常使用这一表达（如 Rosen，1991；Thomas，1993；Van Maanen，1995）。有时这可能由于比较方便而得到辩护——其他表达可能是更加口头上的因而流传不广。而我们还应该记得，特殊的隐喻表达并不必然告诉我们很多关于隐喻在认知层面上的运用。研究的特定部分可能也在这种隐喻的帮助下得到合理的分类和指导。然而，它仍然太过流行，甚至在对自觉和反思的要求比我们在第2章中所概述的研究中对此要求更高的这种研究语境中，也是如此流行。

就像蘑菇隐喻力图警示传统的资料的方法论陷阱那样，有一种类比也援引了它与（早期）资本主义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 在科学世界中，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样，是一个求稳的问题。理智的冒险暗地里是有吸引力的，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正如商业强盗行为一样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人们设想，生活是这样被组织的：所有形式的储蓄——甚至科学资料的储蓄——都将增值和产生复利。而且它们将自己增值。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聪明地投资然后显示良好的节制。股票交易行情与有重大意义的检验两者之间可能看上去是相似的。所谓的硬资料有时令人困惑地就像硬通货。“资料银行”……（Asplund，1970：96）

阿多诺（Adorno，1976）对研究者只是作为登记注册的机器这

个观点的厌恶,表示着一种类似的立场。关于研究优先考虑大量资料的单调细节过程,对于"资料挖掘"的广泛非议也是如此。

关于隐喻的负面意义就说这么多,它揭示了经验研究可能掉入的陷阱。也有隐喻例子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鼓励其他关于研究过程的更"有趣"的看法。扎根理论的既定目标是去"发现"理论。当然,问题是一种理论必须——至少部分地——被创造,它并不仅仅是呆在那里等待着研究者—发现者来发现它,就像一位探索者发现一个迄今尚未被发现的岛屿(参 Woolgar,1983)。伽达默尔(Gadamer,1989a)认为(解释学的)研究是一种"视域的融合",而扎尼亚斯卡-尤格斯(Czarniawska-Joerges,1992)使用"洞见集合(insight gathering)"这一术语而不是"资料收集(data collection)"。阿斯普伦德(Asplund,1970)认为研究过程可以比作侦探小说,它们都是解答神秘事件的。好的研究包含两个核心成分:阐述谜团然后解决它。在批判理论中,陌生化与文化批判是研究的可能隐喻(Ehn and Löfgren,1982;Marcus and Fischer,1986)。(不过,"陌生化"在文化研究中用得更广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质性研究(至少它的某些种类是如此)中有一些根本不同的隐喻。因此,克利福德(Clifford,1986:6)把研究说成是"真实的虚构",而布朗(Brown,1990)认为研究活动是"修辞的建构"。研究是作者身份(Van Maanen,1995)。当然另外有些研究者用隐喻来给予研究中的社会成分以更大的空间,并由此强调了访谈主体的重要性。例如,施泰尔(Steier,1991b)把社会科学研究看成是"共同建构",研究者与研究主体互动而构成了研究对象。 282

根据摩根(Morgan,1980;1986),我们可以把研究视为关于研究对象的隐喻的发展与应用。注意这里的"隐喻"有双重意义:关于研究的隐喻既是隐喻的发展也是隐喻的应用。艾尔维森(Alvesson,1993b)认为理论的指称结构往往比这更加含糊得多,而明确的隐喻反过来又受到第二级隐喻的影响,第二级隐喻以各种方式建构了第一级隐喻。研究者对形成了指称结构之核心的隐喻的控制因而是有限的。有人建议"研究最好被看成是与不同层面的隐喻之间含糊而滑溜的互动作斗争,而不是某一特定隐喻的发展与应用"(Alvesson,1993b:131)。于是这里的研究就被描述为一种非常难以驾驭的过程,它包含着差异,也许是矛盾,以及

关于研究者所处理的问题的部分地不自觉的观念。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的隐喻是阐明作为整体的研究过程,或至少阐明其特定的重要部分。但是也有隐喻是阐明过程中的某些更加限制性的部分或维度的。"硬性和软性资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舒巴罗夫(Czubaroff,1989)根据图尔明的思想,把研究的辩护类比于法理学,说研究辩护是一个法律过程。在第5章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是如何强调科学的文献品质和研究者作为作者的角色,以及文本中的诗性因素。不过,也许关于研究的特定部分或维度的最重要的是,思考作为语言的或多或少自觉地运用的隐喻。冯格拉塞斯菲尔德(Von Glasersfeld,1991:23)比较了两种隐喻:

> 语言并没有把某人的实在片断输送到另一个实在片断中,它只是推动和促进了其他人建立起概念结构,这些概念结构对这位其他人而言看上去是与言说者或写作者所使用过的语词和行为相容的。

因而,作为传递意义的一种手段的语言就遭遇了在概念建构中作为灵感或建筑砖块的语言。类似的遭遇也出现在格根与格根(Gergen and Gergen,1991)所使用的隐喻之间,他们比较了作为绘制世界的符号系统的语言与作为协调行为的行为方式的语言观念(比较言说行为理论)。强调这些思想的元理论特征是要表明,它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而是指示语言的核心要素的问题。语言通过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而获得阐明。于是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协调行为的行为方式或是对实在的反思。强调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的隐喻特征提供了某种自由,而不必不得不选择某种严格的根本观念,不必为偏离了这两个隐喻所指示的那些立场留有余地。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本质论的立场,陈说语言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那么情形就颇为不同了。于是,我们最终将站在一种更加封闭的立场上,如同许多后结构主义者和激进的建构主义者之所为,例如像格根与格根,他们激烈地反对更加传统的关于语言的"反映式"的观点。

283

这一部分所讨论的(根本)隐喻的要点是,它们至多为便利思想以及给予思想以总体方向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全盘的和暗示性

的图景。隐喻可能为与陷入跟经验印象的斗争这一趋向相对抗提供了引导,经验印象很容易导致研究者优先考虑资料管理(编码、分类等)然后转而依靠资料假设。通过指出一些有问题的隐喻——强化经验假设意义上的问题——研究者需要一些引导来使他们避免讨论中的特定陷阱。我们将避免支持任何明确的关于研究的隐喻。但是我们的确感觉到采蘑菇的反讽隐喻作为主导质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量化的)方法论的观念的平衡力量具有某种价值。不过,根据我们的研究理念,我们愿意强调使用若干不同的和互补的研究隐喻的价值。那些被选择的隐喻确实将有赖于它对个体研究者的个人意义或者对他们有衍生性的作用。要点是使用若干不同的隐喻以便于提供关于研究的各种广泛的形象,然后降低纠缠于片面偏好的概念上的风险。有着偏好的隐喻同时是自然的、可欲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策略上却要与它保持某种距离,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某人的偏好立场的能力。隐喻被选择应该有利于刺激解释层面之间的互动和对它们的反思。

让我们把这一部分概括为关于个体研究者自身的(隐喻)可能观点的思考,而不是关于研究过程的思考。如同我们所提到的,我们认为把研究者看成蘑菇采摘者是不明智的,至少在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最本质部分中是如此。另一个不合适的关于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用这样一种表述为代表,即把研究者看成"计算器(calculators)"或"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患者(compulsive neurotics)"——假如我们要参考两个已被恶意的同事用来精确地指涉精神社会科学家和实验室的心理学家的隐喻的话。(实验室的实验把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强迫性的控制是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本书第 3 ~ 6 章所提出的比如研究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们发现研究者被看作一名高级官员(批判理论)、一名煽动者(女权主义)和慢速运转的发动机或摧毁者(后结构主义者)。这些都是有用的相反形象。以更积极的精神,研究者作为现场工作者、侦探、文化批评者、游击队员、自由思考者、真理的雄辩家和解构者等都会被说到。 284

暗示性的隐喻的整个要点不是标记个体或立场,或者把它们

模式化,而是提供建议性的能以实践的方式便于我们反思并帮助我们拒绝陷入偏好立场的诱惑那样的概念。这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反讽是重要的。我们愿以这些例子鼓励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隐喻,为他们服务的隐喻,把他们自身看作某种事物。

一些具体的建议

最后,让我们在阐述中更加降低抽象的层面,并提出一些如何处理有关反身性研究的要求的具体建议。达到理想情形是很困难的。部分问题是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掌握非常难以应付的材料的线索。尽管我们弱化了经验工作,并与当今风尚相比缩小了其范围,问题仍然在于质性研究往往包含着很难彻底传达的经验材料。因为对"资料"的简单分类和范畴化在雄心勃勃的质性项目中并未得到严格的鼓励,所以某种程度上达到并维持一种概览的问题在反身性研究中比蘑菇采摘式研究中更大。此外,对经验材料的处理,和在不同理论的和元理论的层面作持续解释的需要,也要求广泛地把握材料、熟悉广泛的文献、以及良好的记忆、理智灵活性和认知的能力、一个冷静的头脑。应付认知上的不协调音的某种特定能力也是需要的。对某种有特权的立场有某种强烈的宗教式虔诚限制了反身性的空间。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建议的,各种经验工作、有意义的解释、批判性反思和语言学—文本的自我反思的混合是可能的——某一领域占优势可以刺激降低对其他三个领域的需要。但是仍然必须要记得在例如四重解释学变种中的反身性研究,比传统的质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量化的)研究更加需要。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注意到的,一种可能性是从反思性因素的角度把一个研究项目分成不同阶段。于是我们可以在更深的层面和反思意义上来谈论解释的先后顺序。通过首先强调经验工作并且包括某个明确的阶段,即某人以合适的反思性术语来解释他自己的研究项目这个阶段,降低难度是可能的。这一安排可以在项目的一开始,或者在过程当中,或者在刚刚开始组织一个文

本之前，以及/或者在它形成最终版本期间。或者，在研究工作的晚期阶段，一系列的反思性观念或补充的部分可以插入进来，以指明对经验材料和被提供的解释作重新解释和批判性关联的可能方式。自然这些不应该看上去像是在最后一刻才贴上去的恭顺的信末附言或事后所思。反思的观念不仅仅要在与经验材料和主题如权力、政治或意识形态、语言、权威、性等的结构性本质的关系中降低研究的天真度，或者要显示研究者对文献何等地熟悉，其要点是"鼓舞"项目产生更有趣的、创新性的和判断明确的解释与适当的结论。

285

我们也可以认为反身性研究是一种包含不同的次级项目的研究规划。其先后顺序将在时间中发生。在更加发展的意义上，反思的形式可以在传统的经验项目完成并已写出报告之后实现。研究者可以批判地反思先前的项目，而不是直接着手新的经验研究任务，也许发现缺陷或弱点不怎么好，尽管这对于学习是很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重新解释先前的描述和观念并把它们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中，然后发展新的认识。于是反身性解释将以一种更加雄心勃勃的方式首先发生在规划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成分主导了不同的次级项目和研究刊物。它的一个可能优势是，可能更容易对经验材料作出重新解释，更容易在元层面上作出解释，当某人面对材料获得了某种距离的时候。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其他人合作的研究者在反思上具有或发展了不同的专长。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一个包含（极端的）经验主义者、解释学家、批判理论家和后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团队。这种合作在实际运作中将很难组织，不管怎么样都将面临实现视角之间的良好互动的问题，如果最初的接触点相重的架构太过贫弱的话。另一方面，我们所能设想的是，比如两个或更多的研究者，他们有研究语境中所必要的基本的共同的方法，他们个别地深入思考和探研不同的领域，例如研究不同相互补充的理论，这将扩展他们共同的解释的保留内容并确保特定的反思能力。更一般地说，它是一个在合作研究中获得对相似点与相异点的适当结合的问题。

最后是对于反身性解释研究的一个警示。研究失败的风险远远不能忽视。即使某人从一种更传统的方法论观点出发，其情形也与某种简单而天真的解释、语言、政治语境以及表象模式的

观念是一样的。因为甚至采蘑菇式的博士研究项目也常常不能达到最小层面上的可接受性,往往很少能达到任何有趣的或原创性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以更高的要求来成功地完成反思性研究项目是充满着问题的。另一方面,对反身性的研究者的要求将确实对动机有某种有益的影响。对于固定资料的研究("资料挖掘")的深深厌倦以及独立性和创造性思想领域的贫弱,是导致某些失败的原因,因为人们失去了他们的灵感并放弃了研究项目。我们甚至更加强烈地相信反身性解释的方法可以改善结果,它成功地指出了某些适当的和原创性思想的研究形式。含糊的、多层面的反思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让社会科学(或其他)研究免于对解释学、政治和语言学自觉的需要,以及对于发展这种自觉和启发新思考作反思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研究者必须认真地思考如何处理这些需要,可以控制以及如何控制反思的熟练层次。由敏感地听到关于作为研究者的某人的优点和缺点的反馈信息而促进的自知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对各种反身性解释的方法论策略的讨论中所提到的,有着不同程度的野心和熟练度的不同层面上解释的不同混合是可能的。

286

重要的是认识反身性研究的复杂性,而不是受这种复杂性压制。这需要一种自觉的分类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如同在所有质性研究中一样,仅仅依赖于食谱著作的论据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反思是与某人自己的个人能力和条件以及手头的研究工作相适应的。同时必须指出,这些个人的能力是与讨论中的研究者已经阅读和研究的东西相关联的。研究工作部分地受到反思的决定。由对本书中所涵盖的许多论题的思考而透露的研究问题,当然将相当大地区别于大多数传统的研究目的,以及发起组织所支持的利益。代表后者鼓励作重新思考既是一种主要的理智上的任务也是教学法的任务。

最后的评论:作为一种暂时的理性规划的研究

我们在本书中对质性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中的许多核心趋势

作了一种批判性的概览。我们反对流行的方法论研究途径,而试图展示首先来自经验取向的趋势、解释学的、批判性理论的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哲学,也来自话语分析、女权主义和系谱学的重要教训。把它放在辩论中来理解,我们主张的是"食谱书式的研究"与"真空里的理论化"都应该被反思性的活动取代,其中对质性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是对事件实际发展情形的误导性描述,是无论如何比论质性方法的教科书通常看来所主张的更少作为研究的核心。

我们使用反身性解释这一术语,寻求构造了一种合理的、综合的质性方法论(或元方法论)。我们还没有触及技术的层面。这主要是一个焦点选择的问题,也是从我们这方面抵抗传统质性方法论技术困扰的一种反应。我们也不认为对已经说到的方法论技术有任何补充的必要。近年已经见证了一系列的出版物。现存文献包含许多关于接近的问题,关于如何引导访谈,关于在观察期间如何作笔录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如果读者对研究工作的特征也有一种元理解的话。不过我们认为质性研究中的决定性特点不是其不同的成分被管理的方式。毋宁说,首先决定其价值的是若干不同层面上的各种解释维度,以及反身性地处理这些的能力。好的质性研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而是理智性的研究项目。在我们看来,反思表达了领域的多重层面,而不是拥护刻画了社会科学之科学特征固定程序。有人可能会想,这使得与其他有良好推理的活动(如咨询报告)划界的标准太弱,并为社会研究提供了太宽松的基础。我们不同意这一点,而是坚持认为这样的话社会科学的特定本质就非常强烈地(未经夸张地)被引出来。以反身性的方式处理(建构与进一步解释)经验材料,开始对若干问题作反思,同时一贯地允许歧义,这是给予社会科学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本书所提供的架构目的是要提供结构与方向,以及便于创造和超越已确立的观念,同时在研究程序和与经验材料的互动层面上保持灵活性。

根据这里所提供的视角(或者毋宁说是元视角),研究并不遵循任何线性过程或整体单一逻辑。反对或很不重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性的潜能应该是诱人的,如同后现代主义者、激进的建构主义者以及其他人近年来规模宏大的作为。把经验研究界

定为一种极其理性的规划这一尝试并不特别成功，在同意这一点的意义上，我们是赞同他们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建设性的理由来采取相反的立场。实际上我们采用了一种把研究视为暂时的理性规划的观点，其中的合理性内核而非过程才是反思的问题所在。

暂时的理性，是的，也是暂时的说法。通过更密切的考查，四种解释层面就变得明确了，这四种解释层面我们已经在本书中讨论到了，而且我们认为它们是反身性方法论中的主要因素，也与四种主要的修辞格相符，或者“主要比喻”以更广的视角表达了四种主要的思想风格，然后构成了一种“诗性逻辑”（见 White，1985a；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所作的讨论，见 Sköldberg，2000b）。

288

把“原子论式的”一切都看作孤立于一切其他事物，对于这个属于主要比喻的转喻而言，把资料取向方法尤其是扎根理论与它们对孤立的经验资料的强调是相符的。第二个层面解释学表达了一个立场，在这个立场上符号的意义成了中心，于是彰显出了第二种主要比喻，隐喻，符号及其意义正是其中心。批判理论处理的是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最重要的系统影响力，尤其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由此彰显出第三种修辞格，提喻法，它表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我们曾提到，后现代主义处处渗透着一种反讽的思想风格，它由此成了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主要比喻或修辞格的一个佳例，即反讽。

我们在这里不会继续深入下去，因为我们想另外找机会再做。重要的是要指出，不仅仅是对于选择我们为质性方法论建议的这四个层面的反身性解释有着理性的推理，而且其背后也有一种诗性逻辑，由于修辞和思想风格而形成了主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本书的立场看作是接受某种“外在”实在之存在与接受我们对这一实在的知识的修辞和叙述本质之间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在实在与修辞之间有一种不稳定的摇摆的关系，但是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产生了一种重构的动力，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要力图把握的。

注 释

[1] 关于此问题的另一个观点，见伊斯雷尔（Israel，1979），他宣称正是通过语言而非感知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普遍的、“客观的”世界。

[2] 在这一关联上，比较布什曼与鲍迈斯特对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的实验研究将很有意思。作者在自恋与高自尊之间作出了区分。高自尊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恋牵涉到强烈地希望自我感觉良好。布什曼与鲍迈斯特发现自尊大体上与暴力行为无关，而自恋是与暴力行为高度相关的。

[3]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一“结果”，即被发现的语言的相关性或变种。在我们看来，反身性研究既要考虑到这种相关性/变种理解研究主体的心理的可能性（“超越纯粹的语言”），也要考虑到这是另外某种问题的可能性。关于后者的一个例子是，这种陈述更与一种文化传统有关，这一文化传统有一个假定是：“妒忌”与“自尊”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相关联的。（在某种文化中，“妒忌”与“低自尊”都有否定性的内涵，它们可以在人的感知与/或陈述中相关联）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陈述被理解为表示试图产生特定的结果：例如，“我妒忌，不过这是因为我的自尊心低”这一陈述构成了对某种特定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的创造（这可能可以部分地解释某些行为，如对配偶的控制），或者引起某种反应，如同情或支持。正是这种对多重意义的开放在反身性研究中才是重要的。在这里从性别以及与各种类型的社会差异相关的角度来考察陈述也是合理的。关于妒忌的意义和/或陈述可能由于阶级、社会、种族群体等而表现不同——见上文第 6 章讨论的贾加尔（Jagger，1989）关于情绪的思想。人们可以自问格根与格根的定义以及他们的论证（见上文）是否表达的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关于妒忌的观点，而不是任何更一般意义上的性质。最后，也有理由注意到，在制度化的关于妒忌的话语中——这可能反映在（“正常”）人关于这一现象的陈述中，来发现与精神和心理之正常化相关的权力的表达。（我们可以设想“那些从不妒忌的人是没有顾及他们的情绪，并且不能为自己负责”，或者“那些多妒忌的人是患了妄想狂”等诸如此类的陈述。太少或太过妒忌都可以从没有达到标准化的心理来看待）对不同可能解释的多重性的指明可以产生丰富而多样的，并非只是不确定或不明确的“结果”。

289

[4] 我们在本节将不会区别反思性与反身性，只是视之为同义词。下一节我们将为反身性给出一个特定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使用这一术语的方式与大多数其他研究者稍有不同。

[5] 在社会科学中，“研究的对象”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毕竟人们建构了

他们的社会实在。这里的要点是它也适用于研究者。冯格拉塞斯菲尔德(Von Glasersfeld,1991)说到无意义建构,研究者把社会建构保留给了研究对象,这同时也暗示着研究者自身依旧外在于这种建构,而且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客观地——描绘社会结构。认为研究者的建构被忽视了,这一异议显然也适用于许多主流的质性研究。

[6] 所有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思性的。这一因素往往被限制在或关联着某种特殊的逻辑或论题,研究者正在努力考查的正是一种形式的方法、性别关系、语言或权力。这会导致僵局,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整个反身性观念相反。

[7] 注意到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这里讨论与反思相关的一致性与变种。至于理论的指称结构和与经验材料相关的解释,从保持一种理论线索来看,某种连贯性是必要的。混合各种不同的论证,所谓的"混合话语"(Giorgi,引自Sandberg,1994),并不是我们所支持的。混合与对抗或认真研究刺激了反思的多重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后者预设了不同的论题有不同的同一性,而研究者在思想模式中有能力改变层面和有能力变异。

[8] 在一种总体的解释学概念中归入后现代主义这种合理性是成问题的。不过,四重解释学并不偏向于任何传统的意义上的解释学。我们所考虑的后现代主义因素也并非与解释学有着根本和直接的对立,而是一种更温和的变种,它对于多重声音、片断、运用理论系统的限制,或者面对作者的权威和文本的核心意义所采取的一种反思的态度,都并非与解释性经验研究不相容。

[9] 像其他作者那样,波特(Potter,1997:146)认为"反身性鼓励我们思考比如作为一个版本的某种文本方式,它有选择性地加强连贯性与不连贯性、讲述历史故事、描述并确实构成某种客观的外在实在"。对我们来说,这种有点狭窄的文本中心是属于反思性的,而不是反身性的。

[10] 研究者的雄心是典型地去限制解释,去创造尽可能地与被研究的实在接近的以及没有进一步解释上的限制的经验材料。

290

[11] 然而作为一条规则,当涉及可能作出的解释的广度与变种的时候,丰富的经验材料没有理论观念那么重要。在精神分析中,分析者经过数百小时的互动接触了大量关于分析主题的信息,在这里经验材料几乎必然被认为是与精神分析中的分析相适应的。不过资料的特征仍是片面的。在精神分析者的沙发上所发生的事情与被分析者的通常生活是很不相同的。作为这一特殊方式的工作的结果,经验材料——尽管它有丰富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适合于理论的。然而,最重要的是,理论作为控制严格社会化的精神分析者的规则,持续地使一切事物都根据理论结构获得解释得以可能。

[12] 顺着这些个体因素,研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必须要观察到。个体研究者

是研究团体的一部分,其本身常常受到因循守旧的压迫。认知与情绪上的执著常常更易于去理解与个体现象相对的集体现象。对社会认同与归属的需要,加上制裁的威胁,使人很难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打破他们浸润其间已久的理论。某种程度的因循守旧往往是研究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对某一特定学派的前提作质疑的自由思想家很少被赏识。同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开放性与多重性上的差异应该被注意到。在部分社会科学中,没有某个范式能占主导地位的,这能提供自由度和欣赏新思想的范围。

[13] 当然,使某人自己从前概念中解脱出来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不是一个可实现的目标。在最后的分析中,(使研究者)从前概念和认知条件中根本解脱出来需要杀死自我(Khrishnamurti,1954),纵然东方哲学非常重视这一状态,它看上去还是强加在质性研究者头上的颇为过分的要求。

[14]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哪个部分应该排除掉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决定的。比较天真地来理解,也许研究的特定对象被视为在性别、阶级或文化上是中立的,而广泛地阅读性别、阶级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本应改变这种态度,进一步刺激尝试在这些维度上来降低某些被质疑的前概念,这实际上培养了一种前理解,这种前理解应该暗示着在与它们的关系中更开放和更少偏见。

[15] 那建构了元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作为元理论发挥作用的,不是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的因素,因为有一种相关的因素要考虑到。元理论的特征是远离资料,首先是在与被更加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中的那样的理论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比如,在对性别关系的经验研究中,某种版本的女权主义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理论。但是如果某种其他事物的研究并不直接集中在性别的维度上,那么性别理论可以用作反思此项研究的一个来源:例如,在质疑、推理、聚集和语言中有性别偏见,或者特定问题被忽视了吗?在性别研究中也需要其他理论,而且在此语境中这种需要更具根本性意义,目的是提高对所讨论的问题的反思(例如,与强调性别相关的可能的特定利益,过分集中在性别维度上的倾向("性别还原论"),民族中心主义,权威与语言问题)。某一特定理论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才同时作为一种理论和元理论发挥作用。

[16] 我们可以设想这种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至少两个变种。除了多音驱动这一变种之外,解构驱动这一变种也要注意到。前者争取同时为主体的观点和经验"实在"的多重本质提供空间,后者则典型地把核心集中在文本的狭隘片断上。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中,是关于经验社会研究(而不是文学理论)的质性方法的,因而对前一变种更感兴趣。

291

[17] 在转写录音材料的时候,会话与话语分析者试图使解释最小化。读者有时

在理解抄本上有困难，这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凌乱和不连贯的印象，其中含有不完整的句子等。

[18] 把某事物视为事件或行为当然是一种解释。

[19] 不同的信息提供者对于引发了这位创立者的行为与动机的事件将会有颇不相同的描述，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至少如果我们依赖于话语分析的话。在这种情形下"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有益的，不过这不会为我们直接的解释问题提供任何简单的回答。要确定若干陈述中哪一个反映了 X 的真实动机与意图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历史编纂上来讲，是**相互补充**的资料，而不一定是更多的资料，才可能为支持或反对某种解释提供更好的证据（而不是"简单的回答"）。

[20] 这个观点是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相符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多元论很关键，这种考虑也是历史编纂的来源批判的标准，对于互补来源的运用在他们那里具有本质意义。在批判理论中，更成问题的是与主导观点对抗。它可以通过否定来实现。这样一种多元论是批判理论的一种可能策略——观点上的变化可能便于产生批判性的洞见——但它不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种"必须"的或内在固有的价值。

[21] 扎根理论的支持者既强调理论与资料之间的一致性，也强调理论对讨论中的领域中的相关行为实施控制的能力。对于这一方向上的某些支持者而言，真理——由诸如"理论—观察的兼容性、概括性、再现性、准确性、严格性与实证性"（Strauss and Corbin，1990：27）这样的传统科学优点保障——与技术功能价值关系密切。另一方面，格拉泽（Glaser，1992：67-69，71-72）指向作为扎根理论的源头的格拉泽与斯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激烈地反对这种动向，并指出全书的基本思想是理论的产生而非证实或检验。

[22] 尽管他们并非总是非常清楚地理解它，大多数对建构主义和表象（文本）的核心重要性有兴趣的研究者，都同意经验材料的关键性特征。在特定情形下，其所使用的标准与传统的标准非常相似，尽管有点"更软"。例如，居巴与林肯（Guba and Lincoln，1994：114）主张，以值得信赖性代替有效性，可转移性代替外部有效性，可证实性代替客观性。范马伦（Van Maanen，1995：22）宣称，即使研究需要与社会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力量相关的可靠性，即使例如文本性是民族志的中枢，仍然有必要坚持传统的优点如"显示证据、提供解释、详述类推法、援引权威，解决实例，编组系列，等等"。我们同意在经验研究中，工作过程中的这些标准和因素是重要的，但其他标准和因素可能更重要，下文再来说。我们希望弱化那从经验上明确的价值。

[23] 除了支持各种关于"事物如何"或者描述和理解"实在"的（更）富于成效的

方式的观点,经验材料也能以其他方式运用。例如,它可以通过关注否定性的维度来产生思想,阐述或激发、引导对理论的批判与修正,并且产生富于洞见的描述。

[24] 在这方面一个好的观念不应该否定一个被秩序化了的被观察的世界的意义,但最好把它视为一种强有力的(充满力量的)产物,然后试着打破这些客观化以便揭示出比直接的表象更充分的潜能和变化形式(Deetz,1996)。 292



Acker, J. (1989) Making gender visible, In R. A. Wallace (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Newbury Park, CA: Sage.

Acker, J., Barry, K. and Esseveld, J. (1991) Objectivity and truth: proble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In M. Fonow and J. Cook. (eds), *Beyond Methodology: Feminist Scholarship as Lived Resear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dorno, T. W. (1974) *Minima Moralia*. London: NLB.

Adorno, T. W. (1976)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 W. Adorno, H. Albert, R. Dahrendorf, J. Habermas, H. Pilot and K. R.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1961.

Adorno, T. W. and Horkheimer, M. (1979)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First published in 1944.

Adorno, T. W., Frenkel-Brunswik, E., Levinson, D. J. et al.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Agar, M. H. (1986) *Speaking of Ethnography*. Beverly Hills, CA: Sage.

Agger, B.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131.

Alvesson, M. (1990) Organization: from substance to image?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373-394.

Alvesson, M. (1993a)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vesson, M. (1993b) The play of metaphors.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Alvesson, M. (1994) Critical theory and consumer market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0: 291-313.

Alvesson, M. (1995a) The meaning and meaninglessness of postmodernism. *Organization Studies*, 16(6): 1049-1077.

Alvesson, M. (1995b) *Management of Knowledge-Intensive companies*.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Alvesson, M. (1996)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Organisation*.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Alvesson, M. and Billing Y. D. (1997) *Understanding Gender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Sage.

Alvesson, M. and Deetz, S. (1999) *Doing Critical Management Research*. London: Sage.

Alvesson, M. and Köping, A.-S. (1993) *Med känslan som ledstjärna. En studie av reklamarbetare och reklambyråer*. Lund: studentlitteratur.

Alvesson, M. and Willmott, H. (eds) (1992)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London: Sage.

Alvesson, M. and Willmott, H. (1996) *Making Sense of Managemen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Andriessen, E. and Drenth, P. (1984) Leadership: theories and models. In P. Drenth et al. (eds), *Handbook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Vol.* 1. Chichester: Wiley.

Angus, I. (1994) Inscriptions and horizons: a postmodern civilizing effect? In H. Simons and M. Billig (eds),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London: Sage.

Annells, M. P. (1996) Grounded theory metho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paradigm of inquiry, and postmodernism.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6(3): 379-393.

Annells, M. P. (1997) Grounded theory method, Part 1: Within the five moment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ursing Inquiry*, 4: 120-129.

Anthony, P. D. (1977) *The Ideology of Work*. London: Tavistock.

Arminen, I. (1996) On the moral and interactional relevancy of self-repairs for life stories of members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Text*. 16: 449-480.

Arminen, I. (1998) *Therapeutic Interaction: A Study of Mutual Help in the Meetings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Helsinki: Finnish Foundation for Alcohol Studies.
Asplund, J. (1970) *Om undran inför samhället*. Lund: Argos.
Asplund, J. (1987) *Det sociala livets elementära former*. Göteborg: Korpen.
Asplund, J. (1989) *Rivaler och syndabockar*. Göteborg: Korpen.
Asplund, J. (1992) *Storstäderna och det forteanska livet*. Göteborg: Korpen.
Astley, W. G. (198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trut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0: 497-513.
Atkinson, J. M. and Heritage, U.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P. (1988) Ethnomethodolog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441-465.
Atkinson, P. and Hammersley, M. (1994) Ethnography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ker, S. (1990) Reflection, doubt, and the place of rhetoric in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8:232-245.
Bärmark, J. (1984) Vetenskapens subjektiva sida. In J. Bärmark (ed.), *Forskning om forskning*.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Baszanger, I. and Dodier, N. (1997) Ethnography: relating the part to the whole.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Baudrillard, J.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Baudrillard, J. (1985) The ecstacy of communication.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Bauman, Z. (1978)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Hutchinson.
Bauman, Z. (1988) Is there a postmodern sociolog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17-237.
Bay, T. (1998) AND ... AND ... AND. Reiterating financial deriv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ckholm: Stockholm School of Business, Stockholm University.
Beach, W. A. (1996) *Conversations about Illness: Family Preoccupations with Bulimi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Becker, E. (1973) *The Denial of Death*. New York: Free Press.
Bengtsson, J. (1989) Fenomenologi: vardagsforskning, existensfilosofi, hermeneutik. In P. Månsson (ed.), *Moderna samhällsteorier. Traditioner, riktningar, teoretiker*. Stockholm: Prisma.
Benhabib, S. and Cornell, D. (eds) (1987) *Feminism as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rg, P. O. (1982) 11 metaphors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P. O. Berg and P. Daudi (eds), *Traditions and Trends in Organization Theory. Part* II. Lund: Studentlitteratur.
Berg, P. O. (1989) Postmodern management? From facts to fi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5:201-217.
Berger, P. L. and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Berman, M. (1992) Why Modernism Still Matters? In S. Lash and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ernstein, R. J. (ed.) (1985)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eronius, M. (1986) *Den disciplinära maktens organisering*. Lund: Arkiv.
Beronius, M. (1991) *Genealogi och sociologi*. Stehag: Symposion.
Betti, E. (1967) *Allgemeine Auslegungslehre als Methodik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Tübingen: Mohr.
Betti. E. (1980) Hermeneutics as the general methodology of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J. Bleicher (ed.),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Routledge. Paper first published 1962.
Billig, M. and Simons, H. (1994) Introduction. In H. Simons and M. Billig (eds), *After Post 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London: Sage.
Billing, Y. D. and Alvesson, M. (1994) *Gender, Managers and Organizations*.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Bilmes, J. (1997) Being interrupted. *Language in Society*, 26:1-25.
Blau, P. M. (1955)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omqvist, M. (1994) *Könshierarkier i gungning. Kvinnor i kunskapsföretag*. Studia Sociologica Upsaliensa 39. 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Boden, D. and Zimmerman, D. H. (eds) (1991)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hman, J. (1991)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P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Boothby, R. (1993) Heideggerian psychiatry. The Freudian unconscious in Medard Boss and Jacques Lacan.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4(2): 144-160.

Bordo, S.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scepticism. In L.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Borgert, L. (1992) *Organisation som mode*.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ckholm: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Boss, M. (1988) Recent considerations in daseinsanalysis. *The Humanist Psychologist*, 16(1): 58-74. (Special issue on daseinsanalysis.)

Bourdieu, P. (1979)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 J.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urdieu, P., Chamboredon, J.-C. and Passeron, J.-C.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Berlin: de Gruyter.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Bowers, J. (1988) Review Essay on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185-192.

Bricmont, J. (1997) 'Le relativisme alimente le courant irrationnel'. Interview with Jean Bricmont in *La Recherche*, May.

Broad, W. and Wade, N. (1982) *Betrayers of the Trut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Broms, H. and Gahmberg, H. (1983) Communication to self in organizations and cultur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 482-495.

Brown, R. H. (1976) Social theory as metaphor. *Theory and Society*, 3: 169-197.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own, R. H. (1990) Rhetoric, text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8: 188-197.

Brown, R. H. (1994) Re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y after the postmodern critique. In H. Simons and M. Billig (eds),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London: Sage.

Bryman, A. (1989) *Research Methods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London: Unwin-Hyman.

Bubner, R. (1982) Habermas' concept of critical theory. In J. B.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Bullock, A. (1991)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London: HarperCollins.

Bunge, M. (1967) *Scientific Research*, (2 vol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urns, T. and Stalker, G. M. (1961)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London: Tavistock.

Burrell, G. (1992) The organisation of pleasure. In M. Alvesson and H. Willmott (eds),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London: Sage.

Burrell, G. and Morgan, G. (1979)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ldershot: Gower.

Bushman, B. J. and Baumeister, R. F. (1998) Threatened egotism,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direct and misplaced aggression: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lead to viol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1): 219-229.

Calás, M. and Smircich, L. (1988) Reading leadership as a form of cultural analysis. In J. G. Hunt et al. (eds), *Emerging Leadership Vista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Calás, M. and Smircich, L. (1991) Voicing seduction to silence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567-601.

Calás, M. and Smircich, L. (1992a)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In A. Mills and P. Tancred (eds), *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London: Sage.

Calás, M. and Smircich, L. (1992b) Rewriting gender into organizational theorizing: directions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M. Reed and M. Hughes (eds), *Re-thinking Organization: New Directions i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Analysis*. London: Sage.

Calás, M. and Smircich, L. (1996) From the 'woman's' point of view. Feminist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S. Clegg, C. Hardy and W. Nor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London: Sage.

Calhoun, C. (1992)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specificity in social theory. In S. Seidman and D. Wagn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Oxford: Blackwell.

Caponigri, A. R. (1963)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Ⅲ.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aponigri, A. R. (1971)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Ⅴ.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Caputo, J. D. (1987) *Radical Hermeneutics. Repetitio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arrard, P. (1992) *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Discourse from Braudel to Charti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astaneda, C. (1963) *The Teachings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storiadis, C. (1992) Power, politics, autonomy. In A. Honneth et al. (eds), *Cultural-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ia, R. (1995) From modern to postmoder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rganization Studies*, 16(4): 579-604.

Chomsky, N. (1965)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Cicourel, A. V.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legg, S. (1989) *Frameworks of Power*. London: Sage.

Clegg, S. (1990) *Modern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Sage.

Clegg, S. and Hardy, C. (1996) Some dare call it power. In S. Clegg, C. Hardy and W. Nor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London: Sage.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ifford, J. and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llingwood, R. G. (1992)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Collins, R. (1981) Micro-translation as a theory-building strategy. In K. Knorr-Cetina and A.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ollins, R. (1985) *Thre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on, D. (1992) Researching recruitment: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sex discrimination. In R. Burgess (ed.),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Vol.*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Connerton, P. (1980) *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per, J. C. (1978) *An Illustrated Encyclopaedia of Traditional Symbol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Cooper, R, (1989)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3: The contribution of Jacques Derrida. *Organization Studies*, 10:479-502.

Czarniawska-Joerges, B. (1992) *Exploring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Czarniawska-Joerges, B. (1994) Narratives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ties.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7. Newbury Park, CA: Sage.

Czubaroff, J. (1989) The deliberative character of strategic scientific debates. In H. Simons (ed.),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sage.

Daudi, P. (1990) Con-versing in management's public pla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6:285-307.

De Man, P. (1983)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2nd edn). London: Methuen.

Deetz, S. (1992) *Democracy in an Age of Corporate Colonization: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eetz, S. (199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commercial artifact. In L. Cummings and P. Frost (eds), *Publishing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2nd edn). Homewood, IL: Irwin.

Deetz, S. (1996) Describing differences in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science: rethinking Burrell and Morgan and their legacy. *Organization Science*, 7:191-207.

Deetz, S. and Kersten, S. (1983) Critical models of interpretive research. In L. Putnam and M. Pacanowsky (eds),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Deleuze, G. (1983)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London: Athlone.

Deleuze, G. (1988) *Foucaul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nzin, N.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and Lincoln, Y.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Derrida, J. (1978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Derrida, J. (1978b) *Speech and Phenome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Derri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72.

Derrida, J. (1989a) Three questions to Hans-Georg Gadamer. In D. P. Michelfelder and R. E. Palmer (eds),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errida, J. (1989b)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Nietzsche/Heidegger): two questions. In D. P. Michelfelder and

R. E. Palmer(eds),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euerlein, E. (1959) Dokumentation.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7(2): 177-207.

Dews, P. (1987)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London: New Left Review.

Douglas, J. D. and Johnson, J. M. (eds) (1977) *Existenti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ew, P. and Heritage, J. (eds) (1993) *Talk at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eyfus, H. L. (1991) Heidegger's hermeneutic realism.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5-41.

Dreyfus, H. and Rabinow, P. (1983)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reyfus, H. and Rabinow, P. (1986) What is maturity? Habermas and Foucault 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D. Hoy(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1982.

Dunne, J. (1996) Beyond sovereignty and deconstruction: the storied self. In R. Kearny(ed.), *Paul Ricoeur. The Hermeneutics of Action*. London: Sage.

Ehn, B. and Löfgren, O. (1982) *Kulturanalys*. Lund: Liber.

Ekerwald, H. and Johansson, S. (1989) Vetenskap som byråkrati eller som konst? *Sociologisk Forskning*, 2: 15-33.

Eliade, M. (197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liasson, S. (1980) Det samhälleliga sterbhuset. *Bokcaféets månadsbulletin*, 52.

Fay, B. (1987)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eatherstone, M. (1988) 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 an 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195-215.

Fell, J. P. (1979) *Heidegger and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erguson, K. (1984) *The Feminist Case against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etterman, 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Newbury Park, CA: Sage.

Feyerabend, P. K. (1975)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Feyerabend, P. K. (1987) *Farewell to Reason*. London: Verso.

Finch, J. (1984) 'It is great to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interviewing women. In C. Bell and H. Roberts(eds), *Social Researching*. London: Routledge.

Fine, G. A. (1993) The sad demis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and glorious triumph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61-87.

Fine, M. (1994) Working with hyphens: reinventing self and oth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sher, W. R. (1985) Studying technology and social life. In M. Castells (ed.) *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Flax, J. (1987)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12: 621-643.

Flynn, P. J. (1991)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Movement. Socio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Berlin: de Gruyter.

Forester, J. (1983) Critical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In G. Morgan (ed.), *Beyond Method*. Beverly Hills, CA: Sage.

Forester, J. (1989)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ester, J. (1992) Critical ethnography: on fieldwork in a Habermasian way. In M. Alvesson and H. Willmott (eds), *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 London: Sage.

Forester, J. (1993) *Critical Theory, Public Policy, and Planning Pract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rget, P. (1985) Argument(s). In D. P. Michelfelder and R. E. Felder(eds) *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ster, H. (ed.) (1985)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First published in 1969. Includes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first published(as *L'Ordre du Discours*) in 1971.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First published in 1966.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New York: Pantheon. First published in 1976.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Random House. First published in 1975.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 777-795.

Foucault, M. (1983)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by G. Raulet. *Telos*, 55: 195-211.

Foucault, M. (198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urastié, B. and Joron, P. (1993) The imaginary a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urrent Sociology*, 41(2): 53-58.

Fraser, N. (1987)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Habermas and gender. In S. Benhabib and D. Cornell (eds), *Feminism as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raser, N. and Nicholson, L. (1988)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2-3): 373-394.

Freud, S. (195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J. Strachey (ed.), *Work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s 4 and 5. London: Hogarth Press.

Frisby, D. (1976) Introduction. In T. W. Adorno, H. Albert, R. Dahrendorf, J. Habermas, H. Pilot and K. R.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 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Fromm, E. (1955) *The Sane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romm, E. (1976) *To Have or to Be*? London: Abacus.

Frost, P. J. (1987) Power, politics, and influence. In F. Jablin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Frye, N. (1973)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57.

Fuchs, S. and Wingens, M. (1986) Sinnverstehen als Lebensform. Über die Möglichkeit hermeneutischer Objectivitä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2(4) 477-501.

Gadamer, H.-G. (1989a)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n). London: Sheed & Ward. First published in 1960.

Gadamer, H.-G. (1989b) De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D. P. Michelfelder and R. E. Palmer (eds), *Dialogue and Dekonstruktion.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el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arfinkel, H. (1988)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quidd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I of IV): An announcement of studies. *Sociological Theory*, 6: 103-109.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Geertz, C. (1988) *Work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enoud, F. (ed.) (1961)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February-April* 1945. London: Cassell.

Gergen, K. (1978) Toward generative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 1344-1360.

Gergen, K.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266-275.

Gergen, K. (1992)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postmodern era. In M. Reed and M. Hughes (eds), *Rethinking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Gergen, K. and Gergen, M. (1991) Towards reflexive methodologies.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Gherardi, S. (1995) *Gender, Symbolism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London: Sage.

Gherardi, S. and Turner, B. (1987) Real men don't collect soft data. Quaderno 13. Dipartimento di Politica Sociale, Universitá di Trento.

Giddens, A.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Giddens, A. (1982) Labour and interaction. In J. B.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orgi, A. (1985) Th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the verbal learning tradition. In A. Giorgi (ed.),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ed.) (1993) *Examples of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and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raff, G. (1979) *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imas, A. J. (1983) *Structural Semantics: An Attempt at a Metho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uba, E. and Lincoln, Y.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ignon, C. B. (1991) Pragmatism or hermeneutics? Epistemology after foundationalism.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uillet de Monthoux, P. (1978) *Handling och existens-Anarkoexistentiell analys av projekt – , företag och organisation*. Stockholm: Liber.

Guillet de Monthoux, P. (1981) *Doktor Kant eller den oekonomiska rationaliseringen*. Göteborg: Korpen.

Gummesson, E. (1991) *Qualitative Methods in Management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Gurwitsch, A. (1964)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1971a)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71b) Der Universalitä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 In *Hermeneutik and Ideologiekritik*. Frankfurt: Suhrkamp.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73) A postscript to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 157-189.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Boston: Beacon Press.

Habermas, J. (1985)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H. Foster (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Habermas, J. (1986) Entgegnungen. In A. Honneth and H. Joas (eds), *Kommunikatives Handeln. Beiträge zu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s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f.

Habermas, J. (1990) *Kommunikativt handlande. Texter om språk, rationalitet och samhälle*. Göteborg: Diadalos.

Hacking, I. (1982) Language, truth and reason. In M. Hollis and S. Lukes (eds),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glund, D. A. R. (1977) *Perception, Time and the Unity of Mind. Problems in Edmund Husserl's Philosophy*. Doctoral dissertation. Götebor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Göteborg University.

Haig, B. D.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scientific metho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http://www.ed.uiuc.edu/EPS/PES-Yearbook/95_docs/haig.html > (July23, 1998).

Hall, E. (1993) Smiling, deferring, and flirting: doing gender by giving 'good service'. *Work and Occupations*, 20: 452-471.

Hammersley, M. (1989) *The Dilemma of Qualitative Method. Herbert Blumer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Hammersley, M. (1990) What i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The myth of theoretical description. *Sociology*, 24: 597-615.

Hammersley, M. (1992) On feminist methodology. *Sociology*, 26(2): 187-206.

Hanson, N. R. (1958) *Patterns of Discovery: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ding, S. (1987)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In S.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ré, R. (1989) Language games and texts of identity. In J. Shotter and K.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Hayman, R. (1980) *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ath, C. C. and Luff, P. (1993) Explicating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n N. Gilbert (ed.), *Researching Social Life*. London: Sage, pp. 306-327.

Heelan, P. A. (1997)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A(2): 273-298.

Hegel, G. W. F. (1952)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First published in 1807.

Hegel, G. W. F. (1967) *Wissenschaft der Logik. Erster Teil. Erster Band: Die objektive Logik*. Hamburg: Felix Meiner. First published in 1812.

Heidegger, M. (1959)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Oxford: Blackwell.

Heidegger, M. (1977)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 Row.

Heidegger, M. (1982)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Helenius, R. (1990) *Förstå och bättre veta*. Stockholm: Carlsson bokförlag.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ster, M. B. (1967) *The Meaning of Poetic Metaphor*. The Hague: Mouton.

Hirsch, E. D. Jr(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F. (1976) *The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lis, M. (1994)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way, W. (1984) Gender differ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J. Henriques et al. *Changing the Subject*. London: Methuen.

Hollway, W. (1989) *Subjectivity and Method i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Holstein, J. A. and Gubrium, J. F. (1994) Phenomenology, ethno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ive practice.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rkheimer, M. (1976)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In P. Connerton (ed.), *Critical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Essay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Hoy, D. (ed.) (1986a)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oy, D. C. (1986b) Must we say what we mean? The grammatological critique of hermeneutics . In B. R. Wachterhouser(ed.),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uber, J. (1973) Symbolic interaction as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the bias of emergent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274-284.

Huberman, M. and Miles, M. (1994) Data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methods.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Hughes, H. S. (1961)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Random House.

Husserl, E. (1913) *Logische Untersuchungen*(Vol. 2). Halle: Max Niemeyer.

Ihde, D. (1997) *Expanding Hermeneutics* <http://ccmail.sunysb.edu/philosophy/Faculty/papers/Expherm.htm> (13February, 1999).

Ingarden, R. (1976) *Det litterära konstverket*. Lund: Cavefors. First published in 1931.

Irving, D. (1984)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1983 International Revisionist Confer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5 (2-4). See <http://www.codoh.com/irving/irvcontem.html> (22 September, 1999).

Israel, J. (1979) *The Language of Dialect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Language*. London: Harvester.

Jackall, R. (1988) *Moral Mazes. The World of Corporate Manag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J. (1995) 'Déjà entendu': the liminal qualities of anthropological fieldnotes. In J. Van Maanen(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Jackson, N. and Willmott, H. (1987) Beyond epistemology and reflective conversation: towards human relations. *Human Relations*, 40: 361-380.

Jaggar, A. M. (1989) Love and knowledge. *Inquiry*, 32: 51-176.

Jameson, F.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53-93.

Jameson, F. (1985)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 Foster(ed.), *Postmodern Culture*. London: Pluto Press. Paper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Jeffcutt, P. (1993) From interpretation to representation.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eds),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Jencks, C. (1987)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First published in 1977.

Johansson, O. L. (1990) *Organisationsbegrepp och begreppsmedvetenhet*. Göteborg: BAS.

Jönsson, S. A. and Lundin, R. A. (1977) Myths and wishful thinking as management tools. In P. C. Nystrom and W. H. Starbuck(eds), *Prescriptive Model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h-Holland.

Karlsson, G. (1993) *Psychological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Stockholm: Almqvist och Wiksell International.

Kaufmann, W. (1974)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50.

Keat, R. and Urry, J. (1975)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ent, T. (1991) Hermeneutics and genre: Bachti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incheloe, J. and McLaren, P. (1994)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Kittang, A. (1977) Hermeneutikk og litteraturvitskap. In H. Engdahl et al. (eds), *Hermeneutik*. Stockholm: Rabén & Sjögren.

Knights, D. and Willmott, H. (1987)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 management strategy: a critique and illustration from the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17:40-63.

Knights, D. and Willmott, H. (1989) Power and subjectivity at work. *Sociology*, 23:535-558.

Knorr-Cetina, K. (1981) Introduction. The micro-sociological challenge of macrosociology: towards a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K. Knorr-Cetina and A.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oestler, A. (1964) *The Act of Creation*. London: Hutchinson.

Kripke, S.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Oxford: Blackwell.

Krishnamurti, J. (1954) *The First and Last Freedom*. London: Gollancz.

Krupnick, M. (1983) Introduction. In M. Krupnick (ed.), *Displacement. Derrida and Aft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62.

Kunda, G. (1992) *Engineering Culture. 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vale, S. (1989) To validate is to question. In S. Kvale (ed.), *Issues of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und: Studentlitteratur.

Laing, R. D. (1960) *The Divided Self*. London: Tavistock.

Lalli, P. (1989) The imaginative dimension of everyday life: towards a hermeneutic reading. *Current Sociology*, 37 (1):103-114.

Lasch, C. (1978)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Norton.

Lasch, C. (1985) *The Minimal Self*. London: Picador.

Lash, S. (1988) Discourse or figure? Postmodernism as a 'regime of signific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311-336.

Latour, B. (1996) *Aramis—The Lov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urent, A. (1978) Managerial subordin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20-230.

Le Goff, J. (1992)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idner, R. (1991) Serving hamburgers and selling insurance: gender, work, and identity in interactive service jobs. *Gender & Society*, 5(2):154-177.

Leiss, W. (1978)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London: Marion Boyars.

Leiss, W. (1983) The icons of the marketpla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3):10-21.

Lemert, C. (1992) General social theory, irony, postmodernism. In S. Seidman, and D. Wagn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Lerner, E. (1991) *The Big Bang Never Happen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Lesche, C. (1986)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hermeneutischer Psychoanalyse. *Psyche*, 40(1):49-68.

Lévi-Strauss, C. (1967)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62.

Levinas, E. (1989) *Time and the Other*.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47.

Lincoln, Y. and Denzin, N.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ell, P. (1990) De institutionaliserade samtalens elementära former: om möten mellan professionella och lekmän. *Forskning om utbildning*, 4:18-35.

Linstead, S. (1993) From postmodern anthropology to deconstructive ethnography. *Human Relations*, 46:97-120.

Linstead, S. and Grafton-Small, R. (1990) Theory as artefact: artefact as theory. In P. Gagliardi (ed.), *Symbols and Artifacts: Views of the Corporate Landscape*.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Lukes, S. (1982) Of gods and demons: Habermas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J. B.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Lynch, M. and Bogen, D. (1994) Harvey Sacks' Primitive natural sci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1: 65-104.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yotard, J.-F. and Thébaud, J.-L. (1986) *Just Gam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dison, G. B. (1988) *The Hermeneutics of Postmoder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dison, G. B. (1991)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ty. *Critical Review*, 5(1):53-79.

Maffesoli, M. (1993a) Introduction. *Current Sociology*, 41(2):1-5.

Maffesoli, M. (1993b) The social ambiance. *Current Sociology*, 41(2):7-15.

Mandelbrot, B. (1977)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New York: Freeman.

Mangham, I. and Overington, M. (1987) *Organizations as Theatre*. Chichester: Wiley.

Manning, P. K. (1982) Analytic induction. In R. Smith and P. K. Manning (eds), *Qualitative Method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Månsson, P. and Sköldberg, K. (1983) *Symboliska organisationsmönster. Sju typer av planeringskultur under osäkerhet och stress i ett metamorfosperspektiv*. Doctoral dissertation. Umeå: Studier i företagsekonomi, Serie B. English summary.

Maranhão, T. (1991) Reflection, dialogue, and the subject.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Marcus, G. (1992) Past, present and emergent identities: requirements for ethnographies of the late twentieth-century modernity worldwide. In S. Lash and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Marcus, G. (1994) What comes (just) after 'post'. The case of ethnography.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rcus, G.. and Cushman, D. (1982) Ethnographies as text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25-69.

Marcus, G. and Fischer, M.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cuse, H. (1955)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Marcuse, H.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Marcuse, H. (1969)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Margolis, S. (1989) Postscript o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Both.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6: 5-30.

Marshall, H. and Wetherell, M. (1989) Talking about career and gender identities. A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 In S. Skevington and D. Baker (eds), *The Social Identity of Women*. London: Sage.

Marshall, J. (1993)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6. Newbury Park, CA: Sage.

Martin, J. (1990a) Breaking up the mono-method monopolies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In J. Hassard and D. Pym (eds), *The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Martin, J. (1990b) Deconstructing organizational taboos: the suppression of gender conflicts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1: 339-359.

Martin, J. (1992) *The Culture of Organizations. Three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J. R. (1994) 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 false difference, and other dangerous traps. *Sign*, 19: 630-657.

Marx, K. (1967) *Das Kapital*, Vol. 1Berlin: Dietz. First published in 1867.

Maynard, D. W. and Clayman, S. E. (1991) The diversity of ethno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385-418.

McCloskey, D. (1990) *If You're So Smart. The Narrative of Economic Expert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Illvenny, P. (1996) Popular public discourse at Speakers' Corner: negotiating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nteraction. *Discourse & Society*, 7: 7-37.

Mehan, H. and Wood, H.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Wiley.

Meisenhelder, T. (1989) Habermas and feminism.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 In R. A. Wallace (ed.),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Newbury Park, CA: Sage.

Melia, K. (1997) Producing 'plausible stories': interviewing student nurses. In G. Miller and R. Dingwall (eds),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Merleau-Ponty, M. (1973)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In M. Natanson (ed.),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G. (1997) Building bridges: the possibilities of analytic dialogue between ethnography,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Foucault.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Mills, C. W. (1940) Situated action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904-913.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Mintzberg, H. (1975) The manager's job: folklore and fac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 49-61.

Morgan, D. (1981)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process of sociological inquiry. In H. Roberts (ed.),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Morgan, G. (1980) Paradigms, metaphors and puzzle solving in organization theo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 605-622.

Morgan, G. (ed.) (1983) *Beyond Method*. Newbury Park, CA: Sage.

Morgan, G. (1986) *Images of Organiz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Morrow, R. (1994) *Crit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ustakas, C. (1994)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ullins, N. C. and Mullins, C. J. (1973)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 loyal opposition. In N. C. Mullins, *Theories*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Mumby, D. and Putnam, L. (1992)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a feminist reading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7: 465-486.
Mumby, D. and stohl, C. (1991) Power and discourse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absence and the dialectic of control. *Discourse & Society*, 2: 313-332.
Murti, T. R. V. (1980)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A Study of the Madhyamika System*. London: Unwin. First published in 1955.
Newton, T. (1996) Postmodernism and action. *Organization*, 3(1): 7-29.
Newton, T. (1998) Theorizing subjectivity in organizations: the failure of Foucauldian studies. *Organization Studies*, 19(3): 415-447.
Newton-Smith, W. H. (1990)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First published in 1981.
Norén, L. (1990) Om fallstudiens trovärdighet. FE-rappor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öteborg University.
Ödman, P.-J. (1979) *Tolkning förståelse vetande. Hermeneutik i teori och praktik*.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Ogden, C. K. and Richards, I. A. (1956)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Oleson, V. (1994) Feminisms and mode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Olsson, A. (1987) *Den okända texten*. Stockholm: Bonniers.
Ottmann, H. (1982) Cognitive interests and self-reflection. In J. B.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Palmer, R. E. (1969)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I. (1991) *Discourse Dynamics*. London: Routledge.
Parker, I. (1994) Reflexive research and the grounding of analysi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psy-complex'.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 239-252.
Parker, M. (1992) Post-modern organizations or postmodern organiz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17.
Parker, M. (1993) Life after Jean-Francois.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Perrow, C. (1978) Demystifying organizations. In R. Sarri and Y. Heskenfeld (eds),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Servi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ters, J. D. and Rotenbuhler, E. (1989) The reality of construction. In H. Simons (ed.), *Rhetoric in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Sage.
Pettigrew, A. (1985) *The Awakening Gia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hillips, N. and Brown, J. L. (1993) Analyzing communication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hermeneutic approa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6): 1547-1576.
Plummer, K. (ed.) (1991)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Vols 1-2.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olanyi, M. (1967) *The Tacit Dimens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ollay, R. W. (1986) The distorted mirror: reflections o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dvertis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5 (April): 18-36.
Pollner, M.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70-380.
Popper, K. R. (1976)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 W. Adorno, H. Albert, R. Dahrendorf, J. Habermas, H. Pilot and K. R. Popper,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First published in 1961.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London: Sage.
Potter, J. (1997)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way of analysing naturally occurring talk.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Potter, J. and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rasad, P. (1997) Systems of meaning: ethnography as a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A. Lee et al. (ed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Chapman & Hall.
Prigogine, I. and Stengers, I. (1993) *Das Paradox der Zeit. Zeit, Chaos und Quanten*. Munich: Piper.
Prior, L. (1997) Following in Foucault's footsteps: text and contex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Propp, V.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 Tale*, (2nd ed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adnitzky, G. (1970)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Metascience*. Vols Ⅰ-Ⅱ. Göteborg: Akademiförlaget.

Ravn, I. (1991) What should guide reality construction?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Richardson, L. (1995)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In J. Van Maanen, (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oeur, P. (1974)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Evanston, IL: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78a) Metaphor and the main problem of hermeneutics. In C. E. Reagan and D. Stewart (eds),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Boston: Beacon Press.

Ricoeur, P. (1978b) *The Rule of Metaphor: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of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oeur, P. (1985) *Time and Narrative,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oeur, P. (1988) *Time and Narrative,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coeur, P.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91) Inquiry as recontextualization: an anti-dualist account of interpreta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92) Cosmopolitanism without emancipation: a response to Lyotard. In S. Lash and J. Friedman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ose, N. (1989) Individualizing psychology. In J. Shotter and K.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Rosen, M. (1985) Breakfast at Spiro's: dramaturgy and domi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1(2): 31-48.

Rosen, M. (1988) You asked for it: Christmas at the bosses' expen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 463-480.

Rosen, M. (1991)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ield: understanding and doing 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8: 1-24.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h, P. A. (1991) Interpretation as explana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uin, H. (1994) *Enigmatic Origins. Tracing the Theme of Historicity through Heidegger's Work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edited by G. Jefferson and E. A. Schegloff).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acks, H., Schegloff, E. A.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turn taking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Säljö, R. (1990) Språk och institution: Den institutionaliserade inlärningens metaforer. *Forskning om utbildning*. nr 4: 5-17.

Sampson, E. (1989)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In J. Shotter and K.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Sanday, P. R. (1979) The ethnographic paradig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527-538.

Sandberg, J. (1994) *Human Competence at Work. An Interpretative Approach*. Doctoral dissertation. Göteborg: BAS.

Sandelands, L. and Drazin, R. (1989) On the language of organiz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10: 457-458.

Sangren, S. (1992) Rhetoric and the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y*, 33, Supplement: 277-296.

Sartre, J.-P. (1973)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London: Eyre Methuen.

Sarup, M. (1988)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Scheurmann, E. (ed.) (1984) *Papalagi. Tal av Söderhavshövdingen Tuiavii från Tiavea*. Göteborg: Korpen.

Schutz, A. (1967) *Collected Papers.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Nijhoff.

Schwandt, T.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 K.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rtzman, H. (1993) *Ethnography in Organiz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Seltzer, J. and Bass, B. (1990)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yond initiation and 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6: 693-703.

Sennett, R. (1977)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Vintage.

Sennett, R. (1980) *Authority*. New York: Vintage.

Shklar, J. N. (1986) Squaring the hermeneutic circle. *Social Research*, 53(3): 449-473.

Shotter, J. and Gergen, K. (eds) (1989)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Shotter, J. and Gergen, K. (1994) Social construction: knowledge, self, others, and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7. Newbury Park, CA: Sage.

Shrivastava, P. (1994) Ecocentric management for a risk socie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118-137.

Shusterman, R. (1991) Beneath interpretation.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ievers, B. (1990) The diabolization of death: some thoughts on the obsolescence of mortality in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J. Hassard and D. Pym (eds), *The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Organizations. Critical Issues and New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Silverman, D. (1970)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Heinemann.

Silverman, D. (1985)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ociology*. Aldershot: Gower.

Silverman, D. (1987) *Communication and Medical Practice*.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4) On throwing away ladders: rewriting the theory of organisations.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Toward a 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Silverman, D. (1997) The log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G. Miller and R. Dingwall (eds),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Simons, H. (ed.) (1989) *Rhetorics of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Sage.

Skeggs, B. (1994) Situating the production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In M. Maynard and J. Purvis (eds)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London: Sage.

Skinner, Q. (1986a)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Skinner, Q. (1986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J.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Skinner, Q. (1986c)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J.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Skinner, Q. (1986d)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Oxford: Polity Press.

Sköldberg, K. (1991a) *Reformer på vridscen. Organisationsförändringar i kommun och landsting*. Lund: Studentlitteratur.

Sköldberg, K. (1991b) Strategic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case of Sweden. *Higher Education*, 21: 551-572.

Sköldberg, K. (1992a) The alchemy of planning cultures: towards a theory of strategic chang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8: 39-71.

Sköldberg, K. (1992b) Through a glass darkly. A critique of Sandelands and Drazin. *Organization Studies*, 13: 245-247.

Sköldberg, K. (1994) Tales of chang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narrative mode. *Organization Science*, 5 (2): 219-238.

Sköldberg, K. (1998) Heidegger and organization. Notes towards a new research program.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4(1/2): 77-102.

Sköldberg, K. (2000a) *Tracks and Frames. The Economy of Symbolic Forms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Elsevier. (Forthcoming.)

Sköldberg, K. (2000b) *The Poetic Logic of Administration. Styles and Changes of Style in the Art of Organizing*. London: Harwood. (Forthcoming.)

Slater, D. (1989) Corridors of power. In J. Gubrium and D. Silverman (eds), *The Politics of Field Research*. London: Sage.

Slugoski, B. and Ginsburg, G. P. (1989) Ego identity and explanatory speech. In J. Shotter and K.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Sokal, A. D. (1996)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46/47: 217-252.

Sokal, A. D. and Bricmont, J. (1998) *Intellectual Impostors: Postmodern Philosophers' Abuse of Science*. London:

Profile.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Sotto, R. (1990) *Man without Knowledge. Actors and Spectators in Organiz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Spiegelberg, H. (1982)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3rd edn). The Hague: Nijhoff.

Spivak, G. C. (1976) Translator's preface. In J.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ix-xxxvii.

Stanfield, J. H. II (1994) Ethnic model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and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rrin, B., Larsson, G. and Willebrand, K. (1984) Upptäckande metodologi. *Sociologisk Forskning*, 3-4: 15-28.

Steedman, P. (1991)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eing, interpreting and knowing.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Steier, F. (ed.) (1991a)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Steier, F. (1991b) Reflexivity and methodology: a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ism.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Strauss, A.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and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yker, S. (1987) The vitaliza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0: 83-94.

Suppe, F. (ed.) (1977)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2nd ed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acussel, P. (1993) Imaginary and social aesthetics: epistemological proximity. *Current Sociology*, vol. 41/2: 33-42.

Taussig, M.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C. (1985a)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85b)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C. (1991) The dialogic self. In D. R. Hiley, J. F. Bohman and R. Shusterman (eds), *The Interpretive Turn.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J. (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Thompson, J. B. (1981) *Critical Hermene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 B. (1982) Universal pragmatics. In J. B. Thompson and D. Held (eds),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Thompson, J. B. and Held, D. (eds) (1982)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Macmillan.

Thompson, P. (197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P. (1993) Post-modernism: fatal distraction.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Sage.

Toulmin, S. (1953)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ndon: Hutchinson.

Touraine, A. (1992) *Critiqu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Fayard.

Tsoukas, H. (1989) The validity of idiographic research explan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51-561.

Tsoukas, H. (1991) The missing link: a transformational view of metaphors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 566-585.

Tsoukas, H. (1993)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in organis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14: 323-346.

Tuchman, G. (1994)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methods, and meanings. In N. Denzin and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 Maanen, J. (1979) The fact of fiction in 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4: 539-550.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Maanen, J. (ed.) (1995)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sina, J. (1961) *Oral Traditions: 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London: Routledge.

von Glasersfeld, E. (1991) Knowing without metaphysics: aspects of the radical constructivist position. In F.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von Wright, G. H.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Voyer, J. J., Gould, J. M. and Ford. D. N. (1996) *Systemic Creation of Organizational Anxiety: An Empirical*

Study. <http://www. sol-ne. org/res/wp/org_anxiety. html> (12 February, 1999).

Wachtel, P. (1983) *The Poverty of Affluence.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Wachterhouse, B. M. (1986)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understanding. In B. M. Wachterhouse (ed.),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alby, S. (1992) Post-post-modernism? Theorizing social complexity. In M. Barrett and A. Phillips (eds), *Destabilizing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Walzer, M. (1986) The politics of Michel Foucault. In D. C. Hoy (ed.),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Watson, T. (1994) *In Search of Management*. London: Routledge.

Weber, M. (196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22.

Weedon, C.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Weeks, P. (1996) 'A rehearsal of a Beethoven passage: An analysis of correction talk',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9: 247-290.

Weick, K. E. (1989)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16-531.

Weinberg, S. (1996) Sokal's Hoa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8 August: 11-16.

Wellmer, A. (1985) Reason, utopia and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In R.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hite, D. A. (1978) *Heidegger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White, H. (1985a)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White, H. (1985b)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78.

White, S. (1988) *The Recent Work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head, A. N.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derberg, K. (1992) Hur mycket kvinna får jag vara som vetenskaps-man? *Kvinnovetenskaplig tidskrift*, 3: 58-63.

Williams, R. (1976)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fus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D. C. Thorns (ed.),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y*, London: David and Charles.

Willmott, H. (1992) Postmodernism and excellence. The de-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5(3): 58-68.

Willmott, H. (1994a) Bringing agency (back) into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responding to the crises of (post) modernity. In J. Hassard and M. Parker (eds),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Willmott, H. (1994b)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earing the conversation but losing the dialogue.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17. Newbury Park, CA: Sage.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Blackwell.

Wolcott, H. (1995) Making a study 'more ethnographic'. In J. Van Maanen (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lin, R. (1993) Preface to the MIT Press edition. Note on a missing text. In R. Wolin (ed.),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ix-xx.

Woolgar, S. (1983) Irony in th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n K. Knorr-Cetina and M.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Sage.

Wucher, Albert (1961) *Eichmanns gab es viele. Ein Dokumentarbericht über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Munich and Zurich: Knaur.

Yukl, G. (1989) Managerial leadership: a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5: 251-289.

Ziehe, T. and Stubenrauch, H. (1982) *Plädoyer für ein ungewöhnliches Lernen. Ideen zur Jugendsituation*. Reinbek: Rowohlt.

Zuboff, S.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Oxford: Heinemann.

Zuckerman, I. G. (1993) Breaking out: the emergence of autonomous self-hood in women through psychotherapy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B. Glaser (ed.), *Examples of Grounded Theory*: 219-251.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索 引*

---

* 索引部分的页码为原英文版的页码,与本书切口方向的页码对应。

专有名称汉英对照表

人名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阿多诺　Adorno
阿格尔　Agger
阿加　Agar
阿克　Acker
阿兰　Alain
阿佩尔　Apel
阿斯普伦德　Aspland
埃尔莎·维利乌斯　Elsa Villius
艾尔维森　Alvesson
艾伦·索卡尔　Alan Sokal
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
爱丽丝　Alice
安格斯　Angus
奥德曼　Ödman
奥佛　Offe
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奥韦林顿　Overington
巴尔特　Barthes
巴赫京　Bakhtin
巴门尼德　Parmenides
巴舍拉　Bachelard
巴斯　Bass
柏格　Berg
邦奇　Bunge
保罗·德曼　Paul de Man
鲍迈斯特　Baumeister
鲍曼　Bormann
贝克　Baker
贝提　Betti
本杰明　Benjamin
本瑟姆　Bentham
本特森　Bengtsson
比林　Billing
彼得斯　Peters
波尔纳　Pollner
波普尔　Popper
波特　Potter
玻尔　Bohr
伯恩斯　Burns
伯恩斯坦　Bernstein
伯格　Berg
伯曼　Berman
伯特　Burt
博德里亚　Baudrillard
博曼　Bohman
博斯　Boss
布迪厄　Bourdieu
布朗　Brown
布劳　Blau
布里克蒙　Bricmont
布卢默　Blumer
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布鲁特-伊果　Pruitt-Igoe
布洛克　Bollock
布洛维　Burawoy
布什曼　Bushman
布思比　Boothby
达尔文　Darwin
大卫·欧文　David Irving
道格拉斯　Douglas
德赖富斯　Dreyfus
德勒兹　Deleuze
德里达　Derrida
德里伊森　Droysen
德曼　de Man
狄尔泰　Dilthey
迪尔凯姆　Durkheim
笛茨　Deetz
蒂斯塔·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俄狄浦斯王　King Oedipus
厄里　Urry
恩　Ehn
范·马伦　Van Maanen
菲利普斯　Phillips

费瑟斯通 Featherstone
费特曼 Fetterman
费希尔 Fischer
费耶阿本德 Feyerabend
费伊 Fay
冯·诺伊曼 Von Neumann
冯格拉塞斯菲尔德 Von Glasersfeld
弗格森 Ferguson
弗拉克斯 Flax
弗雷泽 Fraser
弗林 Flynn
弗罗姆 Fromm
弗洛伊德 Freud
弗希尔 Fisher
福尔热 Forget
福柯 Foucault
福里斯特 Forester
富克斯 Fuchs
盖布莱恩 Gubrium
盖拉尔迪 Gherardi
戈夫曼 Goffman
格尔茨 Geertz
格根 Gergen
格拉夫 Graff
格拉泽 Glaser
哈贝马斯 Hrbermas
哈德兰 Hardland
哈丁 Harding
哈默斯利 Hammersley
海德格尔 Heidegger
海格 Haig
海曼 Hayman
海森伯格 Heisenberg
汉森 Hanson
汉斯 Hans
荷尔德林 Hölderlin
贺瑞斯 Horace
赫伯特·布卢默 Herbert Blumer
赫勒纽斯 Helenius
赫里蒂奇 Heritage
赫斯特 Hester
赫希 Hirsch
怀特黑德 Whitehead
霍尔 Hall
霍尔斯坦 Holstein
霍克海默尔 Horkheimer
霍利斯 Hollis
基特 Keat
吉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
吉登斯 Giddens
吉尔德纳 Gouldner
吉耶·德·蒙托 Guillet de Monthoux
加达默尔 Gadamer
加芬克尔 Garfinkel
加缪 Camus
贾加尔 Jagger
杰夫卡特 Jeffcutt
居巴 Guba
卡尔霍恩 Calhoun
卡拉斯 Calás
卡普托 Caputo
卡斯塔尼达 Castaneda
卡斯特洛狄斯 Castoriadis
卡伊·舍尔德贝里 Kaj Sköldberg
坎托 Cantor
科尔宾 Corbin
科林伍德 Collingwood
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
克莱格 Clegg
克莱曼 Clayman
克里克 Click
克里斯蒂娃 Kristeva
克里希纳穆提 Krishnamurti
克利福德 Clifford
克罗内克尔 Kronecker
克沃勒 Kvale
肯特 Kent
孔达 Kunda
库恩 Kuhn
库利 Cooley
拉奥·瓦伦贝格 Raoul Wallenberg
拉德尼茨基 Radnitzky
拉康 Lacan
拉图尔 Latour
拉希 Lasch
拉札斯菲尔德 Lazarsfeld
莱德纳 Leidner
莱戈夫 Le Goff
莱斯 Leiss
兰克 Ranke

勒夫格伦 Löfgren
李凯尔特 Rickert
里克尔 Ricoeur
利奥塔尔 Lyotard
利文斯顿 Livingstone
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
列维纳斯 Levinas
林肯 Lincoln
林奇 Lynch
林斯特德 Linstead
鲁因 Ruin
伦丁 Lundin
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罗布-格里耶 Robbe-Grillet
罗蒂 Rorty
罗兰布勒 Rotenbuhler
罗姆 Röhm
罗森 Rosen
罗西瑙 Rosenau
洛里亚 Loria
洛伦茨 Lorenz
马丁 Martin
马费索利 Maffesoli
马戈利斯 Margolis
马克思 Marx
马库斯 Marcuse
马里奥·邦奇 Mario Bunge
马歇尔菲尔德 Michelfelder
麦迪逊 Madison
曼德尔布罗特 Mandelbrot
曼厄姆 Mangham
曼宁 Manning
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
茅斯他嘉 Moustakas
梅利亚 Melia
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梅纳德 Maynard
蒙松 Månsson
米德 Mead
明茨伯格 Mintzberg
摩根 Morgan
摩根斯坦 Morgenstern
默顿 Merton
穆白 Mumby
尼科尔森 Nicholson
牛顿 Newton
帕尔默 Palmer
帕克 Parker
帕森斯 Parsons
帕特南 Putnam
庞加莱 Poincaré
佩蒂格鲁 Pettigrew
佩罗 Perrow
普里果金 Prigogine
齐厄 Ziehe
让·热内 Jean Genet
萨廖 Säljö
萨鲁普 Sarup
萨特 Sartre
赛尔策 Seltzer
森尼特 Sennett
舍尔德贝里 Sköldberg
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
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施泰尔 Steier
施图本劳赫 Stubenrauch
舒巴罗夫 Czubaroff
斯金纳 Skinner
斯莱特 Slater
斯莫利佐夫 Smoltsov
斯默西奇 Smircich
斯皮瓦克 Spivak
斯塔林 Starrin
斯坦菲尔德 Stanfield
斯特劳斯 Strauss
斯滕格 Stengers
斯托尔 Stohl
斯托克 Stalker
索托 Sotto
泰勒 Taylor
汤普森 Thompson
陶西格 Taussig
特博 Thébaud
特纳 Turner
图尔明 Toulmin
涂尔干 Durkheim
托卡斯 Tsoukas
瓦耶 Voyer
威 登 Weedon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韦伯 Weber
韦瑟雷尔 Wetherell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温柏格 Weinberg
温根 Wingens
文德尔班 Windelband
沃尔比 Walby
沃昆特 Wacquant
沃森 Watson
西尔弗曼 Silverman
西梅尔 Simmel
西西弗斯 Sisyphus
希克拉 Shklar
肖特 Shotter
肖伊尔曼 Scheurmann
伊利亚德 Eliade
伊斯雷尔 Israel
约恩松 Jönsson
约翰逊 Johnson
扎尼亚斯卡-尤格斯 Czarniawska-Joerges
詹克斯 Jencks
祖波夫 Zuboff

作品名称汉英对照表(以首汉字拼音为序)

阿拉米 Aramis
存在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单向度的人 One-Dimensional Man
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
后现代状况 Postmodern Condition
健全的社会 the Sane Society
李尔王 King Lear
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罗生门 Rashomon
启蒙辩证法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社会科学质性分析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社会文本 Social Texts
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逃离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脱衣舞娘 Striptease
现场的传说 Tales of the Field
小姐与流浪汉 the Lady and the Tramp
新观察 le nouvel observateur
性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逾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转换解释学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r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和策略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占有还是生存? to Have or to Be?
质性研究基础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近60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09年版

1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吴明隆 著
定价:59.8
书号:978-7-5624-4947-8

2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中文视窗版数据分析范例解析**
邱皓政著
定价:49.5
书号:978-7-5624-4821-1

3 **如何解读统计图表:研究报告阅读指南**
纳迪 著 汪顺玉 等译
定价:19
书号:978-7-5624-4906-5

4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个案阅读)**
列堡 著 李文茂 等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7-9

5 **客厅即工厂(个案阅读)**
熊秉纯 著 杜芳琴 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886-0

6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个案阅读)**
沃尔科特 著 杨海燕 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880-8

7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
艾尔维森 等著 陈仁仁 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889-1

8 **解释互动论(校订新译本)**
邓金 著 周勇 译 刘良华 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936-2

9 **社会评估:理论、过程与技术**
泰勒 等著 葛道顺 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4975-1

10 **调查研究方法(校订新译本)**
福勒著 孙振东等译 沈崇鳞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89-0

11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著 周海涛译
书号:978-7-5624-4679-8

12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78-4

13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著 定价:38
书号:978-7-5624-4649-1

14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16-3

15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等著 林小英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690-3

16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著 边国英译 陈向明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747-4

17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3640-9

18 **AMOS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806-8

19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著 许梦云译 高丙中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698-0

20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等著 郑显兰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720-7

21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著 卢晖临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年版

22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著 李涤非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465-7

23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著 郭志刚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483-1

24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著 沈崇麟译 定价:22
书号:978-7-5624-4487-9

25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著　定价:40
书号:978-7-5624-4446-6

26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主编　定价:30
书号:978-7-5624-4462-6

27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著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456-5

28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著　卢晖临译　定价:78
书号:978-7-5624-4426-8

29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著　刘军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296-7

30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304-9

31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著　王红艳译:定价:27
书号:978-7-5624-4303-2

32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著　于泽元译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349-0

33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著　史玲玲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196-0

34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著　王天夫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290-5

35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著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 年版

36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著　李涤非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259-2

37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 著　郭志刚译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060-4

38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著　邱泽奇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3994-3

39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著　林小英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990-5

40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著　朱光明译,陈向明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71-4

41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055-1

42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著　龚建华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96-7

43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著　高勇译　沈崇麟校　定价:35
书号:978-7-5624-3942-4

44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著　沈崇麟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3943-1

45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3851-9

46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8
书号:978-7-5624-3286-9

47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38
书号:978-7-5624-3948-6

48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3944-8

49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著　崔延强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644-7

50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著　刘军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2147-4

51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 年以前版

52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41-6

53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25-0

5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89-4

55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441-7

56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669-X

57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著　风笑天译　定价:68
书号:978-7-5624-3295-1

58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第2版)
德维利斯著　李红等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0-5

59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15
书号:978-7-5624-3266-1